

一流大学、一流人才如何塑造  
畅销书《一岁就上常青藤》作者最新力作  
作者新浪博客火爆点击即将突破3000万

薛涌◎著



# 美国大学 原来是这样的

MEIGUO DAXUE  
YUANLAI SHI ZHEYANG DE



漓江出版社



# MEIGUO DAXUE YUANLAI SHI ZHEYANG DE

2010年北京市理科高考状元李泰伯成了双料名人——除状元身份外，他申请美国11所顶尖大学全部遭拒。美国的顶尖大学为什么不待见高考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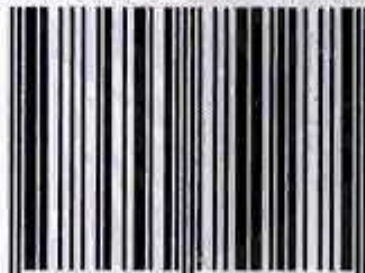
到美国该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怎样度过大学的时光？上名校和普通院校究竟有多大不同？这些选择对人的一生又有多大的影响？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 888 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才生帮着人家发展”，他吃里扒外的形象跃然而出。那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

2004年菲尔普斯在雅典奥运会拿下六金，2008年，他在北京奥运会则冲到八金。他是毫无争议的世界泳王。但是，在这两届奥运之间的四年，他的生活仍然保持着同龄人的一部分常规：读高中、上大学。这辉煌的整个过程，你看不到一点国家的介入。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菲尔普斯？

上架建议：社科·教育

ISBN 978-7-5407-50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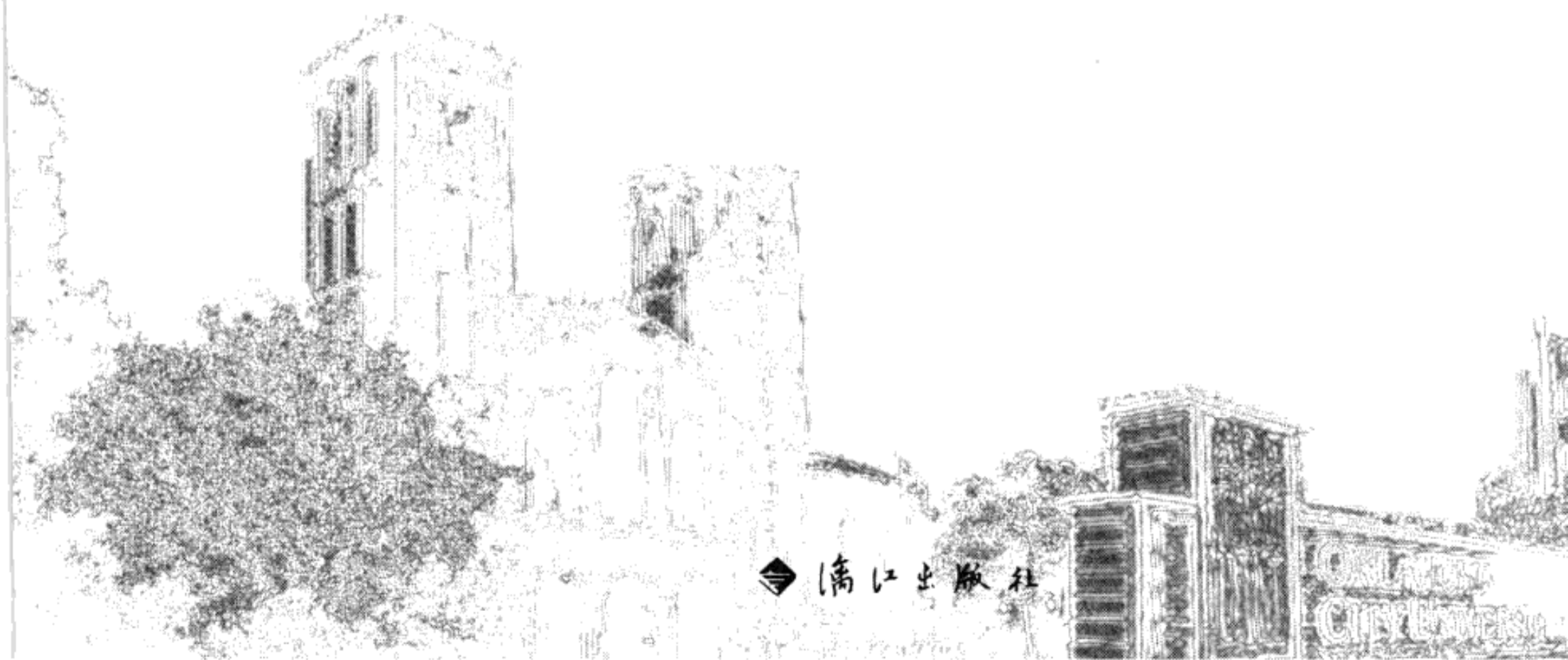
9 787540 750275 >

定价：30.00元

# 美国大学 原来是这样的

MEIGUO DAXUE  
YUANLAI SHI ZHEYANG DE

薛涌◎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 / 薛涌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07-5027-5

I. ①美… II. ①薛…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3999号

## 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

---

作 者 薛 涌  
责任编辑 兰文娟  
责任校对 徐 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朝晖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027-5  
定 价 30.0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序言 一流大学，一流美国人

### ——领导21世纪的核心战略

一流的大国必须有一流的国民。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主流战略家仍然认为美国将领导21世纪，并且不停地在为巩固这种领导地位作准备。他们设计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塑造一流的美国人，保证美国人是世界最优异的民族。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核心措施，就是保持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不久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领衔对美国大学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评估。这一充满忧患意识的调查评估，虽然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深重危机，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认为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的美国大学甚至可能被低估了。

美国人真会比别人优异吗？美国的大学，是否足以保证美国人的优异？作为中国在21世纪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美国在这方面的一系列作为对中国提供了什么启示？中国应该怎样来应对？更为实际的问题是，现在不仅许多中国的大学以美国模式为范本，甚至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直接送到美国去读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和学子们从美国教育中能够获得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本书所讨论的核心。

其实，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要保持其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都非常艰难。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比如，最近美国出版界有一股“帝国热”，特别是讨论罗马帝国的书籍汗牛充栋。从人口上看，罗马帝国对当今的美国都提供了许多警示：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盛期，人口高达6500万，占当时世界3亿左右总人口的21%。甚至有学者大胆估计，当时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口高达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不管怎么说，罗马帝国当时的人口恐怕已经超过了

公元初年西汉极盛期五六千万的人口数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但是，也正是从这个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人口随着战争和瘟疫开始大幅度下降。到6世纪中期，东西罗马帝国境内人口相加也不过在百万左右（此时西罗马帝国业已灭亡）。更有历史学家指出，罗马的富人喜欢在烹调中使用铅锅提取和掺加糖分，导致了慢性的铅中毒。考古发现证明罗马人的遗体中含铅确实过高，特别是贵族阶层的铅摄入量明显高于平民和奴隶。这就导致了统治阶级健康质量和智商的下降。总之，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统治阶层的人口质量）的下降，使罗马帝国在对付内外危机时缺兵少将、领导无方，最终被“野蛮人”所征服。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就被比之为当今的罗马帝国。那么，美国会不会重蹈罗马帝国之覆辙？这是举世都在追问的问题。从人的素质上看，这种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是从来没有人能避免的。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就讨论过这一问题：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有着崛起期、极盛期和衰落期这三个阶段。这就像人从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一样自然，像植物开花结果最终枯萎一样不可避免。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文明都是如此。在崛起期的后半段是最有创造力的。进入盛期不久就像人到中年，然后步步走下坡路。

美国在18世纪诞生，自19世纪崛起，在20世纪带领自由世界战胜了希特勒，打赢了冷战，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极盛时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至今仍然是世界的独霸。经过这么长的荣耀，我们已经很难说美国还在崛起的青年期。特别是面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美国已经显示出中年状。从社会层面看，美国人的素质也确实有下降的趋势。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cKinsey等权威机构的调查评估，在2006年3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15岁的学生中，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排第25，科学排第24。在40年前，美国在高中毕业率上还领先于世，如今在28个工业国家中排第18。在1995年，美国的大学生在适龄青年中的比率还是世界并列第一，10年后跌到第14。还有更令人忧虑的两点：美国中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世界最高的，美国学生是自我感觉最好的。尽管他们的能力很差，但在被问及自己和其他国家学生的对比时，美国学生回答自己属于最好的或者自己拿了最好的分数的人的比例最高。

我在波士顿的一所地方大学中教书，总发现那些操着外国口音的学生表现比较好一些。我曾经两次以不同的方式在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外国子弟表



现比较好？每一次都引起公愤。许多学生听了我的话后张大了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似乎一辈子没有人和他们讲过这种话。后来我干脆拿出了波士顿的例子，终于让他们哑口无言：2005年，波士顿34所公立高中的第一名（即为师生选为毕业典礼代表学生致辞的人），有20名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孩子，有的13岁来美国时一句英语不会，有一个还在等待遣返。我问学生：外国移民占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几？怎么你们人多势众，却让条件差得多的外国人拿第一？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调查亚裔和拉美裔移民，发现第一代移民学术表现最好，第二代则稍弱，但到了第三代就明显下降，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学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越是美国化，学术表现就越差。

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盛极而衰的征候。这就如同罗马帝国一样，空前的繁荣腐蚀了公民的品性，滋长了其傲慢和虚荣。许多美国人觉得上大学、拿高薪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从不觉得这一切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得来。这些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听不得一点不顺耳的话。美国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老师警告他们，生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这样，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泡沫中，甚至不知道自己落后。上述权威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学生的落后，并不能归结为贫富分化。事实上，美国比较富裕阶层的子弟，在学术表现上都比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孩子要落后。

尽管如此，美国的大学仍然雄踞世界一流，而且其在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至今还无人能够挑战。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美国的义务教育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末流，高等教育却能雄踞第一？这是我还无法回答的问题。本书所集中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的大学在面对上述种种危机和挑战中的挣扎与奋斗。如今许多中国人把美国视为中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和赶超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竞争的结果就要看两国的教育体制哪个更能有效地培养人才。所以，美国的大学这些年如何运作，值得中国的读者拿来和中国的现实进行对照。

我在1979—1983年间在北大完成了4年的本科，在1994—2004年间在耶鲁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任教。也就是说，我在中国大学里读了4年书，在美国大学里则泡了16年。同时，自2002年以来，一直把个人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观察向中国读者进行介绍。这些介绍，大都收集在《培养精英》、《北大批判》等著作中。如今回顾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写作一

直以描述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异之处为核心，对其存在的问题触及不多。这一来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习之处，二来美国大学的问题多来源于其社会文化的因素，比如根植于种族问题的认同政治等等，和中国国情并不衔接，谈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中国也缺乏意义。简单地说，我试图描绘的主要是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什么，把人家的好处讲清楚。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以此为核心。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内在的问题。随着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不断地创纪录，并成为美国外国学生中最大的一个地域或国家集团，美国大学的问题，也不再是和中国不相干的事情了。可惜，在这方面，国内还很少有人留意。我自己也做得相当不够。不过，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我多少开始了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希望给国内的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的图景。

本书写作时间，大约跨越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五六年，世界天翻地覆。特别是最近遍及全球的经济“大衰退”，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打击很重。在此之前写的文章，自然带有那个已经消失的繁荣时代的印记。不过，大学是目前西方最古老、最有持续性的制度，已经有了八百年左右的历史，其核心的制度框架并没有变动。从如此漫长的历史眼光看，这次“大衰退”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不过是个小小的涟漪而已。当今美国的大学，和五年前、十年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那时写的文章，今天读来也没有过时之感，照样能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只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到有一些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事件，乃是几年前的背景。当然，书中的另一些篇章，则是最近两年的作品。总之，读者如果能以2005—2010年的历史为背景，就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具体描述。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博大精深，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也永远处于进行时态中。本书和《培养精英》等著作一样，只不过反映了片段的印象。日后在这方面，还应当不断地写下去，不断地和读者分享自己的经验。

# 目 录

## Contents



序言 一流大学，一流美国人  
——领导 21 世纪的核心战略 / 001

### 真实的美国大学

美国的顶尖大学为什么不待见高考状元？ / 002

到美国该上什么大学？ / 004

给完整的人以生长的空间

——美国大学的寄宿热 / 011

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 / 017

美国大学的阴盛阳衰 / 019

美国的名教授怎样对待学生 / 023

教授首先要假设学生比自己聪明 / 025

美国有国学吗？ / 030

大学为什么要尊文史 / 033

从布朗校长的纠纷看企业的廉正透明 / 036

美国盛产“克莱登大学”吗？ / 038

美国大学里的校漂族 / 043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 047

大学应该怎样竞争？ / 053

美国的应试教育之父 / 056

金融泡沫后的美国大学 / 060

美国大学是否会成为房市后的另一个泡沫 / 063

美国大学还能继续保持一流吗？ / 067

## 哈佛，哈佛

- 女人领导哈佛 / 074
- 哈佛怎么录取学生 / 077
- 哈佛的“核心” / 082
- 免费上哈佛? / 087
- 哈佛的性生活 / 092
- 怎样医治哈佛的富贵病 / 099
- 哈佛能改变美国的大学申请战吗? / 102
- 哈佛法学院终于扬眉吐气 / 105
- 哈佛教授被捕所引起的种族争议 / 110
- 从哈佛丑闻看媒体对学术的监督 / 113

## 常青藤秘密

- 常青藤究竟值多少 / 118
- 挑战常青藤 / 122
- 常青藤之间的 PK / 124
- 常青藤能扩招多少? / 127
- 新常青藤的崛起 / 130
- 美国州立大学的常青藤化 / 135
- 经济危机和常青藤的分数 / 140
- 谁把亚裔子弟挤出名校 / 142
- 对耶鲁校长行使一下“批判性思维” / 147
- 商学院本科：大学教育的另类? / 150
- 华尔街的人才泡沫? / 154
- 最高法院的“常青藤专政” / 156



## 体育影响一生

- 美国的大学体育 / 160
- 是什么造就了菲尔普斯  
——透析美国的体育制度 / 165
- 学校为什么需要体育? / 171
- 体育与美国的通才教育 / 174
- 创新阶层的时尚 / 176
- 华尔街中的橄榄球 / 179
- 拉拉队的政治 / 181
- 大学体育这门买卖 / 184
- 奥运项目背后的社会阶层 / 187
- 由市长的大学教育想到的 / 189
- 最知名的大学女篮教练 / 192
- 黑人难当教练 / 195
- 美国大学的体育超霸 / 197
- 美国高中橄榄球的崛起 / 200
- 大学橄榄球：生意还是品牌 / 202
- 大学球星怎样成功 / 204

## 美国大学的钱经

- 要钱的文化 / 208
- 耶鲁财神 / 211
- 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 / 215
- 美国大学的热门专业涨价 / 218
- 美国大学通过涨学费竞争 / 222
- 文凭叹  
——美国“升学女王”的奇异丑闻 / 225

一流学者中的非法移民 / 227

非法的精英

——哈罗德的普林斯顿历险记 / 231

美国大学中的贫困生 / 235

美国贫困生中介业的兴起 / 240

美国大学录取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 / 243

## 中国大学要向美国学什么？

美国高等教育给中国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 / 248

中国的大学如何走出“弱智化” / 259

清华应该怎么学习美国的奖学金制度 / 280

怎样拓展技工教育的前途 / 282

怎样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 285

比比中美的学贷 / 288

中国大学缺乏“中产阶级” / 290

# 真实的美国大学



## 美国的顶尖大学为什么不待见高考状元？

2010年北京市理科高考状元李泰伯成了双料名人。除了状元身份外，他申请美国11所顶尖大学全部遭拒。于是引来媒体的一阵“反省”，称应试教育培养不出优异的人才来。另有个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称过去30年的状元表现都低于预期，没有一个在自己的领域达到“一流”。

我并不赞成以美国大学的取舍来判断某人是不是人才。我多少也算是留美过来的人。一位常青藤的著名教授曾坦率地告诉我：“录取的盲目性很大，经常会招错了学生。特别是隔着太平洋录取中国学生，更难判断。只能尽力而为，最后还要看运气了。”所谓过去30年的状元没有一个成为“一流”之说，也有待推敲。比如“一流”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并没有个界定。我个人就认识非常优异的“高考状元”。

不过，李泰伯的个案，确实有助于我们反省中国的教育制度。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家Tony Wagner曾经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他个人的一段经历。2006年，他外出讲演，在飞机上正好和一位大公司的总裁为邻座。两人一聊天，他就发现这位总裁在招募人才上亲力亲为，花了很大的精力。于是他就问总裁：“在新招募的雇员身上，你最渴求的素质是什么？”对方答道：“会问好的问题。我们的业务每天在变，技术在不断更新。我们会教给雇员新技术。但是，他们要想解决问题、学习新东西，必须知道应该问什么。我们无法现教他们怎么问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素质是你所渴求的呢？”

“我需要那些能够参与讨论的人。”总裁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工作都是由团队



配合完成的。你必须懂得如何与同事相处，如何与顾客打交道。如果你不能和别人深入交流，你就不可能学到你需要学的东西。”

这番对话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我并不是说所有企业总裁都把上述两个素质排在第一第二位。但是，这两项素质之重要，在美国不断被各企业界人士所强调，是真实世界对培养人才提出的真实的要求。再看我们的教育，有多少是围着这样的素质转呢？

李泰伯落选美国11所顶尖高校，可能是他的个人素质问题，可能是申请的技术问题，也有可能是美国的高校集体看走了眼的问题。对此我们很难断定。不过，为他惋惜和不平的人说：他功课出色，钢琴水平很高，喜欢作曲，是班干部等等。这些固然都不错。但是，他问问题的能力如何？深入讨论问题的能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的教育也没有衡量这种素质的指标。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 到美国该上什么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学已经成为事业成功的敲门砖。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洲国家，每年也输送大量的子弟留美，希望借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出人头地。这也难怪，各种媒体每年都公布不同专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成为众多莘莘学子的求学指南。可惜，这类炒作，常常误人子弟。因为大学教育对人生的影响远不止于毕业后找的第一个工作。要衡量大学对人一生事业的影响，就必须有长时间段的指标。美国一家权威的民间机构PayScale Inc.经过一年的努力，调查了至少有10年（平均15年半）工作经验的120万大学本科毕业生，用他们的收入数据为我们衡量大学教育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准。比如，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怎样度过大学的时光？上述这些选择对人的一生有什么影响？以数据为基础实证性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美国的学生和家长至关重要，对那些不太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的亚洲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而言，就更有参考意义了。

PayScale Inc.的统计涉及的人数众多，因而比较准确。更重要的是，该统计设定了长时间段的指标：既有毕业生起薪的数据，又有毕业十几年后“事业中程”时期的收入数据。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在35到40岁这个阶段，一生的事业已经能大致看出个气象来。同时，数据又以常青藤盟校、州立大学、私立文理学院、“派对大学”（Party School），以及不同的专业来分门别类。这样就方便人们通过各种角度来衡量大学教育的经济效益。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上名校和上普通院校究竟有多大不同？这一统计表明，



名校毕业生在收入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比如，哈佛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起薪为44500美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同专业的学生，起薪仅35000美元。此时哈佛学生的收入高出了27%。十几年后，哈佛学生的年薪涨到了103000美元，要比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同阶段的收入高出111%！收入差距急剧拉大。总的来说，常青藤的毕业生收入最高，接下来是私立文理学院，著名的州立大学也还不错，但“派对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虽然尚可，收入的后劲则明显不足。

常青藤盟校和私立的文理学院一直是美国精英教育的两大代表，孰优孰劣也并非没有争议。常青藤盟校一个个都势可敌国，不仅资金雄厚、明星教授满堂，而且吸引了最优异的学生，是门槛最高的学校。但是，许多批评者认为，常青藤过分注重研究，轻视教学，导致师生关系疏远；不管有多少明星教授，他们和学生实际上很少交流。这样的学校，名气虽大，但所提供的教育未必有那么好。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小型的私立文理学院。这种学校以本科教育为核心，很少有研究生课程。教师也全心全意地教学，师生关系密切。比如，学生经常和教授组成项目团队，一起共事。这样由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自然素质较好。

从表面的统计数据上看，常青藤盟校有着明显的优势。比如，常青藤毕业生的中等起薪比文理学院高32%，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比文理学院高34%。不过，再认真分析，这里面还是有不少文章可做。比如，常青藤毕业生起薪最高的是普林斯顿，中等年薪为66500美元；哈佛紧追其后，达63400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排第三，为60900美元。但是，十几年后局面就变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毕业时起薪虽然仅仅58000美元，但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收入则为134000美元，高居第一；普林斯顿的学生毕业十几年后的中等收入则为131000美元，屈居第二；第三名是耶鲁，其毕业生的中等收入从刚毕业时的59100美元提高到了126000美元；大名鼎鼎的哈佛跌到第四，为124000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则沦为第五，为120000美元。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但是，从常识上不难进行若干推论：小型的文理学院式的教育确实塑造了良好的素质，有助于学生长期的发展。在这几个常青藤盟校中，达特茅斯学院实际上更像是一所文理学院，基本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不设立大规模的研究设施。博士课程非常少，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且全限于科学领域。文科仅勉强有个人文研究的硕士课程。剩下的就是商学院等职业性学

院了。其研究院，甚至无法和普通的州立大学相比。该校被归入常青藤盟校，主要是因为其传统。按性质归入文理学院也无不可。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校中，普林斯顿规模最小，耶鲁次之。这两个学校虽然有一流的研究院，但比起哈佛来，也都比较注重本科教育。学生刚毕业时，哈佛学生凭借学校的大名而先声夺人，占据了高薪的好位置。但是，达特茅斯这种“小学校”的学生，则可能靠自己的素质后来居上。我认识的一位达特茅斯的毕业生就说：“在哈佛，明星教授如云，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面对这些教授全吓傻了，除了听听大课、领略一下其风采外，很少能与之有个人之间的接触。这就像看戏看电影一样，算什么一流教育？等这些孩子慢慢成熟起来，有勇气和教授交流时，也该毕业了。在达特茅斯则不然。我的教授知道我的兴趣，甚至会到我宿舍来通知我有个我可能感兴趣的讲座。”一位哈佛的毕业生也说：“哈佛有许多资源，这是任何学校无法相比的。但是，这些资源必须你自己去找。一个20岁上下的孩子，一般很难自己去挖掘这些资源。”

小型文理学院的学生，无论是毕业后的中等起薪还是事业中程时的中等年薪都低于常青藤的学生。但是，其薪水的上涨速度和常青藤相差不大。在文理学院中，学生收入排名第一的是Bucknell University，在中文世界几乎不为人知。其毕业生的中等起薪是54100美元，十几年后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为110000美元。接下来的四所学校也都差不多，在108000到107000美元之间。而常青藤中排末名的哥伦比亚的学生，事业中程的平均年薪也是107000美元，比Bucknell University要低。可见，常青藤盟校并不都有绝对优势。

在州立大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唯一一所学生收入超过文理学院的学校，其毕业生的中等起薪为59000美元，十几年后的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达112000美元。但排第二的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中等起薪为52700美元，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则为103000美元，明显低于前五所文理学院的水平。这里的道理也是大同小异。伯克利的名气可比常青藤。其学生靠本校的声誉在毕业找工作时可以先声夺人，以后只要维持同样的收入增长率，事业中程时还是高人一头。但普遍而言，重要的州立大学虽然名气大，但教育质量赶不上文理学院，毕业生工作十几年后的收入水平也略低。

最有意思的，大概还是“派对大学”。常青藤盟校学生之用功是有名的，乃至睡眠不足成了一种流行的大学病。不过，美国主流的大学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对许多美国的适龄青年而言，大学就是一个“过把瘾就死”的青春派对：同龄人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尽兴而散。著名的大学评估媒体《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和《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都有自己的“派对大学”排名。其评选的依据主要是酗酒、吸毒等等“娱乐指标”，以及学生每天学习的时间（自然是越少越能入选）。这种评选，在美国一直受到许多攻击。批评者认为这等于鼓励年轻人酗酒吸毒、荒废青春。不过，我认识的一位家长，自己是名校出身，还有过在哈佛任教的经历，却心甘情愿地送儿子去头号的“派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读书。他的理论是，自己的儿子虽然功课不错，但讨厌读书，去了常青藤会度日如年，反而容易出事，弄不好心理压抑，对其一生有负面影响。到了“派对大学”，整天打橄榄球、游泳，玩累了以后说不定还会想到读书。这样心情舒畅、自信、合群，对以后的发展反而会好。其实，这些“派对大学”，绝不是什么糟糕的学校，而主要是一些知名的州立大学，比如伊利诺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等等。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时靠本校的名气也可以先声夺人。但是，四年吃喝玩乐下来，对自身素质还是有影响，收入增长的后劲儿不足。比如，收入最好的“派对大学”是在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诺斯大学。这是最顶尖的州立大学之一，名气远盖过一些小型的文理学院。很自然，该学校的毕业生起薪将近6万美元，明显高于任何一所文理学院。但十几年后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则仅为96100美元，比常青藤、顶尖的几所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都低了不少。即使抛开各类大学中的头几名，以平均的院校进行比较，在毕业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文理学院的学生的中等年薪提高了95%，从45747美元上升到89379美元；“派对大学”的学生则仅提高了85%，从45715美元涨到了84685美元。可见，即使到有名的大学去开四年派对，在事业上也非明智之举。

在我看来，对注重专业的亚洲学生最有参考价值的还是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收入比较。美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实用，在各种媒体每年公布各专业毕业生中等起薪的排名中，也是越实用的专业排名越高。比如，根据“全美大学与雇主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的数据，2008年十大顶尖起薪专业的排名是：化学工程（59218），电器工程（55333），机械工程（54057），计算机科学（53051），民用工程（48998），经济（47782），信息管理系统（47407），金融（46442），会计（46292），企业管理（43256）。至于文学、语言、历史等不实用的

专业的学生，起薪则远在其后。一般的美国学生理工训练不足，对工科望尘莫及。为了挣钱，就纷纷学企业管理类。结果，全美五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全是学和企业管理相关的专业。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历史。这属于最不实用，也是最不值钱的专业之一。我反复向学生说：不要信这样的排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一般比较成功。我的道理有三条：第一，本科教育如今已经成了普及的基础教育。一个本科文凭不足以使你成为专家，不要把本科的专业看太重。本科教育要广一些，注重基础学科，注重通识。历史专业比起企业管理来，要宽广得多，更符合大学通才教育的理想。第二，要成为专业人才，必须读研究院，比如商学院、法学院等等。那么，这样的研究院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院招生不看专业，但实际上文学、历史等专业的学生在录取时似乎更受青睐一些。第三，一般而言，能够在讲究实用的世界里对文学历史等不实用的学科感兴趣的人，智商比较高。他们的关怀涉及人类文明的大问题，日后容易成为领袖人物，也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学实用专业的人，则往往对这些问题无理解力，心里仅惦记着下一张工资单是多少。这是能力不足，除了自己的生存而无暇旁顾的征兆。所以，一些著名的法学院甚至商学院对历史专业的学生的评价远胜过企业管理的学生。有大作为者总需要人文教育所培养的远见、想象力和分析力。我还提醒学生们注意：历史系的学生之所以起薪低，一大原因是他们毕业后要继续读研究院，在大学毕业和进研究院之间不得不先找个临时的工作，挣点钱，积累些资历。这种工作一般工资都比较低。

这套理论，从一个历史教授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PayScale Inc.的数据，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工程类学生的中等起薪最高，是59058美元，十年左右的时间上涨到了103842美元，上涨率为76%。而历史专业本科毕业时仅挣4万多，但日后转轨搞企业咨询，在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是104000美元，不仅超过了工程师们，更超过了本科就学工商管理类的学生的事业中程时期的收入水平（仅为98000美元）。前面谈到的常青藤的收入排名，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毕业起薪非常高，甚至超过了耶鲁，这恐怕还是因为该校有一个接纳了大量本科生的著名商学院。这在常青藤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则根本没有商学的本科，最多有个理论性十足的经济学专业而已。这使宾大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占据了明显



的短期优势。可是，十几年后，宾大学生的收入水平就被其他几所学校赶超。可见，即使你以后想做生意，大学本科学历史也比学企业管理好。我的一个最好的学生，曾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但因为那里奖学金不够，就被我们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小学校以全奖吸引过来。他日后准备做生意，不过本科学的还是历史。

总而言之，到美国读大学，学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怎么学，再次就是学校要好好挑。年轻人要胸有大志、眼界开阔，不要掉到钱眼儿里蝇营狗苟，也不要光顾吃喝玩乐、荒废青春。要想成功，就要有个成大器的样子，学会关怀和思考人类的命运。总盯着自己的荷包，太贪图享乐，最终还是无法享受最好的大学教育。

#### 附录：全美大学收入潜能排名

以下排名分列了各类院校中的前五名。名次也以毕业生事业中程的收入为准。所谓事业中程，统计的是毕业生工作十几年后的年薪。这些学生的中等工作年限为十五年半。毕业时的起薪仅列出作为参考。

##### 派对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起薪：59900 事业中程年薪：96100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起薪：52000 事业中程年薪：95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起薪：50500 事业中程年薪：95000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起薪：49700 事业中程年薪：9390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起薪：44500 事业中程年薪：92200

##### 文理学院 (Liberal Arts Schools)

Bucknell University 起薪：54100 事业中程年薪：110000

Colgate University 起薪：52800 事业中程年薪：108000

Amherst College 起薪：54500 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Lafayette College 起薪：53900 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Bowdoin College 起薪：48100 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 常青藤

Dartmouth College 起薪：58000 事业中程年薪：134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起薪：66500 事业中程年薪：131000

Yale University 起薪：59100 事业中程年薪：126000

Harvard University 起薪：63400 事业中程年薪：12400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起薪：60900 事业中程年薪：120000

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起薪：59000 事业中程年薪：112000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起薪：52700 事业中程年薪：103000

Cal Poly San Luis Obispo 起薪：57200 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起薪：52600 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起薪：51100 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 给完整的人以生长的空间

### ——美国大学的寄宿热

美国大学的理想，体现了其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以培养完整的人（whole man）、饱满的人（well-rounded person）为目标。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这一理想又谈何容易。上个世纪研究性大学崛起后，专业化成了时代潮流，本科生的通才教育受到忽视。如今，大学逐渐普及，从精英的文化中心转化为大众的职业培训所，许多学生进校后一头扎进商学院中。在研究大学中，专业化以教授为动力。如今的实用化时代，专业化则以学生为动力。大学除了满足学生的职业训练的专业需求外，还怎么实现其社会理想、传授文化价值？这是各大学都必须面临的挑战。

为应付这些挑战，美国大学最近回归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大学传统：寄宿制。《纽约时报》最近的教育专刊，以寄宿制为主题，详细报道了这一潮流。寄宿制度虽然因学校而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不外乎是学生在学期间以几百人的规模寄宿于一个独立的“学院”之中。这一学院有自己的餐厅、图书馆、计算机房、演奏室等等，并有教授居住，师生朝夕相处，形成一个24小时的全天候的学习环境。如今在美国，正兴起一股急速学院热。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种早已实行寄宿制的学校，正在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其他学校，则纷纷效仿。

要了解寄宿制大学的实况，不妨看看《纽约时报》对康奈尔大学新开张的寄宿学院Alice Cook House的描述：

某个星期一，几个住在Alice Cook House的学生和具有传奇性的白宫记者Helen

Thomas一起吃晚餐，地点是在Alice Cook House的院长Ross Brann教授在学院内的家中，其宽敞的大厅正是为这样的场面所设置的。同时，在隔壁的学院公共大厅内，康奈尔的副教务长正在主持一个公开会议，讨论校园的多元化问题。第二天晚上，在同样的场地，将举行题为“伊斯兰中的妇女”的小组讨论会。在另一个房间，学习中东语言的学生正在用阿拉伯语进行他们一周一度的智力竞赛。同时，在旁边的一个教室，两个研究生正在为修化学课的学生答疑。在星期三，所有在Alice Cook House寄宿的350名学生要一起聚餐。星期四，犹太学生和穆斯林学生举行每周一次的分组讨论。星期五，院长举行茶会，一位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儿科教授将讨论关于医疗保险的政治问题。同时，法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会来组织电影晚会。

这仅仅是这里普通的一周，是学生晚间课外活动的日程。这个学院，有1位资深教授、6位研究生指导员入住，另外有大约30位教师和行政人员志愿来组织学生的活动。当然更不用说，这里的图书馆、计算机房等等设施齐全，自成一体。

康奈尔有13000名学生，在常青藤中是一个超级规模的学校（普林斯顿还不足5000）。规模大，人与人的关系就疏远了，特别是师生之间就容易形同路人。康奈尔的前校长Hunter R. Rawlings III（1995—2003年在任），自己的大学教育是在一个精英的本科生学院Haverford College完成的，当时该校仅450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学校的一部分。但是，他来到康奈尔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分裂的校园。当时校园的西区兄弟会林立，吸引了大量在富裕的郊区长大的白人学生。少数族裔学生则集中于西校区。于是，他决定把新生集中到北校园，在西校园建设寄宿学院。一位匿名的捐款人立即拿出1亿美元来。于是，两所寄宿学院应运而生。到2010年，寄宿学院将增加到5所，总投资达2亿美元。

在兴建寄宿学院方面，康奈尔绝不是孤军奋战。田纳西的名校Vanderbilt，投资了1.5亿大兴土木，预计到2008年将有10所寄宿学院建成。拥有35000多本科生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和拥有24000多学生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也建了第一所寄宿学院。另外，从东北部的弗蒙特州的Middlebury College，到西部俄罗勒冈州的Willamette University，乃至南部的西弗吉尼亚大学，都竞相兴办起寄宿学院。

寄宿学院在美国有许多名称。在耶鲁叫“学院”（college），在哈佛、康奈尔叫“房子”（house），在Vanderbilt和Middlebury叫“共同体”（common）。这些名称，都源



于中世纪，在制度上也继承着中世纪的遗产。

西方的大学，源于1200年前后的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大学”（university），当时有以法学教育为主的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以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波伦亚大学是学生治校，即由希望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自己决定雇什么样的老师来教他们。巴黎大学则是教师治校，开了后来教授治校的先河，成为西方大学的主流。但是，学生治校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而是改头换面地生存于现代的大学之中，使各种学生组织在校园政治中有相当的权力。随后在大学中，马上诞生了一些“学院”（college）。这些学院开始时非常简陋，不过是给穷学生或者来自某一地区的学生提供集中住宿的机会，并安排膳食供应。在此基础上，学院渐渐独立，可以自雇教师、自主招生。这种学院，在牛津、剑桥格外发达。乃至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学派就是以学院为单位而形成的。如今牛津的学生还分属39个学院，剑桥则有13个学院，各学院独立性非常强。在这样的系统中，师生朝夕共处，交流非常频繁。英式的寄宿大学在德国的研究性大学之外别开生面，保证了英国大学的优异。

寄宿学院在美国的发展，则格外有戏剧性。在20世纪初，大学扩张，新兴阶层开始闯进常青藤。但是，不同阶层的人进入大学后彼此隔绝。比如在哈佛，一年级新生和毕业班学生尚有固定的寄宿地，但中间两个年级的学生则游动不定。在一年级以后，只有参加了某个俱乐部，才有固定的地方聚餐。而俱乐部大多为贵族学生垄断，有非常苛刻的准入资格，平民学生被排斥在外，校园成了一个隔离的社会。同时，学生人数扩张到了3500人，学校已经大得不便于交流。所以，哈佛校长Abbott Lawrence Lowell把兴建寄宿式的学院当做他任上的一大使命。可惜的是，他的提案不断被有关委员会否决，眼看寄宿学院的方案将成为泡影。然而，1928年的一天，耶鲁的校友Edward Harkness走进他的办公室，给了他300万美元建设寄宿学院。这位Harkness本来也给自己的母校类似的捐助，但耶鲁的拖沓让他不耐烦。Lowell则在几分钟之内就接受了这一慷慨的捐助。哈佛董事会也大力支持。于是，Harkness马上把钱加到了1000万，可以用来建立7个寄宿系统（House）。同时耶鲁也利用他的捐助建立了自己的寄宿学院体系，使此制在美国渐渐盛行。

美国的寄宿学院热，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大学过分注重研究、轻视本科生教育的倾向，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反思。再加上全球化的竞争，使

美国经济高度白领化，制造业不断外包，新一代高中生把上大学视为找工作的起码本钱，带来了空前的高等教育热。各大学为了竞争这一史无前例的生源，也不得不重视对本科生的服务。另外，战后自由派的思想占据了教育界的主流地位，过分强调学生的自由。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许多大学扩张，在庞大的校园中，学生自由自在不受管束，不免荒废青春。90年代，教育界人士意识到优质的教育要求教授们介入学生的生活，对之进行及时辅导和监督。所以，要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就必须创造一个师生接近的面对面的学术共同体，确保学生能够不断得到指导。学生不是现代化工厂的流水线所制造的产品，而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教授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个人层面的了解。在这样的背景和教育哲学下，寄宿式大学就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途。

当把学生以三四百人的规模集中在一个学院中时，学科的概念就打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仅仅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和同吃同住的同学寻找共同话题；阶级的隔阂也打破了——不同背景的学生，必须在有限的空间交流，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丰富别人的人生；师生的关系密切了——教授二十四小时都和学生在一个学院中同住。更重要的是，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界线也消失了，学习和生活一体化了，教育变成了全天候的活动。在没有寄宿制的大学，学生白天上课，下课后等于就和学校脱离。所以有所谓下午四点半学校停运之说（即学生下课，老师回家）。在寄宿制中，哪怕是晚间学校也生机勃勃：教授和学生共餐、请校外知名人士来进行讲座、举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集体活动，大家没有一刻不在学习和交流。

新兴的寄宿式学院，大部分建于像康奈尔、密西根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这样规模比较大的校园中，目的是在庞大的校园中创造人际互动的小环境，在陌生人的大世界里建立面对面的教学关系。毕竟，美国的大学强调小，强调照顾学生的个人需求。规模大则有批量生产之嫌，很难和精英的大学竞争。不过，一些已经有了寄宿制的精英大学，也追随目前的潮流，对自己的寄宿系统进行改革，使之更有包容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普林斯顿。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都有寄宿制度，但具体的安排又各有不同。哈佛新生第一年在校园中心的哈佛院（Harvard Yard）中寄宿，从第二年起，就分属各“房”（house）寄宿，直到毕业。学生并非不能居住于校外，但绝大部分学



生都选择住在自己的“房”中，保有一个几百位同学组成的小社区。即使是极少数校外居住的学生，学校也提供特别的聚会地点。耶鲁学生头两年必须在寄宿学院住宿。两年后则来去自由，不过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自己的学院中。普林斯顿的寄宿学院传统则短得多，自1982年起才规定新生要住在五个寄宿学院中。不过，到了第三年，他们则必须搬走。因为有了学校餐厅，有70%的高年级学生就加入了“餐饮俱乐部”。其他人要么在低年级学生的餐厅吃饭，要么在学生中心的餐厅吃饭。

“餐饮俱乐部”虽然是个学生组织，但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传统深厚，影响巨大，成为普林斯顿的标志。许多毕业生六七十岁时回忆起普林斯顿，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餐饮俱乐部”消磨的时光。这种“餐饮俱乐部”最后发展到二十几个，等级森严，都执行着严格的准入资格，并得到校友的慷慨资助。一般而言，历史越久的越有声誉、越不好进。结果，这种“餐饮俱乐部”分裂了校园。一些富裕的学生把“餐饮俱乐部”当成自己的兄弟会。他们在校外寻找豪宅作为俱乐部的地点，自请厨师和管理人员。学校的餐厅一年的餐金仅4315美元，但“餐饮俱乐部”的平均餐金则达6300美元。自然，越精英的“餐饮俱乐部”越贵，会员的阶层也就越高。

“餐饮俱乐部”自成立以来就是贵族俱乐部，丑闻不断。许多学生在那里饮酒过度，借酒撒疯，闹得不亦乐乎。上个世纪初，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餐饮俱乐部”分裂社会、败坏道德，试图取缔，但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的这一奋斗，建立了他反对特权阶层的声誉，最后帮助他当选上了总统。现任普林斯顿校长Shirley M. Tilghman也批评这些“餐饮俱乐部”选择会员以自己的阶层为标准，违反了普林斯顿的精神。一些学生则开始组织抵制运动。

不过，终结这种贵族俱乐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建立更为彻底的寄宿学院制度。普林斯顿正好决定扩张，计划在2012年增加500名学生，使学生总数达到5200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寄宿学院。eBay的总裁Meg Whitman作为校友，捐助了3000万美元，学校则以1亿美元的总投资，兴建了Whitman寄宿学院，并在2007年8月17日开始使用。最重要的是，这一新学院将和另外两个重新组合的学院一起，为那些高年级学生提供住宿的机会，和那些“餐饮俱乐部”展开竞争。该学院为高年级学生保留的204个宿舍，很快收到了476份申请，明显供不应求。学校也派高级

官员和“餐饮俱乐部”的人员、校友会晤，希望他们合作，缓解他们的抵抗。事实上，这些“餐饮俱乐部”完全在校方的控制之外，是“学生治校”传统的继续，各个财政实力雄厚，有许多校友作为后盾。从伍德罗·威尔逊的经验看，一个后来当了总统的校长，也动不得这一既得势力。这一势力的做大，多少和普林斯顿寄宿制度开始得晚有关。如今的改革，则使普林斯顿的寄宿体系和哈佛、耶鲁渐渐趋同，最终可能使这些“餐饮俱乐部”衰落。总之，在一些庞大的州立大学，寄宿学院通过在大校园中创造小环境，使平民的教育贵族化。有的州立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建立了荣誉课程，以优厚的奖学金吸引高质量的学生，甚至为这些学生特别建立寄宿学院。在普林斯顿这样袖珍的精英大学，寄宿学院则又把贵族教育平民化。可见，寄宿学院使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接近、融合，在有效地整合着社会。

在1936年受哈佛大学委托而撰写哈佛历史的Samuel Eliot Morison曾这样写道：“书本知识可以通过上课和读书来掌握。但是，只有作为学院这一共同体的一员，和同学及老师都保持着持续、紧密的关系，一起不断地研究和辩论、吃吃喝喝、游戏和祈祷，品格这一无价之宝才能被传授到学生的身上。”（Book learning alone might be got by lectures and reading; but it was only by studying and disputing, eating and drinking, playing and praying as members of the same collegiate community, in close and constant associ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tutors, that the priceless gift of character could be imparted.）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寄宿学院的大学，显然不是完整的大学。

如今，寄宿式大学已经被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采用。香港中文大学也在中国率先建立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一有了800年历史的高等教育体制，在21世纪仍将主宰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教育。



## 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

最近精英教育和高尔夫球成了中国大学的主要新闻。大学是培养精英的机构。高尔夫在人口密度极大、土地资源奇缺的中国，是一项无法大众化的运动，肯定能成为精英阶层的永久标志。结果，上自大学校长，下到学生，都趋之若鹜。通过高尔夫把特权阶层从一般老百姓中区分出来，让他们具有特别的行为风范，享受别人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在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里进行“高层次”的交际，以近亲繁殖的方式培养封闭性的社会网络。这已经成为我们许多“一流大学”未曾明言的教育理想。

那些鼓吹高尔夫式精英教育的高校领导们，谈起这些事情来无不以美国为例：人家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不错，你到美国随便一个再小的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校长致辞时都无一例外地对学生说：“你们是我们社会未来的领袖！”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这谁还能说是错？

可惜，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就是感受不到我们这里的“高尔夫气氛”。更没有哪个大学口口声声要用高尔夫来培养精英。在人家那里，精英不是个人的享受方式或生活方式。精英表达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了带头的作用，就会被社会定义为“领袖”，即我们所谓的精英。一句话，精英是从为社会的服务中来的。培养精英，也是从为社会服务开始。

这也多少解释了美国大学中的一个现象：义工盛行。在2004—2005学年，有330万16—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所有1080万适龄学生的30.2%。打义工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大学教育的标志。据统计，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

大学教育的人有46%做义工，而在同年龄层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中，只有21%的人 would 做义工，还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可见，大学教育转化了人的行为模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美国大学的教育哲学鼓励义工。比如，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耶鲁有位教授在解释耶鲁为什么培养了这么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自豪地说：“这里有最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之塔所无法相比的。”此话到底有多少道理，能否经得起实证研究的检验，还另当别论。但这至少说明了教育者的观念：最精英的人要知道自己怎么和最下层的社会建立联系，怎么深入最基层，怎么体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成为领袖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有不少学校把志愿服务包括在正式的学术课程之中，或者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发现当志愿者的机会。比如耶鲁每年都送自己的学生到纽黑文最差的学校进行义务辅导，并为此设奖。学生通过义工的经历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自己，奠定了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

这一切，并不是说明美国的大学生生来是天使。相反，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学生做义工，自私的动机很多，比如获得工作经验，构造自己的良好履历等等，以求日后求职成功。大学录取，则更强调义工经验。结果，高中生也跟着大学升学的指挥棒转，目前有31%的学生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义工就这样成了一个向上升迁的阶梯。

这一切，也恰恰说明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精英的概念和我们有多么不同。人家衡量精英的准则，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通过义工经验发现了社会，有了使命感，强化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我们国内理想中的精英，则是看其比基层社会有多优越，似乎和老百姓的距离越大就越好。这也就难怪，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比较任劳任怨，更肯从基层做起；而在我们这里，虽然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严峻，许多学生还是心比天高，不可一世，乃至有人打着能够适应一切工作的旗号参加招聘会，但雇主一问能否扫地就怒火冲天，把对方痛斥一顿。我们的精英教育观不改变，我们的大学校长和学生甩不掉高尔夫情结的纠缠，我们的大学就会培养一代没有行动能力的精神贵族。



## 美国大学的阴盛阳衰

大约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女生占据了美国大学生的大多数。自此以后，不管是在人数上还是学习成绩上，女生样样领先，甚至造成了美国大学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目前，男生仅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42%。“男生荒”已经成了许多大学面临的危机。

以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成见，男孩子淘气、发育迟、懂事晚、学习落后于女生。但是进了高中后，就会急起直追，学习成绩超过女生。可是，比较美国各级学校的性别比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曲线：在教育的阶梯上，越往上走，女生越占优势。

比如，以每50位女生所拥有的男同学数来计，小学时是53位，基本反映着人口中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美国人口男女比例大致为49.1:50）；但在高中时，这个数字就变成了50，男女持平；而在高中毕业生中，这个数字降到48；到了大学，这个数字是39；在大学毕业拿到学士学位的学生中，这个数字是37；在硕士学位获得者中，这个数字则跌到了31！

男生日减的现实，是由学业表现决定的。在哈佛，55%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在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有64%的毕业生是女生，她们获得了79%的最高荣誉 *summa cum laude*。

不过，数字下面的现实非常复杂。性别比例的失调，和阶级、种族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比如，出生于人口中最富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即收入在97500美元以上）的大学生中，有52%是男生，并没有阴盛阳衰的问题。女性在高等教育上高

出男性最多的，是在黑人之中。在低收入的拉美裔和白人中，女性也远比男性表现为好。

这种情况，自然反映在各个层级的大学的性别比例上。比如，一些顶尖的大学，学生大部分出身于中高产阶级，或最富裕的1/4人口，学生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并不严重。哈佛几年前录取的学生中，52%是女生；布朗大学如今录取的男生，仅占新生的47%。耶鲁2005年注册的学生中，男生有2707人，女生2609人，男生多于女生将近100人。在普林斯顿，2005—2006学年注册的学生中，男生2548人，女生2213人，男生多出女生300多人。但在一些普通院校，则女生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在New Paltz的纽约州立大学、Greensboro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巴尔的摩城市社区学院，2/3的学生是女生。

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会发生？回答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不仅涉及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还和男女先天的差异有关。

众所周知，美国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崛起，70年代初开始大学男女同校。虽然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几十年还没有消失，但男女同校后大约10年的时间，女生就成了大学生中的多数。如今，这一优势越来越大。

保守主义者借机发难，说女权运动把社会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女孩子身上，想方设法帮助女孩子成功，忽视了男孩，使他们成为受害者。这种说法，无异于睁眼说瞎话。上个世纪末一系列调查表明，美国家庭更愿意为男孩进行教育投资，甚至有男孩的家庭比仅有女孩的家庭离婚率低，因为父母更愿意为了男孩的利益求同存异，保存家庭。男孩的社会优势处处可见。怎么可能成为受害者？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如今大学的阴盛阳衰，并不是因为男孩不行。男孩的学业，和30年前一样，没有任何下跌的迹象。问题是女生在同一时期表现得太“火”了，一下子把原地不动的男生比了下去。

因此，如下的解释也许更有说服力：在女权运动以前，女生基本上没有机会在同一个教育平台上和男生竞争。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没有消失，女生终于可以和男生在大致对等的条件下竞争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先天的不同，以及女性所拥有的某种社会品质，使女性在竞争中逐渐超出。

神经心理学家Louann Brizendine的研究表明，女性大脑中叶前部皮层发达并且成熟得早。这部分组织主管自我控制。女性在这方面的优势，使她们更有耐心，



更喜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脑岛 (insula) 主管直觉和同情。女性这部分组织比男性的大而且活跃，使女性对别人的感情更敏感，更有社会能力。女性大脑的前部环绕皮层也更大，此部分负责在决策时权衡各种意见，同时也是压力和情绪的中心。女人处世慎重，计划周到，同时爱焦虑，大概与此有关。这一系列发现，颇可以印证女性的社会行为。

总体而言，女性更注重感性，更喜欢三思而行，更善于社交，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更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如今的社会，越来越依赖人际的交流和联系而运转，个人和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关系更重要。女性的社会能力，明显使她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女性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强。这使她们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比较审慎地计划自己的一生，并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广泛接受别人（特别是老师、家长）的各种意见。这就使女孩子更用功听话，更注意考试成绩。《纽约时报》不久前采访大学生，不管男生女生，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女生普遍用功，男生则有许多在混日子。

比如，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一位男生说他不相信男女在工作习惯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女友总是完成所有课的阅读，他则不是。他的女友更有组织性，会提前一个星期写论文，他自己则通常临时抱佛脚。在同一个大学就读的一位女生，则终止了和她男朋友的关系。理由是此公一天要玩4个小时电子游戏，最近则保证把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控制在每周15个小时以内。这位女生无法忍受，告诉她男友：“15个小时是我每周当实习生的时间。由此我一个月能挣1300美元！”

这位女生还概括了女大学生们的普遍心态：她们希望有辉煌的事业，但也希望有家庭，生儿育女，要有几年不工作。所以从上大学起就有一种提前赶路的紧迫感，要先建立一些优势，以后才可以有余地停下来建立家庭。

男生则没有这样的压力。许多人到了大学把时间花在社交和体育上。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一周花11个小时社交的男生比女生要多得多。男生比女生更喜欢逃课。结果，女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得多，成绩也更好。结果呢？大学教育在收入上给女生带来了更多的红利。

当然，女性在生物构造上的优势并非显而易见。男生在SAT考试上还略占优

势，在数学上优势更大些。这都说明了男生在智力上的长处。女生最大的优势就是用功。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恐怕更仰仗于后天的培养。比如中高产家庭的家教比较严，父母对孩子的督促比较紧，即使是对男孩子也很抓紧。所以中高产家庭中，男孩上大学的比率比女孩还略高。低收入的家庭孩子常常没有人管。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天性谨慎、计划周全的女生，就远远比那些没心没肺的男生优异。更何况，男性具有传统的社会文化优势，被惯坏了，早就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好处都是自己应得的。女生则继承了女权运动的一个优良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受男人欺负的社会，如果不加倍努力，就别想和男人平起平坐。所以，女孩子会更拼命读书。

面对这种阴盛阳衰的现实，许多大学开始采用对男生倾斜的招生政策和教育课程。比如Dickinson学院1999年的新生中男生仅占36%。该校为此不得不建立妇女中心，开设女性研究专业，和奥斯汀和Virginia Woolf的课程，以满足女生的需要。但同时，该校也展开了吸引男生的计划，比如在招生材料上增加了许多男运动员的照片，突出物理中心、计算机中心、数学中心等有男生特点的东西。在录取时，也适当放低男生的标准。学校的考虑非常实际：大学生是谈情说爱的年龄。该校又设在世外桃源般的农村。男生少，女生也不安全。因为男生太稀缺，想得到什么都能得到，甚至有人因此可能成为色狼。这对女生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该校的倾斜性政策果然收到实效。去年的毕业生，女生人数刚刚超出一半。但是，拿到优异荣誉证书的，有2/3是女生。在该校就读的女生，有83%能够在5年内毕业，但男生仅75%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些男生看着拿全优的女生摇头：这对我太难了。女生能计划长时段战略，我则连未来十分钟也计划不了。



## 美国的名教授怎样对待学生

最近,《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不久前还讨论大学名教授的课程普遍运用研究生做代课老师、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此信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照。

此信的缘由是《华尔街日报》几天前发表的一篇书评。该文引用《高的教育?》一书,对当今美国的大学提出了种种批判。比如,教育费用越来越高,老百姓难以承受,名校教授讲课越来越少,大量使用代课老师甚至研究生等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反复争议的老问题,确实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不过,此书由此把上大学说成是浪费钱,批评的锋芒顿时尖锐了许多。

文章发表后,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立刻致信《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学教育仍然货真价实”。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书评中涉及的上述两点进行了具体的驳斥。第一,斯坦福大学虽然价格昂贵,但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保证你能上得起。她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第二,研究生并非她的代课老师,而是给她判卷子打分的人。甚至判卷子打分经常也是教授亲自操刀。

她的本科是英语专业。以下是最让她难忘的一段经历。她选了一门现代小说的课,期末论文拿回来,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C,每页都写满了评语,而且文中的许多行被黑色的粗线标出。要知道,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全优或满分的学生都经常被拒之门外,能进来的,大多是从小拿惯了第一、满分的学生。这也难怪,她看着这么低的分数、被改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论文,顿时暴怒,连预约也不预约,一下子就冲进任课的Wallace Stegner教授的办公室,把自己的论文狠狠地往教授的

办公桌上一摔，大声质问：“看看你年轻的助教对我做了什么?!”

即使在斯坦福这等名校，这位Wallace Stegner也不是位普通的教授。他不仅是小说家，也是历史学家，在文学和历史领域都著作等身，获得了十几项大奖，其中包括“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这样的最高荣誉，还因为拒绝领取“国家传统基金奖”引得媒体沸腾。他故去后，其百岁诞辰成为一个文化盛典，斯坦福还特别设立了“Wallace Stegner奖学金”。然而，就是这位传奇式的教授，面对着怒气冲冲、大耍小姐脾气的不速之客，调整着老花镜认真地翻看了一下论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相信是我自己批改的这篇论文。”那学生赶紧把论文从桌子上拿回来，一句话也没有，一溜烟儿逃出了办公室。

这就是名教授的作用。对于被自己的高分惯坏了的孩子，一个研究生助教根本镇不住，这时“普利策奖”得主的权威就派上了用场。如果你一心要学写作，那么拿着普利策奖得主给你写的密密麻麻的批语，简直是捡到了金子，当然要赶紧拿着就跑，回家好好受用。也怪不得，这位学生从此以后成了Wallace Stegner的粉丝，读起他的书就放不下。几十年后，她由于对此经历仍念念不忘，才会投书《华尔街日报》为自己的母校和自己的教育进行辩护。

在美国读书教书十几年，每每为美国学生对于母校的忠诚感到惊讶。看看这封信，相信读者们能够对此理解一二。大学不仅仅是块牌子。不管你堆积了多少名教授，但如果这些教授不教书，或者不把教书当回事，那么多大的牌子也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 教授首先要假设学生比自己聪明

大概是两年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教授大胆倡导取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惹得一阵媒体热议，乃至教育部声明不会取消毕业论文，四川大学校方也不得不出来说明没有取消毕业论文的计划，随即新闻系也推出了多元化的毕业论文改革方案。这阵热闹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从中反映出来的教授们的心态，却会长时间地留在那里，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不有一番辨析。

张教授说：如今大学需要为社会培养多种人才。毕业生全用论文这把尺子“卡”着，未免太死，应该改革。国外的大学本科生未必要求写毕业论文，而是搞毕业设计。中国为什么不能效仿？中国大学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目前的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对此，我原则上是赞同的。不过，改革最终是否有益，还要看改革者的思想理念。检视张教授的具体论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大学生还要不要、能不能创新。张教授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的本科教育并没有要求学生必须在四年理论上有什么创新，对理论有什么发现，但却要求学生完成一篇理论有创新或发现的论文，实际上是矛盾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在他看来不是在课程中对学生提出创新的要求，而是干脆放弃创新的目标：别写论文，也省得为创新而坐立不安了。如果大学教育的这种固有矛盾按照他的方法被“解决”了，我们的高等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不创新的学生，这和一个“创新社会”又如何适应呢？

这种在大学教育中取消创新目标的思想，在教授中相当普遍，对我们的大学教育也有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建立在教授们对学生低估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用张教授自己的话就能证明：“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吗？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与其维持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说来说去，张教授实际上是认为一个本科生不可能有创新。

这种藐视年轻一代的话，我在30年前刚进北大中文系时也听到某些教授谈起过。我在近著《北大批判》中回忆一位教古代诗歌的教授私下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刚进大学的毛孩子，能懂什么古诗？毕业时能摸到点门儿就不错了。”这种心态，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中非常普遍。这是我们2000多年的士大夫传统所塑造的对知识的崇拜：人的智慧，是经年累月地“读圣贤书”而炼成的。年头不够，就什么都不要谈。带着这种态度，老师进了课堂当然要假设学生都是幼稚无知的，自己是充满智慧的饱学之士。教授当然不鼓励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更愿意满堂灌，让学生循规蹈矩地接受自己所传授的“知识”。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创新的精神和能力了。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以亲身经验介绍了美国的经验。在常青藤中，学生无论对什么权威都敢于大胆批判，教授也鼓励学生们这样做，课堂上充满了平等讨论的气氛。学生具有这样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从学龄前就被鼓励参与讨论，家长在教育他们时试图建立一种彼此平等的关系，甚至有意创造机会，向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意见是如何影响了大人的决策；他们的思想不仅很重要，而且切实塑造着世界；甚至他们的创造力是大人不具有的。所以我得出结论是：上了常青藤才接受常青藤教育已经太晚了，必须从小开始。

这种教育原则，并不是要人为地让孩子们自我感觉良好，让他们有一种自己很了不起的幻念，而是非常符合上百年来智商研究的基本结论。按照现代智商理论，人的智力可以分为“结晶智力”和“流动智力”两种。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



“结晶智力”就是通过知识积累而形成的智力储备，即我们所谓的“基础知识”，比如乘法口诀等等。20多年前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告诉我：“你想成为历史学家，自己首先要有点历史才行。”意思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训练需要长年积累，不能以小聪明代替。这也突出了“结晶智力”的重要性。“流动智力”则不同，指的是你的纯脑力，就像运动员的体能一样。这种智力的高低，在面对全新的问题而“结晶智力”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最容易显示其优越性。而“流动智力”的高低，如同体能一样，和人的年龄密切相关，一般在16至18岁前后达到顶峰。

人的成功，是“结晶智力”和“流动智力”结合的结果。但现代智商理论明显把“流动智力”看得更重要，在创新的领域更是如此。一般而言，教授们年长些，在“结晶智力”上具有优势。但是在“流动智力”上，学生则往往明显高于自己。年轻人学习什么都容易，接受新东西快，掌握外语迅速，创造力就更强。面对这种在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常识，怎么能说本科生在自己的领域有真知灼见或者有所突破就不可能呢？想想看，谁更可能破百米纪录？是二十几岁的博尔特，还是五十几岁终生从事短跑事业的经验丰富的教练？事实上，在科学领域，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二三十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创造力的极盛期也许推迟十年，但本科生时代正是迸发出创造火花的大好时期。

我当年读中文系时，老师们谆谆告诫：要“厚积薄发”，千万别把自己那点幼稚的想法太当回事。但如今的我大致已经达到那些老师的年纪，回头看来，实在觉得这样的教训误人子弟。教授当然要坚守严格的学术准则，但首先要鼓励学生：千万不能低估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那些自己觉得无足轻重的“小想法”说不定就是大创见，现在不创造，就好像过了40岁再准备破世界纪录一样。那样你就错过了“机会窗”。你到美国一流大学里问问那些教授，提起学生来，许多人都会说他们一直在不断地从学生身上学到东西，哪里有“小小年纪懂个啥！”那样的傲慢？！

几年前，一位北大毕业的学生趁到耶鲁读暑期课程的机会特地跑到波士顿来求见，还拿着一本我的书恭恭敬敬地请我题词。我在受宠若惊之余劝他：“你掌握两门外语，怎么了解美国还要看我的书？难道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难道你不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吗？难道你不应该有更高的起点吗？”最后我给

他的题词是：“几年后如果你还能看得起我，那实在是让我意外地受宠若惊。不过，我更希望和相信：那时我的书对你们已经毫无价值。”我这么说，不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没有长久的价值，而是直面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是在文化贫瘠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中国文化有前景，如果下一代有出息，我辈这等弱苗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价值。面对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战战兢兢，为仍然有资格教育他们而感到幸运。

坦率地说，如今在中国大学充当骨干的，大多是像我这等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些人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那时的大学刚刚从“文革”后恢复，许多学科根本就不成型。除了极少数的优异之士外，我们这代在总体上是文化平庸的一代。如果我们再教育学生跟着我们的平庸而循规蹈矩地学，那么培养的只能是更加平庸的一代。要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在一段平庸期后出现15世纪后半期的群星灿烂，就在于其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一代脱离上一辈平庸的师传。比如发明透视法和建造了佛罗伦萨教堂穹顶的布鲁内热斯奇，就跳开老师直接从古典建筑遗迹中学习。

张小元教授称：“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可惜，凭常识判断，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死记硬背背出来的。学生听老师的话太多，自己闯的机会太少。当务之急，不是取消要求学生创新的毕业论文，而是改革让学生写不出有新意的论文的教育制度。中国不是还没有一本权威的《泰晤士报史》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以课题为核心、以动手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呢？如果我在新闻学院当教授，我第一年就给新生派任务：你们这个班，这四年的任务就是写一部高质量的《泰晤士报史》。写这一部巨著需要什么？需要你们大家的合作。这叫“团队精神”。还需要你们有相当的英语阅读能力。这种语言训练是你们吸收新知识的基本能力；当然，更需要你们进行大量的文献调查，从这些调查中找出线索、理出头绪，最终形成自己的观念，并要学会在清晰的写作中对自己发现的各种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大学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只要成就了这么一件事，你就懂得了如何与别人合作，有了基本的语言和写作训练，



学会了调查研究，发展了用事实说服别人的沟通能力。你就是毕业后不去新闻界，而去当律师、进公司，这些技能都会让你终身受用。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平庸的时代。这种平庸，恰恰给后辈提供了创新的机会。试想，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几部各有特点的《泰晤士报史》，学生们把这个题目做好就不容易了。幸运的是，我们恰恰没有。学生要有机会为天下先。教授不应该用“可能吗”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把学生吓住，而是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开拓者气概。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大学毕业生未必要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大学里所学的一技之长，在当今这种技术更新的时代，很可能刚毕业就过时了。但是，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则激励着学生不停地应付瞬息万变的新挑战，学习新东西，并以自己的创新来塑造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坚持以动手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如果学生在大部分课程中都得到了用写作表达自己观点的训练，毕业论文的危机就不会有。相反，毕业论文可能成为检视学生实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 美国有国学吗？

最近，王达三先生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题为“不妨学学美国的国学热”，实在让人拍案惊奇。我在美国住了14年，而且一直在大学里当学生、教师，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的国学是什么。

王先生据说以儒家的传人自诩，当然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请问美国的“国学”英文怎么说？如果没有的话，总不能自己替人家编出来吧？我想，“国学”在英文中最可能的叫法是national learning。至少美国学者在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时，就是这么译的。但你到美国的大学里找一找，哪个系、哪门课、哪本书叫national learning？美国人不是不研究自己。不过，人家总是叫“美国文学”、“美国历史”、“美国研究”等等，从来不用“国学”这种字眼儿。道理也很简单，民族主义的情绪不应该干扰学术。“美国文学”、“美国历史”就和“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一样都是并行的学术，是普通的一个学科。一加上“国学”二字，就有了特殊性和排他性，也丧失了客观的学术态度。

抛开字义再看看王先生具体的说法：“美国的‘国学’可分‘宗教神学’和‘世俗学问’两大块。虽然采用政教分离原则，但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仍然非常强大，以至于有美国文化即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WASP）文化’的说法。基督教神学研究的重镇是大学分设的或教会独创的神学院。前者如哈佛神学院，主要是侧重于学术研究；后者如‘美国福音自由教会’创办的‘三一神学院’，则是学术研究和传教布道兼顾。”这种说法之荒谬，早已超出了似是而非的程度。首先，当今美国连总统都是肯尼亚黑人的儿子，怎么会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白



人新教 (WASP) 文化”? 美国哪位政治家或者社会知名人士会说或者敢说美国文化即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 (WASP) 文化”? 你到大街上抓个美国人问问, 看有多少人知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 (WASP) 文化”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 在现在的媒体上, “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 (WASP) 文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具有贬义味道的历史词汇, 常用来讽刺过时和狭隘。至于宗教, 在美国基本上也是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运作。你可以办基督教的学校, 但如果联邦或州政府给予财政支援, 则多半会“违宪”。政府和这些事情绝对要划清界限。怎么可以“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来”?

至于所谓美国“国学”中的“世俗学问”, 王先生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把‘通识教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 其主要内容就是讲授西方人文经典,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希罗多德的《历史》, 甚至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香港学者甘阳敏锐地指出, 美国的‘通识教育’和中国的‘经史传统’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又是在想当然了。美国的大学大概有4000所左右, 你若真调查一下, 恐怕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读过《理想国》、《历史》和《资本论》, 甚至不知道这些书究竟是谁写的。“通识教育”确实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精华, 但若比之为中国的“经史传统”那就实在太搞笑了。“通识教育”在美国有多种多样。比如有大名鼎鼎的“核心课程”。其中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的“核心课程”特别突出西方的名著。但是, 大多数学校并不如此。最常见的“核心课程”, 不仅包括科学、外语等等, 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的训练。比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 多元文化是必修课之一。而多元文化课又包括两类, 一是美国的多元文化, 如美国非裔、拉美裔、亚裔的文化。另一类则是欧美以外的外国文化。即使是芝加哥大学, 也削减了“核心课程”的要求。20世纪更大的趋势, 是“核心课程”的衰退。许多大学已经采取学生任意选课的制度。更不用说非洲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 乃至最近的中国研究等等, 在美国校园里都非常走红。怎么会得出美国重视“国学”的结论? 怎么这种“国学”又成了和中国“经史传统”差不多的东西?

中国如今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如果中国有世界大国的气概, 最好取消所谓的“国学”, 还是叫“中国研究”更为妥帖。我一直主张, 一个世界大国, 应该以世界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 以自己的文化为世界的文化, 不要里外分那么清楚。比如王先生所说的《理想国》、《历史》, 分明是希腊学术, 美国的大学生乃

至知识分子大部分不通希腊文，怎么成了美国的“国学”了？如果希腊的东西能够成为美国的“国学”，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国学”呢？

王先生真要学美国人的做法，那就学学人家开放的心胸，不要守着自己家里的几个古董，把喜欢外来文化的人都斥为崇洋媚外、食洋不化。在美国，如果一位学者着迷于中国文化，并大肆鼓吹中国文化高于美国文化，他往往受到非常大的尊重。这不是因为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是人家珍惜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和研究。在中国，谁要说美国文化高于中国文化，你看看会引来多少唾骂？看看世界历史就知道，所谓“崇洋媚外”，往往是盛世之兆。当年文艺复兴的领袖彼德拉克，生活在欧洲文化的中心佛罗伦萨。当时在罗马天主教覆盖的拉丁世界，和东正教覆盖的希腊世界在宗教、文化、语言、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冲突。但彼德拉克对希腊文化崇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据说曾抱着一本希腊文的书捶胸顿足，懊恼自己看不懂，并指示自己的弟子一定把希腊文学好。美国的建国之父，一方面要和旧欧洲决裂，一方面则对古典文明顶礼膜拜。亚当斯刚出道当律师，在法庭上处理农民的日常纠纷时竟背出一大段西塞罗来，迂得让人发笑。当然还有中国的“大唐盛世”唐僧取经的故事。中国现在向外来文化学习的机会，可谓五千年来所未有。但是，中国社会真正对外来文化有那么深刻的崇拜吗？如果没有的话，未来的中国文化究竟会失去什么呢？这才是我们要想的问题。



## 大学为什么要尊文史

我在《东方早报》发表“上大学报什么专业好”一文后，受到读者的批评，说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文史高”，“因为自己学的是文学、历史，就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其实，我推重文史并非仅仅泛论专业之高低，而是针对国内一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文史衰落之势而发。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个大学会把文史的地位放在管理、法学、工程之上。理由无非是文史不实用，大学要教一些实用的手艺。

这是对大学教育的误解。大学不是工厂。工厂制造的产品是死的，比如市场上需要100台电视，工厂就生产100台。大学培养的是人。人是活的。人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市场根据人的需要而存在。人创造了专业，并非专业创造了人。一个大学毕业生二十一二岁，人生刚刚开始。如果他们仅仅守着社会交给自己的“专业”，不能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些自己根本没有学过的东西，或者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我们还谈什么“创新社会”？所以，大学要为社会培养可塑之才，而不是单纯地输送专业成品。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是帮助学生塑造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使命，并懂得怎样为实现这些理想和使命而进行奋斗。

比如我碰到过一个学生，理想是当医生，大学读历史专业。这在美国的校园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理由也很简单：医生是为人和社会服务；历史帮助他了解人和社会。他修了上医学院必修的课程，但最后写了篇历史学的毕业论文才去医学院。

美国的大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高水平，文史这类非实用的系（如历史系、英文系）所占的分量越大。人们常常误解，觉得这是因为好大学有钱，能够拿出一部分资源搞一些不实际的“阳春白雪”，风雅一下。其实，美国的一流大学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不敢在没有需要的专业上大量投资。能够维持庞大的文史阵容，最大的原因还是需求大。比如耶鲁，历史是最热门的专业，历史系竟有90位左右的教师，其中50位左右是终身教授。相比之下，计算机系教师大致仅30人左右，终身教授20位上下。比起Purdue大学的工学院来，耶鲁的工学院最多二流；但顶尖的学生要想当工程师，宁愿到耶鲁读本科，然后去Purdue读研究生。至于管理类的本科专业，在耶鲁这样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正如大名鼎鼎的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院长Paul Danos所指出，美国顶尖的20所大学，1/3都不设本科管理类专业。那些设的，除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Wharton商学院外，规模大都非常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本科的目标是培养人的素质，即美国教育界所津津乐道的“完整（well-rounded）的人”。因此本科教育也就无法用专业来衡量，而必须看其通才（liberal arts）教育的品质。在这种通才教育中，文史类占核心地位。除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几个异数之外，美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不在文史这类非实用性专业上大量投资的。

我并不主张独尊文史。但是，在一流大学中，文史不尊不行。我更不是说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教育很好。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文史教育问题一大堆。一个老问题就是受苏联式专业教育影响过深，钻牛角尖的专家太多，能够对人类的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思考的“知识分子型”教授太少。新的问题则是文史的实用化。比如中文系设编辑专业、秘书专业，甚至对外汉语专业等等，把文史教育变成了手艺人的作坊。

大学的历史教育要振兴，不能走过去的专业路线，也不能追当今的实用风潮，而必须以通才教育为框架：不管学生以后干什么，他们都需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技能、表达能力，了解人类的经验，发展自己的人生观，培养创造的冲动和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这是下一代人立足于世的根本。美国一些企业的老板们就看得很清楚：掌握一门手艺当然不坏。但是，如今世界变化这么快，谁知道我们公司五年十年后干什么？一个素质好的人，无论学什么都快，怎么变化都能适应，这才是我们要的人。大提琴家马友友，是个非练童子功不可的专才。但是他大学上的



是哈佛，而且专业不是音乐。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自问自答：“要是我的手坏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干别的。这就是通才教育的好处！”

“隔行如隔山”固然不假，但对山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大学的通才教育是要让学生具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不管生活中碰到的山有多高，我都能爬过去！所以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后来当了医生，学艺术的成了软件专家。中国大学的专业教育，则把“让中文本科毕业生去设计软件，或者去从事机械、电子类工作”视为不足为训的荒唐事。大家心甘情愿地被“山”给隔开。殊不知，安于被山隔开的人，就像那些被崇山峻岭锁闭的偏远地区一样，最后总是事事落后于人。

## 从布朗校长的纠纷看企业的廉正透明

几年前，媒体曾经为几大知名经济学家在国有企业担任独董而议论纷纷。我也曾凑过热闹，呼吁这些人士公布收入来源。其中，一大经济学家质问记者：我担任独董的地方都是国有企业，有什么错误？更有媒体帮腔：知名人士担任大型企业的独董，行使监督职能，提高企业的公信度，此乃国际惯例。经这么一吆喝，媒体噤声了。我也找不到地方声张，而且心里有些发虚：毕竟自己不是经济学家，对“国际惯例”有点外行呀。

然而，最近从一则教育新闻中，不留神领教了这种“国际惯例”，难免有“原来如此”之叹。

事情发生在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校长Ruth Simmons身上。Ruth Simmons是位黑人女性，从法文教授当起，升到史密斯学院的校长，后被请来领导布朗大学，是美国教育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同时，她还有许多兼职。其中之一，就是在大名鼎鼎的金融巨头高盛充当董事。

这在过去根本不算什么新闻。即使是新闻，也只会增加她的声誉。但在金融危机后人们才发现，她原来是决定给高盛的高管多少薪水和奖金的十人之一！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支付给高盛总裁Lloyd C. Blankfein的900万美元。Ruth Simmons则从她的这一职位中拿到32万多美元的年薪，并且即将拿着高盛价值430多万美元的股票离职。这比起她作为校长的57万多美元的年薪来，已经是个非常不小的数额了。

不过，有几点必须澄清：她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情。校董事会在争议中认真



检查了她的行为，结果甚至连“利益冲突”也没有查出来。而聘请知名人士进入大金融公司的董事会，也确实是个惯例。比如，著名戏剧家Roger S. Berlind就曾进入雷曼兄弟的董事会，前美国陆军总长Tommy Franks将军坐镇美国银行的董事会，甚至已故歌剧演员Beverly Sills也曾是American Express董事会的成员。在金融危机后，这类知名人士中有许多开始打退堂鼓，怀疑自己有多少金融知识充当此职。Ruth Simmons也宣称不再寻求连任董事。不过，她说这和目前的争议没有任何关系，主要还是因为金融危机后董事会开会太多、要看的文件也太多，让她难以承受。她参与决策在2009年给了Lloyd C. Blankfein的900万美元，但这一CEO在2007年则拿了6800万，如今的收入差不多是当年的零头。

关于Ruth Simmons的争议也许还会持续一阵，其是非尚无定论。不过，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知名人士可以进入企业董事会，而且收入丰厚。但是，他们从这样的职务中所获得的收入则是公开的。高盛作为私营企业尚且如此，对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提出这样的要求，对那些当了政协委员或学术界要职的知名人士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还有什么过分的吗？

## 美国盛产“克莱登大学”吗？

中国的“打工皇帝”唐骏博士学位造假之说，被方舟子揭出后顿成新闻热点。后来，唐骏的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已经发布“勘误更正”，唐骏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毕业于加州理工。他拿出来文凭，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但是，这一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是明码标价出售的，不被美国教育部所承认。对此，唐骏在购买时不可能不知道。再说自己并未有意造假，怕是已经说不过去了。

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说唐骏在中国尚有许多校友，而且有许多相当“成功”。这下子大家都要受他的“连累”。另外，人们也许还记得，吴征当年也同样因为在美国的“克莱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受到类似指责。于是，中国的许多读者质问：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贩卖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怎么判断美国大学文凭的真假和“含金量”？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留美已成为中国的时尚，海龟成为一大社会阶层。这样的问题，确实也值得好好回答。

我在2010年年初出版的《培养精英》一书，就旨在系统介绍美国的大学体系。我把美国的大学分成四类：国立、州立、私立、赢利，并概括性地勾画了这四类大学的历史成因和特点，可供读者参考。在这里，仅对这四类大学的现状进行一番简要的描述。

国立大学，顾名思义是联邦政府掏钱办的大学。一般而言，美国是个没有国立大学的国家。恐怕大部分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了三四年，也不知道美国有国立大学。其原因是，美国的国立大学，主要是几所军校。普通的院校确实没有国立的。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为州立。州立大学靠纳税人的钱支持，但仍然“公立”



得不够彻底。这主要是因为州立大学要州政府拨款，依赖的是本州老百姓的税金。本州的纳税人子弟进这些大学，自然享受公立的低廉价格，实际上接受了纳税人的大量补贴。但是，外州学生前来就读，就必须支付全额的教育费用，其学费经常翻一倍还不止，和私立大学的学费没有本质区别。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是依靠私人经费办的大学。因为不靠政府，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私立大学的格局也比较纷繁杂乱，很难一两句话概括。我们不妨从两个极端讲起。美国最好的大学，基本都是私立大学。比如常青藤盟校、麻省理工、芝加哥、斯坦福、加州理工等等。这些学校的“小金库”，即“捐助资金”，往往势可敌国，比一个小国家的GDP都多。而且教育学生不惜工本，即使是三四万的学费，也难支付那里的教育成本，况且还有大量的学生领取奖学金。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前，这些学校面临的危机是钱花不掉。根据美国的法律，非营利组织的基金必须花掉基金总额的5%才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可是，一些常青藤的捐助基金在股市不停地升值，每年的财政经费虽然已经到了相当奢侈的地步，但依然不到捐助基金总额的4%。于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要求用5%这把尺子来逼迫这些大学，大学慷慨地把自己的钱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教育费用，也和这种“必须花够数”的压力有关。甚至有人预言未来一流大学的教育将向免费化发展。金融危机无疑打断了这一进程。但是，这些大学虽然在资产缩水的压力下大砍经费，学生的奖学金仍然要优先保障。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的私立大学。当然，这种学费并非仅仅来自学生的腰包，还有些是从联邦或州政府拿的奖学金、助学金。因为没有纳税人的钱作为直接的后盾，这些学校的经营有时难免风雨飘摇。声誉好的，一般不会有生存问题。比如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真正破产的学校实际上非常少。但是，规模小、底子薄的地方学校，则往往经受不住打击，招不到学生就只好关门倒闭。

在私立学校之外，最近20年还兴起了一种新型大学，叫营利性大学。美国一般的私立学校，不管是国立、州立，还是私立，都属于非营利组织，一般不纳税，但也不能营利。所谓不营利并非不能从事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所得收入投入学校的运营经费或捐助资金，不得用于教育之外的目的。营利大学则不同，往往就是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和超市、工厂并无区别，那就是营利。与此同时，这

种营利大学和企业一样向政府纳税，不享受非营利组织的待遇。美国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等等，曾力挺营利性大学，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像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作为上市公司就属于营利性大学的模式，所不同的是其主业并非大学而已。

这四类的概括，仍然不能全面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下面有必要从“教育层级”的角度介绍一下各种大学的性质。

最高的层级，无疑是研究性大学。如果你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那个著名的全美大学排名，研究性大学当是美国大学的主流。但是“研究性”这个名字有很大的误导性，“综合性”也许更贴切些。研究性大学按说应该是以研究为主，以博士课程为主，本科教育不应该是重点。但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榜中，即使是主要的“研究性大学排名榜”，其实也是在评价本科教育。美国19世纪末学习德国模式，开始建设研究性大学。斯坦福、芝加哥、约翰·霍普金斯、克拉克等大学纷纷冒出来。那时是美国的“镀金时代”，出现了一批像卡内基一样的财主，捐款滚滚而至。办高精尖的研究性大学似乎有了充分的条件。但是，从长久来看，讲究实用的美国文化对研究性大学有相当的抵触，认为把人圈在象牙塔里那么多年实在没有必要，甚至将之当成一种外来文化的入侵。结果，大学很难办成研究所甚至研究院，主业还要归依本科教育。当年的那些研究性大学，纷纷把本科教育当成主业。芝加哥大学大概在研究性上坚持得最久，一直以研究院、博士课程为重点。但是，近20年来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加大本科教育的投入，进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榜上扶摇直上。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研究性大学的崛起重新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常青藤盟校在19世纪末以前全是本科教育学院，19世纪后除了达特茅斯外全成了“研究性大学”。另外，许多“旗舰”式的州立大学，如伯克利、密西根，也都成了研究性大学。这些学校，都有强大的博士课程。当然，即便如此，本科教育还是学校的核心。

接下来的层级，则是本科生教育。按说美国的大学几乎全是以本科教育为主，没有必要另立一类本科大学。其实不然。本科大学，主要是指明显以本科教育为主业并不太注重研究院，甚至完全没有研究院的大学。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除了研究性大学排名外，还有一个本科学院排名。这些本科学院大部分是私立，规模袖珍，质量最高的几乎可以与常青藤比肩。一些被列入研究性大学



排名的学校，如达特茅斯、华盛顿大学，虽然有研究院，但还是以本科教育为绝对中心。大多数州立大学，也不像伯克利、密西根那样有实力雄厚的研究院，本业依然是本科教育。

在最低一层，则是社区学院，即两年制的学校。这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中专、大专，但在美国都归入高等教育体系。在这种学校就读的学生，接近美国大学生人数的一半。社区学院大多公立，学费低廉、学制短，比较容易承担。如今美国制造业外包，产业工人技术升级、适应白领经济，就特别倚仗这种社区学院。因而从布什到奥巴马，联邦政府都给社区学院以大量的支持。许多赢利性大学，也开始和社区学院竞争，瞄准那些半工半读的大龄“非传统学生”。

这么庞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反映着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也给唐骏们所毕业的“克莱登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但是，美国对高等教育虽然自由放任，却仍然维持着基本的水平，否则就无法成为全球第一。根据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美国教育部委托一些可靠的机构，按照严格的程序对各种大学进行“鉴定”（accredit）。一般而言，只有通过鉴定的学校，其学历和文凭才被承认。我查看过美国教育部的资料库，其中包含了6900多家通过鉴定的高等教育机构。

授予唐骏博士的西太平洋大学，当时并没有通过“鉴定”，反而因为贩卖文凭遭到联邦的调查，起因是一些联邦雇员涉嫌花政府的钱到这一学校买文凭以充实自己的资历。联邦法律规定，用政府的钱培训的雇员，必须就读于通过“鉴定”、有正式资格的学校。这一调查引发的最大丑闻，大概是爱尔兰政府顾问Barry Mc-Sweeney。此公仅读了一年，就在西太平洋大学获得博士，日后平步青云，甚至成为具有全欧影响的“居里奖学金”的负责人。他在博士学位造假被揭露后被迫辞职。后来西太平洋大学更名为加州米拉马尔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属于赢利性大学，并通过了“鉴定”，但也仅能授予三个学士学位、四个硕士学位。这些学位，主要是管理类。唯一一个硕士学位为电子通讯（telecommunications），根本不具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这反映了“鉴定”制度下的规范：一个学校不能想设什么专业就设什么专业。如果专业设置无法通过“鉴定”的标准，则会影响学校的资格。

经过这么一番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能说是“产能过剩”，但至少大学是应有尽有，高等教育的“供给”异常充足。美国大学的教育竞

争激烈。但是，这种所谓激烈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前100名左右的大学。这种学校，要挤进去需要和他人拼比。在接下来100多所大学中，最多只是略有竞争而已，80%—90%的申请者都可以被录取，比中国高考的录取率高多了。如果你申请前300名以外的大学，那么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英语达到最低要求，有能力缴纳学费就可以就读。而且周围的同学，经常一周打30个小时左右的工，不少人还有全职工作，很难专心于学业。在这种学校成为优等生，也实在不足以作为“优胜记录”。

博士课程则复杂些。前面已经介绍过，美国的大学，即使列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研究性大学排名榜的，也经常并不重视博士课程。特别是文科的博士课程，只有极少数大学才有。理工科的博士课程因为需求旺盛而多一些。但是，这种博士课程的建设硬件要求比较高，比如大型实验室等等，并非一般院校可为。如此算来，能够授予博士的院校就少得多。比如，授予最传统的博士学位Ph.D.的学校，在美国不足282所。而且这些学校中的大部分，也仅在几个科目上授予博士学位。比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仅在经济学等两三个学科有博士学位，据此就被算入这282所大学内。

应该说，镀上正牌的“留美”这层金，有钱基本就可以。博士也许稍微难些。但是，在比较实用的学科，博士课程数目还是很多，甚至赢利性大学中，至少在低层级竞争性很低，名正言顺地拿个正牌博士，按说并不太难。美国贩卖学位的机构大概不少。但是，我在美国读书、教书15年，听过的贩卖学位的事情，几乎全是从中国新闻中来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有着如此大的规模，对市场渗透可谓无孔不入，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读大学的料的人，也设计好课程，比照其财政能力制定收费标准。如此容易地就能接受正经的教育，为什么还要买文凭呢？这一点，我看是唐骏们最难解释的。



## 美国大学里的校漂族

美国的大学，总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学生的家园：一个青少年在这里长大，学到了人生的基本价值和技能，建立了初步的社会网络，甚至认识了自己未来的配偶。总之，除了自己的家庭，大学就是一个最温馨的归宿。这样，学生毕业后会无不自豪地声称：我是某校出身。然后提携校友，为学校捐款。大学，就是其毕业生自我认同的核心。

然而，这种对母校的认同感，正在受到一股新潮流的挑战，那就是校漂族的出现。这种校漂族，也可以称为大学的游牧民族，指的是一批不停地换大学的学生。等他们拿到本科学位，已经上了两个甚至三四个大学。他们喜欢转来转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现在的美国大学生，拿到本科学位时，一大半都上过一个以上的大学，可见这群人的影响非同小可。这也难怪，在2006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报道。到了2008年大选时，校漂族第一次登上全国最高的政治舞台。阿拉斯加州长佩林被选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竞选伙伴，作为政治新星也大红大紫了一通。人们特别注意到，她大学第一年只在夏威夷太平洋学院读了一个学期，再跑到北爱达荷州的社区学院读了两学期，然后又跳到爱达荷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并在此期间回阿拉斯加参加选美比赛，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接着在当地的Matanuska-Susitna社区学院读了一学期，再回到爱达荷大学修了三学期课，最后毕业。一共读了四所学校。一看便知，她是个穷人，支付学费有困难，读了不少便宜的社区学院凑学分，最后在一个体面的州立大学毕业。而最后赢得大选成为总统的奥巴马，也是先在加州读了两年大学，中

途转到了哥伦比亚。严格地说，他也是个校漂族。

据统计，在1999—2000学年，59%从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学生上过不止一个大学，比1992—1993年度53%的比例大幅提高。其中，有16%的毕业生上了三个大学，有8%的学生上了四个大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大学自由竞争的开放体制：学生可以自由转学，并且可以把学分随身带走。因此，学生在A校上了一年，可以到B校读二年级。这种制度，鼓励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挑肥拣瘦，也给另外一些开始没有条件上好学校的学生日后“升级”提供了条件。

简单说来，这种校漂族有低端和高端两种，当然还有许多在两者之间。最低端的校漂族，是那些准备不足、资源有限的学生。他们常常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起步。这种学院，大致和我们的中专大专差不多。等读完了，觉得自己有条件上四年制的大学，就继续到四年制大学注册，并把社区学院的学分带过去。这样，毕业时就至少上了两个大学。还有一些学生，上学只争朝夕，希望早一年修够学分、早一年毕业，这样不仅少缴一年学费，而且早一年挣钱。他们放暑假回家，常常到附近便宜的社区学院修课，积累学分。当然，还有一部分不属于这种低端，但也不是上名校的高端学生。他们属于挑肥拣瘦型，上一个大学不满意，就换一所，不行再换。他们考虑的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课程和环境是否与自己投缘，又有学校在奖学金等方面给出的条件。根据美国国家教育数据中心的研究报告，在四年制大学中，有1/3的转学学生是转到自己更满意的大学去；另有1/3，是转到更好的地区或者更有声望的大学；还有10%是因为经济原因转学。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以Erin Dadden女士最为典型。她在2000年秋到2005年1月期间完成了大学学业，却换了六所大学！她先上了美国大学，却不喜欢那里的气氛，于是回到家乡附近，到波士顿的麻省大学读书，同时在马萨诸塞艺术学院读夜校。但这种走读生活使她感到太孤独，于是她回到家乡，在波士顿海岸线上的岛Cape Code读社区学院，然后又决定到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也是我2004年起任教的学校）攻读传播学。这里的学生，有24%是转校生，和她很相投。但是，当她刚刚找到感觉时，她在Cape Code读书时认识的一家传媒公司给了她一份全职工作，于是她不得不到萨福克在Cape Code的分校（是和总校不同的社区学院）完成学业。

另一个校漂族的代表人物是Brian Donnelly。他本来上了在Boulder的科罗拉多



大学，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州立大学。但他一天到晚玩滑雪，平均成绩仅2.5分。用他的话说，那是4万美元一年的度假。后来他辍学回到老家加州，在当地两个两年制的初级学院读书，平均成绩提高到4.0。靠这个本钱，他浪子回头，进了名校波士顿学院，一下子喜欢起大学生活来，并且马上就要毕业。

高端的校漂族，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像是中国的复读生，他们没有进入理想的大学，决定第二年再接再厉重新申请。所不同的是，他们复读的地方不是高中，而是已经录取他们的次等大学。

这些骑驴找马、憋着劲儿上名校的校漂族，转学远不像低端的学生那么轻松。一般的大学，学生转来转去，空缺很多，有的大学招生更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名校则不同，每年招生都会严格控制规模，要考虑师生比例、校舍容量、班级规模等等，绝不多招。另外，学生一进名校，一般都会读到毕业。一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拔萝卜哪里有坑？上了大学再转学，接收学校会把你的申请和应届高中生分开，看看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是否有人离开，才能考虑拿你去补缺。

不过，这种过去不太现实的事情，现在有了可能，乃至成为一种时尚。比如，许多名校鼓励学生到海外读书一年，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海外学习算本校学分。所以，许多学生只在本校读三年。他们出国期间，学校就有了空缺。另外，一些名校的学生也开始转学，这也空出若干位置。那些上名校未遂的学生，就把大学一年级当成高中毕业班，一天到晚还在准备申请材料。一些帮助学生申请大学的公司也推波助澜，告诉孩子：“如果你有一个梦的话，千万不要在17岁时就放弃！”

然而，17岁孩子的梦，有时不过是些青春期的骚动，有些是盲目攀比。Abigail Wright从贵族学校Milton Academy毕业。她所在的这个高中，有十个上了哈佛，而她只进了候补名单，最后到了哥伦比亚，心里很不服气。在哥伦比亚，她受到良好的教育，却一心想着转到哈佛。最后她找到教她拉丁和文学的教授写推荐信。这是绝大多数高中生没有的资源。她的教授觉得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最后，她得手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希望从事新闻播音，哥大有新闻学院，恰恰是这个领域的领袖。可她却觉得，顶着个哈佛的牌子，以后好找工作。不过等她毕业时，她至少上了两所大学：哥大和哈佛。

Abigail Wright算是幸运的。哈佛对转校生还算不错，因为那年海外课程扩张，多空出许多位置，对转校生的录取率在8.8%，和其对高中生的正常录取率差不太

多。康奈尔、布朗对转校生的录取率则达34%以上，超过正常录取率。但是，耶鲁和MIT，对转校生的录取率则不足5%，还不及正常录取率的一半。一些规模小的本科学院，喜欢学生“从一而终”，对转校生很苛刻。比如Middlebury College，在2005年面对230份转校申请，仅收了一个人。

目前校漂族泛滥，对高等教育是福是祸，大家还没有定论。不过，从统计数据上看，对校漂现象的成因多少能看出些线索来。在18岁或18岁以下开始上大学的人中，49%是“从一而终”，31%上了两个学校，20%上了三四所或更多的学校。如果在19至23岁期间开始读大学，只有34%会只读一个大学，41%读两所大学，25%读三四所或更多的大学。在24至29岁期间开始读大学，属于大龄青年，是所谓的“非传统学生”。这些人里，只有11%会只读一所大学，47%读两所大学，43%读三四所或更多的大学。可见，上学的年纪越大，校漂现象越严重。美国近年来“非传统”大学生比例的增高，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一现象，说明校漂族的出现大部分是高等教育普及的产物。那些大龄学生，一般是高中毕业没有条件读书，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想上学，于是换来换去。他们因为知道教育机会来之不易，且花的是自己的钱，不是父母的钱，所以精打细算，读书也比较负责。我在萨福克教书，就能碰到这样的学生。他们在过去是没有机会的。美国灵活的体制，则给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201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公布全美大学排名的那一期里，特别刊登了一篇专家的文章，计算怎么通过换大学省钱的办法。按一般私立学校的标价，四年大学的花销可达20万美元，因为四五万一年的学费如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但是，在俄勒冈一个社区大学，一年学费仅3666美元。按照该州的规定，这里的学分可以带入普通的四年制州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加上住宿为15294美元。前两年上社区大学，后两年上州立大学，一张本科学位的总开销仅仅37920美元。在我看来，这笔账水分当然很多。比如，私立大学经常提供许多奖学金，并非一味按标价收费。20万美元的费用似乎太夸张了。何况上一般州立大学仍然相当便宜。不过，即使把这些水分都挤掉，校漂族能省下许多钱，却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那些十八九岁、一心奔名校的高校复读生，校漂等于给自己延长了考大学的苦刑。但是，在大学里复读，总比在高中复读好。灵活的制度，给各种地位和处境的人提供了第二次、第三次机会。高等教育越来越以人的选择为中心。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了，甚至实行义务高等教育的声音也偶尔能听到。不过，高等教育传统上是精英教育。大众化之后，必然产生种种转型之痛，并引发了教育哲学的大辩论和静悄悄的教育革命。

2007年年初，以智商问题激起大辩论的《钟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叫停。他的理论依据还是其备受争议的智商学说。我不妨简述如下。

现在美国教育的问题是上大学的人太多。有成效地接受大学教育，需要115的智商指数(人类平均智商指数是100)。具有这种智商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如果把标准再放松些，最多占25%。但是，最近几年，45%的高中生毕业了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学生对课程失去兴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我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有一半的孩子，智商在中等以下。一个智商是135(即属于1%最聪明的)的女孩如果英语仅拿了个C，那是她丝毫没有利用自己的潜力。如果有人帮助督促她，改善她的教育环境，她可能会有难以置信的进步。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投资。相反，坐在她身后的一个男孩，智商在100的中间线以下。他如果同样拿了个C，大概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再花钱在他身上下功夫，基本上是无济于事。关于人类智能的研究表明，外来的强化干预，即用科学手段最大限度地开发智商，能暂时提高智商七八个点。但是，在干预停止后几年内，提高上去的智商又基本都缩了回去。

目前美国对学生的学术表现非常过敏。比如，“全美教育进步评估”(Na-

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显示, 2005 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低于标准, 于是人们大呼危机。但是, 大家忘了: 四年级有同样比例的学生, 智商低于95。他们的成绩体现了他们的智商, 而不是教育的失败。把智商低而导致的低学术水平归结为教育的失败, 又是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 又是增加各种奖学金使上大学对所有人都变得容易, 等于把大量的钱投资在低智商的学生身上, 不可能有良好的回报。正确的方式, 是把大学留给少数人, 让智商不够的大众上职业学校或社区学院, 学会些谋生的手艺。事实上, 大部分智商平平之士, 都可以把适合自己的手艺发展得精妙绝伦, 甚至获得六位数的年收入, 成为社会中很有贡献的成员。让他们读他们不可能有兴趣也无法掌握的大学功课, 不仅白白浪费了教育资源, 也毁了他们的正当职业生涯。

这一番高论, 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大幅连载三天, 反映的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学说, 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思潮或运动。其实, 类似的思潮或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19世纪, 面对德国的崛起, 一些美国人坐不住了。德国的教育从来是双轨: 一轨运载聪明人走向管理阶层, 一轨运载普通人走向劳动阶层。这样因材施教, 效率极高。当时芝加哥的企业家组织起来, 试图把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改造成德国式的, 为蒸蒸日上的工业化服务。他们估计, 美国的工人如果能有德国那样的训练, 每个工人的生产力可以提高10%。

可惜, 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虽然企业大亨们觉得职业教育系统是最有效的培养人才的方式, 但以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威为首的自由派势力则极力反对。杜威称, 如果施行这样的改革, 教育将成为将现有的工业化秩序固定化的工具, 从而丧失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目标。

Charles Murray的文章, 则表明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面前, 工具性教育思潮正卷土重来。简单地说, 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还是以培养实用的专业技能为目标, 一直界定了教育中的两派。美国是个没有等级的自由社会, 教育一直以前者为重。特别是在自由派看来, 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减少贫富分化、消解阶级鸿沟的重要手段。一开始就在学校把学生分成“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 让前者当全面发展的人, 让后者当只掌握个别技艺的工具, 这等于用教育来创造社会的不平等, 违反自由社会的理想。但在另外一些人(特别是保守派)看来, “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的区别, 连傻瓜心里都很清楚, 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有些人一辈子不会对柏拉图有兴趣，也根本读不明白，但他们可能是天才的木匠。不训练他们做木工活儿，而强迫他们通过读经典来“全面发展”，实际上是知识阶层强迫劳动阶层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精英主义的傲慢。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只有让木匠当木匠，社会才有效率。“全面发展”听起来政治正确，在现实中不过是夸夸其谈，解决不了劳动阶层面临的真实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实用理念的指导下，一些企业积极介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以企业特殊的需要来塑造学校的课程，以企业的管理方式经营学校，并产生了相当的效果。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阿拉巴马州Mobile县Brazier小学的变化。这个县的大部分居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干两份工作来勉强生存。2003年，Brazier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有7%通过了州里的阅读测验。2001年，州里削减了150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面对绝境，该县选民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投票加税，以增加250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Brazier小学趁此良机，雇用了一位新校长Merrier Jackson。这位凭篮球奖学金在本地的南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的职业妇女，并非传统的教育工作者，而是个企业家。她以企业的方式经营学校，吸引企业的投资，并保证这种投资获得回报。比如，附近一个向学校投资的大企业Budweiser Busch Distributing Co.的首脑每年要和她开四次会。每次会议，她都带来一系列数据和图表，像展示企业赢利一样，向投资人汇报学生的进步。她称Budweiser Busch Distributing公司为股东，当地的教会领袖、房地产投资人也都是她的股东。道理很简单，学校表现好，企业就有了合格的雇员，教区有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随行看涨。

Merrier Jackson被当地居民称为上帝派来的校长。其实，她是这些股东选中的。她上任后雇用了新教师，给表现出色的教师奖金（这在许多公立学校还是大逆不道的），把科学和社会研究课程缩短，每天用两个半小时进行阅读练习，一个半小时进行数学练习。当她看到一个男孩在列队走进学校时衬衫有些不整时，就马上走过去严肃地说：“我一直把你看作是一位小小的律师。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会把我的自由和权利托付给一个不把衬衫在皮带下扎好的人。”通过这样的企业纪律，她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期待。结果，仅两年的时间学校就焕然一新。2003年，五年级的学生仅7%通过了州里的阅读测验，2005年则猛增到74%！

如今Mobile的公立学校系统，都仿照这一模式和企业建立了全面的伙伴关系。

当企业作为股东给学校投资后，就渐渐把学校变成了未来职工的训练营地。比如，企业把高中和当地3.5英里外的一所社区学院联结起来。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到那里学习航空技术，学费、交通费、书费全免。这样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获得该学院发放的两种证书，甚至副学士学位。他们还能因此获得工作。这所社区学院的第三号合作伙伴ST Mobile Aerospace Engineering每年选拔20名学生当实习生，他们毕业后如果接受公司的工作，公司负责支付70%的学费（美国高中生往往能免费到大学选修一些课程，但高中以后成为社区学院的正式学生，一般需要自己付学费）。这已经成为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经典模式。比如当地一家造船公司，就要求学生研习金属、燃料、润滑剂等物质的特性和机械冷却法。企业界认为，高技术转化了制造业，传统的高中教育已经不能适应要求了。到当地的造纸厂看看就知道，你碰到的不是干粗活的工人，而是拿着笔记本电脑来去匆匆的技师。再如，阿拉巴马州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职业是医护人员，高中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可以被医院雇用的毕业生。结果，基础教育和职业训练接轨，学生高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式的社区学院。对于劳动阶层的子弟，这已经成为就业的高速公路。

把学校系统以企业模式重新组装，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教育界的传统势力特别是教师群体担心：这样的模式过早地把学生锁定在一种职业轨道上，使他们无法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丧失了向其他方面发展的机会，特别是会牺牲精英主义的教育理想。“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固然是现实存在，也许确实人口中只有15%—25%适合上大学，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这些人哪里？一个未来的爱因斯坦，可能就出生在Mobile镇上一个售货员的家庭。在目前这种企业化的教育模式中，这样的爱因斯坦则只能当木匠来训练，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蹩脚的木匠。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手套商的孩子，基础教育没有完成却写出伟大的剧作，乃至至今还有人宁愿相信那些作品是出于弗朗西斯·培根等贵族知识分子之手。这无非证明传统对劳动阶层子弟的偏见是多么靠不住。高智商的孩子并不一定分布在高收入的家庭或书香门第。企业化的教育在制造一种新的社会隔离：富裕区的孩子都上大学，贫困区的孩子都上社区学院。

对此，企业界人士并非不承认。但是，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Frederic Hess和Andrew Rotherham辩护说：“一个丑陋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对社会来说，让74%的孩子通过考试肯定比只有7%的孩子通过



好。贫困阶层的家长不会梦想着自己的孩子成为爱因斯坦或莎士比亚。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让孩子找到工作，不要犯罪吸毒。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劳动阶层的孩子拥入社区学院的同时，社区学院则努力提供条件让他们有从这种职业轨道上脱身的机会。《纽约时报·教育生活》几年前就集中报道了美国社区大学的这种发展，非常值得注意。

目前在美国4000所左右的大学中，有1202所是社区学院。在社区学院注册的学生达1160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46%，其中有40%是全日制的学生。根据2007年10月份的数据，这些社区学院，一年学费平均仅2272美元，而一般四年制州立大学则是5836美元，私立大学22218美元。美国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大致在5万美元多一点。显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社区大学不仅便宜得多，而且学制短，可以迅速就业。

当然，低收入家庭未必一定要送孩子进社区学院。美国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如果功课好，穷孩子拿全奖的机会反而多。目前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顶尖大学，中低收入家庭是免费的。问题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为教育环境差，许多人上大学的准备不足，或者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希望赶快学点手艺挣钱，就拥进了社区学院。另外有许多人，高中毕业就不再读书，打了一段工后，发现需要门手艺，也进了社区大学半工半读。所以，传统上社区大学全日制学生的比例较低，学生的平均年龄也较大。

如今，社区学院的结构正在调整。一些经济条件不理想但学业优异的学生，可以从社区学院起步，读两年毕业后再转入正式的四年制大学。比如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的女孩，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很快就要从纽约大学毕业了。这是美国最贵的大学之一：一年的学费、住宿费加起来，要5万美元左右。可是，这个女孩先跑到长岛的Nassau社区学院读书，一个学期支付不到2000块。她在那里拿到了可以折合到纽约大学课程的学分后毕业，并在教授的建议下，从“社区大学转学计划”中申请到一笔一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进入纽约大学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另一个马里兰的女孩，是全优学生，大学入学的能力测验SAT高达1380分，本有申请常青藤的条件。但她做出了令所有老师和同学都吃惊的选择：到当地就读社区学院。2007年，她作为社区学院的学生到剑桥读了一个暑假，如今拿到了副学士学位，正在申请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内的14所学校以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

目前美国的社区学院中，有39%是这种准备读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存在，使社区大学学生的平均年龄降低。十年前，有32%的学生在22岁以下；如今，他们的比例升到了42%。为了吸引他们前来深造，许多大学接受他们在社区学院的学分，并提供种种便利和奖励。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部主任称社区学院的转学生更成熟，该校每年有1400到1600个申请者竞争70个左右的转学位置，其中被接受的学生中，有26%是来自社区学院。另一所名校Amherst学院，为吸引转学的社区学院学生，提供了一年最高3万美元的奖学金。在佛罗里达州，凡是在社区学院毕业并拿到副学位的学生，就会自动被本州的几所州立大学录取。

众所周知，在美国也有类似我们的“高考”式的升学战。特别是一些中高产阶级家庭，一切围绕着孩子的升学来设计家庭战略，甚至一个家长不惜辞职。孩子在全家的支持下努力奋斗，高中毕业时一下子进了名校，如同范进中举一般。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这种鲤鱼跳龙门的事情并非没有，但大部分时间是要自己一步步地奋斗。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学院培养着更好的价值观念。上社区学院的学生，从小就知道不能一切靠家长，上学要对费用精打细算，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等他们慢慢奋斗到大学时，性格更成熟，对所得到的机会也更珍惜。我在四年制大学教书，目前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社区大学出身。

可见，即使美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越来越企业化，但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能走向19世纪德国那种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在职业轨道上受训练的穷孩子，如果天分出众，自己也努力，跳出来的机会还是有许多。对于劳动阶层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上的转型，即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尊重知识的价值观念。上得起大学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更大的挑战是：他们的孩子是否想上大学？



## 大学应该怎样竞争？

我坐在自己大学的图书馆中，心情格外舒畅。

这是一个崭新的图书馆，由世界一流的高科技武装。进门后，你可以凭证件免费借用一个笔记本电脑，写论文、无线上网无所不能；你也可以用证件“开单间”：那是一个四周用玻璃屏幕隔离的六人工作间，供学生分组学习用，里面音像设施俱全；另外的房间，不仅有全套计算设备，还可以现场录像，并通过卫星把内容同步传送到学校在欧洲和非洲的校园去，形成环球课堂。另外，图书馆复印费一般都很昂贵，遇到需要复印而不能外借的书时，读者常常头疼。但在这里，复印竟是免费的！

这是我任教的地方：波士顿的萨福克大学。上个世纪初，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看见很多移民勤奋苦干，但因为没有文化，看不到出头之日，就在一家人的起居室里，给几个移民开夜校。慢慢地，这一起居室里的学堂演化成法学院，许多穷人来读书。当时保守的哈佛校长对这样的学校嗤之以鼻，称之为不该存在的、危险的。的确，当时哈佛教移民一些法律，似乎不用这等“野鸡大学”跳出来扰乱高等教育的秩序。但是，那时哈佛给移民上课，是教人家遵纪守法；而我们学校的前辈，是教穷人怎么当律师！这是保守派难以容忍的。但是，学校活下来了。如今的法学院，是本地最大的法学院之一，本科生学院也蒸蒸日上。

学校的发展并非没有瓶颈。大学非大楼也。但没有大楼，也难成大学。萨福克大学地处波士顿最贵的地段，周围富裕的居民不希望家门口有个闹哄哄的学校，所以学校一要盖楼，他们就反对。所幸有的富人不这么看。一位90多岁的老妇，

觉得这块地方应该多些教育味道，一下子把一座富丽堂皇的商业大楼捐给我们。我们的新图书馆就建在这座楼里。

我和同事们有一阵子经常在图书馆里开会，讨论的并不是楼的问题。我们是在一起准备新学期的新生讨论班。本科生院的院长也出席了。他直截了当地挑明了新生讨论班的目的：“我们学校，每年花很大力气招收学生，但30%的学生最终转走了。这些转走的人中，有学业跟不上的，有不愿意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的，但也有根本不把我们当第一选择，读一两年就跳到别的学校去了的。这个新生讨论班，就是要从一开始就抓住他们，让他们觉得这里是个家。”

他描绘的，是每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面临的竞争压力。首先，美国学生可以申请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学，没有数量限制。第二，大学转学如同家常便饭——理想的学校上不了，在不理想的地方将就一年，然后跳槽。哈佛、耶鲁是挤破门的名校。好不容易进来，当然没有人想走，98%左右的新生都会留下。像我所在的小大学，则常常挑人家剩下的学生，最后只能留住70%的新生。另外，由于地处闹市，宿舍有限，校园建筑分散，扩张困难，学生缺乏归属感，这也是新生流失的原因。

新生讨论班就是在这种不利的竞争中挤压出来的。这一讨论班，旨在帮助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不仅教他们某一学科的知识，还要教他们怎样应对大学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包括熟悉图书馆、学习写作技巧，指导他们选专业、选课，等等。每班最多20人，保证教授和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对一的交往。每个班有500美元的经费，教授必要时单独请学生吃饭，让学生放松地敞开心扉。如果有特殊情况钱不够，还可以追加。由于对付这么一个小班所花的精力太大，学校悬赏：教这门课的教授每人的年薪特别加2000美元（这并不是多上一门课。而是在已有的课时中，把一门改作新生讨论班）。

我们这所本科生院学生总数才3600多人，四年平均，新生应该在900人上下。学校为此开设了40个新生讨论班。我粗略一算，仅教授额外的工资和课堂额外经费加起来，这些课就要10万美元。另外，不管是多么有资格的教授，教此课必须接受培训。有位60多岁的系主任，就和我这个刚来的助理教授一起接受培训。

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展现出美国私立学校是怎么竞争的。我们学校比起哈佛、耶鲁来是个丑小鸭，图书馆的藏书更没法比了。但是，我们这个新图书馆，



和法学院不久前建的图书馆，从设施上看比哈佛、耶鲁还豪华，保证学生每天都用的设施是一流的。另外，学校的主要精力和经费也都花在类似讨论班这种教学上。学校不要说没有五星级酒店，连个小客栈也没有。可是，诺贝尔奖得主刚刚来讲了半年课，连前总统老布什也来演讲。该接待的都接待了。只是我们这些当教授的，暂时只能在外面租办公室，等着把花旗银行和城市银行等清除出我们刚刚得到的大楼，才能最后“入主”。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大学办不好不能怪市场化，而要怪没有市场，或者假市场。看看萨福克大学的经营，就非常市场化：除了偶尔的捐助外，就靠学生的学费。也正是如此，学校才对学生非常小心体贴。这次新生讨论班的教授培训，院长陪了一天。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教这门课，你们必须做好准备。学校可能半夜给你家里打电话，问某个学生今天没有来上课，是什么原因。”再看看中国的大学，大牌教授不教书只拿钱，让最年轻的讲师上第一线，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最低的报酬。这样办学，怎么可能不破产呢？

## 美国的应试教育之父

2009年，有两位人物去世。一位是美国著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另一位则是斯坦利·科普兰（Stanley Kaplan）。肯尼迪的死所闹出的动静，几乎赶上了一位总统。他的葬礼就有四位健在的总统出席，几乎所有政要都竞相露面。而科普兰的死则几乎无人知晓，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大公司的牌子一样熟悉。

事实上，这两个人几乎同时退出历史舞台，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肯尼迪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豪门的时代。而科普兰90年的生命，则开创了一个新的平民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刚起步，绝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

爱德华·肯尼迪是肯尼迪四兄弟中最不成器的一位。他因为生于豪门，得以追随家族传统进入哈佛，但很快因为考试作弊被除名。在那个年月，这样的富家子弟，自视能高于一切规矩之上。考试作弊被除名了，那么就再申请回去。如此平庸之士，很快赶上好运气。1960年他哥哥当选美国总统，空出了自己在麻省的参议院席位。当时爱德华才28岁，而法律规定年满30岁才有当参议员的资格。但是，新总统自有安排：他建议州长任命自己的一位朋友填补这一参议员席位。这位朋友等到总统的弟弟满30岁后马上忠实地将议席让出，爱德华得以在选举中轻易获胜。当时他的民主党内对手在竞选中指着他说：“如果你的姓不是肯尼迪，这样的选举就是个笑话。我们选的是能力、经验、业绩，不是关系、家门。”但是，在肯尼迪家族的基地如此斥责肯尼迪，自然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反而成全了爱德华。

不仅如此，爱德华在当了七年参议员后，居然为自己的履历中添了犯罪记录。



1969年，他在麻省一著名的度假胜地和一群为他哥哥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工作的女孩子们聚会，半夜带着其中一位28岁的女性离开，结果把车开到了湖里，他自己游泳上岸，逃离了现场，也不向警察报告，直到第二天那女子的尸体被发现。此案一直疑点重重，连是否为谋杀也难以排除。后来的调查发现爱德华的供认与事实多有冲突，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丑闻粉碎了他的总统梦。197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本来非他莫属。但选民难以忘怀这一丑闻，他也不敢冒险，宣布不参加竞争，让名不见经传的卡特成为总统。四年后他觉得丑闻被人淡忘，卷土重来，但必须挑战本党的总统卡特，最后自然无果而终。不过，尽管他的花花公子式的劣迹屡见报端，最终也都无法将他赶出政界。

作为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三长的参议员，他的立法记录自然惊人。有人说他一生的政治影响甚至超过了两位兄长。不过，看看他的个人历史，再看看满庭政要在他葬礼上那么动情，信仰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的我还是不禁惊讶：这是美国吗？凭什么要选这么一位来成就这些业绩？难道普通美国人中没有比他更秀异的人才？他的成功，挤掉了谁的机会？

其实，冷静想想，这也合情合理。美国以地方自治立国，这种自治传统来源于中世纪。你看看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自治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就知道，虽然也是选举产生，但还是几大家门把持。政治统治集团如同行会一样，以家门作为招牌，并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垄断性。老百姓也认这个招牌。这种共和体制中的政治世袭，和王权的政治世袭不同，代表着中世纪那种跟着邻居中的名门大户捍卫自己权利的草根政治心态，一直延续到了今日的美国。麻省特别是波士顿的老百姓几十年形成了强烈的信念：有事情要找肯尼迪！

但是，这套世袭的政治文化，正在缓慢地瓦解。变化首先发生在大学里。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的常青藤还如同豪门的私人俱乐部：肯尼迪家去哈佛，布什家去耶鲁。这是世袭接班的第一步。但是，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豪门对常青藤的垄断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多元化：大学要海纳不同阶层和种族的英才；一是能力中心：通过考试成绩等等选拔人才。其中SAT作为申请大学的参考成绩，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美国的高考”。换在今天，肯尼迪也好，布什也好，靠考试成绩恐怕都进不了哈佛、耶鲁。有人称布什是常青藤中靠老子上大学的最后一代。

在这一新时代，进哈佛、耶鲁的是一批功课好、智商高的学生。这就突显了科普兰的意义。科普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时申请了五所医学院。他当时在纽约城市大学毕业班中排名第二，并获得自然科学的优异奖，以此记录，按说上个医学院不成问题。但是，五所医学院全拒绝了他。后来他发现：他那些富裕的犹太朋友，跑到私立大学读书，轻易进了哈佛医学院；而他在城市大学那些非犹太人的同学，即使不如他的也进入了医学院。他立即下了结论：我是犹太人，又没有上私立大学，所以门儿也没有！

当时犹太人受到教育歧视，唯一的晋升之阶就是考试。犹太人靠考试成绩好大量挤入常青藤，甚至在哈佛、耶鲁等校引起惊慌，大家要想办法如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美国大学中专门的录取办公室就是这么成立起来的。其办法是把“品格”作为衡量学生的手段，冲淡了考试成绩的重要性，成功地降低了犹太学生的录取率，捍卫了传统白人的垄断地位。这就是科普兰的时代。他的被排挤，和无功受禄的肯尼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贵的是，科普兰并不屈服，而是把精力放在犹太人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器（即应试）上。那时SAT刚开始不久，这是一种智商测试。人们认为考前有针对性的突击和准备并无意义。因为SAT是一个衡量内在脑力的测验。知识可以增长，但脑子不可能变聪明。科普兰则于1946年开始研究针对SAT的应试办法。尽管考试的主持机构告诉学生参加科普兰的培训课程纯属浪费钱，但当他成功地提高了他的学生的SAT成绩后，联邦行业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20世纪70年代末决定对他展开调查。本来，调查的目的是看看他到处鼓吹他的课程能够提高SAT成绩是否属于假广告。但于197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等于给他的事业进行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广告宣传。该调查报告指出，科普兰的系统能够提高SAT的语文和数学部分的成绩各25分（总分在200—800之间）。于是，立志上大学的高中生们纷纷拥入科普兰的培训课程中，让他生意兴隆。1984年他将这笔生意以4500万美元卖给《华盛顿邮报》。如今，科普兰公司是《华盛顿邮报》集团中比《华盛顿邮报》本身身价还高的分支，并包括网上法学院等各种教育课程，年收入高达23亿美元。

科普兰引起的考试革命，被称为教育民主运动。虽然上得起SAT补习班的还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但肯尼迪如果活在今天不可能找人代考，分数还是要自己争取的。另外，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对富人的经济优势也很有意识。当年作为排



挤犹太人的工具的“品格”评价，被用来照顾弱勢。特别是在精英大学，富裕家庭的子弟必须考高得多的成绩才能和穷孩子竞争。穷孩子则因为显示了“克服生活中的挑战”等等品格而获得加分。这样，平民子弟出头的机会就多了不少。

以后的美国政治，家门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但名校的影响则可能加强。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刚刚上任的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全是一色的常青藤毕业。特别是最高法院，几乎被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三大法学院一手遮天。常青藤等一流大学，本世纪开始又试行奖学金的改革，使平民子弟几乎可以在那里获得免费的教育。与此同时，各个私立大学虽然一直招收一定比例的“遗产学生”，即以特殊标准录取一些大家门特别是给学校捐款的富豪的子弟，但最近这种政策在教育平等的浪潮中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肯尼迪生前也公开支持废除成全了他的这种制度。世袭教育的终结，恐怕是指日可待了。这样，大大小小的肯尼迪们就很难和那些功课好的普通学生竞争了。没有常青藤的牌子当然还可以出头，但这条路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容易了。这种苗头，其实已经出现。比如，不久前希拉里就任国务卿，空出了自己在纽约州的参议员议席。纽约州和麻省并列为肯尼迪家族的两大政治基地，是爱德华之兄罗伯特·肯尼迪的大本营。自然，在希拉里走后，肯尼迪总统的独女卡罗琳马上被拥出接班。可惜，时代变了，她显然没有爱德华的运气，尽管人品好得多，选民也不认可。最后接班的是常青藤出身的Kirsten Gillibrand。

这一切，都突显了科普兰的历史意义。有人说，作为美国的应试教育之父，科普兰把教育变成了考试。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美国的现实环境下，考试毕竟是消解传统权力的最好工具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正的平民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

## 金融泡沫后的美国大学

2009年秋天，从联邦储蓄银行主席伯南克到华尔街的主要投资家都宣布经济危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复苏马上开始。但是，这场以华尔街金融风暴为中心的经济危机已经深刻地冲击和改变了美国社会。其中一个不太被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受害者就是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

美国最好的大学全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最大的家底就是自己的捐助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是校友和其他慈善人士捐赠，学校将之投入股市生息，所得利润再用于学校的运营经费。在2008年，哈佛的捐助基金达到369亿美元，而奥巴马的老家肯尼亚一国的GDP也不过才300多亿美元。但根据2009年9月公布的数字，哈佛的捐助基金已经跌到了260亿美元。再看耶鲁，2008年夏天捐助基金高达230亿美元，如今则仅剩160亿美元。两校捐助基金的下降幅度都达到30%上下！

按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名校不管怎样还有上百亿美元的金库，自可维持其豪华的消费。其实不然。许多钱投到了无法迅速变卖的资产上，许多用于基础建设。当然还有不少投到了已经跌得过低的股票上，这时卖出去要赔血本儿。所以，面对这样大的资产缩水，大学拿不出现金来，纷纷开始借贷。哈佛2009年从证券市场借了15亿美元，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各借10亿美元，耶鲁则借8亿美元。另外，各校纷纷冻结教授的薪水，停止雇佣新教授。耶鲁的财政开支就削减了7.5%。

捐助基金不仅反映着一校的实力，也支配着学校的运营。以哈佛为例，大约1/3的运营经费都出自捐助基金。如今赶上号称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美



国的GDP也不过最多缩水几个百分点，这已足以促使美国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捐助基金一下子缩水30%，自然会改变大学的经营方式。

要理解这种变化的深刻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捐助基金在金融风暴前对大学的塑造力。

在传统上，大学对捐助基金的经营和一般非营利组织的基金大同小异，那就是把钱拿去投资。因为其“非营利”的目的，这种投资主要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保值，目的是在通货膨胀中维持基金的实际购买力。最基本的投资模式，是60%的股票，40%的证券。从长远来看，股票的生息率高于银行储蓄，而证券则是旱涝保收，虽然利息比较低。这种投资模式的年回报为6%—8%左右，比银行储蓄利率略高，同时也比较保险。不过，靠这样的模式很难大幅度扩张基金的规模。首先，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要在2%—3%左右，这就砍掉了1/3左右的回报。另外，美国的法律规定，一般非营利的基金，每年必须花掉基金总额的5%。我们只要把3%和5%相加，就得出了8%的比率，正好抵消了基金投资的所有回报。大学的捐助基金虽然不受5%的最低花费的限制，但维持一般的运营每年要从捐助基金中提取4%左右的经费。按照传统的投资方式经营，一年大致维持一两个百分点的增长也就不错了。

这种稳扎稳打的缓慢增长，在上个世纪末被打破。这还要从大名鼎鼎的巴菲特说起。1976年，他说服一所小大学Grinnell College在当地的一家电视网投资1300万美元。五年内，这笔投资变成了3600万。当时巴菲特不过觉得这是笔好买卖而已，没想太多。不过这一行为改变了大学的财政经营。自此之后，各大学都竞相改变投资模式，减少对证券的投资，增加对风险大、赢利也大的股票的投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另类投资”（alternative investments）。这种“另类投资”包括的不仅是高风险的股票，甚至还有对冲基金。

当这种新的投资技术被引进捐助基金的经营中以后，就使得几大名校暴富。其中耶鲁表现最好。在David Swensen的领导下，耶鲁10年的投资回报一度达到年均20%以上的水平。以耶鲁捐助基金顶峰时刻230亿的基数计算，年增20%就是45亿多美元。哈佛在2006年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将近70亿美元。最近公布的数据因为取的时间段不同而显示出低得多的增长幅度。不过，截止到2008年财政年度，耶鲁捐助基金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6.3%，哈佛紧随其后，达

到13.8%。按这种速度，捐助基金的规模几年就翻一番。

因为捐助基金随着股市上涨，大学钱多得花不完。以耶鲁为例，过去股市的平均年回报率达16%。200亿的捐助基金，一年下来就赚32亿！美国法律上有规定，所有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总资产的5%才能享受慈善机构免税的待遇。这几个常青藤怎么烧钱也花不完自己捐助基金的5%。乃至参议院开始酝酿法案，强制这些大学花到这个比例。作为应对，各大学加大了奖学金的颁发，乃至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等名校，正向着提供免费教育的目标迈进：你家庭收入不到18万美元，只要被录取，学费、生活费等等一律不收。这样，美国95%以上的家庭的子弟，只要有本事挤进去，就可以白读四年。

但是，这场金融风暴改变了整个奖学金改革的动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等，仍然维持着慷慨的奖学金制度，但估计短期内不可能继续往前走。全部免费理想恐怕要推迟实现。因为捐助基金萎缩，过去这些学校可以花不到4%的捐助基金就能维持良好运营，如今在大力削减开支后也要花掉捐助基金的6.5%以上。国会那一必须花掉5%的压力顿然消失了。

最糟糕的是实力略逊一筹的学校。比如波士顿地区的布兰代斯大学，按说这也是全国名校，但前一段因财政困顿，计划关掉学校的艺术馆，震动全美高教界。该校据说一方面要削减师资，一方面要扩招学生，试图用学费挽救破败的财政。学生不是资助的对象，反而成了要钱的对象。大名鼎鼎的Reed College（也是苹果电脑总裁Steven Jobs）的母校，竟要求录取办公室砍掉100名需要奖学金的学生。该校负责人坦率承认，这违背了学校一贯的价值观念，但目前别无选择。

2009年华尔街的股市触底反弹，各大学的捐助基金也有所回升。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的这个年度，哈佛的捐助基金上涨了11%，达到276亿美元。耶鲁回弹8.9%，普林斯顿则回弹15%，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更好，分别回弹19%和17%。但是，比起昔日来还不在于一个层次上。美国大学从这场金融危机中恢复，估计要几年时间。在恢复元气之前，除了几所“巨无霸”外，大部分学校恐怕都要走削减奖学金、录取付全额学费的学生的道路。这无疑将增加穷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奥巴马政府虽然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增加国家奖学金的数额，但是恐怕很难弥补私立学校奖学金的萎缩。



## 美国大学是否会成为房市后的另一个泡沫

本世纪初，当美国经济挣扎着走出IT泡沫之时，有些经济学家就指出：经济的回暖，不过是用房市泡沫代替IT泡沫。其实房市泡沫比IT泡沫更大，崩解起来更可怕。如今，这番预言已经应验。如今房市已经触底，于是又有人问：下一个泡沫是什么？回答是：大学！

这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美国的大学信誉卓著。在上海交大的全球大学排名中，美国大学在前20名中占据了17所，在前50名中占据35所。美国大学雇佣了70%的诺贝尔奖得主，出产的论文和论文引用率也位居世界第一。如今美国正向知识经济迅速转型，上大学几乎成了就业之必须，使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去读大学，升学战愈演愈烈，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学业越来越不惜工本。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用房市的模式分析美国的大学的话，目前大学的繁荣就是个大泡沫。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1978年到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CPI）、房价指数和大学费用指数的变化轨迹。如果把三个指数在1978年时的水平全都调到100的水平上计算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就为350上下，房价指数在2006—2008年泡沫顶峰阶段曾高居400以上，但如今已经跌到400以下，和消费价格指数相差并不多，基本上属于合理的水平。但是，大学费用的指数，在2009年就已经超过了1000，并且涨势不减，2010年正大步向1100的水平靠近。当然，这种计算仅仅根据大学的收费标价，并没有考虑到奖学金等等“折价”的因素。不过，Gleen Harlan Reylolds在2010年夏天撰文指出，如果把奖学金的因素考虑进去，美国家庭实际支付的大学费用，自1982年以来也上涨了439%。这基本就是房价泡沫顶端时期的价

格水平。《经济学人》则提出另一种算法：过去40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涨6.5倍，但上本州的州立大学费用（含纳税人的补贴）上涨了15倍，上外州公立大学费用上涨了24倍，上私立大学费用上涨了13倍。

房价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关键在于人们相信房价会不停地上涨。一旦这种信心动摇，泡沫就会顷刻崩解。回到2006年，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房市泡沫崩解的预言，但当我问银行提供房贷的人“房价下落怎么办”时，对方马上笑起来：“谁告诉你的？房价怎么会下落？！”好像我是个白痴。现在人们谈起大学来，也是这种口气，比如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业外包时代不上大学没有出路等等言论，主宰了媒体。对此，一些学者早就进行了挑战。比如，《钟曲线》的作者Charles Murray指出，高科技等等高端产业，需要的不仅是教育，而且是一定的智商水平。达到这种智商水平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有许多人的智商不足以应付大学的学业，但可以成为出色的手艺人，比如木匠、水暖工等等，并且有很高的收入。不考虑人口的智商结构，把全民都变成大学生，把整个经济都白领化，纯粹是异想天开。一些经济学家则用数据分析证明，大学生一生的收入确实比非大学生高得多，似乎上大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这是建立在没有把上大学的投入（特别是学债的利息）算进去的基础上的。如果把上大学的投入放到股市，那么几十年后所得到的回报，恐怕比你上大学所获得的回报要高。可惜，这些理论，全都被淹没在公众对大学的迷信中。只要公众深信大学教育会不断升值，只要大学生一生收入比起非大学生来日益拉大的新闻依然主宰媒体，大学泡沫就还会像当年的房市泡沫一样越吹越大。

不过，最近一段时期，大学教育的“消费者”对大学的价值开始有了信心动摇的迹象。《纽约时报》2010年5月底用了相当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配图报道：一位名叫Courtney Munna的26岁的女性，在纽约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宗教与妇女研究，欠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学债。她现在当摄影助理，扣除税收、医保等以后的月收入是2300美元。这是她迄今为止拿到的最高工资。每个月除了支付纽约高昂的房租外，还要寄走一张700美元的支票来偿还学债。即使她能永久保持这份工作，并且没有任何意外，剩下的不足1000美元也仅仅够维生而已。

该报在2010年9月初围绕着学债又发表了一篇配图报道，细致地描述了学债对



两位女性婚恋的影响。一位名叫Allison Brooke Eastman的女士眼看就要披婚纱，但未婚夫在发现她欠了巨额学债后，突然撕毁婚约，并指责她撒谎隐瞒自己的债务。Allison Brooke Eastman十分委屈地说，她一直只知道每月必须支付1100美元的学债，这是最低的偿还限额。但她从来没有算过自己究竟欠了多少钱，因为想这事让她太压抑。但是，马上到了结婚的大日子，她不得不清理自己的财政状况，最后算出自己竟然欠了17万亿美元的学债。这笔钱，主要花在本科的摄影专业上。如今她已经31岁，职业是X光片技师和业余摄影师，偿还这笔巨债还遥遥无期。她痛苦地说：“如果说我撒谎的话，我是对自己撒谎，绝不是对他撒谎。因为我实在不想知道我究竟欠了多少钱。”另一位女士叫Kerrie Tidwell，26岁，欠了25万亿美元的学债，包括她在伦敦读硕士的费用。不过她要幸运得多。一是未婚夫全力支持，二是自己正在学医，志向是当急救室医生，日后收入不会太低，而且不愁找不到工作。但即使像她这么幸运，婚前也必须接受财政咨询，分清双方的债务责任，以防一旦离婚会形成让前配偶代付学债的局面。

可怕的是，以上这些故事，已经越来越不是个别的极端案例，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Courtney Munna女士痛定思痛，感慨地说：“我确实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当时并没有好好考虑这种教育的债务后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把这么好的教育原价退回。”这就好像2006年买了房子的人突然都得上当，想把房子尽快甩出手一样。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后果是什么？是房市泡沫的崩解。

不过，学债比起房债来，对债务人的麻烦恐怕更大。房债是可以甩掉的。比如，你2006年花60万买了房子，不需要首付，欠下了将近60万的债务。如今房子的价值跌到了只剩下40万，形成了负资产，即你欠的比你拥有的还多。这时你的理性选择，就是把房子扔给银行，一走了之。你丢了房子，也自动从债务中解脱。银行则堆满了这种贬值的资产，这便是次贷危机的来由。但是，学债是甩不掉的。你不可能把学位证书往银行一扔，说声“学位不要了，债也不还了”就了事。你只要还活着，就得还这笔债。大学的消费者，即学生和家长们，越来越意识到学债的狰狞。所以，一旦他们觉醒，大学泡沫就可能崩解。《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学贷需求有变软之势，消费者已经有了迟疑的迹象。

未来几年，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美国高中毕业生人数将减少。如果日

益减少的高中毕业生再被学债吓住，在大学门口止步，那么美国的大学就会陷入严重的生源危机。如果大学没有盲目扩张，学生人数减少倒也无伤大雅。可惜，在前几年的大学泡沫中，各个层级的大学都争相扩张，大兴土木，为此背上巨额债务。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捐款减少，各校捐助资金投在股市中大为缩水，一夜之间从钱多得花不出去到穷得要砸锅卖铁。比如波士顿地区的布兰代斯大学这等名校一度想把名誉卓著的艺术博物馆出售。2009年，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因为债务问题，被标准普尔指数从AAA的财政信誉降格为AA+，Mood's则把20所大学的财政信誉降格，并对55所大学做出负面展望。这种信誉评定，直接关系到这些大学未来借贷的成本。名校如此，一般的学校则危机更大。难怪一向追捧美国大学的《经济学人》也看到了不祥之兆，称现在美国的大学颇像半个世纪前美国的汽车业。那时美国汽车是世界独霸，没有人敢想象如何能够与之竞争，如今则处于半破产的境地。一旦美国的大学追随美国汽车业的足迹，那么哈佛、MIT汇聚的波士顿，闹不好就可能成为今日的底特律。



## 美国大学还能继续保持一流吗？

这次半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大衰退，使人们丧失了对美国金融体制的信心，甚至对美国是否能够保持当今的超霸地位也开始怀疑。但是，很少有人对美国的大学存半点疑虑。中国的留美学生，一年一年地创纪录，年龄也越来越小。到美国读本科，对中国的中高收入家庭来说，早已经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了。

但是，美国大学的危机越来越深重。首先看看1978年到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CPI）、房价指数和大学费用指数的变化轨迹。如果把三个指数在1978年时的水平全都调到100的水平上计算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就为350上下，房价指数在泡沫之后也已经跌到400以下。但是，大学费用的指数，则正大步向1100的水平靠近。Gleen Harlan Reynolds在2010年夏天撰文指出，即使把奖学金的因素考虑进去，美国家庭实际支付的大学费用自1982年以来也上涨了439%。这基本就是房价泡沫顶端时期的价格水平。《经济学人》则提出另一种算法：过去40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涨6.5倍，但上本州的州立大学费用（含纳税人的补贴）上涨了15倍，上外州公立大学费用上涨了24倍，上私立大学费用上涨了13倍。

房价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关键在于人们相信房价会不停地上涨。一旦这种信心动摇，泡沫就会顷刻崩解。大学泡沫也是如此。当人们不相信大学文凭的价值时，大学可能和房市一样惨。当然，大学泡沫一旦破灭，会导致学费降低，中国学生正好去“兜底”受益。但是，在同样的压力下，美国的大学也会降低门槛和学术标准，以保证自己的学生数量，成为变相的文凭工厂。事实上，这样的倾向已经出现。唐骏的野鸡文凭，今年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种野鸡文凭

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可能仅限于到那种缺乏基本学术标准的正牌大学镀层金，最终缺乏一技之长，回来马上从海归变成海待。

对于美国大学质量的下降，有识之士早已大声疾呼。2005年，一些教育专家、媒体人士和教授出版了一本文集，叫《跟着学位衰落：危机中的高等教育》。2010年，Craig Brandson以自己在大学的切身经验和系统调查，出版了《五年的派对：大学是怎样放弃了对你的孩子的教育，你对此又能做什么》。《华尔街日报》特地发表书评，称家长应该为孩子上大学而感到害怕，非常害怕！

为什么？这些专家们指出，美国大学之所以维持着“一流”的声誉，很大一个原因是媒体对其阴暗面缺乏报道，而把精力全放在义务教育的问题上。美国的中小学有5380万学生，10万所学校，350万教师。大学则仅有1590万学生，3500所学校，190万教师。显然中小学的规模更为举足轻重。更何况，中小学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大学则有许多私立。媒体当然要盯着中小学了。1983年专家组受国会委托对义务教育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调查，发表了题为《国家在危机中》的报告，震动了全美。自此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在解决义务教育的问题上。但是，如今专家们则指出，大学质量的问题比起1983年所揭露出的义务教育的危机要更严重。

先看看几个基本事实：目前美国的四年制大学，只有8%的录取率在50%以下，有一半大学的录取率高达50%-80%。另外42%的大学的录取率，则都在80%以上。所以，谁都能进的大学遍地都是。这就让你感慨唐骏何苦要跑到野鸡大学去了。至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40%是所谓“开放录取”，即来者不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义务教育过硬，大学尚可招到可教之才。但是，美国中小学生的文化水准，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根据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成员国15岁学生进行的能力测试，在30个国家中，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在第25位，科学成绩排在第24位。其中在数学测试中，美国（平均474分）不仅远远落后于芬兰（548分）、韩国（547分）、荷兰（531分）、瑞士（530分）、加拿大（527分）、日本（523分）、比利时（520分）、澳大利亚（520分）、丹麦（513分）、冰岛（506分）、奥地利（505分）、德国（504分）、瑞典（502分）、爱尔兰（501分）、法国（496分）、英国（495分）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新西兰（522分）、捷克（510分）、波兰（495分）、斯洛伐克（492）、匈牙利（491）等二流国家。更糟糕的是，美国的人均教育



投资远高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算算经济效益，在这个数学测试中，美国学生每获得一分所消耗的教育经费为165美元，德国为98美元，韩国为77美元，墨西哥仅为40美元。我开玩笑说，美国的教育投资都应该投到墨西哥，因为那样便宜得多，也有效得多。而那些墨西哥人反正早晚会合法或非法地移民到美国来。

那么，所谓“一流”的美国大学，是否能够点石成金，把这些工业化国家中学业最差的学生训练成人才呢？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资料，只有一半的四年制大学新生能在六年内完成学业。在那些拿到文凭的人中，只有31%通过了2003年的阅读能力测试。这个比率比十年前降低了十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大学听课，多半是和文盲坐在一起。几年前我教过一个香港来的新生，他非常崇拜美国大学，特别希望能在这里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结果，第一学期上新生英语，教授对他大为夸奖，说他是全班第一。他则大喊上当，对我诉苦说：“人们都说我们香港学生英文也不行，中文也不行。我指望到美国至少把一种语言训练得过硬。怎么我居然刚来就是第一？”我告诉他：“你的许多同学，不知道to和too、then和than之间的区别，你在这里拿英语第一恐怕要比在香港的高中容易多了。”

美国的大学何以至此？这里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从教育哲学上说，教授治校日益被市场模式所取代，恐怕是一大病根。如今大家都相信大学文凭是日后找个好工作的必需，自然也都不惜代价地往大学里挤。如此旺盛的需求，自然给大学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按说，美国的博士课程规模大、质量精，培养的人才足以应付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但是，以企业模式经营大学，管理者们想着的就是“市场份额”、“赢利边际”等等。校方为了占据市场份额，就必须扩招。扩招就要降低门槛。结果，招进来的学生许多根本无法应付大学的学业，大量辍学。大学的应对方式，则是尽可能降低学术标准。比如，许多大学根本不要求学生学外语，虽然美国的中学一般都有此要求。期末考试这一大学最有压力的节目，也正在渐渐消亡中。这一趋势，甚至蔓延到最好的大学中。比如，2010年10月《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佛春季学期1137门本科生课程中，只有259门有期末考试。而一些教育专家的研究揭示，时不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对所学内容掌握明显要好一些。当地一位神经学教授读了这一报道后投书该报指出，从最实际的角度考虑，没有期末大考将大大影响学生日后的竞争力。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等等，都免不了大考。日后考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也都要经过大考。削减大考，学生就缺

乏相应的技能对付这些挑战。

可惜，即使大幅度降低学术标准，许多学生还是应付不了学业，乃至不得不从所选的课程中退出。按过去的规矩，选的课不能想退就退，开学几周后，退课的机会窗就关闭了，达不到标准的学生只能拿个不及格。现在呢？甚至到了学期结束，学生一看考试没有通过，就赶紧退课，学校为此提供种种方便，有的甚至不要求任课老师签字。为什么呢？第一，学生能退课，成绩单上就没有不及格的记录，消费者满意。第二，课退了，学费还是要缴的。学校不仅不受损失，而且还有机会卖给这个学生另外的课程。学生因为频频修不够学分，只能拖延毕业。四年的课程，平均的完成时间是六年。这等于给学校多缴50%的学费。你如果敢不这么做，那么不高兴的学生就跑到能让他们高兴的学校就读。你就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难以在竞争中立足。

为了让消费者满意，校方经常给教授施加巨大压力，要他们对“消费者”手下留情。但是，美国的大学教学大部分还是被教授控制，行政人员很难插进手来。但是，教授们也很机灵。第一，他们有求生的本能，当然不希望学生越来越少。大家心里明白，即使有了终身教职，学校要是垮了，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第二，教授本来多是大忙人，有许多自己的研究要做。著作等身者可以不停地跳槽，花时间教学岂不误了自己的事业？所以，你不想学，我还不想教呢。这样，教授和学生很容易达成默契，有了不成文的“互不侵犯条约”：教授对学生高抬贵手，大家都拿好分数；学生也知趣些，别来烦教授。如果哪天教授忙不过来，临时取消授课，学生大多都欢天喜地，仿佛拣了个便宜。

当今美国的大学生，大概是最被宠坏的一代。他们从小就理所当然地要这要那，仿佛一切都是别人欠他们的。上大学图什么？图的是“过把瘾”（即所谓“大学经验”）：酒、性、毒、派对，无所不沾，最不愿意干的就是读书学习。大学要把这样的消费者竞争过来，不能加强学术，而要把校园建成豪华俱乐部。所以，虽然大学这几年热得烫手，但学校的进项中只有1/5投在教学上。不仅教授的工资长期停滞，学校还越来越多地雇佣临时的代课老师。这些高级小时工收入低不说，几乎任何福利都没有。教学质量还怎么维持？那么钱花在哪里了呢？花在学生喜欢的东西上。比如超级健身房、豪华宿舍楼、桑拿等等。其中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篮球队、橄榄球队等高度商业化的体育。一个高校顶尖教练的工资动辄百万，



是教授的十几倍。而这些运动队大多数都是赔本的买卖、烧钱的窟窿。学校的球队比赛，经常是学生们派对的机会，大家看完球畅饮通宵，乃至喝出人命来。

我有位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讲起他们那里的一位高管。此公从底层奋斗出来，克勤克俭。可惜自己富裕后，养了三位富家女。老大老二都上了波士顿大学。他希望老三能改主意去个别的地方。为什么？波士顿大学是美国最贵的大学之一，一年费用五万多美元，三个女儿都去，他再有钱也难免叫苦连天。但是，波士顿大学的价格也不是白开的。其地点在市中心，夜生活丰富。新建的宿舍楼，俯瞰查尔斯河，卡住了波士顿最美的景观，几百万的豪宅也难以与之媲美，一度成为当地报纸的热议中心。其超大的豪华健身房，属于半透明的建筑，把在一条主要的大道上。远远望去，好像一个透明的运动城市，俊男美女如云，你怎么会不想进去？所以，他的三女儿跟着姐姐到校园转了一天，回来就铁定要去波士顿大学。其实，麻省是本州最好的州立大学，虽然不起眼，但教育质量不比波士顿大学差，费用便宜一半多。只是地处偏远，不那么时髦。波士顿郊区许多富裕镇的二流高中生，好学校进不去，多以去波士顿大学为荣耀，以去州立大学为耻。这样的学生拥进校园，你还能指望他们用功吗？

不仅富家子弟被宠坏了，穷孩子照样被惯得无可救药。美国对穷学生照顾很周到，联邦对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有奖学金，有贷款，只要这些孩子就读某所大学，联邦的这些钱就跟着到了该大学的账上。所以，招穷学生对许多大学来说是笔大买卖。努力的穷学生，稍微一露头，就被常青藤等名校抢走。剩下的有许多则学术质量很差，他们不仅没有基本的学习能力，甚至有各种行为问题，比如不能按时上课上班等等。许多学校，以服务于弱势阶层的“使命”为招牌，把大量不合格的弱势学生招进来。甚至有学校把建筑物的入口全部设置了电子扫描系统，学生持学生证进入后被自动扫描记录，学校凭着记录证明该学生在学校就读，跑到联邦政府要钱。

就这样，校方、教授和学生形成了一个腐败三角。一同降低大学的教育质量，几乎成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这就使美国的大学成了个寻欢作乐的地方，日益派对化。当然，并非所有大学都是如此。以常青藤为首的名校，本身不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有实力为长远打算，严守教育质量。学生必须经过严酷的竞争才进得来，多是优异之士，发奋向学乃校园文化的主流。这样的学校，在本世纪仍然会保持

世界一流的水准。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仅仅是哈佛、耶鲁和几个常青藤，还有其他三千多所大学。那里则是另外一个天地。在那里，也仍然有努力用功的学生，他们也仍然有着相当好的条件追求自己学业的目标。但是，有人估计，这些学生占总学生的比例不过10%而已。结果是，大部分美国大学毕业生一路派对过来，不具有基本的技能。雇主也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越来越不把大学文凭当回事。最终，文凭会不值钱。当文凭不值钱后，家长们就不愿意再在文凭上投资了。也许，那就是大学泡沫崩解的时刻。

哈佛，哈佛



## 女人领导哈佛

2005年当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因提出妇女在科学上可能有先天劣势的假设而陷入公关危机时，他找到本校Radcliffe高级研究所的所长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求救，要求她领导哈佛雇用和提升女性人才的计划。他当时万万想不到，正是这位女性最后成了取代他的人物，成为371年来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

Faust是位优异的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无懈可击。不过，她能击败众多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候选人而主掌哈佛，确实有些出人意料。自1672年的334年以来，哈佛的校长至少会有个哈佛文凭，而她则没有接受任何哈佛教育，完全是个外来人。她最高的学术行政职务，就是目前哈佛Radcliffe高级研究所的所长。该所作为一个思想库，只有87位雇员，是哈佛最小的一个学术分支。如今，她则要领导有24000个雇员、2500位教授、20000个学生、30亿美元年度经费的世界第一学府。对这样重大的职责来说，她应该说还是个“小人物”。怪不得她在接受面试时，曾一手提携萨默斯的校董、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财长鲁宾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拷问。

哈佛之难治是有名的。1737年到1769年间的哈佛校长Edward Holyoke曾说过一句名言：“当哈佛校长是自取其辱。”那时哈佛还不是个世界一流的学府。如今这一世界顶尖的大学，精英荟萃，教授的脾气大得出奇，顶撞校长不在话下。而哈佛的结构，属于高度分权型，各院系自守其势力范围，很难合作。20世纪90年代的校长Neil Rudenstine竟在任上累得身心交瘁，被医生强令休息3个月。刚刚辞职不久的萨默斯，曾是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当了联邦政府的财长，被视为强势明星级领袖。但是他玩得转华盛顿却玩不转哈佛，任职5年就被迫辞职，而过



去哈佛校长任期20年上下是常例。经过萨默斯，哈佛从难治变成了无治，领导哈佛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工作，也更受媒体的关注。萨默斯当年就任的消息，《纽约时报》仅在第32版发布了消息。如今对Faust的任命，则被放在头版报道。

不过，Faust当校长，多少说明哈佛如今还生存在萨默斯的影子之中。当年萨默斯上任是众望所归，人们期待他能够振兴哈佛。但最后他的统治成了一场噩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选择他的继任者时，哈佛的第一个心思就是怎么避免再找一个萨默斯。

萨默斯的理念很清楚：哈佛已经落伍于时代，必须加强本科生教育，纠正只重研究不重教学的倾向，必须加强科学在哈佛的分量。而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打破院系各自为政的局面，朝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另外，萨默斯是智商超人之士，精力无限，喜欢事必躬亲。他常常工作到凌晨4点，和同道讨论治理哈佛之道。这样一个智力和精力都鹤立鸡群的人，自然常有要专断的倾向，对别人有威慑。更何况，他学术上出道虽早，但已早早离开学术界，到金融界和政界开拓。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专断式的效率是常规，老板可以对部下咆哮。学术界则平等得多。一个教授不因为你是校长就买你的账。独来独往地发号施令惯了的萨默斯不通此道。让他在分权的哈佛推行集权的改革，等于以专断的人物推行专断的制度，步步受到抵抗，最后在教授中引发了“倒萨”的反叛。

Faust上任是“倒萨”的果实。她身上几乎集中了“非萨”的因素。其实在这一点上，萨默斯关于男女先天不同的理论假设恐怕早已深入到校董和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的心中。男人擅长逻辑思维，女人则善解人意，长于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够说服别人但又不显得强加于人或太具侵犯性。Faust在这方面的技巧，正是有口皆碑。在任命前最后一次面临两个董事会的听证时，她告诉所有成员，哈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协作。这也是大家要从她身上找的关键性素质。她长期在学术圈工作，知道学术同事间的协作应该怎样进行。她不像萨默斯一样，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她更能倾听别人的心声。

举例而言，萨默斯在任时反复强调发展科学研究和教学，一手推动在哈佛附近的Allston建立一个科学城。结果引起文理学院许多教授的攻击，说他以别的学科为代价发展科学。在现有科学中心背后的一个科学楼，就花了5亿美元。政府系教授Jennifer L. Hochschild不服气地说：“科学无论在空间上还是财政上，都占了太

多。我们至少应该得到那样的空间和经费的一个零头。”更有人指出，科学要是这么发展下去，哈佛就丧失了自己的认同，成为MIT的一个影子。Faust则是位历史学教授，也是连续第五位非科学家的校长。她的上任，保证了人文学科的主导地位，获得了文科教授的信任。同时，一些理工科教授在考察了她领导Radcliffe高级研究所的业绩后指出，她虽然不懂科学的细节，但对科学有相当的理解和尊重，并且一直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的发展。由她来推动科学在哈佛的扩展，反而比一个科学家校长更容易。因为她解除了文科教授的抵抗。

Faust本身的成长，则充分说明了它具有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能力。她出生在弗吉尼亚的养马场，父母都极端保守。母亲从小就教育具有反叛精神的她：“那是男人的世界，你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她的家庭是把她当成一个未来的贵夫人来培养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那种环境中，所有人际关系都是按预先制造好的模型规范出来的。甚至你在餐桌上在什么位置放刀叉，进门出门时谁走在前面，在进行介绍时应该先介绍谁，应该怎么称呼对方，和谁要握手，和谁不需要握手，谁在客厅吃饭，谁在厨房吃饭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另外黑人只能叫名字，白人则必须叫某某先生、某某夫人。”

她家的男性，包括父亲、两个叔叔、三个兄弟，和祖叔父都上了普林斯顿。但她上大学时，该校还未对女生开放。于是她上了女校Bryn Mawr攻读历史，师从后来当了Smith College校长的Mary Maples Dunn。随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接着又在该校教书，成为美国史的顶尖学者，并就任过美国文明系的主任和女性研究课程的主任。最后又被挖到哈佛领导Radcliffe高级研究所。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这代人，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总是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出人意料得出奇。我总是走得比我预想的要远得多。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博士，没有想到会当教授，没有想到会出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发生了：她创造了哈佛371年的历史，成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女性领袖，前程是个最大的未知数。她不是常青藤的第一位女校长。事实上，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布朗等大学，都已任命了女校长。但是，哈佛却是个是非之地。萨默斯的独断专行固然触犯众怒，但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断不断，则会被视为是领导力的缺失。如今，她上任已经几年，并且赶上了半个世纪不遇的金融危机的考验。她低调稳健，没有像萨默斯那样惹是生非，多少给困境中的哈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安定环境。



## 哈佛怎么录取学生

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闹得舆论沸沸扬扬。有些“专家”出来为北大辩护说，这不过是国外精英大学行之已久的制度，北大不过是借鉴外来经验而已。

对北大最有参照意义的，莫过于哈佛大学。哈佛是“世界第一校”，是美国最难进的大学。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榜，哈佛最近一年的录取率为7.9%，明显低于两大竞争对手耶鲁（8.6%）和普林斯顿（9.9%），并预计还会持续降低。不少人称北大为“中国的哈佛”。前几年北大带头掀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也声称要以美国的名校为范本。所以，哈佛怎么录取学生，应该成为北大的一个重要参照。

哈佛每年进校的新生大致为1650位，录取大约2100位学生（因为有些学生录取后不来，而跑到别的学校就读）。2009年，有29000多位学生申请哈佛，能有机会被录取的刚刚过7%。即使以几年前比较低的申请数量计算，哈佛每年也要面对20000多位申请者。这其中有3100位是高中毕业典礼致辞人（美国高中每年由师生选出毕业班中最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有55%的SAT成绩达到1400分以上（1600为满分），有3000多学生在SAT的数学部分获得满分。即使是那些在高中全校第一、SAT满分的学生，有许多也会被哈佛淘汰。

如此充分的人才供应，如此激烈的竞争，使哈佛录取几乎演化成了一个神话，乃至你在哈佛校园里看见每一个学生，都不禁想仔细打量一番：这是哪路神仙？怎么能够挤进这么优异的人群中来？有位在常青藤盟校的录取办公室工作过，并

进了哈佛教育学院攻读博士的人写了一本描述大学申请战的书《肥大信封的疯狂》（美国大学的录取信往往非常“肥厚”，而拒绝录取的通知书则是简单的一两页纸），提到了一位叫Felix Zhang的中国裔男孩，颇能反映出神话和现实交织的哈佛录取。

Felix Zhang生长在费城郊区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短短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为进哈佛做准备。进入高中毕业班时，他已经在7门高级课程（物理、微积分、美国历史、欧洲历史、统计学、英语与作文、生物）考试中拿了满分。所谓高级课程，其实是大学的基础课程，主要供优秀的高中生提前选修，通过考试后在大部分大学可以免掉有关科目的学分。另外，他在学校中所有快班课程中都拿了A。他的SAT数学部分为780，语文部分为710，写作部分为710。他当然知道仅仅学业优异是不够的。16岁的他已经是位有成就的钢琴家，频频周游世界进行演出。他曾经上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进行独奏，14岁时成为大名鼎鼎的朱莉亚音乐学院国际暑期音乐学校最年轻的学生。他曾经和世界顶尖的音乐大师同台合作，其中包括哈佛教授Robert Levin。立志当医生的他，还和当地大学的教授合作进行了几年的医学研究，并作为主要作者向权威的医学杂志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其研究题目是“患老年痴呆病的绝经后妇女所接受的雌性激素替代疗法是否会抑制其神经细胞的死亡”。另外，他积极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在消防队等机构充当志愿者，创建并编辑着一家网上科学杂志，创建了“人民年轻艺术家”的组织，并担任主席，让高中的音乐家到老年之家去演奏……

他还在一家每周收到2500份投稿的文艺双月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其中一篇13岁时写就的短篇小说《儿子，晚安》催人泪下。小说的悲剧主人公名叫Ryan Carrol。Ryan的父亲在童年时克服种种困难而成功，并发誓要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Ryan也竭尽全力地达到父亲的期望。在父亲那种完美主义的高压下，Ryan逃入了音乐中，成为优异的钢琴家。但是，不管他取得了什么成就，居然都无法赢得严父的一句赞扬。他的一生中，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晚安”。

Ryan终于被哈佛录取，并在毕业后进了医学院。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反抗父亲让他成为大医药公司的总裁的指令，毅然决定到印度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行医，最后受了致命的重伤。当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发现父亲早已守护在床边。终于，在他离开人世之前，父亲平生第一次对他说了声“晚安”。



13岁的Felix Zhang写出这样的悲剧，多少反映了从小为了上哈佛而挣扎的少年的内心世界。从Ryan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的影子。但是，Felix Zhang仍然决意前赴后继地上哈佛。他意识到自己骄人的成就，也知道即使有这样的本钱照样可能被拒之门外。他在面试时非常技巧地用轻松幽默的口气把这些成就讲出来，没有流露出一点骄傲自满的痕迹。这又显示了他深谙人际沟通的技巧：没有人喜欢自以为是的“牛人”，录取官更看重的是合群、放松、好打交道、看似寻常而实际不寻常的人。在经历了复杂的申请和焦躁的等待之后，他终于按照哈佛“提前录取”的程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类似Felix Zhang的例子还相当多。但是，录取这样的人并非哈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哈佛的录取委员会有35位成员，每年录取2000多人。这意味着2000多个重要的选择。每个申请者的材料，都必须经过委员会的综合评估，最后投票决定。像Felix Zhang这样的特异人才，则需要哈佛教授来评价。比如，每年都有几个数学天才，教授们要审查他们各种国内国际竞赛的记录、研究项目并和他们的老师甚至本人交谈，最后作出判断。每年的申请者中音乐人才有几百个，但真正达到大师级别的一般不出十人。特别委员会要审听他们的录音，甚至要请来试奏。不过，绝大多数申请者，还是普通的优秀高中生，几乎个个都有着完美的记录。在这些人中，哈佛最大的使命，就是把来自普通家庭或弱势阶层的学生选进这个传统的“贵族学校”之门。

在过去十几年，普林斯顿的前校长William G. Bowen领衔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评估，并于2005年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一书，在高等教育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在优异（也就是教育质量）方面，这本书给美国大学打了A或A+的成绩，但在平等方面则只给了B。因为大量的数据证明，以同等的成绩和资历，美国贫困和弱势家庭的孩子在录取中既没有受到歧视，也没有得到优惠的照顾。得到优惠照顾的弱势群体，基本限于少数族裔。应该指出，William G. Bowen在这方面所用的数据资料多是1995年以前的。他在书出版前几年，就不断根据其研究成果大声疾呼，要求各精英大学向弱势倾斜。可以说，在最近十年中，如何吸引和录取弱势阶层的子弟已经成为美国精英大学录取政策的重心，实际情况可能和书中的描述有所不同。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录取部院长William Fitzsimmons。他自己就是劳动

阶层的子弟：6岁当了报童，五年级时就在父亲的加油站打杂，曾因荒废学业重读九年级，后来通过刻苦努力进了哈佛，在60年代是哈佛为数十几个拿全奖的贫困生之一。这个穷孩子从劳动阶层的街道走入用艺术品精致装饰起来的哈佛饭厅，完全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在哈佛期间每周打工12个小时，主要是打扫宿舍和办公室，后来在打工中偶然从地上捡起一本哈佛教育学院的介绍材料，于是毕业后进了教育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从1972年开始在哈佛录取部工作，经手录取的学生有73000人。1986年，他就任哈佛录取与助学金部的院长，以给弱势阶层的子弟进入哈佛提供捷径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亲自说服了许多富裕的校友捐款资助贫困生，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的孩子进哈佛更困难。他敦促哈佛于2006年终止了“提前录取制度”。这项制度如同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一样，给在精英学校读书的富裕子弟进入哈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这些精英学校和名牌大学有传统的纽带，更有许多训练有素的咨询顾问为学生出谋划策，使消息灵通的学生更能找到“提前录取”的渠道。Felix Zhang就是这样被录取的。取消这一制度，会使普通家庭的子弟有更公平的机会。如今，在哈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也就是家庭收入相对普通的学生），从十年前的40%上升到了63%。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享受免费的哈佛教育。这后一类学生，比五年前增加了30%。

不过，金钱并不是穷孩子进哈佛的最大障碍。William G. Bowen的研究指出，即使在丰厚的奖学金之下，穷困阶层的子弟也经常会望常青藤而兴叹，觉得这些都是百万富翁俱乐部，和自己无关。穷人的劣势不仅是没有钱，而且还有信息不灵通。穷学生雇不起知道门道的大学申请咨询顾问。所以，哈佛在这方面不是把钱堆出来之后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是投入巨大的财力，建立了全国性的网络，主动出击去搜集优秀的贫困学生。比如，每年哈佛要给目标之中的贫困高中生发出75000封信，鼓励他们申请，告诉他们哈佛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哈佛和另外三所学校（杜克、乔治城、宾州大学）的代理人，每年访问130个美国城市，搜罗这些“非传统的学生”。哈佛自己的录取官员，也亲自到许多城市寻访。另外，有上万名哈佛校友当志愿者，就地对申请的学生面试，给那些没有条件来到哈佛校园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William Fitzsimmons也不停地旅行，到全国各地和普通家庭的学生接触，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现身说法，鼓励这些学生报考。如今高中生



越来越精于塑造自己的履历。特别是富裕家庭，自己掏腰包送孩子到第三世界国家当志愿者、参加国际活动，以惊人的业绩让录取办公室震惊。William Fizzsimmons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你用不着去哥斯达黎加，你用不着操心创造什么离奇的履历。事实上你通过到麦当劳打工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人生的经验。” Bob Giannino-Racine是一位1995年从哈佛毕业的学生，目前领导着波士顿地区的一家非营利组织。他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根据William G. Bowen的研究，这种家族第一代的大学生，是弱势中的弱势，在精英大学中比贫困生还稀少。Bob Giannino-Racine当年在哈佛边上一个穷镇Somerville读高中，觉得自己和哈佛完全属于不搭边的两个世界。William Fizzsimmons不仅认识他，而且亲自鼓励他申请。Bob Giannino-Racine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上有着William Fizzsimmons亲笔写的一行字：“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行列。”要知道，William Fizzsimmons是美国大学的录取之王。用布朗大学录取院长Jim Miller的话来说：“他是美国大学录取中最有影响的院长。”而这个世界第一学府的把门人，竟和许多在办学条件甚差的学校中挣扎的贫困生建立了这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并亲手把他们拉进这一神圣的学术殿堂。怪不得一位哈佛前校长称William Fizzsimmons是“哈佛的良心”。

当记者问William Fizzsimmons在录取的过程中什么最打动他时，William Fizzsimmons毫不迟疑地回答：“阅读申请者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是那么真实、动人，你无法伪造。”在当今世界，哈佛之所以是哈佛，不是因为她能像在19世纪那样依靠几个贵族高中的富家子弟，而是因为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故事，最终能在她美丽的校园中汇流。

## 哈佛的“核心”

2010年10月3日，由六位哈佛教授和两位本科生组成的“通才教育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完成了改革哈佛本科教育“核心课程”的初步报告。这个报告在11月14日哈佛教授会议上引起激烈辩论，并预定在12月的教授会议上继续辩论修改，最后在未来的教授会议进行表决。一旦通过，报告所提出的教改方案就将在哈佛全面施行。

这一报告的命运虽尚不可知，但其影响非同小可，乃至一出笼就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哈佛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哈佛的一举一动，将对其他一流大学产生长远的影响。而“核心课程”的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哈佛教改的焦点。人们都承认过去的“核心课程”已经跟不上时代，必须淘汰。但是，以什么取而代之？大家意见纷纷，缺乏共识。前任校长萨默斯曾把“核心课程”的改革视为自己的首要使命之一。但他的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方案缺乏新意，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热情。随后他本人因为种种争议，被教授逼下台，改革不了了之。然而，在他下台后3个多月，哈佛还没有找到新校长时，这个教改方案就出笼了，可见哈佛改革心情之迫切。更重要的是，比起以前的教改方案来，这个方案大胆得多，可以说是近年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颗炸弹。

大而观之，这个报告强调本科教育的现实性。报告一开始就指出，只有4%的哈佛新生打算未来到大学教书，5%的毕业班学生打算毕业后立即到文理学院读博士，18%则说他们准备在未来某一时刻读博士；与此相对，将近30%的新生计划当医生或律师，53%的毕业班学生准备进入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职业学校深



造。可见，哈佛本科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未来的学者，教学不应该过分强调学生在专业学科上的发展，而要为大多数学生面对现实生活做好实际的准备。旧的“核心课程”涉及的范围太窄太深，符合学科的要求，但未必符合学生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不太实际。

然而，这一报告所界定的“实际”，恰恰是我们所理解的“不实际”。目前高等教育实用化的潮流席卷全球。美国也不例外：商学成为本科生中最流行的专业。每年拿到“健康类专业”（health professions）学士学位的人，要比拿到英国文学的多得多。企业管理本科毕业的起薪（41000多美元），比英文专业的（31000多）要高出一万美元。不过，哈佛的这个报告逆风而上，强调精英教育的重点不在专而在博，强调求知的非功利性而非其实用性。用更平浅的话说，哈佛的教育不是找工作前的职业培训。

这种非功利性的教育方针，重申了传统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理想。关于liberal arts education，因为中文里没有对应观念，很难直译。我过去一直译为“人文教育”，颇为勉强。有人译为“通才教育”，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教育的形式，却译丢了其内在精神。我现在试译为“心智教育”，意思是促进人的心灵和智力发展的教育。这种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课程，起源于中世纪教育的trivium和quadrivium。所谓trivium，是中世纪教育的初级三艺：语法、修辞、论理。这三艺是获得学士学位之必须。quadrivium则指的是高级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属于从学士到硕士的三年课程的内容。两者合起来成为七艺，在中世纪的欧洲被视为是人类高级心智发展的核心。这一传统，被现代西方的大学，特别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本科教育体系所继承。于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核心变成了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和抽象科学，旨在激发学生的通识和心智（如理性和判断）发展，而非技术或职业训练。

哈佛的这个报告强调，心智教育必须超越学科和实用技能的考虑。这种非功利的求知，不仅体现了人的存在的丰富性，而且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大学应该提供一种环境，使学生摆脱在未来生涯中必须面临的种种功利性的考虑和限制，进行自由的学习和反省。

那么，什么是“核心课程”？这一“核心课程”又如何完成上述的心智教育的目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把“核心课程”放到哈佛教育的大结构中来考

察。哈佛的教育由许多面向组成，其中包括学生组织、体育、艺术、寄宿学院的生活等等。课堂教学，则是哈佛经验的中心。课堂教学又由三部分组成：专攻（concentration）、选修（electives）和通识（general education）课程。所谓“专攻”，和我们所谓的“专业”有微妙的不同。“专业”是以学科规定学生的学术发展。“专攻”则强调使学生深度追求自己的志趣。这种志趣，来自个人的关怀，不是把自己限定在别人事先划定的专业领域。选修则是让学生在专攻之外的领域发展，扩展自己的关怀和兴趣。无论是专攻也好，选修也好，都应该不受学科和实用性的限制。

“核心课程”所指的则是通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他们在世界中的角色。这一课程的教学和目的与其他课程有很大的不同。它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使他们能够把在其他具体学科中学到的知识放到这个框架中，了解这些知识和他们的生活乃至他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关联。

这一包容性的框架背后有四大目标：第一，培养全球化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第二，让学生了解他们既是艺术、思想、价值等传统的产物，也是这些传统的创造者；第三，使学生具有应变的能力；第四，发展学生对自己的言行的道德面向的理解力。

为实现这四大目标，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和三项基本技能。这七大领域是：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与世界，理性与信仰，科学与技术等。三项技能则是：书面与口头交流，外语和分析推理。所有学生，不管专攻什么，必须修满核心课程的基本要求，也就是9到11门半的课程。这比过去8到10门半的课程要求有所提高。

当然，学生可以把自己的某些专攻领域的课程也以核心课程来算，或者把某些核心课程同时计入专攻领域的课程。也就是说，一门课可以用来满足两方面的必修要求。这样双重计算的结果，会压缩学生的必修课数目，给学生选课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不过，就像专攻领域的课程有独特的专业要求一样，“核心课程”也必须有其通识的特色，不是每门专业课都能计入“核心课程”，除非这种专业课程同时兼有通识教育的特点，或者根据通识教育的目标进行了修改。比如，“明代妇女文学”可以是中国文学专攻的课程，却很难算入通识课程。与此相对，“艺术与书刊检查”这种关注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主题的，则可以列入核心课程。另外，



探究20世纪世界严肃艺术和文学形成的“纽约，巴黎和莫斯科”，也可以属于核心课程。因为这三大城市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力及其互动，确实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文化。总之，不能超越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种族的题目，和理解人类生存状况的通识教育很难合拍。在科学问题上，其他学校一门标准的化学课就可以让学生完成科学必修课的要求。在哈佛的“核心课程”中，科学内容必须在社会问题的框架中展开，以让学生明白科学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常规的科学课程则可以在科学专攻领域的课程中去修。

这一报告最令人瞩目之处，在于要求学生学习美国和宗教。前者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公民。因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灵魂，也是公民的责任。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参与又同时是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学生必须理解美国的历史、制度和价值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的意义。至于宗教，在三四十年前似乎还不是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到了21世纪，福音派崛起为共和党的重要政治基地，“9·11”又使世界不得不面对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冲突”。这些使现在的学生则很难在生活中绕开宗教问题。把美国和宗教作为学生的必修，这在当今的常青藤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相对主义在美国大学盛行，提西方文明有时也会被人侧目而视。哈佛把美国的历史、制度和价值摆在核心课程的突出地位，显示了强烈的价值确定性，十分大胆。另外，把宗教的位置摆到如此高的地位，也显示了“后9·11”的思路。如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美国的基督教保守主义也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文明战争似乎已经打响。这体现了报告起草人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某种预期：美国将主导全球化的世界，文明冲突主要体现在宗教冲突。

然而，这样的预期，也不免令人担心。如今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要有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半个世纪是很长的时间。美国和宗教这两大领域是否限定得过窄呢？比如，作为通识的研修领域，西方的历史、制度和价值，是否比美国的历史、制度和价值更有包容性？民主毕竟不仅是美国这一种模式。至于宗教，是否会一直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这么重要？有的教授说对他们那一代宗教不像现在这么重要。那么，20年后，宗教的重要性是否会消退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简单地说，这样的课程设计似乎和现实贴得太紧，过多地用本世纪头几年的经验规划学生几十年的人生。这也难怪，有些教授在教授会议上批判这一核心课

程离现实太近，似乎是在教学生读新闻。另有人说，所谓“美国与世界”这种概念就很荒唐，它要么把美国和世界看成两个割裂的实体，要么把世界看成美国的后院。

第一轮教授会议下来，结果如同哈佛校报所描绘的：经济学家希望多教些经济，文学教授希望多教些文学，历史教授希望多教些历史，只是许多教授都不希望过分强调宗教。不过，不管这一新核心课程的命运如何，我们从这样的课程设置中还是能够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精英教育拒绝工具化、实用化。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倒是很合孔子所谓“君子不器”的教诲。哈佛并非没有专业教育。但是，专业教育必须在核心课程的框架中展开，学生必须理解所学的专业对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不能在专业和人生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的专业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也很难培养出领袖人物。换句话说，精英教育，使学生更能够听到人生和社会对专业知识的呼唤，而不是过早陷入专业知识的细节中。日后走出校门，更懂得如何用专业为社会服务，也更知道如何根据社会的需要发展乃至创造自己的专业。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民主社会当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必须有这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怀抱。

如果让中国人来比较美国大学的课程，我们会发现越好的大学课程越不实际。其实，这还在于我们对“实际”的理解和人家不同。哈佛耶鲁的学生，总会比一个社区学院的学生拿出更大份额的时间来学习文史，拿出更小份额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但是，越是这些“不实际”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越能适应实际生活，并在竞争中迅速胜出，成为领袖。哈佛的报告还特别指出，现在一代学生要面临他们父母一代没有面临的社会巨变。他们的生活，将在一个还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未来中展开。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在这个未来会面临什么，谁也无法设计他们为这种不确定的未来应该准备哪些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准备，也就是应付变化和挑战的能力。所以，每一个哈佛的学生，都要了解和思索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是怎么应付挑战的，现在有什么力量在塑造着人类的生活，而“我”又能在在这个过程中做什么。也许，这就是最实际的大学教育吧。



## 免费上哈佛？

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宣布大幅度削减中产阶级家庭支付哈佛教育的费用。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年收入的1/10支付哈佛一年45600美元（含食宿）的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1.2万；而这样的家庭在现行的奖学金制度下则支付1.9万。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1.8万，在现行的制度下则支付3万。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1000多，另有将近1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1.2万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而且还享受着2000元左右的学费补贴。支付1.8万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其实，这一改革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而是预示这美国一流大学即将进入一个免费的时代。一位研究美国精英大学奖学金运营的学者指出：用不了多久，那些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学校，将停止向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收学费。也就是说，除非你是在人口中仅占5%的巨富，你送孩子进最好的大学就不用花钱。这进而可能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形成一个非常怪异的结局：上越好的学校就越便宜，上最好的学校则干脆免费。

这一变化，并非一日之间发生。2001年，普林斯顿宣布用奖学金代替贷款来资助有困难的学生。贷款是要偿还的，奖学金则不必偿还。这样的改革，使学生毕业后不用为还债操心，大受赞誉。随后，美国一流的大学为了竞争纷纷提出大

同小异的优惠条件。其中哈佛在2004年宣布免去所有年收入在4万以下的家庭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的家庭，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削减奖学金的数额。不久这个标准又提高到了6万。而美国目前的中等家庭收入还不及5万。这也就是说，大部分中等家庭，只要孩子有本事上哈佛，那就是免费的。这不仅仅是哈佛的规矩，从斯坦福到耶鲁，美国一流大学在这方面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不过，在这样的制度下，年收入在12万以上的家庭，因为年收入远远超过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水平一倍以上，子弟进哈佛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则不多，上学对家庭就成了个巨大的负担，甚至有些家庭为了供孩子上哈佛要卖掉自己的房子。所以才有如今哈佛针对年收入在12万到18万的家庭的新政。这一新政还特别规定，在考虑奖学金时，将不像过去那样计算学生家庭房产的价值。这样，那些住在七八十万甚至百万豪宅中的家庭，可以把房产从财产中除去，降低自己的经济档次，获得资助的资格。用哈佛校方的话说：“我们不希望有家庭为了送孩子上哈佛卖掉房子。”另有人指出：如果一个优异之士为了上哈佛，逼得父母变卖家产，那么他日后成功了，也不会对哈佛有什么感情、不觉得自己欠学校什么。你还能指望他捐款吗？这也是许多捐款人要求哈佛免费的重要原因。

这一新政，不过是美国一流大学奖学金大战的新一轮竞争。而这样的竞争，还在不断升级之中。那么，钱从哪里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校能够支付这种无休止的奖学金大战？一流的私立大学真要全部实行免费教育，甚至支付学生的生活费用，花钱请人来读书，在财政上能否维持？我们不妨算一笔账。

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财政收入和开支都是30亿美元，相当于捐助基金的8.5%多一点。用于奖学金的开支是9800万，不到其财政开支的1/30。实行对年收入在12到18万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优惠奖学金制度后，奖学金开支将增加到1.2亿美元，也不过占其现有总财政支出的1/25，大致相当于哈佛的捐助基金每年30亿美元新进账的4%（实际上这30亿的估算是根据过去较少的捐助基金的底数得出的，目前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个数字还不足哈佛现在的捐助基金的8.6%）。如今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也就是说，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每年还照样涨15亿。如果照去年捐助基金增值70亿的数字算，全免学费捐助基金照样涨50多亿！再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为例。



该校捐助基金为19亿美元。年度财政开支为2亿，是捐助基金的1/10略多。如果实现让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送子弟免费接受教育的理想，那么预计将花去学校1500万美元，也才花掉学校年度运营经费的1/13左右。可见，对于这些富裕的学校来说，奖学金费用再高，也对其财政的冲击不大。关键还是要抢到好的学生，提高学校的声誉。

为什么这些大学这么富？一个人所共知的原因，当然是培养得出好的人才；这些人才成功后，又回馈母校，使学校的财富大增。不过，更大的原因，还是大学的财政革命。

这场革命，还要从大名鼎鼎的巴菲特说起。1976年，他说服一所小大学Grinnell College在当地的一家电视网投资1300万美元。五年内，这笔投资变成了3600万。当时巴菲特不过觉得这是笔好买卖而已，并没想太多。不过这一行为改变了大学的财政经营。传统的大学，经营自己的捐助基金都十分保守，仅购买常规的股票、证券，风险低，赢利也薄。巴菲特革命之后，各大学都竞相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并通过投资的多元化降低风险。结果一些精英大学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年回报率常常达到20%上下。其中耶鲁表现最好，在过去十年，投资回报维持在平均每年20%以上。如今耶鲁捐助基金为225亿。年增20%，就是45亿左右。哈佛在2006年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将近70亿美元。

一个学校的捐助资金在股市上以每年20%的速度上涨，又有大量校友的捐款不停地进来；同时，每年的财政开支仅仅是捐助资金的10%左右，而这笔财政开支来自许多来源（比如联邦拨款等等），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学，一般每年仅从捐助资金中拿走5%以下的份额用于财政开支。以这个公式一算，捐助基金可以维持每年至少15%左右的增长。你见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GDP能十年维持15%的增长呢？这也难怪这些大学越来越富。学生的奖学金，不管怎么发，面对捐助基金的增长也是九牛一毛，在财政上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的大学学费以两位数比率上涨，拿不到奖学金的中高产阶级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捐助基金越攒越多，不舍得花就容易激起民愤。2007年9月，共和党参议员Chuck Grassley在国会山主持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强迫大学每年花掉更高比例的捐助基金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私人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其基金的5%；大学则不受此限，平均每年仅花掉其

捐助基金的4%。对于有349亿捐助基金的哈佛来说，这区区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3.5亿左右的财富。新政策的实施，也不过破费学校3000多万，实在不足挂齿。按说，国会不应该管私立大学的事情。但是，美国大学生的奖学金大多数还是从联邦政府直接拿的。拿多少常常要根据具体的教育费用来计算。许多论者指出，大学一涨学费，政府就有压力提高奖学金，使上不起学的孩子能上学。这样等于是政府给大学涨学费埋单，鼓励了大学烧钱、提高学费。比如研究高等教育的权威Richard Vedder指出，如今大学的行政人员，以平均每个学生计算，要比70年代高出一倍。普林斯顿最近则刚刚建成超豪华的寄宿学院，餐厅的天花板竟高达10米！哈佛每年也以各种形式从联邦政府接受数亿美元。所以政府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向大学施加压力。

在这些压力下，一流大学就必须为社会“做好事”，捍卫自己的合法性。最近，许多一流大学把自己的课程免费搬到网上，有录像有讲义，一分钱不取地服务于社会。再有一点就是大把大把地撒钱给贫困生，使家境不好的学生享受名副其实的免费教育，并且毕业后没有债务负担。这样做，一来让大家说不出话，二来可以彻底贯彻英才教育，使所有优异之士都能超越自己的家庭背景，凭自己的本事到最好的大学来竞争。如今，这种慷慨又轮到了中高产甚至富裕阶层身上。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一流大学未来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钱花掉，不仅不会贪图学生的几个学费，而且要花钱请好学生来读书。

不过，一流大学的慷慨，会给低层级的大学带来巨大压力，创造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使一流的高等教育彻底被私立大学所垄断。哈佛改革后，一些精英院校预计会“跟牌”，采取类似的政策，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但是，美国大致有60多所院校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捐助基金，只有它们才跟得起。另外美国还有3000多所大学。比如，州立大学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多年来最好的州立大学一直致力于和一流的私立大学争夺英才。像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等，都是能和常青藤一争高低的州立大学。它们的法宝，一是学费低，特别是本州学生的学费，不及一流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一；二是能给自己看重的优异学生全奖。所以，每年有不少被常青藤录取的学生，因为经济原因到州立大学就学。但如今哈佛的政策，把上哈佛变得比上州立大学还便宜，以后甚至可以到免费的程度。这样州立大学的优势就全部消失。而当州政府财政危机时，则每每



削减对州立大学的拨款。这些大学为了生存，不得不开源节流：一方面提高学费，一方面削减终身教授的数量，用低薪雇用大量临时教授。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临时教授的雇用率越高，学生的辍学率也越高。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至于一般的私立大学，受到的冲击也许更大。这些大学不是靠州政府的财政拨款，也没有多少捐助资金，只能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这是美国大部分私立大学的境况。这些学校，学费只能升不能降，而且为了节省开支，也大量雇用临时教员。于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将可能面临这样的前景：上一流大学免费，上二流大学便宜，上三流大学则最贵。你能想象开超豪华的“悍马”免费、开普通的日本车廉价、开土造的小排量车价值连城的情景吗？这种走向也说明未来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人的脑子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脑瓜好使，学业优异，你本身就奇货可居，有的是人争着往你身上投资，你用不着为上学操心。

## 哈佛的性生活

2007年10月的一天，哈佛校园里展开了一场公开的性辩论。参加辩论的一方，我不妨名之为“哈佛的木子美”。她是位中国裔女孩儿Lena Chen，在2006年8月大二时开了个名为“性与常青藤”（Sex and the Ivy）的博客，专述自己跟各种男人的性经验，细致入微，毫无顾忌。比如她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如何用口交让对方达到高潮的过程，她白描式地叙述对方完事后“从自己黏糊糊的精液中抓起我的耳环，举在我的眼前。我简直笑死了：‘他禽我禽得这么凶，乃至我的首饰都掉下来了’”。她有非同寻常的性瘾，也有非同寻常的聪明。她不仅是哈佛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哈佛校报的编辑（常青藤校报一向是人才辈出之所），甚至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也写过文章，文采很受编辑的赞扬。她的主张也是不言而喻：性还是多多益善，及时行乐，犯不上为对方承担什么责任。参加辩论的另一方，则是哈佛贞女Janie Fredell。她不仅是位有男友的处女，而且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学生组织“真正爱情革命”的主席之一。这两位女性，代表着两种极端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里面对面地撞击。如今，两人也都成了媒体红人。她们的活动、思想和组织，不仅在校内街谈巷议，而且被《新闻周刊》、《纽约时报》、CNN等全国性主流媒体广为报道。

她们如此招眼，当然并不完全是本人的因素，而是各自代表着美国大学特别是常青藤中在性问题上的极端潮流。Lena Chen的性观念，和她的成长经历分不开。她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讲她高中时只要和别人秘密幽会，被妈妈发现后就要被训斥一顿，然后关禁闭，绝对不许她再和对方来往。上了哈佛后，她终



于获得了解放，并对母亲在3000英里外为她瞎操心又无能为力而感到幸灾乐祸，不过，她在学校的朋友也常常令人想起她那位受不了的母亲。比如，她母亲目前希望她嫁给一位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她的同屋们更觉得既然她们已经身在常青藤了，这当然是天经地义、别无选择的出路。这些人年纪轻轻，却从来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未来：跟人家刚刚约会三次，就开始计算未来夫君潜在的收入。大概这种对未来的斤斤计较让她感到压抑和可笑，于是她要用现在或者眼前的快乐来反叛未来的设计。她嘲讽说，在哈佛有80%的人没有性生活，大概也不准备有。她则属于另外的20%。

对于8岁开始写日记、15岁开始网络写作、各类性伴侣不断的Lena Chen来说，她的性博客一炮走红并不意外。哈佛校报上有位学生在专栏中写道：不管他怎么讨厌Lena Chen的性博客，但每到深更半夜，自己在房间里准备期中考试和学期论文，大脑发胀之时，面对计算机屏幕一个点击，就进了她的博客，于是马上沉浸在她绘声绘色的文字、无遮拦的照片以及没完没了的跟帖讨论中。这也许是在互联网时代被facebook这类媒体所塑造的校园文化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Lena Chen并非完全是个异数。如今在以常青藤为主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学生性媒体势头甚旺。学生经营的性杂志，哈佛有H Bomb，耶鲁有SWAY等等。波士顿大学因为学生人数庞大，其性杂志Boink竟有4万订户。如此繁荣的大学性媒体，自然也培养了一批性写手。表面看起来，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常青藤似乎正在酝酿着新的一场性解放。

Janie Fredell则似乎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她的老家是科罗拉多的Colorado Springs，是个极端保守的城市。但她作为一个天主教的好女孩儿，对那里原教旨式的宗教运动却颇为反感。比如，在她的高中，几乎所有人都戴着贞操戒指，大家也都没有性经验。她觉得很荒谬：你为什么要戴着那么个东西来表白自己不干一种实际上谁也不会干的事情呢？

当她被哈佛录取后，邻居朋友都来告诉她：那是个没有上帝、性泛滥的自由派学校。许多人干脆劝她不要去。但她觉得，要想成就点事情，还是要到哈佛。但一到哈佛，她就傻眼了：哈佛的学生手册等宣传物充满了性安全的说明：“当阴茎碰到阴道、嘴、肛门以前，一定要戴上安全套……如果你想进行第二次性交，或者决定运用另外一套性交方式的话，要换一个新的安全套。”这里似乎和家乡正

好相反：大家都在指导或者鼓励你干一种你不准备干也不想干的事情。她马上警觉起来：自己被一种性泛滥的文化所包围。

她的新男友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欲望，但她坚决说“不”。到了二年级，她从校报上看到有些学生成立了“真正爱情革命”的组织，宣扬贞操观念，引来舆论的一片嘲笑。当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如此攻击时，她决定挺身而出，不仅加入了该组织，而且很快成为该组织的两位主席之一。

哈佛的“真正爱情革命”虽然只有十几人，但能量不小，影响也相当大。这除了参与者强烈的个人信念和活动能力外，也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有关。在90年代初，福音派基督徒对公立学校那种公开发放安全套的性教育、色情流行文化的泛滥、青春期怀孕率的居高不下等等深恶痛绝，于是在高中组织了贞操俱乐部。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后，保守主义似乎更是为自由派的堕落和对青少年的毒害找到了证据，于是贞操运动更是大行其道。几百万青少年发誓在婚前拒绝性行为。到了布什上台，共和党主控白宫和国会，联邦政府得以拨出数亿美元的巨款用于禁欲教育。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鉴于性病艾滋病泛滥，督促青少年要在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结果福克斯新闻电视网的保守派评论员斥责他：“国务卿先生，你要听清楚：布什总统号召大家禁欲，而不是使用安全套。”

哥伦比亚大学的Peter Bearman和耶鲁大学的Hannah Bruckner两位社会学家2005年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时间范围截止到1995年，调查了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13到18岁）的12000名学生。结果发现：宣誓保持贞操的学生，比起那些不宣誓的学生来，在技术上可以把贞操多保持18个月。但是，他们比起不宣誓的人来，进行口交的比例要高6倍，而且他们更少在第一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保守主义的贞操运动，看来并不成功。

如今大学里的性媒体和贞操运动同时崛起，是否是对中小学中这一波贞操运动的反应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能够证明。不过，性博客、性杂志、性专栏等等，确实是和贞操运动几乎同时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在中小学贞操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如今也确实正好在上大学。2005年，在普林斯顿成立了常青藤中第一个贞操俱乐部：Anscombe Society。这一俱乐部的成员基本都是天主教徒。不过，他们致力于给贞操一种理性的而非宗教的解释。Anscombe这个名字，指的是天主教的著名女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得意弟子Elizabeth Anscombe。她是第一个把



“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带进分析哲学的人。这一“后果主义”的最基本理念是：一个行为的后果形成了对这一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担任这一俱乐部非正式顾问的普林斯顿教授Robert George指出：“性泛滥深深地伤害了人的尊严。随便的性关系会带来个人不幸并危害社会。”哪怕是不同意这种保守的性观念的人也承认，这套理论有着深厚的分析哲学基础，绝不可轻视。结果，麻省理工学院也随即成立了同名的俱乐部。

哈佛的“真正爱情革命”俱乐部直到2006年才成立，也就是Lena Chen的性博客开博的同年，其成员的主体还是天主教徒。不过，与普林斯顿的Anscombe Society不同，“真正爱情革命”并不追求分析哲学式的严密知识目标，而是更具感情性。同时，他们也试图从世俗的角度对待性问题。他们拿出一系列的科学研究证据，表明在没有固定的性伴侣的情况下所谓安全的性行为其实往往并不安全，过早的性行为常常导致更高比例的抑郁症、婚姻不忠、离婚、贫困等等。婚前保持童贞，则增进健康、巩固配偶之间的纽带，并且使婚后的性生活更有质量。Janie Fredell还投书校报，宣称：“童贞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这种神秘的诱惑力不是来自清纯的形象，而是来自力量。”一句话，保持贞操不仅有益，而且很“酷”。

“真正爱情革命”从一开始就遇到许多批评。有人指出他们对性行为危险性的宣传是危言耸听，他们关于婚前性行为和贫困、高离婚率的关系的论述缺乏研究上的证据等等。其最大的一次公关危机，也许是在2007年的情人节。当时“真正爱情革命”给哈佛一年级女生送出情人节贺卡，上面写道：“为什么等待？因为你是有价值的。”结果，许多人把这句话解释为那些在婚前有了性行为的人贬值了。哈佛校报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卡专门送给女生，反映的还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衡量一个女人的价值就是其贞操。

Janie Fredell成为“真正爱情革命”的主席之一后，俱乐部在2008年的情人节不分男女给所有新生都送了贺卡，以示男女平等。事实上，Janie Fredell不仅是“真正爱情革命”最有力的发言人，而且还把贞操运动和女权主义结合起来。她不仅以甘地和曼德拉为自己生活的楷模，而且反复阅读教皇保罗二世的《身体的神学》和约翰·密尔的《妇女的屈从》等著作，在知识上充实自己的信念。她认为，男性总是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女性：工资差别、阴道整形、强制节育，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在性的问题上，总是男人着急。有的男人寻求和女人的性关系，常常是为了

在更衣室里和同伴吹牛。而女人常常不情愿地发生性行为，以便保持和男友的关系。她用密尔的理论来解释，男人总是比女人在性方面更随意，因为社会文化容许这样。在这种社会文化的规范下，女人说“不”就变得非常困难。因此，要求女人拒绝男人的性要求，是一种非常女权的观念，显示着女性的力量，而不是要把女人塑造成男人心目中理想的那种天真无邪的贞女。

“真正爱情革命”的另一位主席，则是位叫Leo Keliher的男生。他的心灵历程，比起Janie Fredell来则痛苦得多。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因为对儿童的性侵犯而入狱，母亲改嫁给一个电工。但这位电工不久就被一个比他年轻20岁的女人勾引走了。结果年幼的他自暴自弃，开始偷东西。幸好后来被送到一个基督教青年组织，获得灵魂拯救，最后凭全额奖学金进了哈佛。从这种经验中，他懂得了“爱一个女人应该是出于力量，而不是出于需要”，懂得在性问题上不尊重女性的后果是什么。他不仅发誓保持童贞之身，甚至考虑以后从事神职的工作。

这对童男贞女共任主席，经历不同，哲学观不同，性别不同，甚至对贞操的生理反应也不同。Janie Fredell要走世俗路线，Leo Keliher则更倾向于宗教路线。《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两人中间穿插采访，提供了兴味盎然的对照。

Janie Fredell有自己的男友，但是两人说好不发生性关系。当她有了性冲动时，就去长跑。跑完步，人基本也就平静了。对Leo Keliher来说可不是这么容易。他承认，性欲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野兽。有时女人碰他一下，或者看了某位女士一眼，甚至看了张照片，都会让他勃起。有个新生女孩，特别温文尔雅、关心别人，喜欢为儿童服务。他却对人家充满了性幻想，甚至连Janie Fredell也成了他幻想的对象。性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挣扎。当记者把这些告诉Janie Fredell时，Janie Fredell马上爆发：“不！不！我们俩不般配呀！”

当“真正爱情革命”和Lena Chen的性博客都在哈佛成为街谈巷议的核心时，一场辩论就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Janie Fredell和Lena Chen在校园里公开PK，吸引了上百的学生。两人一出场，对比就再鲜明不过了。Lena Chen身着超短裙，坐进沙发里后，超短裙陷入沙发中几乎看不见，仅剩两条赤裸裸的大腿，简直是一览无余。正如她在博客中的报告：某日醒来，突然从体内拽出一个不知道是谁用过的安全套。Janie Fredell则穿着一条普通的蓝色牛仔裤。她曾声称：从和伴侣的一次谈话中获得的感情满足，比从性行为中获得的满足要大得多，虽然她根本



没有性经验。不过，两人有个共同点，即都是要做坚强的女人。Lena Chen主张：“坚强的女人就不会为自己做的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感到羞耻。让我关心每个和我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实在是太不靠谱的期望。我就是感觉快乐！我就是感觉快乐！”Janie Fredell则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套催产素荷尔蒙的理论，解释这种荷尔蒙在生产、哺乳和性交中都会分泌。这种荷尔蒙能帮助人们形成彼此之间的牢固纽带，促进家庭的和谐；但是，随意分泌则只能引发短暂的亢奋，而不是长久的爱情，甚至会把人们在错误的境况中绑在一起。她称她和男友之间摆脱了性要求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她可以从对方身上发现真正的人性。她还宣称，如果不发现真正的爱情，她将独守终身。

令人惊异的是，这两位本来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女性，真一过招儿竟客气得出奇。她们都同意公开讨论性问题的的重要性。同时，Janie Fredell还宣称，她们因为都承受着外界攻击，两人反而形成了某种纽带。

不过，这场大戏如同美国的两党政治一样，过度两极化，容易让人忽视站在中间的“沉默的大多数”。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男生在最近一年的性伴侣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2.1降到了2006年的1.6。另有2001年的研究表明：39%的大学女新生是处女，等她们毕业那年，仍有31%保持童贞。200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一半的哈佛学生没有过性经验，比一般大学生的比例明显要高。可见，哈佛既不像Lena Chen所嘲笑的那样80%的人没有性经验，也不像Janie Fredell所想象的那样被性泛滥所包围。在我看来，Lena Chen的性博客在哈佛风行，与其说明哈佛的性泛滥，倒更可能说明哈佛的性饥渴。因为在性方面比较满足的人，一般不会热衷于在网上寻找性博客。甚至像Leo Kelihier这种真诚地相信贞操，并不断和自己的性欲搏斗的青年，也都可能是Lena Chen的读者。难怪不少人对Lena Chen颇为认可，认为在哈佛这么一个未来世界领袖的摇篮中，她撕破了“领袖”的假正经，把大家心中想的东西表达了出来。

问题是：这两位极端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代表的极端潮流中的大学生，在未来将面临着什么？许多在性媒体中成长起来的写手，觉得这些经验对日后的事业有利，甚至可以帮自己找到机会。但更多的人对此将信将疑。Lena Chen自己承认，随着她的博客的流行，来找她的男人越来越少了，前男友也开始不理她了，大概是大家怕和她做完爱后又被评头论足一番吧，虽然她声称她会尊重别人的隐

私。一位网友更是浮想联翩：20多年后的一天，Lena Chen的老公坐在华尔街的办公室中穷极无聊，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打入谷歌的搜索框中，一点击就发现了她性博客的这些照片，才明白自己娶的人是谁……她日后是否能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确实比较难以想象。另一位则在哈佛校报上发表文章，称Lena Chen日后从政的路肯定已经堵死，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工作也不用想，谁会雇用这么一位来污染公司的品牌？随着她年龄的增大，甚至其博客的行情也将看落，性毕竟是碗年轻饭。

Janie Fredell则不会有这些问题。她已经当过两次实习生，发现自己大概不太适合做律师。她正考虑当个心理学家，专攻儿童早期发育。这样的选择除了兴趣外，也是因为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使她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也许人们会担心她因为找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独守终身，或者找到一个负心汉而浪费了纯洁的青春和爱情，但更大的可能是：她的生活不会有Lena Chen博客上那种刺激，却有更大的机会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最近的一项研究（*Bikinis Instigate Generalized Impatienc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表明：男人面对性刺激往往会表现得比较缺乏耐心，倾向于短期内的回报而非长期的利益。而能够为了未来利益推迟眼前满足的人，则一般在事业上比较成功。所以，在摆脱单纯的性诱惑的条件下选择了Janie Fredell的男人，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Lena Chen嘲笑她的哈佛朋友求偶时为了未来算计太多、压抑了眼前的快乐，而前述的研究调查也表明哈佛学生享受的性生活比较少，这也许和哈佛学生比较善于从长远设计自己的人生，因而日后也比较成功不无关系。其实，预测这两位的前途，大家问自己几个问题就可以：如果你是位求偶的男性，你会找谁？如果你有个儿子，你会希望他娶谁？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会雇谁？哈佛的性生活，虽然是私人领域，但和哈佛人未来的事业恐怕并非全无关系。



## 怎样医治哈佛的富贵病

几年前哈佛推行奖学金制度改革，宣布对年收入在12至18万美元的学生家庭，只收其家庭收入的1/10作为哈佛的教育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年收入18万的家庭，供孩子上哈佛，食宿、学费、杂费加在一起，只缴1.8万即可。当然，年收入在12万以下的学生家庭，在这一改革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更大的优惠；包括年收入在6万以下的家庭，孩子上哈佛费用全免。

要知道，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尚未超过5万。年收入达到12万以上的家庭，十里挑一也挑不出来。这一政策，是在优惠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缓解中高收入阶层的教育负担，引起了舆论的喝彩。不过，这一新政，也暴露出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次哈佛的改革和以前扶植贫困生的改革不同，针对的是中等富人阶层。这标志着常青藤的福利从穷人和中产阶层向富人扩张。难怪《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哈佛的改革，将激发其他一流大学类似的改革；用不了多久，上一流大学就可以全部免费。

这么说绝非异想天开。以哈佛而论，其捐助基金将近350亿美元，去年捐助基金的回报达23%，接近70亿美元。而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不过15亿左右。即使这些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和各种杂费）全免，哈佛的捐助基金每年照样上涨50多亿。所以，从学生身上收取的各种费用，对于哈佛来说已经没有财政意义。如果以平均每个学生的捐助基金计算，哈佛还不是最富的。普林斯顿的捐助基金平均到每个学生的人头上就比哈佛多。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威廉斯

(Williams)、Amherst等一流名校，捐助基金以平均每个学生计都接近甚至超过了百万美元。

由于这些学校的捐助基金过大、投资于股市的增长率太高，就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两个挑战。第一，过去这些私立大学的经营，严重依靠校友的捐助，进而保证了校友民主。比如，大学董事会要由校友选举，再由董事会任免校长。一些关键性的大政方针，要由董事会最后拍板。但是，一旦捐助基金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增长，校友的捐助就不再那么重要。校友的钱不重要了，他们的影响就可能随之而减弱。大学更要依赖的，是能在华尔街投资赢利的金融家。这样，大学就从一个自治、民主的学术共同体过渡到了由CEO操控的大企业。这种校内的权力结构一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就可能随之而变。象牙塔变成了投资公司，教育的纯净性和超越性就丧失了。

第二，巨大的捐助基金使一流名校改成彻底的免费教育后依然无财政之忧，而州立院校和其他普通的私立院校则不断在财政困境中挣扎，这就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过去一些州立大学之所以还可以和常青藤竞争，就在于其学费便宜得多。但如果上哈佛真能免费，谁还会花钱到州立学校读书？另外，普通的私立大学也没有巨大的捐助基金，只能靠学费过日子。这些学校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不仅要提高学费，还要削减开支，雇用临时教员，导致教育质量下降。结果就会导致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上越好的大学越便宜，上最好的大学免费；但上三四流的大学，则昂贵得惊人。那些哈佛、耶鲁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占据了最好的职位，而且无债一身轻；那些三四流大学出来的学生，由于训练很差，只能找低端的工作，而且因为学费太高，毕业后欠了一身债务。这岂不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美国社会，必须尽早面临这一挑战。一位投资公司的总裁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一流大学和末流大学分享资源的方案：凡是捐助基金按平均每个学生计算超过50万的大学，其捐助基金投资的回报要纳税（目前大学因为属于非营利机构，其收入是不纳税的）；然后用收上来的钱创立一个共同基金，把这些基金分配给缺乏捐助基金的学校，其中最穷的学校在领取这些基金上有优先权。

这一劫富济贫的“大锅饭”方案是否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冲突呢？我看未必。比如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就是实行的这种利润分享的方案：每年的



比赛，冠军队和最后一名的弱队都把大部分比赛收入上缴联盟，然后各队分享收入。其中成绩最差的队在第二年“选秀”时还享受优先权。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各队实力平均，使比赛水平接近更加好看，进而维护了联盟的整体利益。人称这一制度是“橄榄球社会主义”。美国各大学之间的关系当然和互相之间不停地比赛的球队关系有所不同。但是，美国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有4000所左右的大学，为社会各个层级提供着优质服务，有着其整体的利益要维护。这一整体如果过分贫富分化，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橄榄球社会主义”也许是未来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之途。

## 哈佛能改变美国的大学申请战吗？

在萨默斯因失去本校教授的支持而辞职后，老校长Derek Bok重新出山，代理哈佛的校长之职。这位退休后仍然不断著书立说的前校长，并不甘心当个守摊子的看守内阁首脑。他上任一个多月就放了一把火，要求把教学作为教授评定职称的重要标准，试图改变教授只重研究而轻教学的习气。如今，他又放了一把更大的火：取消提前录取制度。

美国的大学申请，本来是自由竞争，学生可以同时申请许多学校，并接到数封录取通知书，然后和各学校就奖学金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选择一个条件最好的去就读。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学之间争夺人才的“战争”愈演愈烈，大家为了锁定优秀学生，频频出招，其中的一个重要招数就是提前录取。

所谓提前录取，就是学生在头一年秋天就寄出自己首选的学校的申请材料，到12月知道结果。在这个申请中，学生必须保证：如果被该校录取，就肯定前来就读。这样，学校录取的时候，就知道被录取者肯定前来注册，不会跑到别的学校去，就会在同样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申请提前录取的学生。因为录取后不来的学生比例越高，越说明学校缺乏竞争力，排名就会受影响。当然，在提前录取这个制度内，也还有所不同。哈佛和MIT等校的提前录取，还容许学生事后反悔。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达特茅斯、杜克等校，则不容许学生改变主意。从学生一边来说，申请提前录取，自己进“第一志愿”的学校的机会就多了两三倍。比如，正规申请哈佛，录取率仅为7%，普林斯顿为9%；但如果申请提前录取，录取率哈佛是14%，普林斯顿则是29%。同时，一旦申请提前失败，其他正常的申



请还可以照常进行，并不会堵住别的路。

这一游戏规则，看上去对大家都好，可是一旦大家都来玩这个游戏，就变相限制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权。首先，大家都搞提前录取，走这条道的学生被录取的比例高，就等于逼大家都要走这条路，正常的申请则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哈佛和普林斯顿是不分彼此的学校，提前申请普林斯顿，有29%的机会，失败后再按正常方式申请哈佛，仅有7%的机会，因为对方已经把许多机会给了提前录取的学生。就好像在中国高考第一志愿是复旦，第二志愿是北大，头一个落空，第二个也没戏。第二，学生接到录取通知在前，拿到奖学金在后。事先决定去某个学校，就丧失了拿着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就奖学金问题讨价还价的机会。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被几个学校录取的学生，平均获得的奖学金比仅被一个学校录取的学生高30%。所以，学生事先被锁定，在财政资助上损失更大。第三，这套政策把大学申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富裕家庭子弟可以花上万美元雇用专业咨询人士，计算各种因素，帮助学生选择要锁定的学校申请提前录取；贫穷家庭的孩子则没有这种服务，最后手足无措，丧失机会。

也正是如此，各大学和教育专家都谴责提前录取的制度，承认这对学生不公平。但是，由于彼此竞争太激烈，大家全在呼吁取消这个制度，但谁也不愿意率先行动，生怕丧失了优势。以哈佛为例，头一年录取了2124名学生，其中有813名是由提前录取而来，占总数的38%。有的学校，一半学生是提前录取得来的。可见大家对提前录取相当依赖。只有University of Delaware这样一个普通学校宣布了取消提前录取，但其他学校全按兵不动。

哈佛这一义举，获得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欢呼，包括其对手普林斯顿和MIT的录取办公室主任，都在赞扬哈佛时毫无保留，只是大家都不肯说自己将如何跟牌。不过，这个举动，使哈佛一下子抢占了道德高地，将了所有名校一军。估计在未来几年，一些名校会纷纷效仿。现在各名校正处于改革的有利时机。因为人口的变化，最近高中生数量急剧上涨，大学不愁生源。特别是几个常青藤，每年不得不拒绝许多合格的学生。取消提前录取只会丧失短期的优势。而像哈佛这样的“最高学府”，恐怕短期内也不受影响。困难的是次一流或二流的学校，要放弃提前录取的政策，恐怕不是一两年能下决心的。

美国的大学竞争，强调的是如何优化学生的选择范围，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平。

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目标。可惜，目前大学统一招生的模式，完全排斥了学校之间的竞争，不给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希望中国高等教育界能够学习哈佛的榜样，拿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刀，对高考录取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 哈佛法学院终于扬眉吐气

法学院一直是哈佛的王牌。在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出了19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另有4位曾就读而没有毕业；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特在内的6位现任大法官，都是哈佛法学院出身。另外，10位美国总检察长和不计其数的顶尖法学家、律师乃至新闻记者、企业总裁等等，都是哈佛法学院培养的。

但是，比起耶鲁法学院来，哈佛则一直难以翻身。在大名鼎鼎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法学院排名榜上，耶鲁永远是高居第一。比起哈佛来，耶鲁更是个出总统的地方。早在1913年，刚刚卸任的总统塔夫脱就到耶鲁法学院讲授宪法，一直到他1921年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为止。战后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又出了两位总统：福特和克林顿。现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还保留着克林顿和希拉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作为纪念。相比之下，哈佛法学院仅出了一位总统 Rutherford B. Hayes，而那还是19世纪的事情。

如今，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奥巴马入主白宫，其妻子米歇尔则是早他三年毕业的前辈。这让哈佛法学院士气大振。更重要的是，最近五年，哈佛法学院在新院长Elena Kagan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复兴，正在迅速追赶耶鲁。

哈佛法学院于1817年建立，在美国的法学院中历史最悠久，声名赫赫，培养的学生统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19世纪70年代，院长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发展出案例教学法，以苏格拉底式的质询来训练学生的法律思辨能力，很快成为美国法学教育的主流，并拥有世界最大的法学图书馆。但是，在近二十几年里，哈佛法学院从来没有在耶鲁面前抬得起头来，以至于在学生中流行着一句话：“进

了耶鲁法学院则一生不用愁；但进了哈佛法学院，则必须成为班上的前三分之一才可以一生不愁。”从表面上看，耶鲁法学院小而精，仅700名学生，哈佛则有1800名，其法学博士课程，每年新生就有500，分成7个班，每班80人，最多时一个班有140人，使学生很难接近教授。有人说，这简直就是法律工厂，很难和耶鲁的精英教育媲美。

不过，最大的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教授中内斗不断，这使哈佛法学院有“查尔斯河畔的贝鲁特”或“法学教育的贝鲁特”之称。这一内斗，大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时，哈佛法学院成为所谓“批判法学”（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堡垒。这派人的代表，包括至今仍在任教的Duncan Kennedy、Morton Horwitz、Roberto Unger等等。他们的基本信仰是，法律是现存的权力关系的工具。而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传统派学者Paul Bator、Robert Clark等等。他们认为法律可以充当调解社会纠纷的一个没有偏见的仲裁工具。

这种学术之争，从理论层面发展到了政治层面，最后到了个人层面，双方互不买账互相拆台，乃至很难再雇新教授。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校。每雇一位新教授，都要本院的教授们投票表决。因为大家在内斗中走火入魔，在表决时就是“我否决了你的人、你否决了我的人”，谁也别想得手。同时，一些学术上平平，但在两派中都没有树敌的好好先生，反而能够拿到终身教职。这样的结果是，真正好的教授雇不来，而且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也不愿意早早陷入这种派系之争，宁愿绕开哈佛。一流的学生，自然也很容易被其他的学校挖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奥巴马之所以能当选《哈佛法律评论》的主席，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候选人相持不下，陷入了僵局，奥巴马作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折中人物而当选。可见教授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蔓延到学生中。与此同时，耶鲁则大力招兵买马，把最优秀的法学教授网罗其下，最优秀的学生也都把耶鲁视为首选。

1989年，Robert Clark被选为院长，开始平息这场两败俱伤的内争，使法学院又开始雇人了。同时，他也特别善于募捐，加强了学校的财政实力。但是，因为积怨太深，除了修补过去的损失外，他很难有更大的作为。真正的救星，还是克林顿的旧僚。1999年，克林顿的高级法律顾问Elena Kagan退出政府而进入哈佛法学院。她虽然1986年在哈佛法学院毕业，但在本校教了很短时间的书，主要时间



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和克林顿政府的法律顾问，在哈佛基本是个外人，没有介入过去的党争。2001年，克林顿政府的财长萨默斯成为哈佛的校长。萨默斯一上任，就看出法学院的表现远没有发挥其实力，进而把振兴法学院作为首要的议事日程之一。是他看中了Elena Kagan，于2003年将这位43岁的女性任命为院长。

Elena Kagan从克林顿那里学来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智慧，其中包括用一些细小的、具有象征性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大的问题。她首先要将法学院变成一个快乐友好的地方。哈佛法学院以严格著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院院长Robert Berring曾评论道：“哈佛法学院就像一个武士的道场。在那里，你要面对全国最为强悍的知识武士来检验你的剑术。”这种动不动就可能被对手劈成两半的感觉并非全无来历。19世纪Langdell在设计法学院课程时，校长Charles Eliot就特别嘱咐：“一定要让课程又长又难！”哈佛法学院过去录取学生并不是很严格，但第一年后要把大量学生淘汰。一个著名的传奇是院长每年要在新生集会上告诫他们：“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你们之中的一个在年底时就不会在这里！”一直到二战后，哈佛法学院才开始吸收被一个28岁的院长Robert Hutchins所开创的耶鲁法学院的传统：把学业上的竞争转入录取上的竞争。也就是说，把录取的门槛抬高，保证进来的人是一流的；但要给进来的学生创造一个合作而非竞争的环境。一项1992年的研究表明：同学之间的合作比同学之间的竞争更有助于学生日后的成功。

不过，在“法学教育的贝鲁特”的战火硝烟中，学生普遍的情绪是压抑不快，要创造和谐气氛并不容易。Elena Kagan一上任，就给学校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设定接待学生的时间，把课堂规模减小一半，并给教学楼提供免费的咖啡，给女厕所提供免费的月经棉，同时在学生中心的建筑物外设立排球场，冬天可以改造为冰场。她颇为得意地说：“提供免费咖啡可以让你用每一美元给学生买来最多的幸福。这也不用经过各种会议的政治斗争而通过。”到了2008年，她还取消了传统的分级打分制，采取耶鲁那种及格/不及格的分数制，减缓了竞争的压力。

在和谐的气氛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中，她也开始动手解决大问题。她上任时，哈佛法学院已经有明显的商业化趋势，研究公司法的越来越多。学生在这一领域发展很容易到华尔街高就，“钱程”无限。Elena Kagan的前任Clark也是个公司法的专家。而在公共领域的法律方面，学术研究很可能直接导致美国内外政策的改变，

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被忽视。Elena Kagan本人的专业是行政法，其关于总统行政的研究在法学界十分有影响。她的一个重要的新政，就是对那些许诺毕业后在公共部门服务五年的学生免除第三年的学费，并设立公共利益的夏季实习奖学金，鼓励大家向公共法的方向发展。2006年，教授们投票通过了修订过的第一年课程计划，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的能力、行政法、国际法上。

不过，她最大的成功，还在于雇用新教授。在这方面，她在白宫学会的政治技巧全都应用无遗。她的首要目标，是雇用一批年轻的公共法学家，这包括布什的白宫律师Jack Goldsmith。把这么保守的教授塞到哈佛校园，有助于意识形态上的平衡，消除左翼一家之见的学术懒惰，但是也自然在自由派主导的校园引起激烈的抵抗。有些人声称Jack Goldsmith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Ashcroft之下参与起草了酷刑备忘录，后来被证明为不属实。Elena Kagan则力挺Jack Goldsmith。她每招募一个人，都要私下和有投票权的教授们一个一个地单独沟通，说服反对派，等凑够了票数再出手。这次更是竭尽全力。一位反对雇用Jack Goldsmith的教授惊异地讲：在过去，教授中一个目标确定、意志坚定的小集团就可以否决新的雇用，但因为Elena Kagan高超的政治技巧，Jack Goldsmith的雇用竟以高票通过。

就这样，Elena Kagan打破了招募教授过程中内斗的僵局，使这种募集人才大多能超越党争，挑选到最优秀的法学家。在她上任时，哈佛法学院仅有80位全职教授，严重老化；现在则有100多位。几年之间，哈佛成了法学新星的汇聚地，实力大增。

哈佛的崛起，引发了美国顶尖法学院的激烈竞争。要知道，哈佛法学院财政实力雄厚，捐助基金高达17亿美元，最近的一次募捐运动，收益又超出了4亿的目标；再加上规模大、位置多，能够把大量人才吸引过来。过去的内争致使其无法招兵买马，其他各校自然有了发展师资的大好机会。但是，如同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Brian Leiter所说：“哈佛法学院在法律教育上是一头睡狮，如今已经醒了。”言下之意，现在整个法学教育界都在为这头睡狮的苏醒而颤抖。比如，耶鲁法学院虽然仍然是王中之王，但如今在师资上更像十几年前的哈佛，有将近一半的教授都年过六十，显得过于老化。为了保持优势，耶鲁几年前挖走了两位哈佛的法学新星，而且还和哈佛竞争另外两位。斯坦福、哥伦比亚、芝加哥、纽约大学等等，也都纷纷投入竞争。不过，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哈佛一旦消除内部的阻力，就不



可能吃亏。自然，学生也开始看好哈佛。2008年哈佛法学院收到7200份申请，录取了11.4%，其中被录取的新生中有67.9%决定前来就读，创了20年的新高。

不用说，这一切要归功于院长Elena Kagan的领袖才能。2006年，当有争议的校长萨默斯被迫下台时，她曾被视为接任校长的大热门。当学生知道她没有去当校长的消息后，马上聚会庆祝，庆幸自己留住了这位难得的领袖。不过，这种好日子能维持多久现在又难说了。奥巴马当选后，Elena Kagan顺利被任命并就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又给哈佛法学院带来了一阵领袖危机。好在她已经为哈佛法学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家不至于再回到内战时代。在哈佛统治华盛顿的时代，哈佛法学院的崛起已经很难阻挡了。

## 哈佛教授被捕所引起的种族争议

大名鼎鼎的哈佛黑人教授盖茨，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在自己的家中被捕，在奥巴马所象征的“后种族时代”又触发了一场典型的“种族时代”的论争。

58岁的盖茨教授是哈佛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主任。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不停地指导拍摄一系列纪录片，在1997年曾被评为美国25位最有影响的人士。此次他到中国旅行，目的是研究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家族史。但是，当他从机场乘出租车回到家后，发现自家的前门打不开。他绕到后门，关闭了警报系统，然后请黑人出租司机帮忙，一起把门强行推开。此时一位妇女路过此地，看见两位黑人正在破门而入，立即打电话报警。当一位白人警察到达后，黑人出租司机已经离开，盖茨教授则在自家的前厅里。

误会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警察叫盖茨教授出来。盖茨教授拒绝。警察跟进屋子，要求他出示证件，盖茨教授拿出两个证件，一是麻省的，一是哈佛的，表明自己住在这里，是哈佛的教授。根据警察的报告，盖茨教授此时质问警察：你为什么这样做？难道就因为我是黑人？难道你在美国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的吗？他要求警察通报自己的名字和徽章号码。警察说他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号码，盖茨教授则说对方拒绝通报。

根据警察的报告，盖茨此时不停地高声斥责他是种族主义者，并威胁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惹谁?!”警察请他走出房子说话，他则说：“我出来跟你妈妈说话!”因为他如此大声喧闹，引起过路行人的围观，警察立即打电话要求“增援”。等其他警察到场后，盖茨教授以行为失范而被捕。



当然，盖茨被捕后，其律师立即到场，他缴纳了40美元保释金后被释放。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后，警方也立即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是，此事却无法就此平息。盖茨声称：“有上百万黑人被关在监狱里，我是其中之一！”许多黑人精英也站出来现身说法，称“你不管有多大成就、多少钱、开什么豪华车、住什么豪宅，你只要是黑人，就还是被警察用审视犯人的目光看待，进豪华饭店被误认为是司机只能走后门，甚至无缘无故被盘问。如今盖茨这么一位知名人士，在自己家门口常被人拦住要签名，但竟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向警察证明自己是谁。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实在叫人难以容忍”。

但是，另一部分公众则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许多人都有在忘带钥匙而企图破门而入时在自己家中被警察盘问的经历。毕竟警察是接到报警而来，在这个枪支泛滥的国家执行任务相当危险。人家先站在你家门口让你出来。你不出来人家只能跟进来要证件。这和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这时你就开骂人家是种族主义，是否太小题大做了呢？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哈佛大教授在欺负一个小警察。这么一个误会，怎么可以用来证明上百万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被关在监狱里的黑人是冤屈的？

盖茨教授称此事没完。他没有说要进行法律诉讼，但他要求那个警察道歉，并要给该警察讲一堂免费的种族主义历史课。另外，他计划把自己的这个经历放到有关的纪录片中。很快，奥巴马总统也介入，公开称盖茨是自己的老朋友，“警察的行为非常愚蠢”。

真是如此吗？几天后，当事警察终于公开表态：“我不会道歉，我不是种族主义者。”除此以外，他因为没有上级授权，不能多谈。事实证明，他16年前还有过营救一位黑人运动员的记录。他的同事、邻居都站出来为他说话。警察工会审核了此案的过程后，宣布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不过，即使从最为同情盖茨的报道中，你也看不出这位警察犯了任何错误：他接到报案立即到场，甚至没有轻易入舍，而是要求破门而入者出示证件，是在被拒绝时才跟进去；等意识到对方是房子的主人后，他马上请对方出来说话，避免进入民宅。他在这个过程中遭到辱骂。双方争议最大的，是他是否向对方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号码。如果真有警方处置不当之处，那就是盖茨教授的被捕。即使盖茨大声喧哗，是否有必要将他抓起来？这种行为合法但未必合情。不过，逮捕是增援后的警察做出的。从照片上

看，这些警察来自多种族，包括黑人。指责人家种族主义似乎就说不过去了。

此事如此小题大做，对美国的种族关系实在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在2008年美国大选时曾经观察到，美国正在出现反向的肤色政治：黑肤色成了精英的象征，白肤色则代表着受压迫的小民百姓。这可能成为未来共和党的一件武器。长期的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给黑人造成了受害者情结。但现在白人也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受害者情结束。这特别表现在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上。许多白人的平民子弟，在考分明显高的情况下，被考分低的富裕黑人在大学、就业竞争中挤掉。在去年的大选中，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之所以异常人气，也是因为她是个贫寒出身、为了省钱换了五个小大学才毕业的底层白人。奥巴马这种常青藤塑造的黑人贵族，和佩林这种缺少良好教育机会的穷白人，实际上给许多白人创造了一种自己受欺负的心理暗示。行为古怪的佩林，至今仍然打着受害者牌。盖茨被捕事件，则进一步展示了这一主题。盖茨利用此事上纲上线，觉得自己的经历证明了黑人所受到的压迫。其实，即使从黑人的角度说，如果受到的压迫不过如此，那实在也太轻描淡写了。而另外有许多人则觉得，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白人警察，在忠实地执行任务时受到认识总统的通天黑人精英的欺负，这势将为白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必要的燃料。



## 从哈佛丑闻看媒体对学术的监督

正当中国为著名学者汪晖的抄袭问题而争论不休之时，哈佛曝出惊人的学术丑闻。这一丑闻不仅被当地媒体反复报道，而且成了全球性的科技新闻，乃至远在英国的《经济学人》也进行了重点报道。

丑闻的主角，是哈佛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Marc Hauser。此公刚过五十，不仅领导着哈佛的认知进化实验室，而且从国家科学基金和法兰西学院等国际著名机构屡获大奖。其研究题目也非常尖端：动物的道德意识。这对于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道德问题可谓别开生面。但是，他的几位研究生和助手，一直对他取证的方法表示不安，并提出了不少问题要求讨论。对此他都置之不理，最终有人举报。哈佛开始了秘密调查。

2010年8月10日，《波士顿环球报》率先曝出新闻：Marc Hauser正在接受调查。8月20日，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证实调查发现了Marc Hauser有八项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宣布处于一年休假中的Marc Hauser也发表声明道歉，声称自己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因为他的研究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联邦在马萨诸塞州的检察院也已经介入。

根据哈佛公布的情况，Marc Hauser的不端行为有三项涉及他发表的论文，另外几项则涉及尚未发表的论文。可惜，这样的通报难服众人。学界和媒体大为不满的是，哈佛在此事上缺乏透明性，只有在媒体曝出消息后，才被迫承认确有其事。对Marc Hauser的这些不端行为的细节，也一直没有公布。哈佛称案情复杂，涉及不少隐私，难以通盘公布。毕竟实验室涉及一个研究团队，不是一个人。可

惜，这不仅令人猜测纷纷，而且对整个学科的信誉也带来重大的损害。

Marc Hauser所研究的，是通过对动物行为的观察来探知其思想，如认知能力和道德意识等等。这在心理学上是非常艰难的课题，在方法论上必须有严格的限定。毕竟，动物不能通过语言与人进行直接交流。动物的“思想”，全是人根据其行为而进行的解读。解读的方法，大多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并观察和记录动物在实验中的行为，找出能代表其思想程序的令人信服的模式。心理学界经过上百年数代人的积累，已经发展出严格的程序。可想而知，这一过程可以是非常漫长艰难的。急功近利者，自然可能在实验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时，就把“结果”写进论文，证明自己的宏观理论。这就是我们常识中的伪造实验结果。

1995年，Marc Hauser就发表论文宣称一种小猴子可以在镜子中识别自己。同行大为震惊，马上向他索要实验的录像。但Marc Hauser寄来的录像片段毫无说服力。同行继续索取完整的录像，Marc Hauser只好推说录像被偷了。2001年，Marc Hauser发表了另一篇论文，承认他的实验无法重复。此次发现的“行为不端”，包括类似的情况。比如他在一篇论文中声称这种小猴子有着“规则意识”。但证明这一点的实验至少是还没有完成，事后也拿不出来。换句话说，他可能是把自己脑子里需要实验证明的假设当成了实验的结果写进论文。

虽然此案调查的细节过程和最后结论都还有待澄清，处罚措施也尚未公布，但几点很值得中国学术界参照。第一，对Marc Hauser这样明星级的教授，实验室中他手下的研究生的匿名举报，就足以启动校方的调查。他本人不管多么不愿意，也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且目前处于停课候审的状态。第二，即使如此，哈佛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受到了媒体和学界的强烈批评，称其过程不够透明。媒体对学术有监督的权利，即使哈佛也不能免于监督。这早就是学界的共识，哈佛方面更无“媒体炒作”之抱怨。第三，Marc Hauser在学术界势力很大，追随其学说的人很多。然而，此事曝出后，虽然证据不详，但学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他的学术道德和规范打保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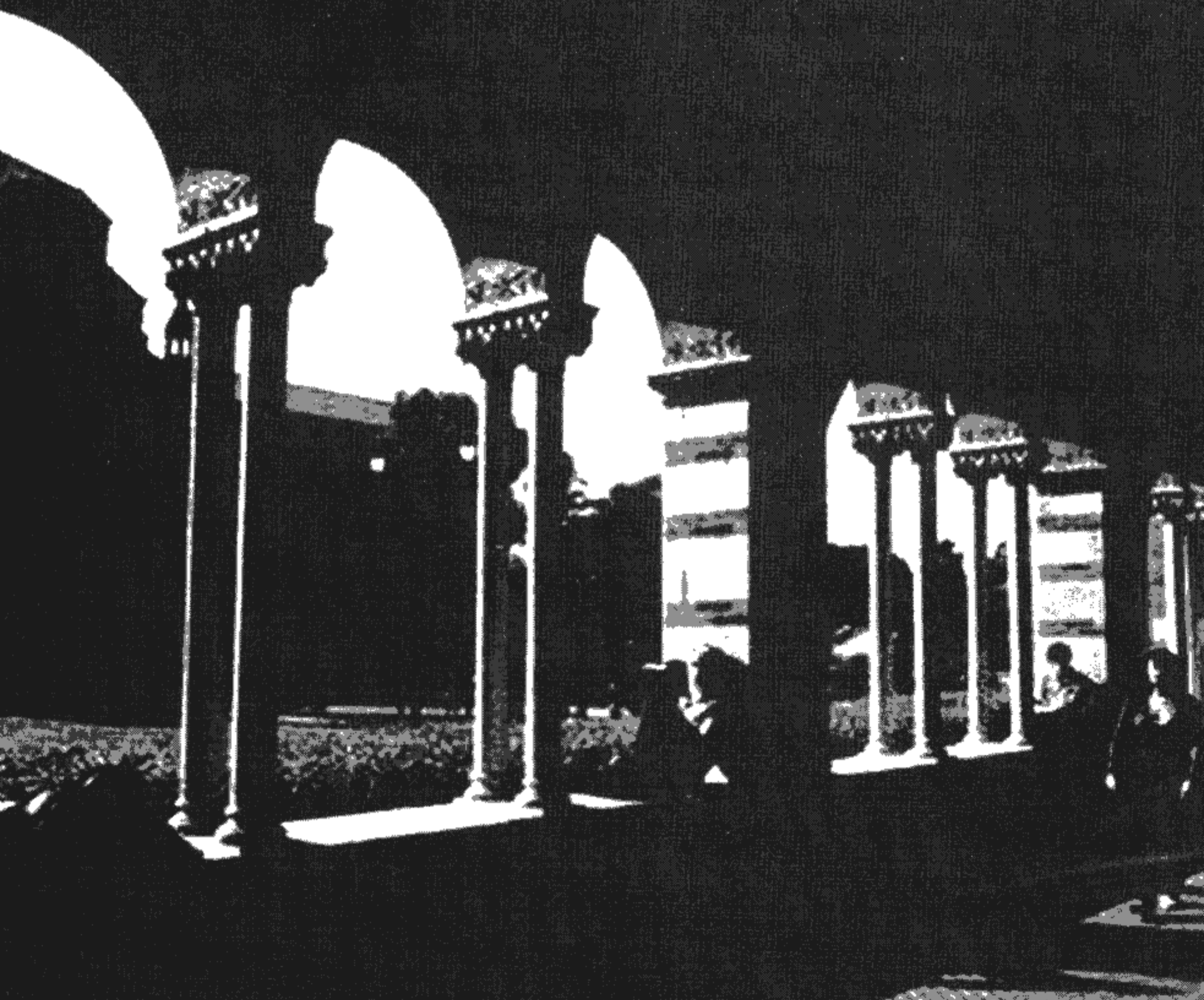
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用说小研究生举报明星教授，就是教授公开写文章指出同行抄袭，也要受到对方律师的威胁。抄袭者所在的大学装聋作哑，甚至有同行出来为其辩护，攻击“媒体炒作”，称中国的媒体不懂学术规范。其实，没有媒体的监督，哈佛也不可信。学术的信誉，不是建立在把自己置于万人之上，



而是把自己摆在和别人（哪怕是圈外人）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当学术不得不依赖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时，学术就不成其为学术了。可惜，中国的学者经常不懂这些，以为抬出八十几位著名“国际学者”的声援信，就把别人都吓住了。看看 Marc Hauser 的案例就应明白：没有人给他声援。声援也没有用。大家要看的，是实验的证据。如果抄袭的事实在网上都能查得一清二楚，再找出八十几位出卖良知的学者又有什么用呢？



# 常青藤秘密



## 常青藤究竟值多少

最近美国有一股反常青藤的潮流。大体而言，以常青藤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的攻击是直接的，靶子是常青藤通过所谓legacy preference，即对给学校捐款的富人和校友子弟的照顾，保证上流社会垄断精英教育资源，使其子弟顺利“接班”。这是一种没有贵族之名的贵族制度。《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Daniel Golden和研究名校的权威人士——伯克利教授Jerome Karabel估计，美国一流大学中大约每年有10%—25%的新生的位置是给这种特权阶层保留的。所以，在常青藤中读书的未必是最优异的学生。另一方面的攻击则是间接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最近都发表特别报道，称教育水平达到常青藤标准的大学有的是，好学生未必非上常青藤不可。甚至有研究表明，20多年前被常青藤录取但没有去成的学生，和当年去就读的学生如今在收入水平上没有任何差距。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试图分析上常青藤究竟能够给学生日后的生涯带来多少好处，常青藤是否还是上流社会的晋身之阶。其方法虽然狭窄，但颇有启发意义。该报统计了美国顶尖大企业的CEO的大学毕业，最后得出结论：接受常青藤教育和成为企业领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第一个例子当然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确实上了哈佛，不过中途辍学，显然是看出在那里泡着对自己没有什么用，最后果然抛弃常青藤而成功。第二个例子是世界第二富巴菲特，大学本科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大概相当于在中国上个云南大学吧。再看另外几位著名的企业领



袖：迪士尼的企业总裁Robert Iger大学上的是Ithaca College，一个小小的地方学院。美国银行的总裁Kenneth Lewis上的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福特汽车的总裁Alan Mulally上的是堪萨斯大学。沃尔玛的总裁上的是设在堪萨斯的匹斯堡州立大学。Costco Wholesale的总裁James Sinegal上的是圣地亚哥城市学院。Intel的总裁Paul Otellini上的是圣弗朗西斯科大学。Exxon Mobil总裁Rex Tillerson上的是得州大学。Procter & Gamble的总裁A. G. Lafley上的大学好得多，但也不过是Hamilton College。Accenture的总裁Bill Green则上的Dean College，是附属在我现在任教的萨福克大学下面的两年制社区学院。在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的总裁中，有26个是从普通州立大学毕业；14位是从普通私立大学毕业（这种私立大学的知名度和教育水准，未必比得上一般的州立大学）；另外有6位，是从军校或海外等其他途径接受的大学教育；只有4位是常青藤出身，仅占8%的比例。而目前在美国前500大企业担任总裁的人中，常青藤出身的比例也不过10%，其中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总裁有10位，从哈佛毕业的则仅九位。

仅以这个数字说明常青藤教育无效，当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在美国四年制大学注册的本科生，有1000多万。常青藤的本科生，怎么也过不了10万人，远达不到大学生总数的1%。不过，现在爬到企业总裁位置的，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那时大学生人数（以全日制学生计）是现在的一半左右；常青藤的学生数目上升则不太大。这样估计，当时常青藤培养的学生，恐怕比当时大学生总数的1%多一些。更重要的是，常青藤的学生，从学业、智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看，在没上大学前就有巨大优势。这群人中产生领袖的比例本来就应该高出一般的人口。可惜，这1%多一点的“人精”，也不过产生出8%到10%的顶尖企业总裁，说明常青藤不过尔尔。这一统计数据至少表明，那种常青藤垄断美国领导权的神话已经破产。展望未来，随着美国大学的扩张，常青藤的影响将越来越小。精英的教育未必培养得出精英。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局面？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从教育的角度讲，常青藤中多是些精英学生，社会背景单一，在这样的地方上学容易成为温室的花朵；而在一些州立大学，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多天地大，容易培养领袖能力。我自己在耶鲁当过助教，如今在平民子弟的学校萨福克大学教书，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这种对比。耶鲁的学生，一个个学术上都比较强，不需要别人帮助，也不需要太多

合作。在讨论班中，大家竞争看谁表现突出，没有团队行为，很难产生领袖人物。在萨福克则不同：许多学生上课一言不发，也不了解课堂的教学内容；但有几个精英学生则鹤立鸡群。这几个学生，和耶鲁学生素质相当，但上课时受到的锻炼则不同。他们不仅要自己表现出色，而且要把那些缺乏能力的人组织起来，做集体的报告。这是地地道道的领袖能力。到了社会上，一个领袖的职能，就是把众多能力低于自己的人组织成一个有效率的团队。普通大学给领袖人物提供了更逼真的场所来发展这种才能。而在耶鲁这样的学校，一屋子里坐着的都是要当将军的人，没有士兵的材料。你想练练怎么统帅士兵，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将军太多的地方反而出不来将军。

另外，常青藤学生毕业后起点太高。他们仗着自己的牌子和关系，一下子就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个舒舒服服的中层工作，开始了坐办公室挣六位数工资的生涯，实际经验非常狭窄。而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常常要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地奋斗出来，对一个企业有全面的了解，接受了更全面的锻炼，更适合充任领袖之职。看看上面提到的那些企业总裁，许多不仅是普通大学出身，而且是低层级的大学出身。他们的教育，以及教育给他们提供的门径，使他们更接近草根社会，更了解各色的人情世态，更有市场的直觉。

前面提到的Bill Green，在1971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建筑工人。作为管道工之子，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是一块上大学的材料。但是，有一次他去Dean College这么一个两年制的小社区学院看朋友，一下子被那里的气氛迷住了。现在他回忆，那是他一生的转折。在这所学校，教授的使命就是教书，办公室的门上根本没有固定的答疑时间。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进门请教。而常青藤中那些沉浸在研究中的教授，学生难得一见，有时在固定的答疑时间也找不到人。如今，Bill Green领导着一个有170亿美元的营业额、13万员工的大企业。他就是这所小学校造就的。所以，他对那些为自己的孩子上了社区学院而羞耻的父母非常愤怒。用他的话说：“你可以进常青藤但依然缺乏表现。或者你可以到一个真正关心你、激励你的地方，别管别人怎么想。”

Procter & Gamble的总裁A. G. Lafley当年选择Hamilton College，理由很简单：他要坚实的人文训练并成为大学篮球队的成员。在这个小学校，他的意愿得到了充分满足。他选了历史专业，并被选为二年级学生主席，三年级则去法国学习一



年。用他的话来说，他学到了良好的沟通技巧和领袖能力；这种能力，是他未来录用人才的标准，任何大学都可以培养。

另一有趣的现象是，高科技公司的创建人常常中途辍学，但成功后雇的人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盖茨就不说了。Michael Dell从得州大学辍学，创建了Dell Computer。Steve Jobs从Reed College辍学，创建了苹果电脑。Steve Jobs谈起往事，说辍学是非常恐怖的，但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决定。他可以不听那些没有兴趣的课，而跑去旁听书法课。这门书法课十年后直接影响了苹果电脑的设计。

严格地说，巴菲特也是个名校辍学生。他父亲让他上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他兴味索然，待了两年就跑回家，用一年时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这时父亲又来督促，他就申请哈佛商学院，结果被拒，理由是他太年轻。不过在那时，他读了David Dodd和Benjamin Graham撰写的关于投资的书，一下子被迷住。后来他听说两人在哥伦比亚教书，就写信问两个教授自己能否去哥大。结果，他于1951年拿了哥大的经济学硕士，也算是沾上了常青藤的边。不过，他强调，他当年不是冲学位去的。他想找的，是启蒙了他的投资理念的教授。

毫无疑问，常青藤学生日后的平均收入，绝对高于一般学校的毕业生。但是，成大事者，却有多种成功的路：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小学校，可以辍学，可以半工半读。一位大公司负责招聘的人也说：如果你打过工，甚至同时干两份工作，这些经验有时比你的教育背景还重要。当大公司在选择总裁和其他高层职位时，并不看你的学位。“重要的是你成就了什么，而不是你在21岁时在干什么。”

总而言之，从培养顶尖人才的角度说，常青藤在投入产出方面是非常缺乏效率的。常青藤中画廊里的一张名画可以价值几百万上千万，餐厅盖得像座宫殿，明星教授一大堆，学费远远不够教育费用。一些巨富，为了把他们不成器的孩子送进常青藤镀金，几百万几千万美元地给学校捐款。这样烧钱换来的结果，并没有使常青藤子弟成为社会的主宰。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代企业总裁出道时，常青藤的势力还很大，校友彼此提携，其人脉还十分关键。如今这些普通学校的总裁们获得了统治，价值观念变了，根本不在乎常青藤不常青藤。所以，日后非常青藤出身的人才，晋身就更加容易，常青藤的魔力会因此大大削减。这是常青藤所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 挑战常青藤

2006年哈佛大学在罗得学者（Rhodes Scholars）大战中总算扬眉吐气，有6位学生包揽了麻省的全部罗得学者。同时，耶鲁有4位学生成为罗得学者。2006年在36名美国的罗得学者中，有1/3强来自常青藤。不过，这一辉煌战绩，并不能掩盖常青藤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的现实。

罗得奖学金是世界上最有声誉的奖学金，获奖者一般从本科生中选拔。一旦被选中，就成为罗得学者，有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两到三年研究院的机会。奖学金的年度金额大致为45000美元，足以支付全部费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就是罗得学者。他的劳工部长，知名经济学家Robert Reich也是一起赴英的罗得学者。一个学校产生多少罗得学者，反映了该校精英教育的质量，所以竞争十分激烈。今年的32位美国的罗得学者，就是从340个学校的896位顶尖学生中分16个区域选出。参加竞争的学生，不仅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修改自己的申请信，而且要参加面试乃至鸡尾酒会的预演，经过反复演练才可能成功。

罗得学者是精英中的精英，过去自然多为常青藤所垄断。但是，现在美国高等教育急速扩张，许多一般院校大幅度提高质量，挑战常青藤的领导地位，使罗得奖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从1987到1996年，有63%的罗得学者来自常青藤，37%来自非常青藤学校。但在1997到2006年间，只有25%的罗得学者来自常青藤，75%则来自常青藤之外。哈佛大学在过去十年只能占有10%的罗得学者，比起再前面十年的17%，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2001年，哈佛竟是70年来第一次无人获得罗得奖学金！



与此相对，一些不知名的小学校，却异军突起。比如同在麻省的 Wheaton College，是个只有1500名学生的小型本科生学院，12年前还没有人获得过罗得奖学金，到2006年则已经造就了3名罗得学者。同时，自2001年以来，该校学生赢得了60个声誉卓著的奖学金。结果，该校的录取率从2000年的65%降到了2005年的41%，门槛明显高了一截；同时，新生的高中平均成绩（GPA）从3.35上涨到了3.5。

罗得基金会每年都到一些从来没有产生过罗得学者的学校访问，鼓励学生申请。如果一个学校首次产生了罗得学者，罗得基金会会在颁奖时公布。所以，学生拿罗得奖学金，成为学校出现在“名校地图”上的重要战略。各校的罗得奖学金申请，常常由专门机构负责。这种机构的负责人不仅审视学生的成绩，而且暗访教授，了解哪个学生课上回答问题特别出众，如同职业足球中招募新星的球探一般。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校园产生的罗得学者都是美国人。十几年前，我曾有位耶鲁的同班女生获得罗得奖学金。她是香港人，竞争的是香港名额。她自谦地对我说：在耶鲁这样的学校竞争香港的罗得奖学金，难度低一些。

2006年常青藤揽获三分之一以上的罗得学者，逆转了近年来的趋势。不过，这一年的战绩，是否仅仅是回光返照呢？现在还很难判断。小学校一旦建立了“罗得传统”，日后就会更有竞争力。美国精英教育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分散，也许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 常青藤之间的PK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美国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衡量大学水平的一把尺子。今年普林斯顿连获“七连冠”，哈佛、耶鲁屈居二三。但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基于一套复杂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和一般人的印象并不相同。比如，你走遍世界，大家恐怕都认为哈佛是世界的最高学府；普林斯顿的名气，可能还比不上耶鲁。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依次下来，大致是人们心目中的正常名次。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基本证实了这一日常印象。这些经济学家对3200名优秀的高中生进行调查，问他们如果被两个学校同时录取后会去哪里，这样以100个学生为单位两个学校两个学校地进行PK，决出名校之间的胜负。结果发现，哈佛是绝对冠军，耶鲁稳居第二，MIT和斯坦福以毫厘之差分居第三第四，普林斯顿仅居第五。

比如，如果100名学生同时被两个名校录取，哈佛和耶鲁之间的PK比分就是65比35，即同时被两校录取的100名学生中，65人会选择哈佛，35人会选择耶鲁。哈佛和MIT之间的PK比分则是73比27，和斯坦福之间的PK比分也是73比27。哈佛和普林斯顿的PK结果，则是75比25。可见，普林斯顿在高中生中的竞争力，仅排第四。

除了哈佛和各校PK外，其他学校之间的PK也指向同样的结果。比如，耶鲁和MIT的PK比分是59比41，和斯坦福的PK比分是60比40，和普林斯顿的PK比分则是62比38，不仅证明耶鲁压了普林斯顿一头，而且MIT和斯坦福也比普林斯顿更有



竞争力。不信可以看这两个学校分别和普林斯顿的PK。MIT对普林斯顿，以53比47险胜。斯坦福对普林斯顿，则以更小的优势（52比48）胜出。MIT和斯坦福在与哈佛的PK中比分相同，并列第三，居耶鲁之后，但两校之间的直接PK，则是MIT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获胜。排在普林斯顿之后的则是位令人意外的明星布朗大学。该校虽然以大比分输给上述五所学校，但在和其他学校的PK中大获全胜，特别是以56比46击败了紧追其后的哥伦比亚。哈佛在和布朗的PK中，以89比11获胜，但以更大的优势赢了哥伦比亚，比分为91比9。在布朗之下，没有一个学校在和哈佛竞争100名学生时能保住两位数的学生。

这样把名校的竞争像球赛一样记比分，究竟是一种媒体娱乐还是有什么实际意义？看来两者皆有。《纽约时报》报道这项结果，就是因为这些比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久前哈佛大学废除了提前录取的制度，引起美国高等教育一片欢呼。舆论的压力导向了哈佛的几个对手：耶鲁、普林斯顿、布朗、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等等，要求他们也立即跟牌，废除提前录取制度。但这几个学校都拒绝说自己是否响应。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提前录取制度本身。这一制度开始于半个世纪以前。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一次可以申请许多学校，结果会被好几个学校录取。他们拿着多份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和各校讨价还价，最后选择一个条件最好的学校。大学为了稳定生源，发明了这种提前录取的制度，即学生秋天申请一个首选学校，12月知道结果。申请提前录取，一般被录取的机会会高两三倍；如果没有被提前录取，还可以走正常申请的程序，到第二年4月拿到录取结果。不过，大部分学校提前录取的一个条件是学生被录取后不能再去别的学校。这样，学校就提前锁定了自己想要的学生。

大学竞争激烈，提前录取的学生占新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有的学校甚至一半新生都是通过提前录取招来的。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学生就越来越要提前选定学校，拿着几份录取通知挑肥拣瘦的机会就少了，更不可能和各校为奖学金讨价还价。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制度不公平，可惜就是没有人出来废止。如今哈佛率先站出来，一个理由就是上面分析的比分。如果废除提前录取，哈佛将是最大的赢家。在各校无法提前锁定学生的前提下，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哈佛。这也是哈佛的几个竞争对手嘴上对哈佛的行动赞扬却缺乏实际行动的原因。

当然，学生的偏好并不是大学吸引学生的唯一因素。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资料就知道，以录取率算，哈佛为9%，即100个人申请仅有9个被录取，是最难进的。耶鲁为10%，排第二，下面依次为普林斯顿（11%），斯坦福（12%），哥伦比亚（13%），MIT（14%），布朗（15%）。为什么大家的名次和上述的PK比分所决定的名次比有所变化？因为学校还有其他杠杆。比如，大学的财政实力要看其“捐助基金”（endowment）。哈佛的捐助基金总量虽然排第一，但普林斯顿在人均捐助基金的指标上是最高的。也正是仗着自己有钱，普林斯顿率先取消了贷款，代之以奖学金，使需要资助的学生享受免费教育。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等竞争对手经过迟疑后不得不跟牌。看来大家有什么优势打什么牌。这次哈佛仗着自己人气，率先宣布取消提前录取，哈佛校刊欢呼这是取消了“提前的不公平”。其他几个学校还在迟疑，觉得一旦此制取消，哈佛的便宜太大了。不过，舆论的压力可能逼得他们不得不行动。像普林斯顿这样财大气粗的学校，也许最终会认识到，真取消了提前录取，各校更要对拿着几份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展开奖学金竞价，自己在这样的游戏中未必输给哈佛。所以，我相信最终还是会有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跟牌的。



## 常青藤能扩招多少？

2007年底，美国的教育之都波士顿有两则新闻。一则已经轰动全国甚至世界：从明年起，哈佛将要求家庭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学生，以家庭年收入的1/10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和其他杂费）。当然，年收入在12万以下的家庭，支付比例更低；而年收入在6万以下的，仍然按几年前的规矩，费用全免。另一个则是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消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Patrick向州议会要求20亿的款项，以维护全州29个公立大学的基础设施。

这两则新闻，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严重的两极分化。哈佛的这大手笔，一下子把读哈佛的费用降低到普通州立大学的水平，耗资2000万美元左右。但是，这对哈佛的财富而言，实在是九牛一毛。哈佛的“金库”——捐助基金——将近350亿美元之巨，在金融危机前，一年能在股市上升值23%，也就是将近70亿美元。而哈佛向学生收取的各种费用，总额不过15亿。即使哈佛对所有学生实行食宿和学费全免，其“金库”一年还净增50多亿。难怪有人指出，用不了多久，美国一流大学就可以对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学生全部免费。但是，哈佛所在的马萨诸塞州，29个公立大学基础设施大部分是30到50年前建成，年久失修。其中Salem州立学院甚至不得不关闭其图书馆，因为其建筑已经有35年的历史，因为得不到维修而成为危险建筑。这次州长提出的拨款，被称为“紧急法令”，不过也才区区20亿，不及哈佛一年捐助基金增值的1/3。

哈佛的慷慨，当然令人鼓舞。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大学生有2/3就读于州立大学。这些州立大学财政紧张，只能开源节流：涨学费、雇用临时教师、砍掉必要

的教学设施。结果，教育质量下降，费用却提高了。而马萨诸塞州偏偏又是精英的私立大学最集中的州：哈佛、MIT、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Amherst College，个个富得流油，有提供免费教育的实力。如果不改革，未来少数精英可以享受免费的一流教育；一般学生则只能接受昂贵的二三流教育。教育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已经提出这些势可敌国的大学和普通院校共享资源的方案。但让这些大学把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捐助基金白送给别人，恐怕会遇到激烈的抵抗。另一个措施，就是让这些一流大学扩招，扩大免费一流教育的受益人数，也增加这些大学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双赢”的方案，也遇到许多技术性的阻力。

精英大学扩招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最近40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3，申请哈佛的人数增加了3倍。但是哈佛新生人数也不过在40年前1550人的基础上增加了125人，还不到1/10。其他一流大学也都大同小异。结果，能上一流大学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小。以马萨诸塞州为例，10年前有58%的大学生上州立大学，如今这个比例变成了2/3。在一流私立大学最集中的州尚且如此，在其他州就更不用说了。

精英教育变得越来越精英，一流大学的录取率大致在10%多一点（哈佛竟在10%以下），乃至一流大学拒绝一些“令人惊异的优秀学生”（包括在学术能力测验SAT中获得满分的学生）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进常青藤成了范进中举式的荒唐竞争。另外，一流大学虽然挤破门、合格的学生进不去，却还需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校友子弟。因为校友捐款最多，不照顾他们的利益，就会影响未来的财源。这就等于创造了一个世袭的特权阶层，更是引起公愤。于是要求扩招的声音不绝于耳。从财政能力上看，这些一流大学的捐助基金平均每年增值20%上下，几年就翻一番，大幅度扩招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尽管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条件俱在，各一流大学的扩招计划都非常谨慎。普林斯顿仅4000多名本科生，从2005年开始扩招，预计到2012年，本科生人数将增加500人，达到5200人。斯坦福大学20年前有6571个本科生，如今增加到6759，20年增长不足200，目前正在研究进一步扩招的计划。在Amherst，教授们刚刚同意把学生人数从1600人增加到1700人。耶鲁目前有本科生5275人，目前已经成立了两个委员会，研究是否增加600名学生。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也都酝酿



着类似的扩招计划。

综观这些扩招计划，将学生人数在七八年内提高10%就已经算是非常大胆了。这些财大气粗的学校，要钱有钱，要生源有生源，究竟怕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教育质量。美国的一流大学，规模都相当小，哈佛现在拥有6715名本科生，已经属于过大的了，乃至有许多哈佛学生不满自己的哈佛经验，对学校的教育评估远低于同等的但规模小的学校。这些大学一旦扩招，有将近万人的本科生，就形同一个州立大学，没有小大学那种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师生关系也将疏远，对话式的讨论班也将被满堂灌的大课所取代。

欧洲的大学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热潮中扩招，大学严重超载，引起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美国的一流大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扩招压力，但慎之又慎，进而保证了质量。目前的扩招计划，不仅都和增加教授人数并行，而且也都为增加出来的学生新建寄宿学院。以耶鲁为例，5000多名学生分散在12个寄宿学院中，一个学院4000人上下。计划扩招600学生，则将新建两所寄宿学院。这样，就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小共同体，有一种小村子里乡里乡亲的感觉。这是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要素。

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一个是一流的。大学城的兴建、大学的合并升级，恰恰毁掉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潜力，乃至出现在一些“大学城”中教授下了课就急着赶班车的现象，和美国一流大学师生在寄宿学院中同住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说大学不能“大”，要点也就在这里。

## 新常青藤的崛起

8月是美国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开始准备申请大学的季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那个著名的大学排行榜，也在此时出笼。但是，今年另两家杂志先发制人，抢先一个星期发表了自己对大学的评估。其中，《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赫然写道：“谁需要哈佛？”副标题是：“忘了常青藤盟校……”该刊声称美国州立大学里的荣誉课程有几百家能够提供常青藤质量的高等教育，更不用说那些久负盛誉的袖珍型本科生学院了。《新闻周刊》则公布了25家“新常青藤”的名单，提醒高中生们择校时不要总盯着传统名校，而要把眼界放宽些。

这两家最有影响的主流新闻刊物一起伏击美国的头号大学排行榜，自然有媒体商业竞争的考虑。但它们如此异口同声地绕开常青藤，抬举一些不甚知名的学校，说明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趋向：第一，进入哈佛、耶鲁这样的顶尖名校越来越难；第二，几个顶尖名校已经无法垄断美国的精英教育。

美国大学的申请战，一年比一年激烈。尽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有逐渐扩招的计划，进这些学校的门槛还是越来越高。原因是合格的优秀学生实在太多了。用哈佛录取部主任Bill Fitzsimmons的话说，在他20世纪60年代就读哈佛时，全国3/4的人口和精英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如今，上大学的学生比20世纪60年代多了62%。顶尖的大学主动到一些低收入的地区和农村招兵买马，许诺优厚的奖学金。比如哈佛2009届（2005年入学）的学生中，来自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美国平均水平在5万左右）的比2008届多了22%。学生来自多种社会阶层已经成了每个名校都不得不考虑的品牌问题。结果，进名校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仿佛是进上流



社会俱乐部的小圈子里的游戏，而是全社会的竞争，其激烈状况到了残酷的程度。美国的高中每年毕业典礼都要选出一位最优秀的学生代表致辞。这位“致辞人”标志着一个高中的最高水平。但是，普林斯顿录取时竟拒绝了4/5这样的“致辞人”申请者。一个来自培养了四位哈佛校长的波士顿拉丁学校、并已经被哈佛录取的女孩告诉我：她12岁开始就晚上12点以后才能睡觉，早晨7点起床，而且她的同学大致都是这样。

不过，对身处如此惨烈竞争中的考生们来说，一个好消息是能够提供精英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多。过去一谈精英教育，不过就是八所常青藤盟校，外加斯坦福、芝加哥、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以及Williams, Amherst, Swarthmore, Wellesley等几个贵族式的本科生学院。如今，达到这样的水平的学校已经数不过来，甚至许多还不太为人所知。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几个原因。首先，申请大学的人多了，优秀的学生也多，能达到过去哈佛耶鲁几个名校要求的学生，绝不是十几个一流大学能容得下的。优质的生源有保障，就能刺激更多大学提高水准。第二，从1968到1998这30年间，美国的大学培养的博士数量增加了一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3年一年就生产了767个博士，造成大学教授过剩，乃至非常优异的学者也可能找不到工作。结果，一些不起眼的大学也能够雇到水平极高的学者。第三，美国大学的制度多元，有私立州立，还有几个国立的军校。大的学校，如Miami Dade College和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生人数达5万以上；小的学校则仅200来个学生，其中最小的The Thomas Mo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只有68名学生。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无一定之规。比如，西方文明这样的课程在一些研究性大学正在受到文化多元论的挑战，但在St. John's College，学生学习的唯一内容就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西方名著。有的学校，如Hampshire College，取消了学生的分数，给每个学生写详细的书面评价。这样五花八门，大家就各有优势，可以互相竞争，取长补短，不是哈佛、耶鲁几个名校可以一手遮天的。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后，冷战的科技竞争使大型的研究性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小型本科生学院乘虚而入，巩固了自己在教学方面的优势。

关于这后一点，我在近著《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中有比较详尽的介绍。以哈佛而言，虽然其财力和研究水平是世界顶尖的，但学生的满意度几乎是同等学校中最低的。究其原因，就是教授太过专心于研究，忽视了教学。加上学校太大，学生和教授的距离就很远。一个明星教授的课有几百人听，教授根本不

认识学生。学生打交道的是那些当助教的研究生。而一些袖珍的本科生学院，没有博士课程，没有大研究中心，集中资源搞教学；全校学生两三千，班级非常小，学生和教授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大家一起做项目、写论文。毕竟大学生还是20岁上下的孩子，需要监督，更需要指导。在小学校，一个学生的表现、长短，许多教授都了如指掌；在大学校，学生则很难让教授记住自己的名字。

另外，一些州立大学，也不甘心让几个常青藤把风头都出了。这些学校本来是服务于一般的学生的。它们没有私立研究性大学的赫赫声誉，又因为规模过大（最大的大学基本都是州立学校），缺乏袖珍型本科生学院那种面对面的个人化教育的优势。州立大学便宜但平庸，似乎已经成了世俗成见。作为回应，这些大学纷纷建立自己的“荣誉课程”。所谓荣誉课程，就是用高额奖学金把一些顶尖的学生从名校手中抢过来，然后集中给这些学生开设高水平课程，甚至还提供特殊的宿舍和指导教授，几乎成为校中之校。一个高品质的学生，可以在庞大的州立大学享受小型本科生学院的精英式教育。比如这次被《新闻周刊》列入“新常青藤”的密西根大学，在其College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Arts中设立“荣誉课程”，每年招收1700—1800个学生，班级规模甚小。这就在这所拥有25000多名本科生、近15000名研究生的大型州立大学中，创造了一个小的精英学术社区。一些被常青藤录取的学生，最后为了奖学金跑到并不太有名的学校就读。而他们的存在，也有助于提高州立大学中普通学生的水平。甚至我执教的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本来是波士顿市中心的一所小私立大学，最近也参与了这样的竞争。上个学期我教两堂课，头两周就看出两个学生不同寻常；于是把他们个别叫到教室外面询问，发现一个是康州两届高中辩论的冠军，一个则被斯坦福录取。两人都因为我们的学校奖学金多而前来就读。

当然，像哈佛、耶鲁这种老牌的常青藤，还是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这样响当当的牌子，仍然是学生毕业后的晋身之阶。特别是在学校里培养的人脉、毕业后校友的提携，对日后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有两大新趋势减轻了人们对常青藤的依赖。第一，在大学普及后，研究生教育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必需。学生在设计自己的教育战略时，常常以硕士学位为终点。他们本科读个师生关系密切的小学校，等自己成熟了，再到大牌的研究性大学读研究生，到大世界里闯荡。这样不仅在比较幼稚的时期获得扎实的基础教育，避免了在研究性大学中受忽视，最终还是会在研究性大学获得个响亮的牌子，并且读研究生更能从这样的大学的



“研究性”中真正受益。第二，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许多传统行业消失了，许多新行业过去不存在。名牌大学在传统行业中的人脉，就显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学生们对大学有了一个更实际的态度。比起名牌来，他们更关心的是哪个大学更花心思在我的教育上，哪个大学能使我毕业后不背上一身学债。

美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精英的平民化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立学校出身的犹太学生，靠自己的考试成绩，渐渐突破了那些从贵族寄宿学校出身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对常青藤的垄断。“犹太问题”一度成为高等教育界保守派的心病。二战后，“退伍军人法案”又使一代来自普通家庭的退伍兵免费拥入这些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名校，破坏了那里优雅的口吻；但他们在现实社会的经验，却使他们成长为一代优异的学生。冷战期间的科技竞争，更使美国的大学强调分数，强调学术表现，淡化家族传统，平民精英开始占据一流大学。如今，随着高校扩招、奖学金的增多、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达到了常青藤的要求，并有了进这些学校的能力。这种常青藤挤破门的境况，就终于使常青藤教育突破了常青藤本身，刺激了新一代名校的产生。

《经济学人》在概览全球大学时指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其没有体系，保证了大学中的“物种多元”。这种“物种多元”，使大学作为群体更能够应付时代的挑战，保持长期的优势，不仅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会因为一种类型的大学不适应某个时代的生存环境而丧失竞争力，而且还会使精英教育越来越普及，使下一代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 附录：《新闻周刊》刊登的25所“新常青藤”名单

Boston College

Bowdoin Colleg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laremont Colleges: Harvey Mudd and Pomona

Colby College

Colgate University

Davidson College

Emory University  
Kenyon College  
Macaleste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ew Yor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Reed College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Skidmore College  
Tuft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Vanderbil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常青藤盟校 (Ivy league) 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这八所学校一直是美国排名最顶尖的大学，拥有世界高等教育界最雄厚的财力、师资，吸引着最优秀的学生。除了康奈尔大学外，另外七所都是殖民地时代建立的私立学校，并且都坐落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常青藤盟校”，本是这些学校体育联赛的名称，后来演化为精英大学的集团称呼。这八所学校在规模上大于袖珍型本科生学院，但小于一般的州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优异的象征。在MIT、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相继崛起后，其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同时，Williams, Amherst, Swarthmore, Wellesley等几个小型本科生学院，在教育质量上也能与之分庭抗礼。最近几十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在排名上和常青藤并驾齐驱。如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等等，频频在排名上超过一些常青藤盟校。



## 美国州立大学的常青藤化

美国的大学，素来是公立私立并行。公立的使命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私立的则是培养精英。因此，精英在高等教育上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哈佛、耶鲁等几个常青藤盟校。后来竞争扩大，出现了所谓的“新常青藤”，主要也是像波士顿学院、塔夫脱大学这类私立学校。公立大学，即所谓州立大学，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极少数外，基本上置身事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州立大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体制和使命。1862年和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Morrill法案，给各州大量土地，用以建设高等教育机构，并以服务本州为基本使命。具体而言，其开始时的目标是进行农业和机械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美国州立大学的主要传统，也是由此而来。

因为拿着纳税人的钱办学，州立大学的经营和私立就非常不同。这首先体现在服务本州上。州立大学的学生，普遍是来自本州。即使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已经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名校，最近还被列入“新常青藤”，属于前五大公立大学，可是，该校2006年来自外州的学生仅占学生总人数的20%，五年前则才占18%。这种有全国品牌的学校尚且如此，一般州立大学的外州学生比例就更少了。从学生一方说，如果上州立大学，在本州上是最合算的。2006年在本州上州立大学的学费，平均为5836美元，但到外州上州立大学，平均学费就会上涨将近三倍，达到15783美元。其原因之一是本州大学是由本州纳税人资助的，本州居民当然要享受这个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顶尖的州立大学，除了三四所最好的以外，说到底还是地方

学校，不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人才，而且彼此之间因为学费的壁垒也很难竞争。就算你们州的学校比邻州略高一筹，人家也不可能掏三倍的钱来读书。一般而言，一个学生在高中成绩中等，到州立大学读书几乎就成了其与生俱来的权利。

最近十来年的大学竞争，则正在打破这种私立与公立的分野。首先，大学生激增，入学竞争白热化。2004至2005年度，美国高中毕业生从十年前的250万增长到300万。再加上那些25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纷纷半途到大学读书，造成大学爆满。在大学注册的学生，从1994年到2004年增长了21%，达到1730万。预计到2014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950万。特别是中高产阶级子弟，拼命往名校里钻，不用说常青藤挤不进去，就是“新常青藤”也常常进不去，州立学校就成了这些人的重要选择。

第二，大学费用日益上涨。私立学校的学费，平均已经超过三万美元，即使比起去外州读州立大学的学费，也高出差不多一倍，比在本州读州立大学的学费高出三倍半到四倍。许多家长在财政的压力下，更愿意考虑州立大学。

第三，一些州立大学本身，早已经不安于地头蛇的地位，要把自己打造成全国名校。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都是由州立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典范。其他的州立大学为什么不能效仿呢？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就提出成为十大名校之一的目标。其理由是，一流大学基本都集中在东北部和西部等几个地方。佛罗里达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州，岂能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真若达到前十名的地位，就能争取到大量的研究经费，吸引大量外州和国际的学生来读书，把当地转化为一个南部的硅谷，刺激本州经济的跃进。所以，州政府对此非常支持。

美国州立大学的布局因州而异，但大多是连锁性质，一个州立系统有许多分立的校园，散布在全州各地，并有一个实力最强的“旗舰”校园。以大家熟悉的加州而论：加州大学有许多校园，其中最突出的学校，还是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加州规模超大，如同国家。在其他的州，“旗舰”一般只有一个。比如麻省，私立名校林立，州立大学成了丑小鸭。不过，在麻省大学系列中，设在Amherst的校园有相当的质量，其他如设在波士顿的校园，基本还属于走读性质的大学，当然无法和常青藤竞争了。所以，现在要与私立大学竞争的州立大学，基本都是各州立大学系统中的“旗舰”。

这些旗舰州立大学的实力，本来就与许多一流的私立大学非常接近。要想超



过人家，就要采用一些具有攻击性的战略。其中之一，就是挖优秀的学生，设置“优异奖学金”（merit aid）。所谓“优异奖学金”，是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经济背景来颁发的。美国在2003至2004年度，发放了73亿美元的优异奖学金，占给学生资助总额的16%。许多私立的名校，如哈佛、斯坦福，都不设优异奖学金。理由是：接受这种精英教育，经济背景不应该成为障碍。凡是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家庭，学校提供奖学金。也就是说，所有奖学金都是根据学生的经济背景而颁发的需求奖学金。至于“优异”，能被这些大学录取的学生都非常优异，根本不需要什么优异奖学金。

这一制度，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在人才竞争时，则给常青藤等名校制造了一大破绽。试想，如果你学业优异，家庭年收入为5万美元，属于穷人，你可以免费到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读书，再好的州立大学也不用去。但是，如果你家庭年收入为12万，一张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你父母一年花4万多美元供你读书。这相当于家庭税后收入的一半。四年下来，费用可能接近20万。这时，如果有一个质量相当好也很有名气的州立大学，给你一个“优异奖学金”，省了家里将近20万的大学教育费用，你还那么想去哈佛吗？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家庭年收入5万以下而能考进常青藤的学生实际非常少。因为这样的家庭，大部分住在教育破败的坏学区，家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孩子要不是智力超常，很难和中高阶层的孩子竞争。相反，家庭收入12万的家庭，一般能住在非常好的学区，家长也大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给孩子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真论成绩，这一阶层能为常青藤输送的学生最多，但也最容易被常青藤的费用所吓住。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大多会咬咬牙，宁愿花4万（包括生活费用）送孩子去常青藤，也不愿意花一半多或1/3的钱让孩子到一个哪怕声誉不错的州立大学读书。但是，一旦州立大学通过优异奖学金免去了这笔教育费用，天平一下子就会向州立大学倾斜。

这着棋后，还跟着有另一着棋。这些旗舰州立大学知道，常青藤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有一个精英的小环境。校园被分为几个寄宿学院，师生的比例高，彼此交往密切，教授对孩子能够“耳提面命”。另外，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程度整齐，课堂教学的水平不必考虑后进生的需要，非常具有挑战性。州立大学即使是旗舰，规模一般也大得多，教授和学生之间缺乏个人的交流。特别是学生程度不齐，教

授讲课至少要照顾中间水准，弄得优异学生昏昏欲睡，浪费青春。这种局面不改变，你就是有优异奖学金，优异的学生也不来。针对这一状况，旗舰大学纷纷设立荣誉课程，把优异的学生集中训练，有特别的教授、特别的标准。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课程，有单独的新生讨论班，课程中的学生选课有优先权，学校还将花8000万美元，专门为荣誉课程建一个校园。这样，荣誉课程几乎成了校中之校，州立大学内部的小常青藤。

当然，旗舰们更不忘招兵买马，扩充和提高教师队伍。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J. Bernard Machen一针见血地说：“我们要成为前十名的大学。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接受哈佛、耶鲁水平的教育。可是，密西根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比15，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比14，我们的师生比例是1比21到22。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说服家长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得到的教育和在密西根、北卡得到的一样好？”所以，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最近要新雇200名教授。

这一切努力都有了巨大的成效。根据《华尔街日报》2006年11月的报道，旗舰州立大学学生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录取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越来越难进）。佛罗里达大学学生的课堂平均成绩从十年前的3.45提高到3.99（一般满分是4），录取率从五年前的54%下降到了44%。2005年，该校接受了230名“优异学者”（merit scholar），比哈佛、耶鲁之外的任何常青藤盟校都多。要知道，许多常青藤不提供优异奖学金，优异学者到这些学校，多是拿了校外的优异奖学金。佛罗里达大学自己提供大量优异奖学金，所以在人才争夺战中能把许多常青藤击败。再如默默无闻的特拉华大学，录取率从十年前的2/3跌到了不到50%。华盛顿大学追求学术优异的结果，使该校获得的国家健康协会基金的数量，仅次于哈佛。这些州立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精英。

这一动向，甚至惊动了华尔街。来自Goldman Sachs的主管校园招募人才的负责人Janet Raiffa说：“现在有许多顶尖学生放弃常青藤而到州立大学读书，而投资银行一直习惯瞄准顶尖的私立大学录用人才。现在我们必须改进。”她新的目标就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得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等。学生到这些旗舰州立大学读书不仅价格优惠、质量良好，而且就业前景也在看涨。

不过，这些成就的代价也非常巨大，乃至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要争夺优秀学生，从1995到2003年，这些旗舰州立学校和一流的研究性



大学给出身于年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上涨了4倍，给最穷一阶层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则有所下降。同时，公立大学学费提高的幅度超出了私立大学。一些州立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跌到50%以下。结果，那些家境困难、教育上准备不充分的学生，就无法像过去那样想当然地从高中升入本州的大学。全球化的竞争要求一流的高等教育。但是，追求优异，又直接挑战着教育公平。

## 经济危机和常青藤的分数

最近20年，美国大学普遍出现了分数膨胀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好的大学，因为进来的门槛高、竞争激烈，学生素质出色、学习用功，自然考试成绩好。差一些的大学，则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如果低分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人家就跑到别的地方去读书了。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一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拿了A，就很难彼此分出高下。这样一来，成绩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治理分数膨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可是真正敢动手干的，还是一些得罪得起学生的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就是一例。2004年，普林斯顿本科生的成绩中，有将近一半是A。其实细想一下，这并非不合理。即使是那些在“美国的高考”SAT中拿了满分的学生申请普林斯顿，也有一半都会被拒掉。能进这个门的，都是考试精英，拿满分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在普林斯顿居然有一半的成绩不是A，只能说明普林斯顿的考试有多厉害。有些常青藤教授就公开声称根本没有什么分数膨胀。现在打分标准并不比半个世纪前松。所不同的是，半个世纪前富家子弟不用怎么竞争就可以进来，现在要进来则必须在学业上是精英的精英。学生不一样了，常青藤也不一样了。没有人再敢说常青藤的学生是愚蠢的富家子弟。

但是，即使是尖子，彼此之间也要分出高下。看看世界体操比赛的打分制度不就是早改了吗？其结果不是比动不动前三名全是10分要好吗？就在2004年，普林斯顿开始施行更严格的打分制度。到2009年时，A在所有成绩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了40%。2009年毕业班学生的平均成绩（4为满分），从2003年毕业班3.46的水平降到了3.39。



这0.07分之差虽然微小，但已经在学生中引起颇为激烈的反应。有位学生说：我们出去找工作，拿着3.5的平均成绩和拿着3.8分的耶鲁学生竞争，怎么可能不输？曾有一个调查表明，有32%的学生把新的打分标准视为他们不幸福的头号原因，另有25%把睡眠不足视为不幸福的头号原因。可见，新的分数政策已经成了学生的公敌。学生会还给教授写信，质问教授们是否在执行新政时矫枉过正了。学生报纸也发表社论，谴责新的分数政策。

新的分数政策是否伤害了学生的利益？普林斯顿立即研究了顶尖医学院和法学院录取的情况，说明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并没有因为低分受到任何伤害。但是，华尔街的情况则有些不妙。普林斯顿一般每年有1100个毕业生。2004年有194个毕业生直接拿到金融和咨询业中的肥缺。这个数字到2008年上升到249，2009年则猛跌到169。这难道不是新的分数政策在捣乱？

其实，这一急剧下跌和分数并无直接关系。2009年赶上金融危机，华尔街首当其冲，银行大量裁员。一些分析家指出，这次房地产泡沫中最大的一个泡沫就是金融泡沫。金融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度达到8%，正常的比例应该是6%。1100个普林斯顿毕业生中有249个（也就是将近1/4）去了金融和咨询业，是否太过分呢？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分析，经过这些危机，华尔街的一些泡沫性工作，将和制造业、建筑业中的许多工作一样一去不复返。即使再回到高分时代，普林斯顿毕业生也别指望像过去那样蜂拥而至华尔街。

普林斯顿本科学院院长Nancy Weiss Malkiel表示，本科生课程的成绩，A不应超过35%。言下之意，现在40%的水平还达不到她的要求。她的办公室已经给各大研究院的录取部和主要用人单位发了3000多封信，解释普林斯顿的新分数政策和学生平均成绩下降的原因，并获得了良好的回应。高盛公司的高管公开表示，该公司完全理解普林斯顿分数的“含金量”，会对普林斯顿的成绩单另眼相看。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录取部的负责人也出来说，该校对来自普林斯顿的申请会一如既往地重视。不过，教育界人士指出，普林斯顿的新政本应带来示范效应。但是，在经济危机之中，敢效仿的学校几乎没有，普林斯顿只能是个例外了。对此，Nancy Weiss Malkiel不为所动。她说：“如果这种例外意味着我们站在领袖的位置（也就是说比较孤独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就准备迎接这种挑战。我们相信我们是正确的。”

## 谁把亚裔子弟挤出名校

美国的亚裔学生学业优异，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在申请大学时受到歧视，也是公开的秘密：作为亚裔，你的分数即使比别人高一点，也会被人家挤掉。过去，许多亚裔觉得黑人、拉美裔靠种族平权的优惠，挤掉了自己的位置。加州大学系统取消种族平权政策之后，亚裔学生大增，黑人拉美裔大减，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在一流名校，黑人和拉美裔学生比例非常少。亚裔进不来，主要不能怪人家。真正挤掉亚裔位置的，还是美国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分数比亚裔低一头，但差距不是太大。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有个好爸爸，几百万几百万地给学校捐款。结果，学校对公子哥儿们网开一面。这些人多了，其他人就得少。黑人、低收入阶层本来在学校代表性就不足，削减他们的数量会引起公共关系危机，没人敢动。最后，许多中产阶级的亚裔就成了主要的牺牲对象。

Daniel Golden出版了《录取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炮轰美国各名校为了拉来捐款而降低富家子弟的录取要求，等于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容忍行贿受贿。他身为《华尔街日报》记者，因为撰写了一系列教育问题的优异报道，于2004年获普利策奖。他批评名校不遗余力，指名道姓，得罪了不少人，自己虽然是哈佛出身，却不敢把孩子往名校送，而是转道去加拿大读书。这也难怪，他的新书一出，全美震动。《华尔街日报》将书浓缩成一篇报道刊登在头版，各媒体也纷纷发表书评。一时间，美国大学录取的公平性又一次陷入信誉危机。

Golden的结论很简单：美国的精英大学中，每年录取的新生中有大约25%的位置是特别给财主们准备的保留席，使他们的子弟能够以比别人低得多的标准挤进



来。伯克利的教授Jerome Karabel则通过自己的研究，估计这个比例应该是10%—15%，仍然是个很高的比例。另外，美国的精英大学中，有60%的位置，是给那些有特殊关系的人的。这种关系包括富人、校友，或一些体育明星。哈佛的录取率是11%（如今已经跌到9%），但那些有legacy的申请者们，录取率是40%。另一精英名校Amherst录取50%的legacy学生。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21%—24%的学生是校友子弟。大学教授们也不含糊，他们可以免费送孩子到本校上学（这一直是大学职工的正常福利）。2003年，波士顿大学录取了91%的本校子弟的申请者，花费900万美元。圣母大学则接受了70%，虽然其正常录取率仅19%。总之，各种关系，把60%的位置占走。从这些位置上被赶走的，是中产阶级新移民特别是亚裔子弟。他们只能争夺剩下的40%的残羹剩饭。

在Golden看来，亚裔就是当年的犹太人，其优异的学术表现，反而使之成为大学录取部门打压的对象。几年前他曾调查美国最著名的寄宿高中Groton毕业班的情况。Groton是培养像罗斯福总统这样的统治者的训练营地。在1998年的毕业班中，79位毕业生有34位上了常青藤。但就是在这个班中，排名第14的韩国裔孩子Henry Park申请了哈佛、耶鲁、布朗、哥伦比亚、斯坦福、麻省理工，结果全被拒绝。他的SAT的分数，高达1560，离1600的满分仅差40分，明显高出这几个学校的学生的平均分。与此同时，同班一个黑人女生Lakia Washington，靠奖学金上了Groton，排名仅第60，SAT仅1110，几乎是普通高中生的水平，但进了哥伦比亚。另一个同班同学John Roberts，排名第10，SAT为1530，和Henry Park不相上下，但因为家里从爷爷那辈就上哈佛，申请时家里安排他见了包括哈佛录取部主任在内的许多哈佛显要人士，结果轻松进了哈佛。哈佛那年从Groton录取了十几个学生。其中五位是校友子弟。还有一位SAT仅考了1240分，但父亲给哈佛两次捐了600万美元，也从容进去了。另一位在班上排名第40，SAT仅1220，比Henry Park低340分，但因为是得州石油大亨Robert Bass的孩子，靠父亲给斯坦福捐了2500万美元而被斯坦福录取。可怜的Henry Park，父母是韩国移民，靠开店为生，没有关系，没有捐款能力，省吃俭用供他上了Groton这样的贵族学校，他自己也表现优异，却与常青藤无缘。其实，在他申请时，Groton的大学申请咨询专家就警告他上不了这些名校。因为亚裔平均要比别的种族考试高50分后才能和人家站到一个起跑线上。哈佛长期把亚裔的个人品格评估在白人之下。而所谓“品格”，根据Jerome

Karabel，就是上个世纪初常青藤发明出来打压学业优异的犹太学生的录取标准。

受Daniel Golden审视最细致的，大概莫过于杜克和布朗大学。杜克虽然不属于常青藤，但有“南方哈佛”之誉，如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上升到第8位，高于哥伦比亚、达特茅斯、康奈尔、布朗等常青藤名校。布朗则一直是常青藤中比较弱的学校。这两个学校在过去20年都采取了所谓“发展战略”，拒绝一些没有背景的优异学生，重点录取富家子弟。哪怕没有捐款，录取知名人士的孩子也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提高学校的声誉。

杜克如今可谓战果累累。众所周知，一个学校的“捐助基金”是其实力的基础。1980年，杜克的捐助基金为1350万美元，在全美大学中排名第25；到了2005年，其捐助基金已经膨胀到了38亿美元，排名上升到了第16。这一成功，可以追溯到前校长Sanford（1917—1998）的政策。他本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1970年接掌杜克校长时就迅速发现，杜克的校友太年轻，尚无经济能力大力捐助母校。于是他提出：“我们需要一些一流的葬礼！”也就是说，打上了年纪的有钱人的主意。在20世纪70年代，杜克的学生主要还是公立学校出身的中产阶级子弟。Sanford则督促部下到一些贵族寄宿学校招兵买马，特别瞄准那些传统上和耶鲁有关系的家庭。于是，Mars棒棒糖家族、制造管道设备的Kohlers家族、以口香糖著称的Wrigleys家族，以及得州石油大亨、耶鲁毕业的Robert Bass，纷纷送孩子进杜克。Robert Bass的妻子在2003年甚至还进了杜克的董事会。消息在富家子弟中一下子传开。一些本以为自己不够格的，也纷纷申请。甚至和杜克毫无关系的大亨，也可以把孩子带到学校，由学校高官赴机场迎接，直接送到校长的官邸下榻。学校录取部主任甚至还亲自跑到著名电影导演Steven Spielberg家面试他的继女。

布朗的成绩也同样不俗，这包括把两位总统的孩子、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孩子、两位Beatles的孩子，和七位奥斯卡奖得主的孩子招进学校；其捐助基金在1980年是1230万美元，在全美大学中排名第29，到2005年上升到了16亿美元，排名第26。1969年，布朗宣布取消其本科生选课中跨学科的要求。这一新课程，使一些学生可以不修数学或科学的科目就毕业。这一下子就吸引了许多好莱坞明星的子弟。这样的孩子在申请前由父母雇个家庭教师恶补数学，使成绩勉强看得过去，然后父母再捐一大笔款，随即进学校学个艺术史之类的专业，不仅不碰数学，画画拉琴不会也没有关系。布朗最大的一个成功，大概莫过于1979年肯尼迪总统



之子小约翰·肯尼迪的入学。他本来应该跟随家族传统进哈佛。但是，他为了摆脱家族的阴影而选择了布朗。这一下使布朗成为媒体的热点。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女儿Alexandra Kerry，也是布朗出身。

1989年，布朗任命了新校长Vertan Gregorian。此公清醒地认识到，布朗的捐助基金仅为哈佛的1/10。于是他马上盯上Groton的几个大亨的子弟。他的得力助手是David Zucconi。Zucconi把包括著名影星简·方达的女儿在内的许多富家子弟塞进布朗。在布朗的录取部，有一个让录取官员憎恨的“Zucconi的名单”。这个名单上的许多人，根本不够格进来。但是Zucconi秉承圣旨，大家只好照办。等Zucconi死后，在他的葬礼上，许多富人跑到他弟弟跟前感激地说：“没有你哥哥，我们的孩子肯定进不了布朗。”

杜克和布朗，在美国名校中绝不是异数。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把儿子塞进了哈佛，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Bill Frist把孩子弄进了普林斯顿。这些子弟大多成绩平平，甚至酗酒吸毒，进学校并不用心读书，而是参加各种特权阶层的俱乐部，建立人际网络，成为日后发达的资源。另外，许多大学通过给一些贵族体育运动加分来提高大亨子弟的入学率。从1992到2002年，在全美范围内，女子划船运动员入学人数从1555增加到了6690，马术运动员的入学人数从1998年的633增加到了2002年的1175。另外还有击剑、壁球、高尔夫等等。这些完全是贵族运动，平民子弟很难染指。所以，这样的运动等于是上流社会进名校的又一个后门。

不过，也并非没有例外。加州理工学院，坚持按分数录取，不理睬富家子弟。可惜，这样的副作用是黑人学生的比例大降。2004年，207个加州理工的学生中才有一个黑人；而黑人学生在MIT、斯坦福和哈佛的比例分别是：6%，10%，8%。

如今，美国精英大学中来自收入在人口中最低的1/5的阶层的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3%；而来自最富的1/5家庭的学生则占了74%。剩下的23%的位置，是占人口3/5的中产阶级的位置。另有统计表明，从1980到1992年，弱势阶层在四年制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从29%降到28%，而富家子弟的比例从55%激增到66%，挤压的还是中产阶级子弟。显然，中产阶级的亚裔进大学，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富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的4%，但在精英大学中占学生总数的15%，不管怎么压，还是要出头。波士顿拉丁学校是美国最古老最优秀的公立学校，培养了四位哈佛校长，每年送十几位毕业生进哈佛。2005和2006年全校第一（即毕业致辞人）的都是中

国孩子。2004的情况我查不到记录，但不久前到一个华人家庭看朋友，发现他们的女儿，竟是波士顿拉丁学校2003年的第一！由于亚裔孩子表现如此突出，仅仅是一般的优秀已经不够，人家还是会把你放在族群中看待。

《经济学人》尖锐地批评说，照顾富人的录取政策，已经使美国变得像当年强调社会等级的大英帝国。如今牛津、剑桥早已取消了对校友子弟的照顾，美国还在维持这种没有贵族之名的贵族制度，实在是对其人人平等的立国理念的讽刺。这也难怪，包括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许多从这种特权中受益的政治家，已经开始呼吁取消这样的制度。不过，美国私立大学的体制，目前还是最有竞争力的教育体制之一。大亨捐上几百万上千万，送一两个孩子上学，可以给学校提供更多的资源，使之更有能力给一些穷人奖学金。更重要的是，常青藤如今已经无法一手遮天。现在美国前500大企业的CEO，仅1/10是常青藤出身。以后这个比例可能更小。可见，常青藤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牌子而已，一部分位置要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亚裔上进之路仍然很宽，未来一代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也绝非现在的亚裔可比。



## 对耶鲁校长行使一下“批判性思维”

2010年临近春节，好像是要给中国人贺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出访伦敦时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力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称按照目前的投资力度，中国的名牌大学在25年内将可以赶上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和英国剑桥、牛津等世界著名学府。莱文同时建议，中国学府应加强培养“批判性思维”。

作为耶鲁校友，我对自己的校长如此无知的言论感到汗颜。同时，也为了不辜负母校多年的栽培，不妨就莱文校长的话行使一下“批判性思维”。

莱文校长在此时此刻对中国的大学大表艳羡，不仅反映了美国大学既得利益集团的寻租心态（即拿中国大学的例证向美国纳税人要钱），而且也显示了自由派知识精英对大政府的幻想。在美国，赶上如今这样的经济危机，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自己的金库（捐助基金）缩水近三分之一。但是，联邦政府对此放手不管，也不可能给这些学校直接的财政拨款。中国则不同。中国政府近年来下拨给大学的资金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2006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几乎是前10年的3倍。北大清华从中央政府得到的大笔拨款，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莱文看了分外眼热，马上说：由于中印等亚洲新兴国家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预估25年内，亚洲地区的大学将能与美国“常春藤”名校以及英国剑桥、牛津等知名学府并驾齐驱。

莱文校长说来说去，无非是中国政府肯往大学投资。在他的论证中，这是中国顶尖大学能在20多年内达到世界一流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不妨问莱文校长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已经展开了10多年。政府的投

资也是逐年上升。效果在哪里？如今200万大学生失业。大学从校长到研究生，学术造假丑闻不断。买卖论文在2009年为GDP贡献了10个亿。甚至最近出现抄袭一下教材的介绍性文字就能拿到一流学术杂志当原创论文发表的奇事。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大学普遍负债，根本不可能偿还。由此如何看出中国能够产生一系列世界一流大学？第二，莱文校长是“常春藤”之领袖，不妨自己给中国人总结一下经验。“常春藤”特别是耶鲁成为世界名校，是美国联邦政府投资的结果吗？

事实上，哈佛耶鲁之所以成为哈佛耶鲁，并非美国总统在白宫里发号施令，说要给某某大学几个亿，保证其成为世界一流。人家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外自己拼出来的。与此相对，计划经济的关键就在于“计划”二字。一切都要政府指定，政府投资。比如，政府要让北大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笔钱就砸过去，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看看世界大学史，有几家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成功的？

十年以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滚滚而来。清华校长王大中院士面对首都几十家新闻媒体豪迈宣布：“清华大学一直把建设具有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争取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定在了2011年。”我是当年最早站出来反对这一运动的人士之一，并为此出版了《谁的大学》一书，明确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体制到现状都和中国足球非常一致。如今清华除了从普林斯顿请回一位施一公教授外，一流的影子也找不到。当年的目标成了今天的笑谈。即使是施一公教授，在清华待上五六年是否还能是当年普林斯顿的那位施一公教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十年前闹腾了一通，事实证明是劳民伤财，失败的教训还没有好好总结。如今，这一运动的第二波又要掀起。先是施一公教授要求温家宝总理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再是莱文校长推波助澜。中国高等教育界自然会有人跟着呼风唤雨，以“学习美国先进经验”为名义向政府要钱。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如果这样的运动再来一次，中国的大学就会再一次扩张。

其实，美国的经验并非不可借鉴。最近几年，由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Bowen领衔的研究团队对美国大学进行的大规模的综合评估，已经产生权威性成果，并有两本著作出版。其结论和其他学者的结论几乎不谋而合：美国大学优异的最关键因素，不是对名校的投资，而是义务教育的普及与成功使民智大增，使大学生源



充足，选才有充分的余地。但是，如今中国的大学，则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空校危机”：2009年高考考生千万出头，录取600多万，录取率已经超过60%。同时，考生数量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现明显下降，有些省份下降了10%以上。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考生数量在未来十年下降百分之二三十绝非什么天方夜谭。另外，2010年留美人数超过10万。随着高中毕业生的逐年减少、留美浪潮搭乘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势头愈演愈烈以及学生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幻灭，中国大学的考生人数在十几年内可能将低于招生人数。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大学又新增43所。如果再次掀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后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希望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已经比十年前成熟。我也希望中国的公众能够懂得：北大清华，不是政府指令它们成为一流就能成为一流的。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是在于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和领导如何表现，一是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把珍贵的教育资源集中于义务教育，特别是让那些失学的农民和民工子弟有书读，进而补充和增加将面临枯竭的大学生源。

## 商学院本科：大学教育的另类？

除了大学本科外，是否还有个商学本科？商学院能否和大学并立？几年前出版的一期《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第一次推出了全美商学院本科排名。这表面上是大学排名战中的一次新的“排名秀”，实际则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务实化的倾向对通才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传统的直接挑战。

美国大学排名种类繁多，争议不休。但所有排名一直集中在两类：一是本科排名，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年一度的大榜最有影响；另一类是研究院或职业学院的排名，如法学院、医学、工学院、商学院等等。其中商学院的排名花样最多。除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外，《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福布斯》，乃至英国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等，都有自己的商学院排名。但是，所有本科排名，都是不分专业的。而所有商学院的排名，又都评价的是本科后的职业学院（或我们所谓的研究院）。把本科中的商学院单独拿出来排名，还是第一次。

美国的大学讲究通才教育，专业发展是本科以后的事。比如Purdue大学有一流的工学院，耶鲁的工学院最多二流；但顶尖的学生要想当工程师，宁愿到耶鲁读本科，然后去Purdue读研究生。大学本科的目标是培养所谓“完整的人”（well-rounded person），不是专家。因此本科教育也就无法用专业来衡量。

如今，大学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趋于实用。1971年，美国大学本科生以商学为专业的占学生总数的13.6%。最近几年则有1/5到1/4的本科生以商学为专业。乃至学商的大学生，几乎可以从普通的大学教育中宣布独立。这也是《商业周刊》



把本科商学院单拿出来排名的现实基础。

在这第一个本科商学院排名中雄居榜首的，是声誉卓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Wharton商学院，第二是弗吉尼亚大学Mcintire商学院，下面依次为Notre Dame的Mendoza，MIT的Sloan，Emory的Goizueta，密西根的Ross。

人们会注意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达特茅斯等常青藤名校没有出现在榜上。因为这些学校并不提供本科的商学专业。大名鼎鼎的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的院长Paul Danos指出，美国顶尖的20所大学，1/3都不设本科商学专业。而那些设商学科的，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Wharton商学院外，规模大多都非常小。比如密西根这样庞大的一个州立大学，学生人数接近四万，本科的商学院却非常小，仅728名学生。更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商学院本科，学制为两三年；本科生在大一或大二后才进商学院，在此之前则在大学里接受了一两年的通才教育。当然还有许多商学院的学生另外加修第二专业，以拓宽知识面。这次排在前6位的商学院中，只有Wharton是四年制，另外三所是两年制，剩下两所是三年制。这种让本科生到二三年级进商学院的做法，和在传统的大学中选专业并无太大差别。比如在密西根的Ross商学院读本科的学生，大学头两年还是密西根和普通学生，只不过从三年级起专业是商学而已。可见，美国的一流大学，大多保持着通才教育的传统。即使开了商学院本科，也注意限制规模，或在通才教育的框架中，让学生到了二三年级才“半路出家”。

不过，看看前6名以后的商学院，四年制占了绝大部分。比如排在第30到第61位的，除了三所两年制的外，全是四年制的。学生来读的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商学院；拿的学位不是学士（BA），而是商学学士（BBA）。另外，即使在那些两三年制的学校中，本校学生进商学院，大多数还是要申请，不像选专业那样简单。虽然录取比例甚大，但并不意味着你是哪所大学的学生就可以到这所大学的商学院读本科。商学院本科生和一般大学生的认同，已经有些不同。这在四年制的商学院中体现得特别突出。记得1998年我上日语暑期班时碰到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我只知道他是宾大的。但他特别提醒我：他是Wharton（四年制）的学生，以示和宾大学生的不同。

表面看来，这些拿了本科商学学位（即BBA）的人，比起其他大学生来，有企业管理的“童子功”，似乎是未来的企业精英了。其实不然。如今本科文凭几乎

成了全民文凭。拿一个本科学位，仍然是个普通劳动者，很难指望人家把你当专家。管理阶层的主要梯队，还是在本科之后的MBA中。可惜，在申请商学硕士（即MBA）时，手里拿着BBA并不占便宜。事实上，MBA课程中有BBA学位的学生，仅占20%；而美国学士学位中BBA的比例，还要略高于此。也就是说，拿了BBA的人，拿MBA的机会比一般的学士还略小些。这也难怪，许多BBA的学生觉得有些商学院的MBA课程喜欢录取本科不是学商的学生。其实真实的原因，大概还是美国一流大学大部分不设商学本科。正是这些学校，给精英的MBA课程输送了大批学生。

可见，BBA绝不是进入管理精英阶层的证书，而更像是基层从事经营的“车间主任”的“打工证”。除了在华尔街有深厚人脉的Wharton等几个精英学校，大部分BBA的学生毕业后还是当小老百姓。Wharton、Sloan的毕业生平均起薪可达55000美元；而一般学校的BBA，起薪多在3万多或4万多，并无过人之处。这也难怪，这次《商业周刊》介绍典型BBA毕业生的一个人物特写，是以2005年在排名第27位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的一位女生为主人公。她起早贪黑地在美国第五大食品工业公司General Mills做信息分析员，职责是处理各种销售数据，帮助老板搞清楚产品的销路。虽然她觉得BBA的训练对她有帮助，但也指出这个工作并不一定要拿个BBA。

这个典型的BBA的经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必要在本科通才教育之外另设商学院吗？搞数据分析，那些学数学或统计的人难道不是更胜任吗？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个职位非BBA不可的。对此，商学院的人也不否认。不过，他们认为，那些讲究实际的管家式的人物、那些希望马上看到结果的人，更适合学BBA。BBA的教育内容，强调数量分析、人际沟通、团队配合。更重要的是，BBA强调工作实习，毕业时BBA的学生比一般学生更有工作经验。

本科商学院的流行，挑战着美国大学的教育理想。20世纪以前，美国大学以培养绅士为目标；20世纪中，则注重培养理想的公民。绅士也好，公民也好，都是所谓“完整的人”，强调的是精神的发展。如今大学普及，全球化又造成了制造业的“外包”，那些希望靠卖力气过日子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结果，许多本来对大学教育毫无兴趣的人，为了饭碗不得不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读书，脑子里想的不过是学个手艺而已。本科商学院也就由此风行。在某种意义上说，一般的商学院本



科，不过是为白领化的美国企业培养劳工。

最近两年，商学院的MBA课程刚刚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萧条中恢复过来，申请人数增多，毕业生就业前景重新看好。加上本科生的增多，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商学院热。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如今的大学生更注意生存竞争，而不是人生理想和品格的培养。他们纷纷拥进商学院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不少高等教育界人士担心，这样的发展，有使大学从教育蜕化为训练、由培养人转为传授技能的危险。

## 华尔街的人才泡沫？

IT泡沫、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这十年，美国经济的戏剧不断。这次次贷危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终于导致了金融系统的大失血。花旗等大银行损失了几百亿美元，并大量裁员。人们在这一系列泡沫破灭之时，也开始进一步地问：这些泡沫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华尔街的人才泡沫？

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短文，细述这一泡沫的本末。金融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1947年时为2.3%，1977年上涨到了4.4%，2005年则达到7.7%。如今美国人挣的工资，每13美元就有1美元支付给金融业的人。在1980年以前，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仅比其他行业的人略微多受了些教育，工资上涨的速度也差不多。但是在1980年后，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在教育程度和收入上都与其他行业大幅拉开距离。在60和70年代，哈佛的毕业生更多地成为律师、医生、学术界人士，而并非跑到华尔街去。比如1970年，只有5%的哈佛男生在毕业15年后从事金融业，但到1990年左右，这个比例达到15%。由于华尔街还是男人的天下，哈佛女生的这个比例，在同期内从2.3%增加到了3.4%。而哈佛学生报纸所做的调查表明，2007年哈佛毕业直接工作的人中，男生有1/5到了投资银行，女生则有1/10。理由也很简单：钱。如果你同是哈佛毕业，同样的考试成绩，你在金融界干就比在其他行业中干的收入要高将近3倍。如今的华尔街，收银员、秘书少了，MBA、博士甚至医学博士则到处都是。

目前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舆论把矛头都对准那些年收入过千万的企业总裁。不过，收入最厉害的，还是金融行业的炼金师们。2006年，在华尔街拿最高



收入的是James Simons，一位69岁的低调前数学教授。他曾是陈省身的学生和学术合作伙伴，23岁就拿到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哈佛和MIT，并作为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分校数学系的主任，把该系转化为全美前十名的数学重镇，是美国顶尖的数学家。他1978年下海，经营的就是对冲基金，一年收入达17亿美元，而且是连续两年蝉联收入第一。

为什么他能这么成功？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华尔街赢利结构。除了一般性的商业投资外，美国家庭把自己的退休金、孩子的教育基金等等都投入股市。比如我刚刚得到工作，学校就鼓励我拿出工资的5%投入退休金，同时校方拿出9%的对应基金。这样，一个人如果年薪到了七八万，每年放到股市上的退休金就达一万上下。这些钱要维持良好的增值，就需要投资家来经营。

一般而言，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要从总投资中拿2%作为自己的基本回报，同时再从投资后增值金额中拿20%的回报。如果一个经理神通广大、所经营的投资增值迅速，就可以拿到更大份额的回报。比如James Simons的基本回报就是总投资金额的5%，投资增值金额的44%；同时，他还在自己的公司中个人投资17亿美元。他的公司2006年经营60亿，增值84%。这也就解释了他的财富来源。

在这种高刺激下，对冲基金的好手就可以迅速成为巨富。不过，这些人并非一般喜欢冒险、赌博的股民可比，必须有相当的经验和训练。华尔街的25位顶尖对冲基金经理，在2006年总共挣了1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的GDP，可以支付纽约地区8万公立学校教师三年的工资。另有数据表明，这25位在2004年的收入总和，比在Standard & Poor's 500家企业的总裁的收入总和还高。这些炼金师的平均年龄为51岁，年轻人甚少，说明经验的重要。同时，他们也都训练有素。对冲基金公司里的从业人员，一半是高科技专业人士。James Simons的经营就得益于他所设计的数学模型和演算方法。说到底，把握这么大的资金的运转，必须把握数字的运作。

如今美国的经济危机，金融业首当其冲。这些炼金师的泡沫是否会破灭呢？我看不太可能。如今世界经济越来越复杂，金融则是经济的神经系统。我看真想当企业家，还是去MIT学数学为好。

## 最高法院的“常青藤专政”

奥巴马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Sonia Sotomayor于2009年顺利就任后，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就有8位是常青藤的毕业生。而这8位大法官，仅来自三所法学院：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只有89岁高龄的John Paul Stevens是个例外，来自西北大学法学院，本科是芝加哥大学毕业，其实也都是名校。而他是1975年成为大法官的。2010年他退休，被出身于普林斯顿本科、哈佛法学院的Kagan接任。至此，常青藤完成了对最高法院的征服。

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出最高法院不断精英化的趋势。美国最高法院共有过110名大法官，有一半是常青藤的本科或法学院毕业。其中18位是哈佛法学院出身，8位耶鲁法学院出身，6位哥伦比亚法学院出身。但是，有44位从来没有上过法学院。因为在早期，没有法学院的学位照样可以从事法律工作。但到了1950年以后，70%的大法官来自常青藤。直到现在常青藤几乎占领了所有位置。

要知道，美国是草根民主社会，讲究的是多元性、代表性。选总统也好，议员也好，选民们总希望选那些“我们中的一个”。你的背景太精英，经常会疏离选民。比如布什选总统时，尽可能不提自己在耶鲁读书的经历。像里根这种最具人气的总统，就是来自不知名的小学校。但是，到了最高法院似乎就变了规矩。你的学校不硬，往往会成为被人攻击的靶子。比如，布什曾推荐自己的法律顾问Harriet E. Miers为大法官。她上的是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法学院。结果，连布什本党的保守派都不干，举出她上的“软”学校作为理由，认为她根本不具备必要的能力，最后她只好撤回自己的提名。看这个架势，在21世纪要绕开常青



藤当上大法官，还真要仰仗奇迹。

为什么会如此？当然，首先的一个理由是大法官不是民选，而是总统任命、国会批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一切。毕竟，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是民选的，必须顾及民意。如果民意倾向于普通人，最高法院如何可能一色的精英？另外，代表性、多元性也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法则。许多人讽刺说，现在的最高法院，所谓“多元性”就是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这种精英学校出来的大法官，自然形成一种封闭的精英思维，和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相脱节。对此，总统和国会怎么可以不考虑？

看来，对于最高法院越来越精英化的问题，需要另外寻求解释。这里恐怕有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美国教育制度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现代的法律传统，大致起源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教冲突的加剧，依靠封建式的个人纽带已经难以解决治理问题。古典学术的发现，使非常复杂的罗马法成为统治的法宝。当时掌握这套学问的，主要是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者。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Bologna大学，就是从法学起家。当时欧洲的皇帝、教皇、国王等等，对这里的学生都非常青睐，竞相招揽来填充自己的官僚体系。也就是说，法律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和现实社会、政治的脉络相对脱离而自成一体。作为司法专家，你的成功要取决于在这个体系中有多优异，而未必是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的脉络中赢得多种既得利益的认可。你越是这样超凡脱俗、专业化的程度越高，信誉也就越高。毕竟，法律本来就应该是超出现实的既得利益之上的一种仲裁理性。

另外，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二战后经过“退伍军人法案”的改革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比较好地解决了代表性、多元性的问题。“退伍军人法案”使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进大学的“大老粗”拖家带口地到常青藤读书。奖学金的不断增多，又使许多平民子弟接受了精英教育。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给了少数族裔相当的照顾，使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这样，许多平民甚至贫民子弟通过教育系统进入精英阶层。现在的精英阶层本身已经多元化了。能力超群的人，不管是什么背景，大多会被常青藤网罗进去。所以，常青藤的牌子代表的不是身份，而是你的优异。Sonia Sotomayor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她出生于波多黎各家庭，从小住在廉租房中，属于社会的底层。但是，一上大学就进了普林斯顿这种

最为“贵族”的学校，日后平步青云。很少有人说她是代表精英阶层，更难有人否认她对弱势群体有着天生的、本能的同情。如今许多反对她的保守派，攻击的不是她的精英意识，而是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太多，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其实，这种“名校专制”并不仅仅限于最高法院，在政治中也如此。里根固然是毕业于地方小大学的草根总统，但他是在战前接受的教育。那时没有“退伍军人法案”，奖学金也很少，他这个背景进常青藤是不可能的。战后常青藤一旦通过奖学金制度以“野无遗贤”的精神收揽人才，绕开常青藤攀上政治登峰的机会就少得多了。看看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以及差点成为总统的希拉里，除了布什外都是普通家庭甚至弱势家庭出身，但大家不是哈佛就是耶鲁。

看来，精英政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精英政治要有合理性，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让那些最底层的人在早年就能进入精英集团。

体育影响一生



## 美国的大学体育

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以51枚金牌力压传统的奥运超霸美国，高居金牌榜榜首，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无上的骄傲。但是，在这“世界第一”的成就的照耀下，一般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体质和运动水平则呈现出令人窘迫的状态。在2008年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一份《中国大学生健康与生活行为调查报告研究》透露，中国大学生有65.58%“感到运动不足”。与此相对的，则是势可敌国的美国大学体育。美国代表团虽然在金牌总数上输给了中国，但其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不仅如此，在田径、游泳、女足、赛艇等众多项目中，美国的大学还为其他国家代表团培养了大量的奥运选手和奖牌得主。应该说，美国的大学是当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最大的基地，也是其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大学体育，不仅为中国的体育改革，也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

请看几个简单的数字：美国有大约1000多万四年制在校大学生，有40万左右的大学生运动员。而日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如今美国大学竞争日趋白热化。各校为了吸引学生不惜工本。其中，大家要比的最大一项，就是大学的运动设施。想到美国找规模最大的健身房，非要到大学去不可。大学体育之普及，由此可窥一斑。

为什么大学体育如此普及？这和美国乃至西方的整个教育观念有关。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把体育作为精英教育的核心。在中国，你让孔子练武功纯属亵渎圣贤；在西方，苏格拉底则是位英勇的战士。西方贵族尚武的精神一直没有断过。



当年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英国贵族骄傲地说：这场战争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比赛的孩子们打赢的！19世纪后半期，古希腊文化在西方渐渐成为时尚。格罗特的《希腊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不仅成为教养阶层的必读，而且是他们人格培养的范本，大家模仿起希腊英雄来不遗余力。美国的教育制度在起步期模仿英国，从上流社会子弟的寄宿学校到常青藤，都把体育作为教育的核心。日后的发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美国大学体育普及的原因，并不能仅仅从高等教育本身去找，而还要看美国从小培养孩子的观念和方式。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的高中，大致有1/6到1/3的学生参加校队的竞技比赛。一个学校往往有二三十个运动队。每个公立高中，至少都有一个带看台的奥林匹克标准体育场，外加体育馆、棒球场等等。各种联赛，如同美国的职业体育联赛一样，棒球、橄榄球、足球、篮球，你方唱罢我登场，四季不绝。你查各高中的网站，首页必有体育一项。我家住在波士顿郊外的阿灵顿，这是个拥有42000左右人口的小镇。其公立高中总共也就1000左右的学生。就是这么一个学校，竟有二十几个男女运动队。除了夏天的假期外，一年的其他三季都有正常的联赛。运动队的训练是一周五天，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外加两三场比赛（比赛经常在周末举行）。这也是美国非常典型的高中教育。在麻省这么一个小州，仅高中足球联赛就有上百个队参加。这种高中球队的比赛，不仅吸引了师生和家长，而且当地的报纸报道、电视转播，俨然是个小职业联赛。高中的精英运动员，更有一天训练三四个小时者，就像个专业运动员。他们这么用功，除了对体育的爱好外，还有一大功利目标，那就是为上大学创造条件。中国读者因为姚明的关系，大多对NBA选秀非常熟悉。其实，美国大学运动队在高中生里选秀，也是个达到了疯狂程度的竞争。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在上大学前要在各种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试图让坐在场外的大学队教练相中。对许多高中运动员来说，大学的升学竞争也是体育竞争。

美国的大学，在中小学体育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完备的训练和竞赛体制。在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即NCAA：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旗下，有三个等级的比赛。除此之外，还有全美校际体育联合会的比赛（NAI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s）。其中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的一级联赛，包括美国最大的大学，运动水平甚高。第二等级则包括小大学，水平不齐，但也不断

出现高水平选手。第三等级则比较弱，因为其中的大学不提供体育奖学金，吸引不到优秀的运动员。至于全美校际体育联合会，有时可以和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的第二等级类似，只是规模比较小，项目不多。在这些联赛中，篮球、橄榄球最为热门，是美国体育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商业价值足以和NBA以及以“超级碗”为顶峰的职业橄榄球联赛相比。这些比赛中涌现出来的精英，最终成为NBA和职业橄榄球联盟的职业运动员。田径、游泳等比赛，也几乎达到奥运会的水平。不仅美国在这些项目中的奥林匹克选手基本上全部出自大学，而且许多外国选手，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也纷纷到美国的大学读书。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100米蝶泳中以0.01秒输给菲尔普斯的塞尔维亚运动员查维奇，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在北京奥运会夺得一金三银并曾在雅典奥运会上为津巴布韦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女将Kirsty Coventry，则是美国Auburn大学的学生。她称到美国大学读书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经验。她的主要对手——美国队的Margaret Hoelzer，竟是在Auburn大学的队友和同屋。获得女子200米短跑金牌的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布朗等等众多田径名将，也是美国的大学生。以菲尔普斯出身的密西根大学为例，篮球、棒球、橄榄球、冰球都拿过全国冠军，是职业联盟的重要“供血站”，前总统福特就是该大学出身的橄榄球运动员。到2004年奥运会为止，该校共为奥林匹克输送了178名运动员，代表着22个国家，赢得了54枚金牌、27枚银牌、35枚铜牌。如果以金牌总数而论，该校已经势可敌国，在122个国家中能排到第17位！2010年因为菲尔普斯等密西根泳将的表现，上述数目自然大为增长。私立的精英学校虽然一般不提供体育奖学金，但也不甘示弱。到2008年奥运会为止，常青藤盟校共为奥林匹克输送了880名运动员，他们共获得110枚金牌、476枚奖牌。

大学体育的优越性在哪里？大学正好涵盖十七八到二十几岁这一运动员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几十万大学运动员中，未来能成为职业选手或登上奥运赛场的，不过百分之零点零几。对那些极少数能够显示出超人的运动才能的精英，大学无疑是成为职业运动员或奥运明星的跳板。美国的职业篮球、橄榄球的选手，绝大部分都是从大学中选拔的。在非职业项目中，如果能够在田径游泳这种大项中进入奥林匹克，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商业赞助，有条件进行绝对专业化的训练。总之，在这些项目中的精英，等到大学毕业时，翅膀已硬，可以靠体育吃饭了。



对美国的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而言，大学则是最便宜的培养人才的方式。欧洲足球俱乐部看中一个南美的希望之星，虽然才十三四岁的年纪，一年也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烧上几百万才能到职业赛场上派用场。美国的一个篮球或橄榄球明星，虽然具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价值，但在18到22岁期间，往往在州立学校读大学并参与比赛。学校最多支付一笔体育奖学金，一年的花费不过几万块。而主要大学的橄榄球和篮球联赛可为学校带来大量利润，学校也得以从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资助像击剑这样的冷门赔钱项目，最终使体育全面腾飞。美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需要太多特别的投资。

至于大部分大学生运动员，则会在四年之间发现自己在运动上并无前途。但是，因为他们一边训练一边完成了学业，最终还是掌握了一技之长，可以在其他领域竞争。即使是那些有运动天才、达到世界顶级的选手，如果从事的是小项目，因为毫无商业价值，也无法靠运动吃饭。他们从事体育不过是业余，在学业上不在其他同学之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常青藤子弟已经代表不同国家赢得十几枚奖牌，其中5枚是金牌。这些项目也大多集中在船艇、击剑、射击等小项目中。比如，美国女队8人单桨赛艇金牌得主中，有来自哈佛的Caryn Davies，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usan Francia，和来自普林斯顿的Caroline Lind。加拿大男队8人单桨金牌得主中则有来自哈佛的Malcolm Howard和来自达特茅斯的Dominic Seiterle。此项银牌得主英国队中，则有耶鲁子弟，获铜牌的美国队中有普林斯顿的子弟。击剑项目的银牌得主则有四名常青藤子弟，他们分别来自耶鲁、哥伦比亚和哈佛。这些人，通常是运动世家出身，父母就从事类似的小项目。他们的未来，也常常和这些奥运会项目无关，而是走常青藤的正途：进华尔街，当医生、教授、律师等等。

可见，美国的大学体育，并不仅仅是个体育问题，更是个教育问题。美国人教育孩子并不只看学习成绩，还要看孩子的社会技能、心理素质、人格发展等等。比如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团队精神、领袖才能、竞争意识、意志力、尊重对手和接受失败的能力等等。这些精神气质，都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成功之必需。体育则是培养这些素质的重要手段。要知道，市场经济中的“团队精神”和计划经济中的“集体主义”看似相同其实不同，前者是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凝聚力，后者则是行政命令所塑造的“服从组织”的行为规范。“领袖才能”也和我

们小时候当班干部不一样。当班干部是必须迎合老师的欢心，老师叫谁当谁就当。领袖才能则要有对同伴的个人感召力、能说服大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领导，就和选举一样。我的一位在美国搞教育学的朋友到中国的名校帮助评估，最后他说该校学生“缺乏团队精神”。该校人士则面面相觑，仿佛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汇。长期在计划经济下运转的社会和个人，往往习惯于一切听上面的，丧失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一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而动摇，人们面对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前景就会不知所措。如今中国大步迈进市场经济，学生到社会上创业时，要学会和别人合作、自发地组成团队，并在平等的合作关系中培养自己领袖的感召力。但是，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因为在观念模式上一直还没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这方面的训练，更谈不上对体育的重视了。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体育要教育化；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应该理解如何用体育塑造学生的人格和行为规范。体育的竞技就是市场竞争的模拟演习。进入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至少要学会如何运用这个模拟器。



## 是什么造就了菲尔普斯

### ——透析美国的体育制度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独霸奥运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查一下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年度开支，不过区区1.3亿美元，还不到姚明工资单（1376万，在NBA是并列第20的最高收入）的10倍。靠这“十个姚明”，拿个男篮金牌也许够了；但每次奥运会都在金牌和奖牌总数上占据了顶尖的位置，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美国高度草根性和商业化的体育制度。这套制度，把奥林匹克委员会打发到一个协调人的地位，最多制定些一般性政策、组织奥运会预选赛，严格地说连决定哪个运动员进奥运会代表团的权力也没有，不过是个承认预选赛的结果的“橡皮图章”而已。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美国奥委会拿着区区1.3亿，支付了代表团的机票、旅馆、训练场地、伙食、集训补贴等费用后就剩不下多少了，无法自己去培养奥运苗子；最终要靠的，还是民间涌现出来的人才。

这种国家放手不管的民间化制度，当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大家还记得，在冷战时代，苏美两大阵营拿体育当成社会制度竞争的赛场，似乎奥运会上谁占上风谁的社会制度就优越。结果，美国在冷战初期还曾主宰奥运会，但到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金牌总数被苏联以50比33的优势所超越。在1976年家门口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不仅金牌和奖牌总数全面败给苏联，甚至在金牌总数上被东德所击败。自此以后到冷战结束，美国在奥运会上逢苏联、东德必败，似乎其制度已

经破产。

但事实证明，美国“笑到了最后”。冷战结束后，苏、东体制迅速瓦解，美国则成为奥运会的独霸。如今这一霸主地位虽然受到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但这恐怕仅仅是个暂时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讲过，奥运会项目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职业项目，如篮球、足球、网球等等。这些项目，本身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一流队员多像姚明一样，身价千万，靠打球谋生，是地道的职业选手。这类项目，本来是被以业余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所排斥，如今虽然有些喧宾夺主，但尚不是奥运的主流。第二类是田径、游泳等项目。这类项目是奥运的正宗，以业余为宗旨。但是，因为这些项目观赏性强，商业价值不断提升，每个精英运动员都能拿到一大堆商业赞助。比如菲尔普斯，2008年奥运拿了8金，赞助他的泳装公司Speedo就额外给他100万美元的红利。这笔财富当然还属于他收入的零头，其他进项更多。这不仅使他这样的精英运动员能够全心全意地训练，而且雇佣得起一流的教练、医生、营养师等等，实际上也职业化了。第三类则是射击、举重、船艇、跳水、乒乓球、体操等等项目。这些项目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商业价值，队员基本是业余的。比如美国的赛艇运动员，拿了世界冠军还要到商店去打工。

在冷战时代，苏美两大阵营的对抗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体育上的对抗。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通过举国体制，靠国家的大规模投入，用与世隔绝的方式对一小部分运动精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挖掘有商业化潜力的项目，以市场经济的方法与之抗衡。在田径、游泳等有商业潜力的项目上，美国与苏联、东德基本打成平手；但在没有商业潜力的项目上，则只能以打工仔对付人家从小封闭训练出来的专业运动员，结果当然是大败而归。

苏、东体制瓦解后，在奥林匹克创造了一个“冷战真空”，给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当然，“冷战真空”不是苏、东瓦解后马上就有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苏联的继承者独连体还在金牌和奖牌总数上大胜美国。这里的原因是，旧体制虽然瓦解，但这个体制中训练出来的运动员尚有几年的黄金运动生命。只有等这些人才凋零时，“冷战真空”才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进入本世纪后，俄罗斯在金牌奖牌总数上的位置迅速下降。特别是在第三类没有任何商业潜力的项目上，离开国家资助，前苏、东国家的奥运优势立即土崩瓦解。比如在体操场上，昔日



的超霸苏联、罗马尼亚，早已经成为二流了。

中国是在苏、东瓦解后唯一坚持举国体制的国家，面对“冷战真空”乘虚而入。特别是对前苏、东制胜美国的主要根据地，即第三类项目，几乎全面接管，甚至连人家的教练也招募到自己门下。这就造成了奥运会上中国的崛起。只要看看2008年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得的金牌就知道，这些金牌全集中在第三类项目上，甚至体操等项目是在没有对手和悬念的条件下夺冠的。而在以市场经济推动的项目上，则基本交了白卷，还比不上日本和韩国。可惜，从苏、东的教训看，这种计划体制无法长久维持。特别是中国已经向市场经济大步迈进，体育要依托的将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所以，美国体制的优点并不仅仅在于其创造的奥运优势，更在于其长久维持这种优势的能力。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体制呢？我们不妨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打造出来的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菲尔普斯。他一直到高中还上的是普通公立学校。虽然7岁时在两个姐姐的影响下开始了游泳训练，但在布满家庭游泳池和俱乐部的美国，其实还是很普通。所不同的是，他很快被恩师Bob Bowman发现并悉心调教，在10岁时就赢得了同年龄组的全国冠军。以后则一马平川，边上学边在Bob Bowman的俱乐部里训练，15岁就入选美国奥林匹克代表团。不过，他此时不属于任何专业队，也没有进什么体校，而是个有特殊天赋的高中生。

2004年菲尔普斯在雅典拿下6金，在北京则冲到8金，是毫无争议的世界泳王。但是，在这两个事业高峰之间的4年，他的生活仍然保持着同龄人的一部分常规：高中毕业后进入密西根大学当大学生，学习体育市场和管理。其恩师Bob Bowman也成为密西根大学游泳队的主教练。实际上，这次美国乃至其他国家游泳队的几员大将，都是在密西根大学的游泳池里和菲尔普斯同室操戈。如今这对师徒功成名就，宣布将回到家乡巴尔的摩的俱乐部，Bob Bowman将成为该俱乐部的CEO。在整个这一辉煌的过程中，你看不到一点国家的介入。连奥委会这个“橡皮图章”，也是地道的民间组织。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超级巨星的故事，也是大部分美国运动员的故事。这一故事，生动地展示了美国体育的制度架构：基层的青少年体育组织（俱乐部和学校），大学体育，和职业乃至专业体育。

先说第一层级。针对青少年的俱乐部在美国无处不在。以游泳而言，像基督

教青年会（YMCA）和各镇大致都有的“男孩儿女孩儿俱乐部”，为孩子提供了优良的游泳启蒙教育。其中男孩儿女孩儿俱乐部的入会最低年龄是6岁。我9岁的女儿这个暑假到俱乐部参加夏令营，为期两个月，总共费用仅65块（平均一天一块钱左右），每天的活动从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项目有游泳、划艇、帆板等等。俱乐部不仅受到当地社会和慈善事业的资助，而且一批“青年领袖”，即十五六岁的志愿者，也来帮助管理和训练。在这里，游泳是万事之本。孩子能游50米后，才有驾驶帆船的资格。当然，在以上各项上如果再想深造，当地则有各种俱乐部和教练，提供一对一的课程。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如牛毛的俱乐部，自发组织起名目繁多的联赛，从地方性的一直发展到全国性的。美国的孩子从小开始，就不停地比赛。菲尔普斯，当年就是这几百万个俱乐部中的孩子里的一个。

学校系统，则构成了更大的体育组织，特别侧重于球类等集体项目。每个学校都有几个球队。麻省这么一个小州，仅高中足球联赛就有上百个队参加。这种高中球队的比赛，不仅吸引了师生和家长，而且当地的报纸报道、电视转播，俨然是个小职业联赛。高中生常有一天训练三四个小时者，就像个专业运动员。他们这么用功，除了对体育的爱好外，还有一大功利目标，那就是为上大学创造条件。美国的大学，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对体育非常重视。在体育上有一技之长、能够进校队的，大学录取有特招名额。中国读者因为姚明的关系，大多对NBA选秀非常熟悉。其实，美国大学运动队在高中生里选秀，也是达到了疯狂程度的竞争。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在上大学前要在各种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试图让坐在场外的大学队教练相中。以菲尔普斯出身的密西根大学为例，篮球、棒球、橄榄球、冰球都拿过全国冠军，是职业联盟的重要“供血站”。其他相类的大学，如佛罗里达大学、俄亥俄大学、迈阿密大学等等，也都不示弱。每年参加各项大学比赛的运动员，达40万之巨。可以说，美国的大学，是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大基地。这是美国体育的第二层级，也是其最关键的制度基础。

大学体育的优越性在哪里？大学正好涵盖十七八到二十几岁这一运动员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几十万大学运动员中，未来能成为职业选手或登上奥运赛场的，不过百分之零点零几。对那些极少数能够显示出超人的运动才能的精英，大学无疑是成为职业运动员或奥运明星的跳板。美国的职业篮球、橄榄球的选手，绝大部分都是从大学选拔的。在非职业项目中，如果能够在田径游泳这种大项中进入



奥林匹克，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商业赞助，有条件进行绝对专业化的训练。总之，在这些项目中的精英，等大学毕业时，翅膀已硬，可以靠体育吃饭。至于大部分运动员，则会在四年之间发现自己在运动上并无前途。但是，因为他们一边训练一边完成了学业，最终还是掌握了一技之长，可以在其他领域竞争。

对美国的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而言，大学则是最便宜的培养人才的方式。欧洲足球俱乐部看中一个南美的希望之星，虽然才十三四岁，一年也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烧上几百万才能到职业赛场派上用场。美国的一个篮球或橄榄球明星，虽然具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价值，但在18到22岁期间，往往在州立学校读大学并参与比赛。学校最多支付一笔体育奖学金，一年的花费不过几万块。而精英大学的橄榄球和篮球联赛，人气不在职业联盟之下，为学校带来大量利润。学校也得以从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资助像击剑这样的冷门赔钱项目，最终使体育全面腾飞。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美国这种以大学为中心的体育制度，被证明是最有竞争力的。所以，不仅是美国的运动员，世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都借助这种制度，到美国大学来读书。而运动医学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以大学为基地，不断为训练提供新的理念。美国的体制，已经开始对世界体坛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过，当体育进入第三层级（即职业和奥运层级）时，大学体育对各项目的助推力则明显不均。美国职业篮球和橄榄球一直是最受益于大学体育的。理由前面已经细述。对田径、游泳等奥运会热门项目，大学体育当然也功不可没。但是，最近20年，当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后，企业迅速介入，赞助商为了争夺明星不遗余力，大量的金钱流入大牌运动员或者希望之星的名下。像菲尔普斯这样的人物，一个人就等于一个生产金牌的公司：手下的教练、医生、理疗按摩师、运动心理学家、营养师等等一大群，使项目的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也正是因为利润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医学药物知识越来越复杂，利欲熏心、无所不用其极者层出不穷，出现了琼斯等知名运动员的服药丑闻。乃至奥委会要求保存运动员的尿样血样，以求几年后发展出新的检测技术后，再重新检测，以未来的药检技术，对抗现在的反药检的技术。所以，日后菲尔普斯是否成为另一个琼斯，谁也不敢打包票。更严重的是，如今已经有人在做基因工程的文章。这种技术当然不可能把菲尔普斯改造成鲨鱼。但通过基因改造而提高运动成绩，挑战人类的认同，是

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更大威胁。

在美国这套体制下，待遇最不公的就是上面所讲的第三类项目：射击、船艇、体操、举重、击剑等等。这些运动，有的相当昂贵，但观赏力不强，缺乏商业价值，也拉不来赞助商。不过，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也最能遵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把体育当做自我完善的业余爱好。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像普通人一样找个工作，把业余时间全用来提高自己的成绩。即使如此，当他们面对中国这种从小封闭训练出来的专业运动员时，也不至于完全举手投降，甚至奋力一争也能旗开得胜。也许，最大的敬意，应该献给他们。



## 学校为什么需要体育？

在美国的中国人，许多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人真幼稚！可是，时间久了，你就觉得这幼稚之中，有许多东西可学的。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我1994年作为一个陪读的家属来到美国，到学校健身房的第二天，就认识了几乎每天都去锻炼的“大老粗”。到2004年找到工作时，已经十年过去了。记得临走前的一天我十分感伤地告诉他，我不得不离开这里了。他先向我道贺，然后对我竟在学校里泡了十年感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以大老粗特有的好奇和直率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你大概挣多少吗？”我告诉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他睁圆了眼睛：“你没有开玩笑吧？这是教授的工资吗？”我告诉他没有开玩笑，而且这个数在我这行里还挺高呢。他一下子爆发了：“哈哈，这是劳工的工资呀！你学这么多年就为这个？这实在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糟糕的地方。你问问那些大学，他们给教练开多少工资！孩子上学是为读书还是为打球？”我对他的义愤表示感谢。不过也告诉他，可惜他不是校长。另外，我当然希望钱越多越好，不过，我和我这行里的许多人，对这种工资也并不是太在意。

美国大学里的一位著名教练，可以比一位名教授的工资高将近十倍，更不用提我们这等刚刚出道的助理教授了。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是NBA的训练基地？这不是典型的“脑体倒挂”吗？可是，在美国社会，大家一般还认为这挺公平（我碰到的这位“大老粗”算是个特例）。其实你观察西方社会，历来是如此。比如中世纪，贵族大部分是文盲，有文化的人是听他们使唤的文书。如今的美国，知识经济大行其道。但是，大老粗们还是常常要压满肚子墨水的人一头。要是相

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到美国算是投错了门了。

大学给教练（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体育老师吧）付的工资比名教授高十倍，你会觉得美国人实在幼稚，不知道尊重知识。但是你再看一看，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都在美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们嚷嚷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纯粹成了起哄了。

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得如何复杂，都需要领袖。而这种领袖，是课堂上培养不出来的。在中世纪，什么人领袖呢？如果你英勇善战，并且有魅力和信誉让许多勇武之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你就是领袖，你就是贵族。需要有人帮你算账、做记录时，雇个文书就可以了，你自己识不识字倒并不是那么重要。后来美国打独立战争时，人类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文明的发达，也未必能使文人硕儒高过一介武夫。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富兰克林大概是最耀眼的文化巨人了：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头衔你就数吧，数得再多也难免漏掉一个。另外，亚当斯、杰弗逊，都是学富五车之士，汉密尔顿也是个天才，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仰仗他奠基的。可是，领导这些巨人的，是华盛顿，一介武夫，一个“大老粗”。当时有人甚至说，他成为领袖，一大原因就是个子高，往那里一站，把别人都镇住了。

领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你未必读了多少书，但你需要有触动人心的东西，能找一帮人，让这些人信服，让他们跟着你走。自古以来，领袖绝大多数是在战场上产生的。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大部分人没有沙场经验。但是，在和平社会中的领袖，同样要具有感召力，能找到跟从者，能让大家相信你。所以，培养领袖才能，就是大学的首要使命之一。这也怪不得在许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人反复对毕业生说：“你们是你们这一代的领袖，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说起培养领袖，球场比课堂是个更合适的场所。球赛不仅更接近战场，而且球队之中时刻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要出风头才能成为领袖，但你要只顾出风头，就会遭别人嫉恨，失去队友的信任。真正的领袖，要有办法让队友心悦诚服地把重大责任交给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负众望。同时，还要维持全队的团结，让队友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队里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教练也正是培养这种人才的人物，必须把一群孩子王捏合在一起，形成高效率的战斗集体。这一职责，当然不容易。



美国大学里的一位名教授，可以是自己学科中的泰斗，人们对他或她异常尊重，但其影响一般局限在学科中，成不了所有人的领袖。而一个德高望重的橄榄球教练就不一样了，他常常是所有人的英雄。一个橄榄球队长，毕业后到华尔街也往往比一个全优生更有价值，其卖点也是成绩单上没有写的领袖才能。

这样的体育教育，在过去的中国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领袖是上面指定的，不需要对下的感召力，只要上面喜欢就行。我们从小就由老师任命谁来当班长，毕业听学校分配，工作后任领导分派。所以许多“领袖”，都是拍马屁式的出身，为周围的人所怨恨。但是，在市场经济中，那种能把大家攒在一起折腾出些事情来的人、那种受大众爱戴的人，就变得难能可贵了。大学培养不出这样有组织才能、有创意、有感召力的领袖，就是大学的失职。这也是我一再主张大学需要体育的原因。

## 体育与美国的通才教育

几年前看《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版，发现一条意想不到的教育新闻：附近的两位美国高校大学生，获得了当年的罗得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

前文已经介绍过，罗得奖学金非同小可。罗得奖学金是牛津大学于1902年建立的，其目的是培养未来世界的领袖，每年招募世界各地最优异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到牛津大学接受两年的研究生教育，费用全部由该奖学金承担。那时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水平还赶不上欧洲，牛津、剑桥无疑是世界最高学府了。后来牛津、剑桥也许被哈佛、耶鲁给比下去了，但罗得奖学金依然维持着世界第一奖学金的声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的劳工部长Robert Reich、前参议员（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特利等等，都曾是获奖者。该奖非常注重学术品质。美国今年有32人获奖。在波士顿周边地区的获奖人里，竟有两个运动员，岂不有点令人意外？

其实，熟悉美国大学教育的就明白，这一切是非常正常的。美国大学讲究通才教育，而且特别注重体育，体育成了培养领袖才能的重要手段。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莱特利参议员，读大学时就是普林斯顿的篮球明星，三次进了全美大学明星队，1965年还是全美大学最佳篮球运动员，毕业后拿了罗得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然后领导一个意大利职业篮球队拿下欧洲冠军，再回美国加盟NBA的纽约Knicks，两夺NBA冠军，并进入NBA全明星队，1977年一退役就被选进篮球名人堂，第二年就当选参议员，直到1996年退休，2000年竞选总统时在党内预选中败在戈尔手下。从高才生到职业运动员，再到政治领袖，这就是一个“罗得学者”的生涯。



这次获奖的两位运动员，一位名叫Adam Levine，是达特茅斯的学生。他大学的专业是人类学、艺术史和数学与社会科学。这至少跨了三四个领域。人们也许应该问他：“什么不是你的专业？”除了这些功课外，他还是达特茅斯拳击俱乐部的主席，他到牛津大学希望研究哲学，并拿一个古典研究的学位，大概免不了要啃一大堆拉丁文希腊文了。他在达特茅斯的平均成绩是3.92（满分是4），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清晨6点到健身房对着沙袋狂击15轮，再进行一套海军的训练，晚上他还会再回来练一通。他打拳的体会是：你攻击对手的目的不是伤害别人，而是免得自己挨打。你要知道怎么摆脱困境。这是拳击教给他的生活哲学。

另一位学生，则是哈佛的Clara Balttler。她本是波士顿地区Brookline高中毕业的优等生（平均成绩为4，无懈可击），到了哈佛，平均成绩是3.8。用她的话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她接受这个事实。而她在学习之外，是撑竿跳高运动员，刚刚获得了常青藤盟校女子撑竿跳高的冠军，破了学校的纪录。用她的话说，撑竿跳高需要勇气、直觉、平衡。在高空极端不确定的时刻把握住自己的身体，这给了她非常大的自信。她的志向是研究环境和地球，曾去纳米比亚做研究，试图证明七亿五千万年前赤道是封冻着的。她还在阿根廷进行地形地图的研究，希望在牛津大学从事冰川期地球气候的研究，最终为解决地球变暖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看看这些罗得学者，你就知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多么有中国特色了。北京奥运会，也正好给我们一个反省奥林匹克精神的机会。这个精神，基本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体育是培养人的手段。中国的体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教育化。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体育也能培养出一个罗得学者，那将比在奥运会拿几块金牌要值得骄傲。

## 创新阶层的时尚

财富塑造生活方式。新财富则塑造新的生活方式。最近二三十年，美国知识经济崛起。创造财富的领军人物，是城市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所谓的“创新阶层”。他们再不是没有受过基本的教育、从童工干起的卡耐基，也不是继承了巨额财富的传统统治精英WASP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他们是上个世纪后半期美国大学的产物。在这期间，WASP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子弟再也无法靠显赫的家庭出身来垄断高等教育。代之而起的，是一批靠分数、靠自己的智能上来的中产阶级的优等生。知识精英主义从此取代了世袭的上流社会绅士品味而主导了美国的一流大学。

高等教育的变化，自然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变化。19世纪卡耐基在美国登陆时，他的境遇相当于流落中国大城市街头的一个12岁的农民工子弟。但是，美国当时也还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处女地，还是托克维尔所描写的贫富分化远逊于欧洲的平等社会。结果，卡耐基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童工，成为世界钢铁大王。当时的美国就是能够给各路才俊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卡耐基、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家族，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垄断性王国。他们的子弟也垄断了精英教育。平民百姓再想白手起家，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不过，20世纪6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大学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又一次打破了传统财富阶层的垄断，改变了游戏规则。那些知识训练好、有创意的年轻人，可以白手起家，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这就是比尔·盖茨一代的新贵。

这代新贵不仅创造了新财富，而且创造了新文化、新生活方式。旧财富所代



表的文化，是排他性的垄断性文化。豪华车、高尔夫成了他们的社会标志。他们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给人一种常人无法接近的养尊处优的形象，以此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新财富则创造了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竞争主义文化。如果把自己和平民百姓隔离，让人家觉得不可企及，那还算什么竞争？他们就是要把自己摆在开放的社会中，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同时，在这种平起平坐中超人一头，以此突出自己的优越。

你在美国的街上，看见一辆自行车和汽车在路口相遇，坐在车里的，很可能就是个老百姓；而那个身着时髦的自行车服，满头大汗的，可能是个CEO。同样，在河里开机动游艇的，常常是些发福的劳动人民；而在那里吭哧吭哧地划赛船的，则很可能是个银行家。新贵们喜欢玩的，是有竞争性的游戏。这种游戏本身并无排他性。但是，玩的过程则有极大的排他性。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训练，根本跟不上这样看似简单的时尚。

在这方面，比较中美的大款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大款，炫耀自己的豪华车，但你要把他们从车里拉出来和你拼场马拉松，他们多半是个草包。美国的大款并非没有豪华车，但人家的企业总裁、高级经理，常常骑车上班。人家要和你拼50公里的自行车公路赛，你几乎不是对手。人家炫耀的，是看谁能运动。这在硅谷特别明显。在那里流行的，不是什么高尔夫，而是长距离自行车、长距离游泳、深海潜水、风筝冲浪（kite surfing）等等极端体育或风险体育。而且是总裁们带头。这些又不仅是体育锻炼，而且是个社交圈。你不跟着玩，进不了圈子，就做不成生意；而你要玩不出高水平来，就不会受人尊重。所以，有些人凌晨四点起床训练两个多小时，几乎是专业运动员的水平。一位31岁的企业总裁感叹：“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高技术圈子里，你要找一个没有参加过三次铁人三项的女人约会简直太难了！”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这代人的观念和过去的富人非常不同。过去的富人，成功的标志就是坐享其成，不需要再操心什么了。现在这代人，成功的标志就是自己的竞争力。他们更喜欢享受竞争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果实。所以，这种竞争精神，也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也不甘落后。因为高科技实际上是碗年轻饭，大家必须为“年轻”这一本钱保值。每年有几千位野心勃勃、才能卓著的大学毕业生“入侵”硅谷。老一代要想在这个领地站住脚，就

得要在这些年轻气盛的“征服者”面前证明自己能玩年轻人玩的东西。

一个社会的文化，从来都是上行下效。精英带头，老百姓就追风。1965年，一个美国人平均一周仅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到了1995年已经达到三个小时，现在的数字虽然没有出来，但肯定是更高了。比如，1987年，美国有1730万人是健身俱乐部的成员。到2004年，这个数字达到4130万。美国人口在2.8亿以上。其中19到75岁的人口，不足1.8亿。这部分人中，1/4到1/5是健身俱乐部的成员。

精英的时尚，正在转化社会。现在不仅到处是健身房，而且专用的自行车、跑步小道也开始联网。向来不容自行车的马路，也开始划出自行车道来。而自行车站应运而生，不仅提供修理、存车的服务，而且有淋浴、更衣室等设施。缴纳些会费就可以使用。一个银行家，可以骑车一个小时，然后痛快地洗个澡，西装革履地走进金融中心上班。你在这个圈里道行有多深，比一个极端运动大家就看得出来。



## 华尔街中的橄榄球

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总决赛超级碗，是美国职业体育的最大盛事。在比赛前一周，新闻里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赛前分析和报道。

与一般的报纸不同，《华尔街日报》一直不重视体育，不管事前事后，一般都不报道比赛（直到默克多收购后才略有改变）。但是，超级碗前后，该报也从来不忘凑热闹，版面上充斥了关于超级碗的财经分析，对了解美国职业体育的经营十分有用。

2006年《华尔街日报》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教练。该报着重分析教练的管理风格，让企业总裁们学习。职业橄榄球总教练的平均工资为250万美元，最高可达500万，算是进入企业总裁的收入标准了。同时，橄榄球队的管理非常复杂。总教练之下，还有一群专项教练，分管进攻、防守、体能等等。这等于是一个中层管理阶层，需要总教练统合。最难办的是队员。职业橄榄球明星，挣得往往比教练要高，甚至有上千万者，谁也不服。再加上年轻，心理和感情都不成熟，谱儿大，脾气更大，很难管理。但是，橄榄球比赛集体性和计划性非常强，队员必须严格执行教练的战术，很少有篮球中那种个人发挥的空间。所以，能让这些年轻的百万富翁们服从自己，把他们组成一个高效率的团队，需要非常高的管理技能。一位好的橄榄球总教练，自然被华尔街视为管理大师。

2006年进决赛的两个队的总教练更是独特：芝加哥熊队的总教练叫Lovie Smith，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马驹队的总教练叫Tony Dungy，他们全是黑人。我曾经撰文讲过，橄榄球是个比篮球“白”得多的体育，黑人队员虽然很多，但大多数

属于“干粗活儿”的阶层。职业橄榄球在1946年才黑白整合，到1974年才有了第一个黑人的四分位（也就是统率全队的“大脑”）出现在季后赛中。如今黑人四分位虽然日益普及，但在教练阶层中，白人占压倒性优势。黑人教练进超级碗还是第一次。两个黑人教练垄断了超级碗，更是破天荒。

更有趣的是，两人曾是上下级的同事。Dungy在Tempa Bay Buccaneers当总教练时，雇用了Smith当他的助理教练。两人的执教风格也非常接近。和在场上不停地吼叫咆哮的那些教练不同，他们现场指挥从来不露声色，平静得出奇，几乎是和沸腾的场地隔绝的冰点。两人都相信，这种冷静的指挥和管理，能使球队更有效率。他们都采用一套计分系统，来评价哪个队员偷懒。比如Smith，当一个队员的偷懒让他发怒时，他就盯那个队员一眼，一点声音也不会发出。对队员来说，这目光是最令人恐怖的东西。

这一套，自然被《华尔街日报》津津乐道。有一篇文章，专门以这两个教练为例，谈为什么那些喜欢对下属吼叫咆哮的企业总裁缺乏效率。要知道，在华尔街，有一帮老板脾气极坏，对下属动辄训斥羞辱，号称是铁腕作风，是效率的标志。但是，一些研究表明，这种老板手下的员工，流失率甚高。一位心理学家指出，对下属说“你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和对之吼叫“你这个蠢货！”虽然都表达了同样的批评，却有本质的不同。说后面话的那种老板，常常留不住人。

Dungy总教练因为过于温和礼貌，一度被认为是没有威慑力和效率，并为此在早年找不到工作，如今却用事实证明，他这一套能主宰橄榄球。在华尔街和美国的流行文化中，企业总裁也被描绘为铁腕人物，不发脾气就办不成事。地产大亨Donald Trump破产后上了电视，开起题为“学徒”的真人秀，以“你被炒了！”的名言，表现老板无情粗暴的管理作风，一炮走红，成为美国最人气的电视节目。他迎合的，正是这种把企业总裁崇拜成暴君的社会心理。而这两位平静儒雅的黑人教练，则直接挑战了华尔街的傲慢，让人们看到真正的领袖是如何建立和行使自己的权威的。



## 拉拉队的政治

美国体育植根于大学。这也塑造了美国体育的一个特异之处：每次比赛，总是场上两个队，场下两个队。场上是运动员的对抗，场下是拉拉队的竞争。中国的观众大概都能注意到，NBA比赛时两队各雇一群穿短裙的女孩子，一手拿一大朵花，集体上演“热舞”。其实，这一套说到底是从学校体育中来的。同学上场比赛，大家去观战助威，女孩子组织起来鼓舞士气。所以，即使是职业比赛，美国体育的拉拉队比起其他国家来，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有的干脆配有乐队。没有这套“行头”，体育比赛就没了滋味。

要知道，因为拉拉队的发达，拉拉队本身也几乎是个运动队。进拉拉队要经过选拔竞争，队员们定期进行严格的训练，甚至拉拉队之间也举行比赛。总之，拉拉队是个女孩子出风头最好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拉拉队还刺激了体操等其他运动的发展。因为体操训练，对进拉拉队大有帮助。

也正是因为拉拉队如此重要，曾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乃至《纽约时报》头版对之进行了报道。

事情的起因是纽约州一所高中的女篮队员向美国教育部提出诉讼，称她打球时场边没有拉拉队的支持，而男队则有。这说明了男女不平等。其实，这一诉讼是她母亲提出来的。她本人并不在乎是否有拉拉队。她母亲说，同一个高中男篮比赛，有60个女孩子组成的拉拉队出场。男篮和拉拉队员们又把自己的朋友家长等等吸引到球场，比赛就显得十分热闹。女孩子比赛没有拉拉队，场面冷冷清清，女儿在场上没少拼搏，却像个二流队员。

她的诉讼也并非异想天开。1972年，美国通过了所谓“第九条款”的法律，规定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在任何领域不得进行性别歧视。根据这一法律的精神，男女运动队也必须接受同等的待遇。比如，双方教练的工资、更衣室的设施等等，都要一致。甚至男女运动队的人数也要一致。我过去曾经介绍过，因为男子体育传统长，男孩子更喜欢运动，参加运动的总是男多女少，学校不得不挖空心思吸引女孩子进运动队，否则男孩子也别想玩。女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给女孩子凑指标搞出来的。

拉拉队一直都是一色的女生。在有些学校，拉拉队也被单计算为运动队。这样，女孩子参加运动队的人数也就增加了，使男子项目有了开展的余地。另外，拉拉队只出现在场面火爆的比赛中，比如橄榄球和篮球，冰球就没有拉拉队。当然，这些比赛，全是男子项目。

这一诉讼提出后，教育部门不敢掉以轻心。美国教育部去年收到了64件类似的诉讼，而在此之前，四年中才收到28件。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为拉拉队的不平等而诉诸法律。结果，有的地区的学校规定，拉拉队不仅要给男队加油，也必须给女队加油，甚至要给各种项目的比赛都加油。

可是，这样的规则一实施，就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一个拉拉队跑去为女篮助威，刚刚开始跳起来，教练就跑过来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来给你们加油助威呀。”“你们最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不要分散我们队员的注意力。”拉拉队自讨没趣。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让一群女孩子给另外一群女孩子加油，双方都非常扫兴。大家的关系本来是争风吃醋，现在法律逼着她们彼此捧场，谁会乐意？所以，有的女孩子一听是给女队加油，干脆辞职不干了。当然，还有现实的问题。拉拉队如今给女队加油助威不算，还要给其他项目的队加油助威，否则不仅是性别歧视，而且是歧视某些项目了。这样一来，拉拉队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力不从心，只好盯着主场。过去橄榄球和男篮客场比赛总有拉拉队随队出战，现在不得不取消，使客场作战士气低落。

这场拉拉队政治的戏剧如何收场，还不得而知。让女孩子给女孩子助威是违反人性，这恐怕大家都承认。一位得州的读者致信《纽约时报》，称她1979年是高中女足的队员（那基本属于第一代女足选手）。有一天拉拉队前来助威，她觉得很新鲜，但是场上表现并没有因此不同。可是，有一天，她们比赛时男足正好路过，



都停下来给她们助威。这下可好，场上的女孩子个个神勇，好像呼吸的空气也不一样了。所以，她主张组织男孩子给女孩子当拉拉队。

事情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拉拉队有固定的人员、训练日程和经费。把男孩子拉进来，规模扩大了一倍。男女平等的体育政治格局又会大乱。况且，难道真有那么多个男孩子愿意干吗？女权主义者很乐观，说当年人们觉得女法官、女将军、女牧师等等都是很荒谬的念头，如今却都实现了。男拉拉队面临的挑战要小多了。我个人以为，这事还是等等瞧吧。男拉拉队在场边跳什么舞？他们手拿花朵还是戴拳击手套？我倒是很想等着瞧热闹呢。

## 大学体育这门买卖

由于姚明在NBA风头出尽，许多中国人都领教了NBA的气派。在世界职业体育中，NBA无疑是最大的摇钱树之一。不过，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作为摇钱树，NBA未必比得过美国的大学体育。美国大学体育联合会2006年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的大学体育，一年的收入达到42亿美元，比NBA 2004—2005年赛季的全球收入还要高。

当然，大学体育的队和场次比NBA多得多，不能简单地对比。不过，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大学体育属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理论上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不像NBA那样以赢利为目的，赢利多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第二，即使每个大学比赛联盟或每个队单独算，一些大学队的赢利，也还是让NBA和华尔街的企业总裁们无不分外眼红。

先说篮球。根据最近的数据，在2004—2005年赛季，参加大学男篮最高水平比赛“三月疯狂”（March Madness）或称“巨舞”（Big Dance）的64个队，总收入为3.3亿美元以上，赢利将近1.5亿。利润率（即利润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为45%。战绩一般的亚利桑那大学男篮虽然仅是2005—2006年赛季的第八号种子队，但其总收入为1660万美元，扣除开支后的利润为1250万美元，高居各队之首，利润率达到了75%。该校的篮球场仅14000个座位，比一流大学篮球队的主场小了不少，但是，门票、电视转播权、产品冠名权等等销售甚旺，内场的一对坐席一个赛季的联票，竟高达3万美元！

橄榄球则更有气派。在2004—2005年赛季，冠军得州大学橄榄球队总收入5300



万美元，排全国第九，利润3870万美元，利润率接近73%。全美前20个大学橄榄球队，平均利润率达60%，最高的是乔治亚大学（77%），其次是密西根大学（75%）。

根据2005—2006年的数据，橄榄球总收入最高的是圣母大学（Notre Dame），达6150万美元，得州大学上升为第二，为6090万美元。在1月9日获得总冠军的佛罗里达大学的橄榄球队利润达到3240万美元，赢利率为67%，排全国第五，亚军俄亥俄州立大学在橄榄球上的投资在全国居首，达到3230万美元，赢利为2850万美元，居全国第七，赢利率将近47%，基本属于顶尖的63个队的平均水平。最有效率的是密西根大学橄榄球队，每4美元的收入中就有3美元的赢利。

当然，不是每个队都能赚钱。球队如同企业，经营充满风险。以男篮2004—2005年的“三月疯狂”为例，参与的64个队，有14个是赔本的。在男篮的一些次要联赛中，有2/3的队赔本或仅能持平。这些多如牛毛的队总赢利加起来还不到500万美元，不到亚利桑那大学一个队赢利的一半。今年橄榄球的一级联赛中，也有15个队赔本，其中圣何塞州立大学赔了360多万。一般而言，加入水平高的联盟，影响大，转播权肥，容易赢利。另外，虽然那种投资少、赢利率高的大学一向被华尔街奉为理想模式，但如果投资大、总收入大，赢利率即使低些，净赚的总额还是更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追加投资，把饼做得更大。

总的来说，大学篮球和橄榄球在生意场上表现不俗，频频成为重要的财经新闻。业余队如此赢利，除了其相当高的水平外，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队员属于学生，拿体育奖学金，不过是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而已，在州立大学，这也不过是一人两三万的开销，和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年薪的职业选手比，成本小多了；第二，大学属于非营利组织，大学体育也就成了免税的买卖。

最近，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挑战大学体育的非营利的地位，认为企业的大笔资助，几百万美元的电视转播权、高薪以及和学术无关的教练，近乎职业化的训练，使大学的篮球和橄榄球变成了职业体育，不应该再享受非营利的地位。然而，国会的这些议员，很难在这方面闹出大动静。因为这些大学体育的传统由来已久，和美国的大学文化水乳交融，拆开后大学就不叫美国的大学了。

平心而论，美国大学体育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过度商业化、运动员功课太差等等。还有人指出，大学体育的存在，影响到了基础教育。许多黑人孩子只顾打球，根本不读书，指望靠打球上学。《纽约时报》曾发表过连续报道，讲一些

孩子不读书，弄个假高中文凭，靠打球上大学，现在在最高级别的队里效力，号称也是大学生。该报指责这样的体育耽误了运动员的学业。我在我的大学也和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开始都反对这样的做法，认为打球妨碍学业。我马上问：“如果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不这么练球，你认为他们是会去读书，还是会去弄毒品呢？这些人大部分要么没有爹，要么爹在监狱里，有个妈在就不错了，而且生活在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我的学生面面相觑，最后十分肯定地回答：他们不打球，肯定就和毒品为伍了。

可见，体育给一些根本没有指望的孩子提供了一条体面的晋身之路。这些队员一犯罪，媒体就不停地炒作，但却没有看到，如果他们不打球，大部分都会犯罪，打球后至少犯罪率低多了。更有许多人因此受了教育，甚至有成为百万富翁者。更何况，体育所培养的团队精神、竞争意识、求胜的意志等等，都是大学教育之必需。大学体育能成为摇钱树，也说明老百姓对此普遍认同，愿意花钱捧场。

当然，大学体育的发展，也使美国有了一套独特的高效率运动体系。以欧洲的足球俱乐部而论，培养运动员的投资甚大。比如一个有希望的少年运动员，还没有到能上场的法定年龄，就已经是百万年薪了。俱乐部承受这么大的负担，能力当然有限，无法培养太多的苗子。美国大学生球队，水平接近职业。打到22岁，也就是一年两三万的奖学金。这么低的成本，一方面使球队有赢利的可能，一方面普及了这个项目，使千百个球队崛起，给美国的职业体育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底盘。当然，也培养了大量球迷。如果取消大学体育的非营利地位，学生运动员都签高价合同，搞得起球队的就少了，以后职业队的选才面也就小了。

这几年，我一直写文章探讨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体育改革，就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体育，都不能再按计划经济的模式办下去。出路在于大学要把体育吸收为自己核心的教育内容，体育也要教育化，为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创造庞大的基盘。如今，中国大学生的人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看看中国大学体育的规模，再比比美国大学体育42亿美元的进账，我们不难感受到大学体育的潜力。



## 奥运项目背后的社会阶层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按照美国的体育现状把奥运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业化项目，如篮球、足球等等。运动员本身是职业出身，奥运会对他们并不太重要。这种运动也有悖现代奥林匹克最原初的业余精神，至今还不算奥运的主流。第二类是田径游泳等有极强观赏价值的项目。这些项目过去是业余的，但因为收视率高、商业价值大，很容易得到大量的赞助金，实际上已经专业化了。如今是奥运会的顶梁柱。第三类是船艇、射击、击剑等没有人看的小项目，运动员单靠干这个吃不了饭，仍然维持在业余的状态。

不用说，第一类项目的运动员，如科比等等，动辄身价千万美元，贵如王侯。第二类项目运动员，如菲尔普斯等等，收入比不上科比，但也相距不远了。至于名气小些的，大体能靠赞助收入维持相当高的专业训练条件，并且进入富人阶层。第三类则最可怜，参加奥运会完全是个赔本的买卖。

不过，如果你分析一下这几类项目的参与者，则又会发现相反的现象：第三类项目的运动员多为贵族，常青藤出身的最多；第二类则多出自美国的州立大学，似乎不那么精英了；第一类项目的运动员，则多是贫民窟里出来的穷孩子。

梦八确实威风。但根据一项调查表明，NBA的球星退役五年后，三分之二会沦为贫困。这不是说他们挣得不够多。恰恰相反，他们的收入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也羡慕不已。但是，这些球星多是穷孩子，从小父母很少教育，长大光打球不读书。一旦有钱，就忘乎所以，自我膨胀。他们不仅挥霍无度，而且经常和不同的女人生一大堆孩子，最后频频被法院强令支付抚养费。退役后收入急剧减少，生

活方式却不改变，没几年就一贫如洗了。

田径、游泳的运动员相对没有那么暴富，许多人能利用拿金牌时代积累的钱和名望在退役后继续创业，并且经常从事和自己运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菲尔普斯在密西根大学，学的就是体育市场等等，明显以后希望靠体育吃饭。

第三类的队员最有贵族气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常青藤子弟已经代表不同国家赢得13枚奖牌，其中5枚是金牌。这些项目也大多集中在船艇、击剑、射击等项目。比如，美国女队八人单桨赛艇金牌得主中，有来自哈佛的Caryn Davies，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usan Francia，和来自普林斯顿的Caroline Lind。加拿大男队八人单桨金牌得主中则有来自哈佛的Malcolm Howard和来自达特茅斯的Dominic Seiterle。此项银牌得主英国队中，则有耶鲁子弟，获铜牌的美国队中有普林斯顿的子弟。击剑项目的银牌得主则有四名常青藤子弟，他们分别来自耶鲁、哥伦比亚和哈佛。这些人，通常是运动世家出身，父母就从事类似的小项目。他们的未来，也常常和这些奥运会项目无关，而是走常青藤的正途：进华尔街，当医生、教授、律师等等。

为什么会如此？美国的上流社会，仍把体育作为教育孩子的重要手段。但是，他们总想方设法保持这种教育的纯净性。比如，当橄榄球越来越职业化后，许多中高阶层不愿意孩子再从事这种项目，结果造成了网式曲棍球作为替代品在郊区富裕社区的流行。这些小项目，贵族口味甚高，而且费用比较贵，结果经常在精英阶层中世代相传。而没有其他出路的穷孩子，则被丢在贫民窟的篮球场上，最后造出几个超级巨星来。

可见，奥运会上最职业化、最耀眼的明星，日后的人生未必如意。相反，那些最业余、最不起眼的，却通常属于世代成功的家族。这也不禁让我们反省：奥林匹克运动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商业成功。但这种成功，未必意味着运动员作为一个更完美的人的成功。相反，现代奥林匹克那种业余的原初精神，只保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并依然在塑造着成功的个人和家庭。



## 由市长的大学教育想到的

我在近著《培养精英》中，用大量的章节介绍体育在美国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并认为这是中国人了解美国教育的最大盲点。纵观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西方人在教育上，自古以来就是以体育来培养领袖、培养公民。在这方面，他们的传统最始终如一。而之所以能如此始终如一，也是在于这一传统能够有效地培养人才。

在古希腊，男性公民实际上是城邦的贵族。当兵打仗是他们的特权。平时的教育，有一大半就是在健身场训练，以便到战时组成方阵。古希腊城邦林立，战争不休，打仗是生存之必需。而古希腊的方阵步兵，铠甲就重达60多磅，可以和传说中美云长的82斤青龙偃月刀相提并论。负载这样的铠甲拼杀，一定要有十项全能运动员的体魄才行。更重要的是，方阵的战法不像武侠小说一样神化个人功夫，而是强调集体的协同：大家同生死共进退，将官在开战后就变成了普通士兵；光体格强健、勇武异常还不行，方阵士兵必须懂得如何和战友平等地配合。所以，有学者认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方阵，对古希腊的民主作出了重要贡献。方阵士兵是城邦的精英，掌握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他们习惯了在方阵中平等的关系，于是就把这种军事组织的原则用于社会政治。当然，能在方阵这样的集团中获得战友拥戴的人，日后在城邦的政治生涯中自有广阔的前程。方阵，以及为准备方阵而进行训练的健身场，就成了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场所。

后来西方社会有种种变化，特别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全民皆兵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的日常形态。但是，培养人的方式，则和古希腊形异神同。古希腊的体

育强调个人而非集体，因为个人的体魄和勇武是方阵的基础；集体主义精神，则会在方阵中培养。现代社会打仗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阵消失了；因此作为培养人才的体育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橄榄球、篮球等集体项目变得日益重要，个人项目则不被看重。因为像橄榄球这种比赛，其实就是对已经消失的方阵战法的模仿：你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和队友配合才能获得成功；你的领袖才能也必须通过这样的集体经验来证实。

我并不是说西方不强调个人项目。以美国为例，在纯竞技的层面，个人项目非常流行，比如网球、拳击等等。但是作为教育性的体育，集体项目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学校里最流行的，是橄榄球、篮球。甚至一些社会上很少有人看、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因为是集体运动，在学校则非常热门，比如女足以及网式曲棍球。你要是这种运动队的队长，毕业后出去华尔街找工作，优势甚至比有一张好的成绩单还大。《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还说，统计表明，在政界和企业界充任领袖的人，大学从事体育的明显比一般人的比例要高。你要真是个球队的队长，人家就认为你具有领袖才能，是当政治家、企业总裁，和将军的材料。

曾经，《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美国最年轻的市长的事迹，也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市长名字叫Luke Ravenstahl，年仅26岁，目前已经继任为匹斯堡的市长。美国人18岁当市长的事情，媒体早有报道。不过，那不过是百余人小镇的业余市长，连工资也没有，说是个街道办事处主任也许更合适。匹斯堡则曾是世界著名钢铁之都，如今虽然衰落，仍然有32万多的人口。Ravenstahl的崛起，也充满了运气。他本来是市议会（City Council）的议员。因为市议会派系争斗处于僵持状态，他作为一个妥协的人选，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市议会主席。紧接着，市长因病去世，他顺理成章接任市长。他的前途也未定。有的律师说按法律他明年必须竞选市长，现在不过是临时执政；另有律师则说他的任期可以自动延续到2009年。

抛开这些繁复的政治程序不谈，这么一个大学毕业才几年的人，突然就任这么大的城市的市长，所面临的挑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匹斯堡在美国属于最难治理的城市之一：制造业多已被外包出国，作为昔日的钢铁之都，城市经济自然丧失了竞争力，正在急剧衰落。而Ravenstahl值得一提的履历只有两个：他曾是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他毕业后在快递公司工作过几年。

他当然不忘橄榄球教给他的智慧。去年当地的球队Steelers赢得了自1979年以



来的第一次“超级碗”，球迷们将此视为匹斯堡复兴的征兆。在看Steelers的比赛时，Ravenstahl指着24岁的四分位Ben Roethlisberger说：“他也很年轻。”懂橄榄球的人都知道：负责传球的四分位是全队的绝对统帅。他必须在各种危局中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直接关乎全队的生死。一个队丧失了对四分位的信任，则立刻土崩瓦解。Ravenstahl现在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不管对他还是对他的支持者来说，此时此刻，他在大学橄榄队的经验，比他大学的成绩单更重要。不管他在大学的数学或英语成绩是A是B，他能够成为大学橄榄队的明星，就必须获得队友的拥戴，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而匹斯堡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橄榄球队而已。一个在球队里领悟和贯彻“战术意图”快的人，就更有能力制定并有效地执行领导城市走向成功的政策。

在目前的中国，不管什么岗位，要想获得提升就要想办法拿个博士。有些城市甚至以博士官员的比例而自傲。而美国则秉承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常常要将其放在方阵一样的运动队里磨炼。因为体育比赛是人生和社会规则简化本的演绎：你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向同伴证明自己的能力、责任感，和领导才能；而且你的品质马上就能在比赛场上看到结果。

## 最知名的大学女篮教练

Rutgers大学女篮的主教练C. Vivian Stringer, 2008年和学校续签了她的合同。在未来6年, 她一个赛季的工资是95万美元, 比现在的45万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拿如此丰厚的工资, 当然和她的战绩有关。她是美国大学女篮中第三号常胜将军, 是唯一一位曾经带领三个不同的学校女篮打入全美大学联赛四强的教练, 进入了美国篮球名人堂。不过, 她毕竟从来没有拿过全国冠军。这突然之间的薪水翻番, 使她拿的和拯救了该校橄榄球的传奇教练(是美国大学教练中薪水最高的阶层)一样多, 比一个终身教授的年薪高出10倍甚至更多。指导大学女篮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油水?

实际上, 这笔钱不仅仅是对她的篮球专业的奖赏, 而且是因为她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 在一场围绕着她球队的文化冲突中表现出了令人信服的领袖能力, 并因此一夜之间成为最知名的女篮教练。这一大戏剧本来将成为席卷美国媒体的头号新闻, 可惜被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击案给冲了, 至今基本不为国人所知。但是, 这一戏剧特别能够展示体育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所占的地位, 以及在美国的大学当“体育老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对我们理解体育如何教育化大有帮助。

她带领的队, 2007年赛季出师不利, 输了四场, 包括以40分之差惨败于杜克之手, 跌到了前二十五强(该校的传统名次)之外。她训斥队员(被认为是该校历史上最精英的选手): “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你们必须证明自己。”她要求队员退回有学校色彩的球衣和标志(因为她们还不配, 必须自己挣来), 加大训练量, 重振军威。最后作为一个不被看好的弱旅, 该队杀进了全国的四强, 并在半决赛中



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头号种子杜克队，可惜在决赛中被田纳西队所击败。

然而，比起杜克和田纳西等传统强队来，Rutgers颠覆了既有格局，是最受观众青睐的队。她们决赛的失利，好像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演出了一场灰姑娘梦碎的悲剧，赢得广泛的同情和赞誉，也被称为本赛季的无冕之王。然而，正当全队沐浴在一篇赞扬声中时，刺耳的声音从全国最有影响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发出。该节目的主持人Don Imus在报道比赛时，随口开了句玩笑：“哈哈，有些毛糙的女孩子从Rutgers来了，老天爷，她们还文身呢，一帮厉害的妓女……”

美国的媒体，有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遣词造句十分小心，不能触犯任何阶层、种族、性别或者年龄群体。“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的帽子漫天飞。不过，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条条框框，使一般的节目四平八稳、枯燥无味。这也就刺激出一批新的系列，即不管政治正确的教条的生猛节目。Don Imus主持的《新闻秀》就是其中一种。他拿手的好戏是所谓shock joke，就是开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玩笑。他会用极其粗俗的语言，甚至当面侮辱到他节目中的客人。这一天不怕地不怕的粗野风格，反而在听众中走红。他的节目每周有275万人次的收听率，NBC一年给他千万美元的年薪；美国各界显要，都争先恐后地到他节目中做客，似乎不值得被他辱骂的人，就不是个明星；甚至有人选总统也要到他的节目中宣布。这种玩笑、脏话、辱骂，和政治社会评论掺和在一起的广播节目，成为主宰美国的一大公共舆论载体。

这也是为什么他并不觉得拿“妓女”开玩笑有什么了不起。毕竟，骂人、说脏话是他的职业，什么都敢说是他成功的基础。你跟他斗也没用，因为你斗不过市场。他是千万的身价。

Rutgers这些刚刚用汗水换来了一个赛季荣耀的女孩子们，听到这话惊呆了。篮球队大部分队员是黑人。在黑人社区和黑人的音乐里，这种玩笑和脏话司空见惯。但是，她们是大学生，是赢得全国荣誉的天之骄子，许多还是全优学生，她们无法想象全国最有影响的广播节目会这样说她们。民权领袖自然也抗议。Don Imus马上道歉，说即兴开玩笑一时出圈，不是他的本意。事情按说也就这么过去了。有许多人还给C. Vivian Stringer出主意：球队的最佳战略是保持高姿态的沉默，让政治家和媒体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C. Vivian Stringer坚决回答：“我不这样认为。”在她看来，当主教练不仅是

教篮球，而且是育人。她要让自己的女孩子们看看，碰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于是，她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全队在媒体面前一字排开，自己对着麦克风，一口气进行了36分钟不间断的演讲，质问所有的人：“看看我身后这些女孩子，看看她们的成就。‘妓女’？你们谁能接受别人用这样的词称呼自己的女儿？”由此媒体立即升温，从要求Don Imus道歉，到要求他下台。

Don Imus见势不妙，马上要求和全队见面，当众进行解释和道歉，C. Vivian Stringer同意带队会晤。但是为时已晚，因为舆论的谴责排山倒海，广告商纷纷撤走给Don Imus节目的广告。最后，Don Imus的东家NBC宣布将他解雇。Don Imus起诉NBC违约，要求4000万的赔偿，这一大官司还未了结。

然而，C. Vivian Stringer证明了自己作为大学教练的价值：她不仅是个“体育老师”，而且必要时还是个政治领袖。关键时刻，孩子们就要靠她教她们怎样做人。要知道，美国的大学体育运动员，即使是明星，大部分还是普通学生，毕业后进不了职业队，要从零开始找工作。这样被一个全国的明星欺负，一时之间当然不知所措。这时就要看教练了。C. Vivian Stringer则不辱使命。难怪队员们说：“看看教练，一下子就有信心了。”她们学会了怎么应付生活的挑战。

因为C. Vivian Stringer的表现，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站出谴责Don Imus，希拉里·克林顿则要到Rutgers来竞选。Rutgers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女篮。C. Vivian Stringer则签约出版自己的自传：《站出来，昂首挺胸》。这，就是教育。



## 黑人难当教练

美国的黑人在体育上有卓越的天才，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这种天才使他们成为优秀的运动员，却未必能使他们成为教练。毕竟，运动员的竞争是最直接的：水平高低，在场上马上显示出来，谁的眼睛也逃不过，而且一切都直接反映在比分上。教练则不同。教练的水平，是通过运动员的表现间接反映出来的。藏头露尾之处甚多。所以，在雇用谁当教练的问题上，搞起种族歧视起来就更容易。

美国黑人教练的命运，就反映了这一点。美国的几个热门项目，篮球是黑人的天下，但教练以白人居多，虽然也有些黑人的面孔。冰球从队员到教练，全是一色的白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最说明问题的是橄榄球：黑白混合，虽然黑人表现出色，但橄榄球属于白人文化，黑人教练非常之少。

《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报道中揭露了这个问题。隶属于“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的大学橄榄球队有616个，仅有16位黑人主教练，占总数的2.6%，但黑人运动员则有19667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7%。

美国大学橄榄球分三个等级进行联赛，其中一级中又进一步分为一级A和一级AA。顶尖的球队，几乎接近职业队，队员的运动才能就是一切，黑人比例高。末流的队，如哈佛、耶鲁，根本没有体育奖学金，进球队先要进大学，要有好的学习成绩，所以黑人比例锐减。在一级队中，黑人队员占45.4%，白人占47.7%；在二级队中，黑人为38.3%，白人为56.6%；在三级队中，黑人仅为13.8%，白人为79.6%。但黑人教练的比例则明显和黑人队员的比例不一致。比如，在119个一级A

的队中，46.1%的队员是黑人，但黑人主教练仅5位，占4.2%；在115个一级AA队中，仅有6位黑人主教练；在151个二级队中，仅有1个黑人主教练；在231个三级队中，仅有4位黑人主教练。而且情况不是在好转。比如在一级A组中，1997年还有8位黑人主教练，如今剩下5位。

这一情况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更严重。该地区一共54个大学橄榄球队，只有一个三级队的主教练是黑人。一级队的黑人运动员占了37.2%，但全由白人主教练领导。这和这一地区的大学体育文化密切相关。在这54个大学中，只有2个大学体育部的主任是黑人，但有10位是妇女。可见妇女在这个男人的领地争取权力，进步比黑人要大得多。

要知道，大学橄榄球虽然有近乎职业队的上座率和巨大的商业收入，但队员除了拿微不足道的体育奖学金外，并没有收入。真正挣上百万年薪的，是球队的教练。教练圈这个小小的富人俱乐部，完全由白人把持。他们把肥缺给自己的哥们儿，不许外人染指。这也难怪，一些业内的黑人，已经开始准备诉之法律了。



## 美国大学的体育超霸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我们总看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几所常青藤大学名列前茅。这是评的学术质量。但是，如果谈起体育，哪所大学应该高居榜首呢？那恐怕要属俄亥俄州立大学。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体育年度经费曾达到1亿900多万美元，超出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亿700多万美元），名列全美第一。在美国大学体育的“第一球”橄榄球中，俄亥俄州立大学排名第一，虽然去年输给了佛罗里达大学。俄亥俄的男篮，也在大部分排名中名列第一。该校共有36个运动队，除了橄榄球和篮球外，还有棒球、冰球、射击、击剑、高尔夫、花样游泳等等，共980名运动员。学校在每个运动员身上的平均花费，是11万美元，竟是平均投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的3倍！这样巨额的投资，自然使学校的体育设施豪华无比。比如刚刚完成的橄榄球场的翻修，耗资将近2000万美元。冰球队训练用的滑行机，单价75000美元，可以创造一种在冰上以每小时16英里速滑的模拟训练。这样的设备，美国的许多职业冰球俱乐部也还没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所在地俄亥俄州的经济衰败。从2000到2005年，俄亥俄的中等家庭收入下降了9.3%，是全国经济最为低迷的州之一。住房贷款的坏账和住房作为抵押被没收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美国五大最贫困的城市，两个在俄亥俄（克里夫兰和辛辛那提）。也正是如此，州政府三番五次削减教育经费。俄亥俄州立大学是该州州立大学体系的旗舰，自然要靠州里的财政拨款。大学没有钱，只好提高学费。从2002到2005年，学费竟涨了60%。但是，面临拨款的不断

减少和学费的飞涨，最近五年该大学的体育经费竟然增长了46%！

一个州立大学敢这么在体育上烧钱，主要还是因为体育能赚钱。根据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提供的数据，俄亥俄州立大学是19所能够靠体育赢利的大学之一。在这里，体育不仅能自负盈亏，而且还可以拿出钱来支持教育，并推动地方经济。比如，体育部几年前拿出500万美元帮助翻修大学的中心图书馆。另有研究表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运动队，每年向地方经济注入1亿美元，其中的1/3来自球迷们在旅馆、停车、餐饮和购物等方面的花费。俄亥俄州立大学有5万多学生，是美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所在的州首府（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哥伦布，则一向以这所学校和其运动队为骄傲，将之视为自己的俱乐部。该校的比赛，在当地吸引60%的收视率是家常便饭。早晨的电视和广播，也充斥了该校教练的访谈，收视率超过一些全国性的热点节目。

不过，该校赚钱的体育项目，说到底只有两个：橄榄球和篮球。其他三十几个项目，都是在这两棵巨大的摇钱树下“乘凉”。上个赛季，橄榄球的总收入是5700万美元，其中包括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支付的全国冠军赛的费用475万美元，以及3165万美元的主场门票收入（该校球场有10万多坐席）。扣除各种花销，净赢利将近3700万美元。而去年在全国冠军赛中击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佛罗里达大学橄榄球队，赢利略低一头，才3400万美元。至于男篮，俄亥俄州立大学有着将近两万坐席的篮球场，去年也打入全国冠军的决赛，赢利900万美元。与此相对，女子冰球队去年消耗了120万美元，带来的收入仅为1600多美元。这也就是说，这两大高度商业化的项目的市场成功，使许多没有市场价值却有教育价值的运动得以展开，使校园生活更加丰富。

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体育上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体育和教育融合的商业化模式。大学生年轻好动，大学校园是体育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同时，美国的教育注重运用体育培养竞争、纪律和团队精神，从中小学到大学，体育都是教育的核心。而像俄亥俄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这样的州立大学，在这块市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这种州立大学学生人数甚多，常达几万人，市场规模远比一般的常青藤等私立名校要大。第二，这些学校因为是州立学校，靠本州纳税人的钱来资助。同时，本州学生的学费比外州学生低一半甚至更多，自然使本州子弟成为学生的主流。所以，这些学校被所在的州的老百姓看做



是自己的子弟，非常有认同感。有的地方没有自己的职业橄榄球或篮球俱乐部，就把当地大学队当做代表自己的俱乐部。甚至有些有职业俱乐部的地方，职业俱乐部也赶不上州立大学运动队的人气。第三，这些体育超霸所在的大学一般也有相当的质量。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列57位，在州立大学中列19位。佛罗里达大学则列49位，在州立大学中列17位。密西根大学更是地道的名校，列25位，在州立大学中排在第3位。孩子能上这种学校，父母都感到荣耀。哪怕自己的孩子不在运动队，学校的比赛也都跟着看。

地方社会的认同和知名度，又吸引了大量的捐款。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体育俱乐部Buckeye Club在最近五年收到的捐款平均每年增长12%，如今已经有3700名会员，比2003年时增加了32%。大部分会员等级的会费，都在1500美元以上，最高可达10万以上。许多大款也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学的球场上。比如一位石油巨富，捐了3000万美元翻修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橄榄球场，又捐资1亿6500万美元在校园里修建运动员村。耐克的创建人Phil Knight则拿出1亿给俄勒冈大学的体育部。在过去五年，全美大学体育的前六大比赛，总共吸引了39亿美元的捐款来修建新的体育设施。捐助当地大学的体育，成了富裕阶层的“公民职责”。

如今美国大学体育高度商业化，甚至过分商业化，引起教育界乃至国会的警惕。主要的问题，是许多大学因为体育忽视了学业，运动员学生的功课太差。另外，有些学校体育赔钱，以教育经费支持商业化的体育。不过，那些挪用教育经费支持运动队的，多是在体育商业化中失败的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则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体育不仅给学校带来声誉，也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另外，体育部拿出1200万美元的巨资，支付运动员的学费，另拿出170万美元，给运动员额外请私人老师，尽最大可能保证他们的学术水准。

中国体育正在向市场化转型。但是，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几个职业俱乐部。实际上，大学体育是市场化体育的草根，也是教育的核心。美国职业橄榄球和篮球这些最为赢利的体育联盟，都主要是从大学运动员中选秀。像田径、游泳等非赢利项目，也主要以大学为基地。没有美国大学体育，职业体育就寸步难行。所以，我一直主张，中国的体育不仅要市场化，而且要教育化。俄亥俄州立大学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参照。

## 美国高中橄榄球的崛起

说美国的橄榄球普及，不仅要算全美有多少职业队，也不仅是看其庞大的大学联赛。最让人吃惊的，恐怕是高中的橄榄球运动。

美国几乎每个高中都有橄榄球队。要知道，一个橄榄球队可以有几十甚至近百名队员，不少高中的学生人数在千人以下，除去女生，男生中可能五分之一要到校队里打球。

当我在纽黑文第一次使用当地的运动场时，心里暗暗吃惊：保养良好的绿草坪，奥林匹克标准的塑胶跑道，几百人的看台，电子记分牌……在中国，这大概就是国家队的设施吧。可是，纽黑文是最穷的城市之一。后来我搬到波士顿地区，到本镇的高中一看，更傻眼了。人家的设施比纽黑文的好多了，看台几乎是环形的，坐上千观众不成问题。

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到了橄榄球更流行的南方和西南部，一场高中的橄榄球比赛，吸引12000名观众是很平常的事情。美国职业足球的大联盟比赛，平均上座率距此还差一点。观众多了，自然就得卖票。一个高中的体育场，竟能耗资800万美元把看台修到6500个座位，比高中的学生人数还要多好几倍。在得州，两个高中合建一个橄榄球场，竟有12000个座位，耗资1830万美元！

最近几年，更有一股新潮。这些庞大的高中橄榄球场，不仅有几千人的座位，还有豪华空中套间、豪华接待厅，并有专用电梯把贵宾送到套间里，简直就是模范职业橄榄球场的设施。

钱从哪里来？最近美国公立学校资金告急，怎么能这么烧钱盖运动场？要知



道，高中全是当地纳税人的税金支持的，谁会容忍这样的事？这里的诀窍是，因为高中橄榄球越来越流行，渐渐成了学校的摇钱树。门票收入相当可观，豪华套间成了吸引财主捐款的设施，甚至有的高中，已经有电视转播权的收入。所有进项加在一起，经营得好，就可以支付许多学校的体育经费。

首先，这些豪华套间大多是用私人捐款建的。建成后，又可以打当地土财主的主意。美国社会有许多富裕的橄榄球迷，他们活着的一大梦想，就是到橄榄球场包个套间，炫耀一下自己的地位。可惜，职业橄榄球先不说，在大学橄榄球场包个套间，也贵得惊人，常常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比如，乔治亚大学橄榄球场的套间，一个赛季的价格是9万美元。土财主还没这个实力。但是，当地Vidalia高中的橄榄球场，一个套间包5年，价格是2万美元。当地一个汽车销售商，儿子是高中橄榄球队的队员，自己包个套间，比赛时把自己的顾客和雇员都请来，又给儿子捧场，又疏通了生意，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种豪华套间，在土财主中还挺俏。

更令人惊异的是，能折腾起豪华套间的乔治亚州的这个Vidalia高中，仅有700名学生，每年在橄榄球上花10万美元左右。体育经费是15到17万多美元之间。橄榄球的普通门票，6美元一张，一年收入6到7万美元。另有35000个保留席的预售票收入，再加上其他收入，不算捐款，橄榄球基本也算自负盈亏了。而在一些规模大的高中，橄榄球的年度经费可达35万美元。当然，所有这些成本，不包括教练的工资。因为教练等于是体育老师，工资要由纳税人支付。

体育是美国教育中的核心内容，高中又是当地社区生活的核心，孩子们的橄榄球赛，总有许多人捧场，经营得好的就可能赢利。不过，目前这种商业化，令许多人警觉。美国职业橄榄球比赛，豪华套间是必备的设施。但公立学校强调平等精神，豪华套间就很刺眼。不久前，密西根大学橄榄球场翻修，要加豪华套间以款待捐款人，引起许多师生和校友的抗议，此事还没有最后结果。也有的高中，本来计划豪华套间，但在当地纳税人的抗议下放弃。人们最大的担心是：橄榄球本是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从高中就这么商业化，就可能使橄榄球偏离原来的教育目标。

## 大学橄榄球：生意还是品牌

几年前，设在Amherst的麻省大学橄榄球队球运奇好，打进了全美大学联赛1-AA级的决赛。但是，在冠军战的前夜，大学必须面临其橄榄球的另一个现实：赔钱冠军。在2005—2006年度，该大学的橄榄球队净赔290万美元，居全国第二，居公立大学的第一。

大学橄榄球是个非常昂贵的项目。以麻省大学为例，为一个橄榄球队，学校要给63份体育奖学金、支付10位教练和相关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以及95位队员的装备、旅费和其他种种相关费用。按说，橄榄球并不是最贵的项目。学校在每个队员身上的平均投资为27555美元。相比之下，女篮每个运动员要80605美元，男篮为73077美元，男子冰球为36550美元，垒球为30329美元，女子网球为28072美元，都比橄榄球贵。但是，橄榄球队人数多。全校体育总经费是1900万美元，橄榄球就花去了290万，占了15%。

怎么办？学校已经提出了设想：进一步提升橄榄球的地位，进入1-A级的比赛！美国大学橄榄球有三个级别，其中一级中又分1-A和1-AA两层。1-A是最高级别，有119个队，其人气直逼职业赛。参加了1-A级的比赛，就进入了非常有油水的商业竞争，一旦打入季后赛，门票、电视转播，乃至品牌收入就会滚滚而来。1-AA的比赛则完全不同。这一级别有116个队，其中70个来自公立学校。试想，有了119个1-A级的一流队看，再加上职业联赛，谁还有工夫看1-AA级的比赛？所以，在这个级别，尽管进入季后赛，收入也非常少。而1-A级的队，大部分是赚钱的。比如同州的波士顿学院橄榄球队，属于1-A级劲旅，一年净赚140万美元。



麻省大学队当然有升级的实力。它自1998年赢得1-AA级冠军后，一直是支劲旅。但是，进入1-A级，必须加大财政投入。按美国大学体育联合会的规定，升入1-A，该校给的体育奖学金要从63个增加到85个，同时要修一个3万座位的球场，并翻新其他相关设备，这笔设施投资，估计就要2.5亿美元。康州大学1999年从1-AA升进1-A，投资1.5亿美元，如今年赢利为220万美元。同时，美国有男女平等的法律规定，即所谓第九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增加对男子运动的投资时，必须相应增加对女子体育的投资。这样一算，费用还得翻番。

面对这样的困局，校园内引起激烈的辩论。一些教授认为，这样的投资超出了学校的财政支付能力。即使有这样的钱，也应该先用在教学上，扩大教授的队伍。毕竟学校首先是读书的地方。但另一部分人认为，投资可以通过捐款和游说州政府拨款解决。如果在1-A成功，投资在十年多就可能赚回来。更关键的是，在1-A走红，会提高学校的品牌，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报考。

哪派会赢？目前很难说。但是，我看拥护升级一派胜面要大一些。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大学纷纷要提升自己的地位，烧起钱来很是吓人。麻省大学在Amherst的校园本来是一所普通州立大学，目前地位正在上升，向名校跃进。要想快速成功，就需要橄榄球的广告效应。

## 大学球星怎样成功

我曾经反复讲过，美国的大学体育，不仅为职业体育培养了许多球星，而且还培养了社会各界的领袖。从总统、议员，到企业总裁、将军，几乎无所不包。大学体育的参与者，毕业后的成功率远高于一般的学生。

最近引人注目的一个从大学球星转化而成企业领袖的例子，是Brian Davis。他是一个典型的由大学体育塑造的英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位Brian Davis正在准备成为NBA的一支球队Memphis Grizzlies的所有人。拥有一支NBA的球队，可非同儿戏。目前NBA的30位老板，全是亿万富翁，全在40岁以上，其中29位是白人。Brian Davis年仅36，是从小由单身母亲在贫民窟用政府的救济食品喂大的黑人孩子。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生父。不过，他有的是志气。他9岁时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我什么都能干！”他铲雪、修草坪、扫叶子，无所不为，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

最后使他证明自己的还是篮球。他因为具有篮球天才，被选入杜克大学男篮。很快，他就显示了自己的球艺和领袖才能，成为队长，并领导全队在1991年和1992年连夺两届全国冠军。但是，到了职业队后，其球艺“撞墙”，一筹莫展，最后在NBA干了一年文职。随后就和当年的队友联手，在杜克所在的城市Durham办起房地产公司。

因为他和队友在当地是人气很旺的球星，生意很快兴隆起来。当时，市中心破落不堪，人口一度仅剩几百人。他则充当公司的公关大使，说服市议会，他们的公司能够用高档公寓复兴市中心，结果立竿见影。原来被遗弃的烟厂，变成了



时髦的高级公寓。其西村计划，有240套公寓，空房率仅2.5%。他们的成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新的工程又破土动工。

Brian Davis的野心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是梦想着NBA，Memphis Grizzlies成了他的目标。他希望把他的房地产模式带到NBA的经营中。用他的话说：“Memphis是个黑人带。我们如果不能赢得黑人的支持，那肯定就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他计划以Grizzlies主场为中心，改造和复兴Memphis的市区。同时，他还可能成为美国足球大联盟的华盛顿联队的次要股东，试图借此振兴当地一些破落的地区。

但是，要拥有NBA的一支球队，门槛甚高。Brian Davis和他领导的集团，已经同意支付2.5亿多美元的款项，收购球队总价值的70%，并拿出1.5亿支付其他费用。Brian Davis个人，则必须拿出5400万美元的现金。他声称他将支付。

这笔交易最后结果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人们怀疑Brian Davis是否有这么多钱。他毫无疑问是百万富翁，但还不是亿万富翁。不过，一个在贫民窟靠喝政府的救济奶粉长大的穷孩子，不仅挤进杜克这样的一流名校，而且毕业后十几年，就成为当地的企业领袖，实在是个奇迹。而没有美国式的大学体育，这种奇迹根本不可能出现。



# 美国大学的钱经



## 要钱的文化

中国的大学在烧了几年钱后，现在开始为钱发愁了，据说有的已经濒临破产，乃至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出来下安民告示：高校不会因2000亿元的贷款而破产。

高校不会破产，这个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事情有时非常简单，钱糟蹋完了，就向老百姓要好了。公办的事业怎么会破产呢？不过，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不需要还的债。从长远看，大学要想生存，要有竞争力，就必须学会一种与向政府要钱不同的要钱技巧，并培养相应的要钱文化。

世界上的大学，数美国的最富。同是一流名校，哈佛的捐助资金（endowment）为280亿美元，耶鲁是180亿。相比之下，牛津才71亿，剑桥仅59亿。这里的一大区别，就是美国人有要钱的文化，英国人则以谈钱为耻，向人要钱则更是恬不知耻了。

钱不要是不会自己来的。美国大学富有，是其要钱系统发达使然。要钱的对象不是政府，而是校友。比如我刚离开耶鲁，校友会就追上来，先是填写通讯表格，接着校友杂志就寄来了。另外，在波士顿校友会有各种集会，都会及时通知。与此同时，电话、信件就接踵而来。目的都是一个：要钱。学校的官僚打电话来还好拒绝。可是，人家有时候派一个本科生打电话，讲起学校的情况，讲起他或她在校园里的生活，讲起你常去的图书馆，勾起你的感情来。面对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后辈，不给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

结果是，美国大学校友捐款率极高，平均达12.4%。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校友捐款率竟达43.1%，耶鲁是33%，哈佛是24%。再看英国，大部分大学的校友捐



款率仅1%，牛津剑桥也才11%，还比不上美国的平均水平。

英国的大学靠政府资助，吃着皇粮当然可以不要钱。但是，如今政府吃不消，要大学“自谋出路”，自己去要钱。布莱尔政府许诺了2亿英镑（将近4亿美元）的等价基金（*matching fund*），即私人捐1英镑给大学，政府就再加1英镑，捐一得二，希望以此鼓励捐款。

可是，光有要钱的政策没有要钱的文化还是不行。想想看，如果你要跑到一位大款那里说：“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具体地说，我们希望您能给我们500万英镑。”这话要让美国人说，他会坚定不移、神气十足，还不忘讲一通捐款后的税收优惠。那架势是你非给不可。要是换成英国人，没说半句就不好意思了，即使不把话吞回去，最后也会说：“实在对不起，这确实太多了。您考虑一下。不行也没有关系。”这样钱还会来吗？

这种不同的文化，并不仅仅限于大学。美国人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是其GDP的7%，英国才1.8%。这并不仅仅是美国人慷慨大方，也是因为人家募捐如同逼债，你不给也不行。比如公共广播电台，募捐就是通过广播向你喊话：“我们从政府得到的资助远远不够。没有听众的帮助，根本无法维持。想想看，每天我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多少信息！当然，你不捐，我们也会存活，你还会收听。不过，这就好像别人付钱给你白听了。想一想，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我一边开车，一边听着这样的唠叨。7岁的女儿在后座上早坐不住了：“爸爸，我们捐了吗？”“没有。”“可是我们在听呀。你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定律吗？”看看，我要是再不捐，就和小偷差不多了。甚至当地的警察也来要钱，说警察的工作很危险，保护着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可是我一看报，一个交通巡警一年竟挣十几万美元，比我工资多一倍多，他们应该给我捐才对。这回我终于痛快地说了“不”。

看看我的小女，从小就学会为学校募捐，别人对她的行为又支持又尊重。这么长大后，要钱就会大大方方。不这么长大，像这样要钱可不容易。美国人这套英国人学不来。所以，英国一些大学，干脆就雇美国人来帮着要钱。

中国的大学要学美国这种要钱术，怕是更难。中国人的脸皮并不像英国人那么薄，只是中国的大学对校友没有基本的礼遇。我从北大毕业20多年，北大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如果明天突然来要钱，我会给吗？怕是门儿也没有。耶鲁不同。人家定期会向你汇报学校的事务，一笔账一笔账地报。校董选举，把选票

寄给你。而校董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是任命校长的地方。当校友能决定谁当校董，其实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要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校友，那就是自掘坟墓。

美国大学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和这种校友当家做主的要钱文化密切相关。让校友给钱，学生在学时就要对人家关怀备至，让人家绝对满意。毕业时帮人家找工作，找到工作通过校友关系帮助毕业生成功。学校一辈子都是学生的家。你教育失败，培养的人没有出息，以后就没有人给得起钱，学校就失去了竞争力。相反，你的学生许多当了总统、企业总裁，以后就财源滚滚。这种要钱文化，当然和我们向政府要钱的文化塑造的大学有本质的不同。举个例子，我们向政府要钱，大学就越办越大。但向校友要钱，小大学往往更有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校友捐款率，普林斯顿、耶鲁、哈佛这样依次排下来，校友捐款率和学校的规模正好成反比。理由很简单，小学校更有人情味，学生之间的纽带更牢固，也更容易使学生对学校有责任感。所以一般小学校的学生更支持母校。

中国的大学，不学这种要钱文化是不行的。不过，日后要想要钱，现在就要把学生当做学校的主人。如果人家毕业后只觉得被你宰了一刀，以后谁还会给你钱？



## 耶鲁财神

“如果你经营对冲基金投资，你就身价8亿（但你竟然拿着现在的工资）。你有什么毛病？”

这是在曼哈顿金融界的一次讲演中来自听众的提问。提问者是位对冲基金投资者。被问者则是讲演人——耶鲁的首席投资官David Swensen。

David Swensen，是在耶鲁拿工资最高的人：100万美元，超过校长的一倍以上。但是，他在哈佛的前同行，年收入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一个好的对冲基金投资者，则可能挣到上亿。所以，在金融界，百万收入的David Swensen确实太过安贫乐道了。

再看看他的业绩就更是不可思议：他也许是历史上给耶鲁带来的财富最多的人。他的职务很简单，就是用耶鲁的捐助基金投资，使学校的财力升值。在美国，特别是私立名校，都拥有大量捐助基金。这是一个学校实力的基础。如果能够聪明地用这笔基金投资，学校的资产就会迅速翻番。所以，各大学会不惜工本，斥重金聘请一流的金融专家来经营。

耶鲁的捐助基金仅排在哈佛之后，为全美第二。这笔钱的形成，当然要靠一系列慷慨解囊的校友和财主：Harkness, Sterling, Beinecke, Mellon等等。这些名字，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财神”。耶鲁的许多建筑、图书馆、学院都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捐助的金额，从一亿多到两三亿美元不等。但是，David Swensen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出现在任何耶鲁的建筑上，他给耶鲁带来的财富到2005年为止已高达78亿美元，无人能比。在2006—2007年度，耶鲁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

28%，高于任何学校捐助基金的表现。

这78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首先，在Swensen的经营之下，从1985到2005年这20年，耶鲁的捐助基金从13亿增长到140亿，净增127亿。当然，这20年赶上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股市火爆，各学校的捐助基金都通过投资大幅上涨。净增值当然不是Swensen一人之功。不过，如果拿各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长比率来对比，在Swensen的经营下，耶鲁的捐助基金比按各校平均增长率创造的财富多出78亿。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经营有方。即使和耶鲁的“巨无霸”对手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等学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比，Swensen的经营也比人家多生出40亿。具体地说，这20年，耶鲁捐助基金的年增长率是16.1%，哈佛虽然也表现出色，但年增长率也不过是14.9%。如果一位校友1985年捐给耶鲁1万美元，到2005年，Swensen就让这笔钱变成了将近16万。即使把这笔钱放在股市中，现在也不过是4万到9万多。难怪Swensen在哈佛的同行Jack Meyer自叹不如：“在这个行当中，David（Swensen的名字）是最好的。”

1985年，当年仅31岁的David Swensen出任耶鲁捐助基金首席投资官时，耶鲁的捐助基金正陷于危机之中。从1968到1979年，美国处于高通货膨胀、股市低迷的阶段。耶鲁捐助基金的购买力下降了45%，以后也迟迟不见起色。实际上，耶鲁的财政危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乃至学校穷到要砍掉一些缺乏竞争力的系和学科。甚至一度连社会学系也面临着关门的危险。

捐助基金是一个学校的底气。耶鲁靠这笔钱支持着全校28位最顶尖的Sterling教授，给学生提供奖学金，维修各种基础设施，支持各种运动队，等等。捐助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不佳，一切都免谈。这也怪不得，耶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Swensen的金融魔棒下渐渐反弹。科系不再砍了，像商学院这样的新兴学院，反而异军突起。给学生的奖学金也更有竞争力了，甚至读硕士学位也能拿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奖，所有博士学位都拿到全奖，外加暑假的经济资助（美国一般的好大学，博士生中一部分人才能拿到全奖，但不包括暑假；硕士生全奖很少，减免学费就算不错了）。同时，整个校园突然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校方投入大量资金，对年久失修的建筑逐个维修。号称世界第二大的综合健身房，本是个获奖的老建筑。拆掉重建一个现代的健身房，费用是维修老建筑的一半。但是，财大气粗的耶鲁决定保留老建筑，对之翻修扩建。这个健身房经过昂贵的整形后，变



成世界第一大，而且照样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风格。这一切，离开了Swensen怎么可能？

当然，他并不仅仅给学校带来财富。许多教授和员工的退休金，也跟着捐助基金经营。结果水涨船高，大家跟着这位财神一起致富。一位教授退休前竟得意洋洋地对学生说，他的退休金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了，高兴得如同喝醉了一般。这也难怪，Swensen的事迹以封面人物故事刊登在耶鲁校友的杂志上。许多人把他看做是耶鲁成功的魔术师。

Swensen出身于书香门第，是6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化学教授。他父亲还是威斯康星大学River Falls分校文理学院的院长。他也就是在父亲的学校里读完了本科。1975年，他来耶鲁读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Tobin和Arthur Okun讲座教授William Brainard。毕业后，他到华尔街工作了6年，但觉得华尔街不是安身立命之处。他最喜欢的还是耶鲁。这时，恩师William Brainard正好当了教务长（provost，也是耶鲁第二号人物）。这位经济学家清醒地意识到扭转学校的危机必须以理财为先。而理财的能力，非自己的得意门生Swensen莫属。于是他力挺Swensen，破天荒地让一位31岁的年轻人执掌耶鲁的财政命脉。

Swensen也当仁不让，迅速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闪光。除了理财的天赋外，他最可贵的素质，就是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一个只想赚钱的人，不可能在耶鲁待这么久。比如哈佛捐助基金的负责人Jack Meyer，虽然业绩比不上Swensen，挣的钱也比Swensen多得多，但无法安心于非营利组织中的“清寒”日子，最后离任，下海自己搞对冲基金投资，一下子敛得许多资金。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的Swensen，则从小受父母的影响，认识到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为公众服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美国金融投资业的许多做法是不道德的。他的近著《非常规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基本方法》，对前通用电器CEO韦尔奇（Jack Welch）惊人的退休待遇，对Merrill Lynch的分析家向客户兜售自己的股票，特别是对互助基金（mutual fund）向客户收取巨额佣金却不代表客户利益的行为，都逐一炮轰。也正是他在道德上的无懈可击，使他对来自左翼的攻击嗤之以鼻。一些学生活动分子攻击耶鲁投资木材和石油业，不考虑环境后果。耶鲁的工会也攻击他只顾赚钱，不考虑社会和环境后果。2003年，耶鲁工会组织罢工。7名退休员工竟占领了他的办公室，要求更高的退休金。当他耐心地说明他无从操纵他们的退休金时，那几名工

友竟拒绝相信。

在耶鲁，Swensen不仅负责投资，卷入校园政治，而且还自愿给本科生和商学院的研究生们上课。他不愿意单纯地做一个赚钱机器，而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作为经营耶鲁投资的最高官员，他每天都会遇到这类道德问题：投资烟草业是否对得起那些吸烟的受害者（哈佛已经从烟草业撤资，耶鲁没有行动。据Swensen声称，耶鲁没有相关股份）？是否应该用投资的方式支持社会公益？一句话，钱究竟是个中性的商品媒介，还是可以用来支持社会道德的工具？

所谓“道德投资”（ethical investing）的问题，在耶鲁已经辩论了30多年。1972年，耶鲁成为第一个放弃价值中立的投资行为（即所谓“消极的机构投资者”）的主要大学，并由学生、教师，和校友组成了“投资者责任委员会”。在1978到1994年期间，在这个委员会的敦促下，耶鲁卖掉了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17家公司的股票。像哈佛、耶鲁这种在财政上势可敌国的名校，怎么投资全社会都在盯着。大学经营自己的资产不能只找能赚钱的人，还要考虑其道德信誉。正如Swensen所声称的：耶鲁只会把钱交给有极高的道德准则的人。投资的目标是赢利还是实现某种社会理想，其间的平衡很难掌握。在Swensen的领导下，耶鲁的投资行为已经受到左翼和进步主义人士的批评。Swensen若不能以自己的人格为耶鲁的道德标准做担保，投资即使赚了钱，也会产生不能承受之重的政治后果。Swensen之不可或缺，就在于他立功、立德、立言，兼理财、政治和知识才能于一身，能够同时对付金融和道德的问题。这20年耶鲁的成长离不开他。他为耶鲁创造了历史。



## 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 888 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才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缺乏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情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20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2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1万的生活费，整整3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笔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

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清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几乎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账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了10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扔，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了，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6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如果我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像惯着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而美国的学校则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以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的，大学校园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



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做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给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3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做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做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索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能指望学生像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 美国大学的热门专业涨价

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强调通才教育，目标是培养饱满的人（a well-rounded person），即我们所谓的全面发展的人。但是，如今的市场竞争使大学教育越来越专业化，乃至一些热门专业开始标价出售，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忧虑。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商学院本科的学生，每个学期要比其他学生多缴500美元的学费。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工程系的学生每个课时要多支付40美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专业高年级学生，要在每学期州内学生2411美元的学费上多缴250美元（美国州立大学对州内学生的收费比对外州学生的收费几乎低一半）。衣阿华州立大学的商学专业学生，每年要多支付500美元，并且这一价格在未来两年每年还要再涨500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大学各专业的教授工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一个法学院或商学院教授的起薪达到13万美元，这些专业一个助理教授的起薪比该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工资还高。另外，有些专业（特别是工程专业）需要的设备极其昂贵，抬高了这些专业的成本。

从另一方面看，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的身价也大有不同。CNN每年都公布每个大学专业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和相比前一年的上涨幅度。2007年的数据如下：

化学工程：59351美元 上涨5.4%  
计算机工程：56201美元 上涨4.8%  
电子工程：55292美元 上涨3.2%  
机械工程：54128美元 上涨4.6%



计算机科学：53396美元 上涨4.1%  
民用工程：48509美元 上涨5.4%  
信息管理：47648美元 上涨4.2%  
会计：46718美元 上涨2.3%  
商务管理：43701美元 上涨3.9%  
市场销售：40161美元 上涨6.1%  
政治学与政府科学：34590美元 上涨5.9%  
历史：33768美元 上涨3.3%  
英语：32553美元 上涨5.3%  
社会学：32033美元 上涨3.5%  
心理学：31631美元 上涨4.7%

看看以上的数据就知道，排名第一的专业起薪要比排名最后的几乎高一倍。而且最大的一个差距，出现在实用专业和非实用专业之间。收入最低的“实用专业”市场销售比收入最高的“非实用专业”政治学和政府科学的起薪高出5000多美元。如今大学费用上涨迅猛，花了那么多钱上大学，谁不想毕业后找个薪水高的工作呢？另外，上述前6位全是工程专业，需要良好的数理基础。这恰恰是美国学生的弱项，大部分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与商学有关的专业就格外热销。

这种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挑战着美国大学的理想。采取这样政策的大学，都表示无奈。这些大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州立大学。热门专业成本高，但大学很难因此从州政府要来特别拨款，选的人越多学校越赔，最后只好采取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段来对付。

这一政策的结果，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价格提高后，就等于把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排斥在热门专业之外，在学校形成贵族专业和平民专业，破坏了校园的多元性和社会的整合。

第二，上了热门专业的学生，因为多花了钱，“消费者”的心态超过了受教育者的心态。他们非常不愿意在本专业之外选课，因为自己花了大价钱，不能选“便宜货”。这样一来，通才教育就更不可能，大家都龟缩在自己的专业中和其他学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狭隘的教育，最终会伤害这些学生。比如衣阿华州立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Mark Kushner指出：如果你学环境工程、对付气候变化，你所需

要掌握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而且还要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狭隘的工程训练，无法适应社会需要。

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这些大学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来对付热门专业涨价的后果。比如，许多大学容许热门专业以外的学生选修这些专业的课程，鼓励跨专业的交流。另有些大学，把热门专业附加学费收入的20%—25%用于奖学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加以资助。不过，这些看起来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政策最大的支持者是支付这些额外学费的学生本身。比如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商学院本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支持涨学费的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学校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吸引一流的教授，以维持这一商学院的声誉。最终众多的学生团体投票支持了涨学费。

不过，许多人批评这种高等教育是偷工减料，从根本上伤害了大学。在10到15年前，州立大学还能得到州政府相当充足的资助，有恒产则有恒心，不会采用这样商业化的政策。如今，州政府的资助越来越不够用，大学生则越来越多，专业偏好也越来越实际。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学的高远理想就很难再维持。这也是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的全是州立大学。私立大学，特别是精英的私立大学，全都维持着通才教育的完整性。在加州一个精英本科学院Pomona College的副校长Richard Fass就说，我们强调学生要感觉到自己是学校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用学费把各专业的学生都分割开来。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盟校，政治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等等，还是最热门的专业。

以我个人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观察，这一实用化的倾向，是近年来美国大学普及以及媒体对大学炒作联合产生的副作用。因为美国经济迅速白领化，蓝领阶层面临着“灭绝”之前景，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大学读书。但也正是这个阶层，对大学教育最缺乏理解。许多大学生，家里世世代代也没有一个大学生，自己到高中毕业为止，也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他们上大学的原因，就是突然听说不上大学以后就没有工作，于是匆忙打听一下到大学应该学什么会找得到工作。像这样的人，拿到上面CNN报道的那个表格一看，很容易就作出决定：学工程我不是那块料，商务管理、会计、金融、推销等专业最万无一失。

其实，CNN的报道有极大的误导性。有的大学官员指出，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一生会换几个工作，大学专业也许对起薪有影响，但很难预测你一生的收入



水平。在基层大学教书的经验也给了我类似的印象。比如，学商学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进学校的目的非常明确：大学就是个技工学校，他们学了手艺后就开始工作。这样的人，毕业后往往不再上研究院。但是，如今美国大学普及，大部分年轻人都上大学。大学毕业，不管是什么专业，都属于一般劳工，不是专业人才。停在大学专业上，并仅依靠这一专业找工作，也许起薪会高一点，但是，日后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前景。

相比之下，许多历史专业的学生，课堂表现非常突出，素质明显高于那些商学本科的学生。再问他们毕业以后准备干什么，大部分说是要读法学院。他们来学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学院喜欢招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另有些人希望毕业后积累几年工作经验，然后进商学院或其他研究院深造。这样的学生，人生设计就比前一种热门专业的学生复杂得多。你很难想象他们一生的收入会比那些商学本科的学生少。比如几年前，我的一个学生作为历史专业本科生毕业，她本是我们学校学生历史学会的主席。我当年来找工作时进行演讲，她还作为学生代表出席并且参与了决定这个教职该给谁的投票。她也一直是我班上的优秀学生。她毕业后，立即被本校的法学院录取。我们这个法学院（萨福克法学院），在当地声誉很好，许多名校的本科毕业生都来投考，许多人上我们学校读本科，也是希望进这个法学院能容易些。不过我告诉她，她应该再工作几年，上更好的法学院。于是，她就在一个非营利机构就任了一个工作。我不能问她薪水，但收入不高是肯定的。许多历史、英文专业的学生，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的“起薪”，其实不过是在大学毕业和进研究院之间的一个临时工作的收入。要这么算，就完全低估了他们的潜力。

在我看来，热门专业另价出售最大的危险是把一些普通大学渐渐变成了技校，使私立大学和普通州立大学的距离拉大。那些父母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都跑到精英大学，选择“不实际”的专业，最后进了研究院，成为高级人才。而劳动阶层的子弟，因为不了解大学教育，匆匆忙忙选了个热门专业，并在这一专业上干一辈子。这样，通才教育则永远属于一小部分“贵族”，热门专业，其实才是真正的“平民”专业。

## 美国大学通过涨学费竞争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曾刊登一篇报道，美国的大学竞相涨学费，而且学费越涨，吸引的学生越多。虽然学费上涨使中产阶级的子弟上不起学的呼声日益升高，但学校要少收学费，人家还不来呢。

比如，宾州东部的农村有一个叫Ursinus College的小大学。2000年初，校董事会告诉校长，学校的申请人数下降，因为学费太低了。董事会投票决定一下子把学费和住宿费上调17.6%，达到23460美元的水平。当然，这笔钱中，包括给每个学生配备一个笔记本电脑。结果，四年之内，新生入学人数上涨了35%，达到454人。另一个在阿肯萨（最穷的州之一）的小大学Hendrix College，两年前决定把学费和住宿费上调29%，达到21636美元的水平，同时强化课程设置和服务，结果新生入学人数达到409，上涨了37%！

这不是出现在几个学校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潮流。各大学在自己的定位中锁定同级别的主要竞争者，人家涨学费而自己涨，申请者就觉得该大学地位下降，不会登门。美国现在上大学的人许多还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对高等教育了解甚浅，上学也很盲目。比如我当年在纽黑文的房东到当地一个大学读书，学费公司里出一半。她本来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学校的学费比另一个高出一倍，她上了贵的。我问她两个学校有什么区别，她竟一点也答不上来。

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第一，美国人对大学费用的支付能力还是很高，大学费用上涨对美国家庭的压力被夸张了。第二，学费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费用的上涨。美国大学一直采用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双高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



Ursinus College, 学费住宿费上涨17.6%的同时, 奖学金助学金等财政资助增长了将近20%, 总额接近1290万美元。全国的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从1993到2004年, 美国大学学费上涨了81%, 高出通货膨胀率的一倍还多, 但是奖学金助学金等财政资助, 则上涨了135%。在四年制私立大学读书的学生, 有73%的学生获得了财政资助。在有的学校, 获得财政资助的学生比例达到90%! 如果按标价算, 大学费用占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比重, 从1990年的32%左右上升到如今的48%上下; 但真按实际支出算, 从1998年至今, 不过是从大约24%上升到27%上下。这与其说美国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萎缩, 不如说大家更加舍得向教育投资了。

家庭舍得为孩子的大学教育投资, 大学就得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重点不是把大学弄得更便宜, 而是提高教育质量。顶尖的本科生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就是一例。该校学费和寄宿费用的标价是41000美元, 一半学生支付这样的价格。另一半学生则得到平均28500美元的资助。有些家庭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的学生, 也能拿到资助。同时, 这个仅有1500个学生的袖珍学校, 教育经费高达1亿多, 平均每个学生的教育成本是73690美元。学校的财政负责人骄傲地说, 在这里, 即使付全价, 花4万块所获得的是价值7万多的教育。学校高达13亿美元的捐助基金, 支付着43%的预算, 维持着这种“赔本”的运营。

像Swarthmore College这样的本科生学院, 没有研究性大学那种大规模的研究项目, 钱全花在教学上, 教育成本在一流大学中还算低的。另一所精英本科生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Tom Tritton说: “你要为你的学生创造一流的大学经验, 这是要花钱的。我有时对家长说, 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把大学教育变得便宜些。”问题是, 家长并不愿意。

可见, 美国大学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追求优异, 而不是价格竞争。一些一流大学, 资源充足, 但非赢利性的体制, 使这些学校只能把拿到的钱用于教育, 不能流出校园, 结果, 一流大学和三四流大学的价钱几乎相等。比如, 前面提到的Ursinus College如今的标价是33000多美元, 而哈佛和Swarthmore College也是这个标价。前者靠学费支撑, 后者则靠大量的捐助, 使质量的提高不会立竿见影地反映到价格的上涨上来。

不过, 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 也会产生各种隐忧。其中最大的问题, 是中高产阶级的承受力。学校涨学费, 提高品牌, 对于不在乎钱而在乎教育质量和名气

的上流社会当然有巨大吸引力。同时，下层阶级只要学业过关，就可以拿大笔奖学金，甚至享受免费的名牌教育，奖学金比学费涨得快，他们可能受益。最苦的是中高产。这一阶层，钱还没有多到一年花四五万不在乎的地步，但也没有少到具有获得奖学金的资格。比如年收入15万左右的家庭，有几个孩子上大学还可能获得奖学金，有一两个孩子，大概就只能照价付了。也正是这个阶层，参政积极，到了选举时是一股决定性的力量。学费贵得受不了之说，很多也是他们喊出来的。所以，未来学费贵的叫声还会更响。但是，美国家庭对日益涨价的高等教育，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支付能力。



## 文凭叹

——美国“升学女王”的奇异丑闻

我把Marille Jones看做是美国的一位“升学女王”。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部总监 (dean)，是这所世界名校的把门人。同时，她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领袖。特别是在升学问题上，她如同一位教主。2006年，她出版了一本新书：《少些压力，多些成功：指导你的孩子升学和升学后生活的新方法》。她在书中大声疾呼：“成功和幸福是一种心灵状态，和你在哪个学校上大学毫无关系。我们许多人没有上一流大学，但还是设法有了非常幸福和成功的人生。”如今美国大学的升学战白热化，补习班遍地，许多家长甚至辞职管督战。高中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部总监的这番话，立即获得全国的喝彩，使她成为一个最有名的大学录取官员。

如今，人们开始怀疑：她这番话是否讲的就是她自己?! 2007年4月底，Marille Jones递交了自己的辞呈，因为28年前她伪造了三个学校的学历。根据她的简历，她从三所纽约州的大学获得了学历：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Union College, Albany Medical College。但最近麻省理工学院在接到匿名电话的举报后发现：她根本没有在这三所学校获得文凭。

28年前（从2007年辞职时算起），Marille Jones随着读研究生的丈夫来到麻省理工，需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开始，她是希望找一份实验室的工作。但是，她看到录取办公室有位秘书的职位空缺，就去申请。她的三份文凭，就是在那时伪造的。麻省理工并没有对此进行核对，因为秘书这么一个低级职位并不要求大学学历。更奇的是，她当时并非没有大学文凭：她是在纽约州一所小的天主教学院

College of Saint Rose获得了大学学位。但是，这一学历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简历上。为什么她把已有的学历藏着不用，却冒险伪造了三份学历？此事至今没有人能答复。不过，一些人指出，她的真学历，是出自一所小大学，但她伪造的学历，特别是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是著名的理工学院。她称她从那里获得了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她最初准备申请实验室的工作，这样的硬牌理工学院显然可能会帮她。但是，后来她选择去当秘书，在哪里毕业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她在申请时竟没有把这没有必要的谎言收回。

也许她没有想那么长远，也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优秀。丈夫是个穷学生，妻子在本校当秘书，这是美国大学常见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等丈夫一毕业，妻子也就跟着走了。一般情况下，这不过是个长期的临时工。

然而，她很快就显示出了她的色彩。由于她出色的表现，在录取部一路高升，最后竟成了录取部的副总监。到1997年，她被任命为录取部总监。

当初任命她的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现在的塔夫脱大学（Tufts University）校长Lawrence S. Bacow和哈佛大学高级官员Evelynn Hammonds等知名人士。他们说，选择Marille Jones是根据她在麻省理工无懈可击的辉煌业绩。那时她已经工作了18年，早已证明了自己，谁也没有想到去查她的文凭。

但是，最近当麻省理工接到匿名举报后，事情很快暴露出来。Marille Jones必须走人。她通过学校发表声明：“28年前，当我第一次申请麻省理工的工作时，我误报了我的文凭。当我申请现在的这个职位时，我又没有勇气改正我的错误。我让许多在麻省理工内外支持我、相信我并给了我非同寻常机会的人感到失望，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歉意。”除了这个简短的声明外，记者再也找不到她。

麻省理工的有关人士非常肯定地表示，选她当录取部总监，与她拿着哪个学校的文凭根本没有关系，但她提供的更新简历，还是包括这三个假文凭。所有和她共事过的人，也都对她的卓越表现无话可说。许多人惋惜并担心地指出：希望她这个丑闻，不要毁了她为麻省理工所成就的一切。

Marille Jones的辉煌生涯本来可以证明她一再向年轻的学生和家长说的话：成功并不意味着要上名牌大学。很多从小学校毕业的人也可以有成功和幸福的生活。可惜，她年轻的时候，自己看不破这一点。难怪有人说，她抨击名校崇拜之所以那么透彻到家，大概就是因为她自己藏着的这段难以启齿的经历。



## 一流学者中的非法移民

Dan-el Padilla 21岁已成为普林斯顿的明星学生。用一位教授的话来说：“他将成为他这代人之中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之一。”然而，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以这样的方式成名。他的大照片，上了《华尔街日报》头版。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他优异的学业（谁会在乎一个古典学者的生平事迹呢？），更是因为他是个非法移民。他以一种最为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美国在对待非法移民上的难局，也反映了非法移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1989年，年仅4岁的Dan-el Padilla随父母从多米尼加来到美国。他的母亲当时正怀着孕，而且因为患有糖尿病综合征，胎儿的存活有相当的危险。为了在美国得到治疗的机会，一家人用6个月的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随后，Dan-el Padilla的弟弟顺利出生，全家决定留下。但是，由于申请移民没有结果，没有工作，Dan-el的父亲于1993年只身返回多米尼加。Dan-el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前途，执意留下。

一家人先在一位朋友家的地下室住了两周，但因地下室管道破裂，只好迁移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Dan-el的弟弟因为是在美国出生的，享受公民待遇，一个月可以领取42.5美元的食品券，同时享受医疗保险和例行的体检。每次体检，当母亲的就把大儿子也带上。等小儿子看完，就拿出10或15美元来，央求大夫给大儿子也看看。大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Dan-el的记忆中，他们一家被毒品贩子、暴力和肮脏所包围。他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就是读书。美国的法律规定给任何生活在美国境内的孩子提供义务教育，于是Dan-el上了中国城里的一家小学，而且很快赢得了阅读竞赛第一名，奖金50美元。他把这笔不可思议的财富全用来买了书。

1994年，一位名叫Jeff Cowen的29岁犹太摄影师利用业余时间到纽约贫民区给穷孩子讲艺术课。他碰到Dan-el时，Dan-el非常温文尔雅地和他打招呼，并一口气背出了多米尼加的各种数据，从人口、主要作物，一直到国民生产总值。Cowen印象深刻，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Cowen带Dan-el和他的弟弟看电影，到游乐场玩，并很快成了他们的教父。

Dan-el也不愧是一个读书种子。他9岁时，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发现一本脏兮兮的旧书，讲的是古代的雅典，这一下子激发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10岁时，他已经沉浸在索福克勒斯、古代欧洲史和美国史的世界中。在Cowen看来，Dan-el对恶劣的社会环境有一种天生的免疫力。不管身边有什么毒品贩子、犯罪团伙，他都可以置之不理，进入书的世界。你给他买玩具，他也没有兴趣。他只知道要书。

这位Cowen先生其实来历不凡。他祖父是曼哈顿的著名金融家，从小在最精英的私立学校Manhattan's Collegiate读书。这也是肯尼迪总统的母校。这样的贵族学校，一年下来费用惊人。但是，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信条：不能让贫困挡住英才的道。Cowen把让Dan-el进这样的学校读书作为自己的使命，不仅安排人给Dan-el补习数学（因为这是Dan-el的弱项），而且多次和母校联系疏通。终于，Dan-el被录取到7年级并获得全奖。Cowen和Dan-el一家看着录取通知书无不热泪盈眶。

就这样开始了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进入了贵族的“城堡”和“宫殿”。他要体面地出入学校，甚至到住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里的同学家参加上流社会那种奢侈得让人头晕的晚会。但他坐地铁回家时，就要提前几站把领带和学校的标志收起来，免得引起人家注意，被打被抢。他特有的社会免疫力，为他在这种贵族与无家可归者的世界中周旋时保持着惊人的心理平衡，学业突飞猛进。在第一学年结束时，他已经成为班上最具人气的学生。到了9年级，他被选为班主席。同时，他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法文也非常流利。到19岁时，他已经熟练掌握了五种语言。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作文，至今还是该校学生的范文。作为一个雄辩家，他还赢得了参加全国辩论冠军赛的资格。该校虽然精英，但能赢得这样的荣誉的学生，还是凤毛麟角。

Manhattan's Collegiate校方后来说，他们没有想到查Dan-el的身份。Cowen身为教父，事后也说他根本没有想到问Dan-el的身份，因为他首先面临的是怎么给这家人解决吃饭问题。对Dan-el来说，Collegiate的教育对他至关重要。事后他说，



许多像他这样优异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很快把所有能学的课程都学完，然后就发生了学业上的“撞墙”现象，再提高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只有Collegiate这种精英学校，给了他一种天高任鸟飞的发展空间。他这个以非法身份躲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的孩子，竟受到了原属于特权阶层的最精英的教育。

接下来，他面临着更难的关口：上大学。虽然非法移民的子女在美国接受义务教育是有法律保障的，上大学则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一个钱字。美国大学以高学费、高奖学金著称。穷孩子可以得到大笔财政资助完成学业。但有一条：你必须有合法身份。这样一来，Daniel和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奖学金全都绝缘，只能靠私人奖学金读书。好在他被普林斯顿看重。人家是私立学校，财大气粗，可以不用政府的钱而给他全奖。但是，他是外国学生，按法律必须回国办签证。他只好告诉校方：我一旦回国，就别想再回来。这等于向人家交代了自己的非法身份。但是，普林斯顿这次是知法犯法，故意不过问他的身份问题。用录取部院长的话说：“他就是来自月球，我们也录取他！”据说普林斯顿录取了几位身份不合法的学生。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Daniel那样幸运。一位叫Esteban Navarro学生在离普林斯顿不远的一个城市作为全校第一而高中毕业。他读高中时就在普林斯顿选课，成为普林斯顿招募的重点对象。但是，2002年他申请普林斯顿时，因为移民身份问题被拒绝，如今只能在一家比萨饼店打工。

Daniel没有辜负自己的运气。普林斯顿要求新生选8门课，他则选了11门。他第一年的学术表现，就使得他赢得了新生头等荣誉奖。这个奖在1100个新生中只有一个，可谓普林斯顿的千里挑一了。他还应邀到附近一所社区大学讲授“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和其他在普林斯顿研习古典文化的学生不同，他不敢离开美国一步，从来没有到过雅典。不过，他一个奖一个奖地赢，最后终于赢出了麻烦。

麻烦在于他赢得了Daniel M. Sachs Class of 1960 Graduating Scholarship。这是一笔支付他到牛津大学读书两年的全部费用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声誉卓著，难以拒绝。过去的得主，包括现在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院长Anne-Marie Slaughter和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Elena Kagan。Daniel是第37位Sachs学者。这就把他逼到了墙角：如果接受这笔奖学金，他离开美国后至少10年之内无法再入境；如果放弃，他将丧失他事业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他永远无法看到雅典，他毕业后也无法在美国找到合法的工作。思前想后，他终于决定到移民局自首。同时，

他迅速为自己募集了1万美元的律师费用。Daniel说，普林斯顿的教授和Manhattan's Collegiate的校友都为他慷慨解囊。另外，他的几位女同学主动提出和他结婚，以帮助他解决合法身份问题。但他都拒绝了。他的律师将根据法律上“极端条件”的条款为他争取身份。因为他父亲在他4岁时基本就抛弃了他，回国后只回来访问过两次，偶尔有些联系。他自己则专心准备毕业论文。

Daniel的故事，以最极端的方式体现了美国社会在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上的分裂。因为法律规定任何在美国生活的孩子都有权享受12年的义务教育，大量非法移民的子弟可在美国的中小学读书。仅今年一年，就有65000名非法移民的子弟将从高中毕业。根据州的不同，许多移民还能享受若干社会福利。有10个州，包括加州、得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帮助非法移民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能上得起大学，包括容许他们按本州居民的学费标准上州立大学（美国的州立大学，本州学生的学费比外州学生的学费便宜一半左右）。当然更有一些私立大学，像普林斯顿那样录取并资助非法移民的子弟。1990年，加州在共和党州长的领导下通过法案，取消了许多给非法移民的社会服务，被视为治理非法移民的先行之举，可能会有其他许多州效仿。但此举激怒了拉美裔。过去他们很少投票，经此一事却开始政治觉醒，纷纷走向投票站，不仅使加州成为民主党的“死党”，而且使拉美裔选民成为和黑人一样重要的政治力量。于是很少有政治家敢触犯非法移民的利益，就连共和党内部也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裂。

另一方面，许多反对非法移民的人指出，非法移民不仅抢了美国人的工作，而且抢了合法移民的位置。许多非法移民，比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享受着更优越的待遇。这样一来，等于鼓励大家犯法。非法移民之风更会愈演愈烈。Daniel也正是在国会为非法移民案打得难解难分，举国都在为此示威游行的节骨眼上一举“成名”。

Daniel当然有理由乐观，他精明地把球踢给了美国。他的教父Cowen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未来在于教育。Daniel就是凭这个奋斗出来的。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么优秀的人才送给外国吗？” Daniel的经历，正体现了美国社会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乃至他这样一个最边缘的人物，将掌握西方最核心的文化价值的解释权。这分明是对亨廷顿式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挑战。如果现在再把他拒之门外，他可以日后在牛津、剑桥当个教授。美国等于自己毁掉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成就。



## 非法的精英

——哈罗德的普林斯顿历险记

他的名字叫哈罗德·费南德斯 (Harold A. Fernandez)，44岁，普林斯顿的优等生，哈佛医学院毕业，纽约一家大医院的心脏搭桥手术专家。刚到盛年的他，不知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也在美国的上流社会稳稳地站稳了脚跟。

然而，面对这么一位令人敬畏的医学专家，人们很难想象他的生命中另外的几种可能：他可能仍在哥伦比亚的贫民窟中干粗活儿或加入贩毒集团，可能早已在偷渡中葬身鱼腹，还可能被美国移民局遣返、回到穷困的故国抑郁终生。所幸的是，他人生的一连串赌博，在普林斯顿绝处逢生。这不仅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也书写了一个非法移民的美国传奇。

哈罗德生长在哥伦比亚的贫民窟中。那里也是世界贩毒之都。他小时候曾经两次亲眼看到街头的枪杀。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带着弟弟偷渡到美国。1978年他13岁时，父母联系好蛇头，准备安排他的偷渡。此时他已经和父亲分别4年，和母亲分别2年。

他和一群偷渡的男孩到达了巴哈马最西端的一个小岛。这里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仅有8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是偷渡者的最佳跳板。但是，这段海域波涛汹涌，他们等了12天，终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开始了冒险。

那是一条仅25英尺的粗糙木船，一路上几乎被巨浪拍散。大部分人都在晕船、呕吐。哈罗德至今也忘不了惊涛骇浪中同船的成年人恐怖的目光。到了天亮时分，人们依稀看到了迈阿密海岸线。船一靠岸，身心都已几乎崩溃的乘客们踉踉跄跄地跑到海岸的公用电话厅给亲友打电话。母亲听到他活着到岸时那哽咽的声音，

至今还在哈罗德的耳边回荡。

1985年，这位在人蛇的船上幸运地活下来的男孩，来到了普林斯顿的校园。这位捡了条命的移民子弟，知道“机会”意味着什么。美国一些大城市公立学校中的优等生，经常被这些孩子所占据。哈罗德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纽约的一所高中读书。周围环境恶劣，学坏很容易。但他一门心思奋斗，最终成了毕业班第一名，代表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他被普林斯顿录取的本钱。他比其他学生提前到达校园两个星期。毕竟他是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学业基础无法和那些从私立学校或者富裕地区的精英高中里竞争出来的学生相比。学校给他们这些贫困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开设了“学前班”，在正式的课程开始前对微积分、化学、写作等学科进行恶补。等开学一看，同学中充满了律师、医生、企业家的孩子，还有位洛克菲勒家族之后。他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父母来访，全家上街买回来200美元的一双鞋。他则从来不会在鞋上花费20美元。

在这种环境下，他靠在餐厅打工来挣自己的生活费，并设法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一直相信，他能住在这种带有古雅的哥特式庭园的宿舍里，是因为普林斯顿的录取政策对贫困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倾斜。在学业上他总有些低人一等的感觉。于是，他夹着尾巴做人，无论上什么课，总是把指定的阅读提前两周完成，平时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爱因斯坦半个世纪前讲过课的那间著名的教室里苦读。他发现自己考试成绩非常好，第一学期拿了全A。只是在课堂上他还是胆怯的学生，并不敢轻易说话。等第二学期开始时，他收到他所在学院的学习部主任的信，知道自己是学院的顶尖学生之一。他满脸泪水地把信读了许多遍，终于充满信心地意识到：自己确实属于这里。

但是，这一刚刚拥有的信心马上被击得粉碎。就在那年春天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和女友出去吃完饭回到宿舍，在进门处的邮箱，他发现了一个信封。一看寄信人的地址，他脸上顿现阴云。

信是学校的外籍学生顾问写来的。内容其实不过是简单的例行公事：所有在外国出生的学生，要约定一个时间，把自己的身份文件拿去让学校复印。哈罗德上学，拿的是两种资助，一是针对贫困学生的联邦奖学金Pell grant，一个是联邦贷款。接受这两种资助的条件是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身份。但是，哈罗德两者都没有。他是从黑市中购买的一张粗糙的假绿卡。在申请学校时只需提供复印件，如



今学校要的是原件。他那张假绿卡，明眼人一看就认出来。他的梦想开始倒塌。不知情的女友看到他脸色不对，忙问出了什么事。就这样，他第一次对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告诉女友，他可能被遣返哥伦比亚，他几乎肯定会被普林斯顿开除。但是，女友坚决地要和他共患难。

他除了招供别无选择。但是，他不敢去见校方官员，而是找到了自己的拉美文学教授。这位教授关上办公室的门，静静地听完他的故事。教授告诉他两件事：第一，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此事；第二，好好用功，不要耽误功课。教授本人，则去找了校方的官员和校长商讨对策。

几天后，写信的那位外籍学生顾问约见哈罗德。她首先告诉哈罗德：普林斯顿为拥有他这样的学生感到非常骄傲。但是，他目前要面对这两大难题：第一，他破坏了普林斯顿的荣誉原则：普林斯顿的学生绝不欺诈；第二，他非法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给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奖学金。但是，这两个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首先，学校要求他写坦白信，讲明自己破坏法律的过程，并恳求宽恕。另外，普林斯顿将把他的身份从永久居民转成纯粹的外国学生，这样他就失去了已经获得的联邦资助和奖学金。为了能让他继续学业，普林斯顿将拿出自己的钱来，给他全奖。得到了这样的许诺，哈罗德才敢回家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父母。接着，普林斯顿的移民律师主动约见仍然是非法身份的哈罗德的父母，以帮助他们获得合法身份。

最终，哈罗德全家都获得了合法身份。为此，普林斯顿动员了自己最有权势的校友、参议员布莱德利给移民局写信。哈罗德最终以优等生的身份在普林斯顿毕业，然后进了哈佛医学院和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接受职业训练，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

哈罗德的传奇在《纽约时报》刊出后，立即引起网络激辩。一位自称是合法移民之后的网友对该报道大加谴责，称哈罗德不过是使用了欺骗的手法混进普林斯顿并偷了别人的奖学金。其实，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有得是。他这个机会，应该留给那些同样优秀但却诚实的人。许多合法移民老老实实地排队等自己的身份“转正”。在等候期间，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许多机会从身边错过。为什么哈罗德这种不排队的人反而得到了如此的优待？另有一些网友也颇为愤怒：我们勤勤恳恳的美国人的教育机会被这等违法乱纪的人给挤占了。他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回报吗？难道就是拿着高薪、给那些有良好医疗保险的富人做心脏手术？另一派网友则截然相反。一位学生说：“哈罗德的故事让我无比惭愧。我在名校读书，却毫不

知道自己的机会是多么来之不易。他让我对自己的学业有了新的态度。”还有位网友则更直截了当：“哈罗德是聪明、用功、难得的人才。怎么居然有人说这种人有得是？这实在是想入非非。在普林斯顿成为顶尖学生，有几个人有这种本事？另外，他13岁被父母安排偷渡。13岁的孩子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道理很简单。普林斯顿的做法不仅是人道，而且为美国招揽、培养了人才。”

这样的辩论，体现了美国在对待非法移民子弟教育问题上的困局。美国有大约20万以上的非法移民在16到18岁之间。每年到达这个年龄的非法移民有5到10万人。这正是申请汽车驾驶执照、联邦奖学金或者找工作的年龄。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小时候被父母带到美国，难以为自己的非法身份负责；同时因为从小在美国长大，和美国孩子几乎没有两样。只是一到成年，自己的前程就被堵死。美国并没有联邦法律禁止非法移民读大学，大部分大学也不核查移民的身份。但是，每年65000个高中毕业的非法移民中，只有5%上大学（一般美国人上大学的比例则为37%）。这些非法移民中，有许多优等生。但是，他们怕上大学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干脆放弃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非法移民没有资格申请联邦奖学金，大多也没有资格按本州居民的身份读州立大学。美国本州居民上本州的州立大学享有巨大的学费优惠，外州学生要缴的学费则高一倍还多。美国目前只有10个州允许非法移民按本州居民的身份读州立大学。结果，大部分非法移民想读大学也读不起。而他们注定将在美国终此一生。缺乏教育，使他们的生产力大大降低，极大影响了美国的竞争力。

是否应该给这年轻一代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这个问题在国会已经辩论了8年。2009年由两党部分议员推出的“梦想法案”，提出给那些16岁以前来到美国、连续居住5年、品格端正并且高中毕业的非法移民6年的临时合法身份。在这6年内，凡是读完两年大学或在美军服役两年者，便获得了申请永久居民的资格。可惜，由于反移民派和支持移民派势不两立，再加上经济危机增加了反移民的声音，使这一法案难以通过。

然而，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则不会等着国会的政治交易。这些学校认识到，高等教育早已变成了全球竞争。一流大学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掐尖”，才能维持领先的地位。所以，常青藤经常对学生中的非法移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学生遭遇麻烦的关键时刻，则以雄厚的财力和政治纽带保住自己的优等生。哈罗德的故事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 美国大学中的贫困生

托尼·杰克 (Anthony Abraham Jack) 从 Amherst College 毕业。这个坐落在马萨诸塞州中部的本科学院 (liberal arts college), 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那个著名的全美大学排名就知道, 在研究性大学一栏, 前三位总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而在本科学院的排名中, William College 和 Amherst College 两所马州的学校稳居前两名。可以说, 这两所本科学院, 是属于紧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最精英的大学, 和其他常青藤平起平坐。

当然, 和所有精英的私立学校一样, Amherst College 要价不低: 一年标准的学费和生活费为 48000 美元! 而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也才 5 万美元出头。托尼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母亲是个单身黑人, 拉扯三个孩子, 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学校当保安, 年收入为 26000 美元, 刚刚过 2006 年联邦政府四口之家 (三个孩子) 年收入 20516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然而, 他已经顺顺当当地上完了四年最昂贵的大学, 并将作为荣誉学生 (优秀生) 毕业。他四年下来所欠的债, 共计 41 美元, 是他长达 107 页的优秀论文的复印费。

托尼这样毕业, 可以说是个人生活的奇迹, 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向穷人倾斜的政策的结果。当年托尼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 (SAT) 的成绩是 1200 分, 立即获得了本州第一学府佛罗里达大学的全奖。其实该校中等的 SAT 的成绩大体在 1160—1360 之间。托尼成绩偏弱, 大部分自己花钱上该校的学生也比他成绩高。Amherst College 则是全国名校, SAT 的中等成绩为 1422, 远非托尼所能及。但是, Amherst College 录取部主任 Tom Parker 看了托尼的申请材料后说: “这孩子要是生

长在格林威治（Greenwich，是坐落在康州的美国最富的小镇），那他的成绩恐怕就是1500分了，因为他会上Kaplan或普林斯顿的‘高考补习班’，他会订阅《纽约人》杂志。”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孩子怎么可以和百万富翁阶层中最优秀的子弟拼分数？CNN曾经对Amherst College的整个录取过程进行过电视报道。那里的规矩很明确：你要是富家子弟，光成绩好也很难进来，你还需要很多东西要证明。因为录取官员认为，你小小年纪，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机会给你？

也正是本着这个原则，Amherst College把机会给了托尼。这是学校资助贫困生计划的一部分：学费全免，外加生活费，400美元的起步金（供穷学生购买衣物被褥），夏季的数学和科学补习，还有学前夏季课程，帮助他们适应高标准的学术课程。每年圣诞节，学校支付其回家的探亲机票。不过，这些学生每星期需要进行至少7小时的勤工俭学（8美元一小时）。他们这样每个月挣200多美元，可以用来当自己的零花钱。今年Amherst College有413名学生毕业，其中有15%，也就是61人，是来自家庭年收入低于45000美元的家庭。而在这些人中，有2/3，也就是40人左右，是来自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0美元的家庭。

Amherst College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不俗，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向贫困宣战的最初战果。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流大学一直给贫困生优厚的奖学金。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贫困生在学生中比例过少的问题。世纪基金会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的精英大学中，3/4的学生来自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4的家庭，只有3%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10%的学生来自中等收入以下的那一半人口。去年《波士顿环球报》还公布了一个各大学中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的排名。结果，当地一个地方大学Framingham State College的比例是44%，麻省最好的州立大学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为39%，波士顿私立大学中的后起之秀东北大学为32%，普林斯顿大学为17%，哈佛16%，耶鲁15%。总之，越好的大学，穷学生越少。

原因并不是大学不想收穷人，而是因为如今的教育竞争向低龄推进，有条件的家庭都让孩子练就一身“童子功”，从一开始就封杀了穷孩子的机会。有钱人住的学区好，学校好。比如波士顿附近的几个镇，中等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平均房价也要上百万。学校经费是从房地产税中来，当一栋房子一年就是1万多美



元的税时，这些地区的公立学校当然就资金充足。更不用说，还有许多人住这么贵的区，守着这么好的学校不上，把孩子送进一年三四万美元的私立学校。许多富裕家庭只有一个人上班，常青藤毕业的母亲专门在家管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穷孩子的母亲则常常高中也没毕业，到18岁还不认识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学校也破败不堪，求学无门。结果，有些扶贫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为富人服务。比如，种族平权法的宗旨是照顾黑人等少数弱势族裔。可是，实行以后，却被黑人中的富裕阶层利用，让他们的子弟用低分把白人和亚裔穷人挤走。1999年，在由普林斯顿前校长William Bowen和哈佛现任代理校长（也是前校长）Derek Bok共同领衔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8所精英大学中的黑人学生，有86%来自中高产阶级。可见，在“正常”的竞争下，穷人除非智力超常，否则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也正是如此，真正成绩好的穷学生是最俏的。各顶尖大学都把精力用来追这些人。可惜，不管怎么追，还是僧多粥少，合格的穷学生满足不了各大学的胃口，精英大学越来越像是富裕阶层的私校。也正是面对这样的危机，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顶尖的私立大学，到弗吉尼亚大学等精英公立大学，又开始了新一轮出击。一系列名校彻底免除了穷学生的学费，许多大学干脆就让贫困生“白上”四年，即在免学费之外还支付巨额生活费。几年前，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在大力录取贫困生后，发现SAT的平均成绩并没有下降，使其他学校大受鼓舞，大家竞相做了大量广告吸引贫困生。比如哈佛的一位名叫Jennifer Christine Arcila的女孩，是哥伦比亚移民之后，父母不会说英语。她上高中二年级时，突然收到哈佛的贺信，恭喜她在SAT上拿了高分：人家提前一年在打探贫困生的情况并加以笼络！把她挖来后，哈佛又让她勤工俭学，专门给其他贫困生打电话，告诉他们哈佛不是富家子弟的私学，有大量奖学金给穷人。设计SAT的大学教育委员会（College Board）还专门设计了软件，综合经济、种族、性别，乃至邮政编码等大量人口信息，帮助大学寻找贫困生。

不过，仅仅这样并不够。贫困生不可能和中高产阶层的孩子拼分数。于是许多学校宁愿为贫困生降低分数标准。但降低了录取标准，就必须有一些特别措施，让他们达到学校的学术要求。托尼就是被录取后提前入学，利用免费的夏季课程为正式的课程做准备。他进校后才发现，自己那些富裕同学为上大学下了多少本儿：从小训练SAT，甚至为了掌握英文词汇而学习拉丁文。第一学年，他的成绩

全是A或B，只有化学得了C。二年级他不服气，选了有机化学，结果第一学期拿了B，第二学期拿了A-。最后，他竟在微积分课中拿了A+，教授说他教了30年，只给过10个学生这样的成绩。也怪不得，他最后被教授提名为大名鼎鼎的Rhode Scholar（留学剑桥研究院的奖学金，是美国大学本科生的最高荣誉，当年克林顿就是获奖者之一）的候选人。

不过，贫困生们即使像托尼一样拿了全奖，要取得他这样的成绩也远比外人想象的困难。除了学业准备不足外，最大的挑战是心理问题。耶鲁的一位女生观察到：富裕家庭的孩子多是贵族寄宿学校出身。他们在那里就形成了社会网络，进了大学自成一个圈子，外人很难进去。这倒并不是说你不可能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道理很简单：当你刚刚认识一个人时，一旦发现对方的经历和你有共同之处，马上就容易成为朋友。结果，你自以为进大学是按学业，进来后大家却根据社会阶层形成小圈子。另一个哈佛的穷学生说，你的同屋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要把洗手液兑水以后才用。他们只是觉得你怪。还有一个哈佛学生观察贫困生第一年的挣扎：大家去参加一个校友会，来的校友全是大款。富裕学生和人家上去就聊，因为大家是一个贵族学校出身，很快建立了关系。贫困生则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从何谈起。托尼就发现，他的富裕同学一听说他来自佛罗里达，就打听那里著名的高尔夫俱乐部的情况，而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当然，在学习上差别也非常大。贵族学校出身的学生，知道怎么选小班的课、和教授建立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中学时就有这样的训练。贫困生则多是跟着大班上课，最后哪个教授也不认识，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用耶鲁一位贫困生的话来说：当年你在高中时，因为太聪明，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被同学孤立，那时做梦都想着耶鲁，觉得那里全是和我一样的人。但是真来了以后，发现许多同学早已学富五车，你无法与之竞争。另外，人家已经有各种小圈子，你也进不去，不知道和人家谈什么好，最后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各学校提供一系列的特别服务，不过战略有所不同。哈佛出版了精致的手册，告诉贫困生怎么应付富贵的同屋，比如：同学相约到海滨度假，你该怎么办？大家到一家名馆子吃一顿，你怎么告诉他们你不去的理由？另外还特别给贫困生提供心理咨询，举办半年一次的贫困生聚会，帮助大家交流，共同应付生活的挑战。这一系列服务，都是不公开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通知，避



免把贫困生特别标志出来。耶鲁则不提供这样的服务，理由是这样一来贫困生就被特别划成一个弱势群体，好像他们因不如普通学生而需要特别帮助，打击他们的自信，不利于他们融入学校的大环境。不过，对贫困生最大的帮助，恐怕还是在大学之前。托尼在公立小学就参加了天才班，高中最后一年则靠全奖上了私立学校。如今美国的许多“贵族学校”，希望摆脱贵族学校的形象，成为精英学校，给贫困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这种做法，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所以，一些常青藤中的贫困生，其实是私立的贵族学校出身。这样的经历，不仅帮助他们在学业上达到了录取标准，在文化上也使他们上大学后更能适应与上流社会的子弟打交道的环境。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贫困生最终还是为学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比如，在Amherst的一个贫困问题的社会学课上，大家讨论食物券（即给穷人领救济食品的证券）的问题。一群毫无经验的学生，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托尼自报家门：谁知道领食物券的家庭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我一直就是这么长大的。于是，随着他的故事，课堂气氛一下子就活了。

贫困问题不可能一天解决。但是，只要大学把社会公平当做理想，并不懈地为之而努力，就总会看到希望。托尼的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人。她租了一部车，把两个孩子放到车里，一路从佛罗里达开到麻省Amherst College，来参加托尼的毕业典礼。她根本买不起机票，学校也不给她买。但是，她在长途跋涉之后，恐怕十有八九会和一个百万富翁并排坐在一起，一起骄傲地看着身穿毕业长袍的孩子们。这，就是希望。

## 美国贫困生中介业的兴起

弱势阶层在一流大学中缺乏“代表性”，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危机。根据纽约的世纪基金会2004年对146个精英大学的研究，在这些大学里，只有3%的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25%的人口，而有74%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25%的人口。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因此被攻击为向富人倾斜。

其实，这种现象远非“向富人倾斜”一句话所能概括。一般而言，美国的贫困生能够用较低的分数在升学竞争中把分数略高的富家子弟击败，同时获得富家子弟想也不敢想的奖学金。问题是，这些穷人阶层中，够分数的人实在太少，即使降低一些标准，也招不到足够的穷人。穷人子弟学业表现差的原因则更为复杂。首先，他们资源少，学习条件差，缺乏必要的机会。第二，有些贫困是境遇贫困，即自己不走运出生在社会底层；有些则是行为贫困，即他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如吸毒、犯罪、性行为过滥、无心读书等等，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对前者，提供了机会就能使他们成功；但对后者，提供什么机会也无济于事。

美国的大学其实是向穷人倾斜。只不过向穷人倾斜是个复杂的工程，开发穷人中的人才非常困难。美国社会各界，包括大学，对此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效果依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州开始禁止以种族平权的原则根据肤色在录取时对学业差的黑人进行照顾，使得黑人学生的比例急剧下降。维持学生的多元性，就成了大学所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帮助大学挖掘穷人中的人才的非营利性中介公司和慈善组织便应运而生，大学则为他们的服务付费。换句话说，许多一流大学为了把奖



学金送到穷学生的手上，还要为此雇佣中介，等于花钱送钱。

在这一行业中的新星，叫Quest Bridge，意思是“寻桥”，《华尔街日报》还进行了报道。这是一个非营利的中介公司，使命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贫困生、并进行评估，然后把这些学生送到合适的名校，说白了就是在穷学生和名校之间当“媒娘”。该公司拥有由3万名招募人员构成的网络，包括高中的咨询人员、教师、牧师等等，负责锁定4000名左右贫困的优等生。这些学生需要像申请大学一样，填写公司的17页表格，同时提交自己的作文。最后，公司根据这些学生的家庭收入、学业表现和社区服务的成绩等指标，确定最后1600名人选，往各大学推荐。使用该公司服务的大学，一年支付4到7万美元的中介费。该公司运营了4年，已经向一流大学输送了2300名贫困生。

衡量该公司的影响力，只要看一看美国顶尖的几所私立大学的录取数据就能明白。比如Amherst College长期以来是美国本科生学院的前三强之一，在2006年录取了473位新生，其中来自“寻桥”的学生就达10%。也就是说，“寻桥”这一个中介机构为这所学校提供的贫困生，在其本科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出全国精英院校中贫困生在本科生中所占的比例（3%）。在全美本科生学院中多年高居第一的Williams College，加州最好的本科生学院Pomona College，麻省的名校Wellesley College，其新生中来自“寻桥”的学生都达到了6%以上。另外，斯坦福、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耶鲁等研究性大学，也都大规模地利用“寻桥”的服务。

“寻桥”的创建人Michael McCullough是位医院急救中心的医生。他和他当律师的妻子Ana从1994年就致力于帮助有才能的穷学生的事业，到了2003年终于创办了“寻桥”。而“寻桥”的日常经营者，则是当年帮助雅虎设计企业战略的Tim Brady。他因为在雅虎的成功，成为百万富翁，然后马上致力于慈善事业。他谢绝了“寻桥”的工资，放弃了在企业界飞黄腾达的大好前景，义务经营这一仅有160万美元年度运营经费的非营利性公司。而这160万中，仅有一半来自各学校支付的中介费，其他都要靠别人的捐助。

在过去几年“寻桥”为20个顶尖的大学服务，现在则计划把服务对象扩展到30所大学。用Michael McCullough的话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年之间，把一代从社会底层出身的优秀青年送到美国的领袖的位置上。”

扶贫首先要有意愿，但同时还必须有一流的企业才行。从“寻桥”的成功可

以看出，美国的精英阶层，有一大批人成功后首先想到帮助他人。他们贡献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自己宝贵的企业家才能。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光凭几个钱绝对无法解释“寻桥”的成功。同理，中国的企业家要造福社会，也不仅仅是捐几个钱的问题。我们期望有一流的企业家能放弃生意场，运用自己的经营才能专心于社会公益。



## 美国大学录取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

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中，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在二战前，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大学被以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所垄断。一些犹太平民子弟靠优异的成绩进了常青藤，就让既得利益集团惊恐不已。在一战以前，常青藤还是延续欧洲的传统，按考试成绩的客观标准录取学生。这种录取政策，其实并非看起来那么公平。比如，考试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语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学校不教或者很少教。结果，那些从私立贵族学校出身的WASP还是占尽优势。但是，犹太人的到来挑战了这一体系。这些犹太子弟学习认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精心准备常青藤的入学考试，并经常能够战胜WASP子弟。纽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地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达到40%以上。这就导致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专门的“录取办公室”于1910年在该校建立。这一办公室的使命就是解决“犹太问题”，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是在录取时不仅仅看成绩，还要看学生的“品格”（character）和“领导力”（leadership）等素质。当然，这些素质的评价具有非常主观的色彩，使录取官员可以绕开客观的考试标准。结果大见成效。到1921年，哥伦比亚的犹太学生比例被压到了22%。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也很快效法。考生进大学不再是参加一个考试那么简单，而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和家庭背景资料，撰写自传性的作文，描绘足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领导力”的课外活动。当然，还有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写的推荐信。录取时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

没过多久，录取办公室就成了美国大学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门。美国大学的历史由此被改写。

虽然有这一肮脏的历史，这套系统在二战后仍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经过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affirmation action）而被用于扶助弱势的目标，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如今，美国的大学录取仍然不仅仅是看成绩，个人在功课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取舍过程也是严格保密的。这就给录取过程带来了相当大的神秘性。最近，马萨诸塞州的两个知名大学 Tuft University 和 Amherst College 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走进其录取办公室监督整个录取程序，最后记者的观察被公开登在报纸上，使我们对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了解。

这两所大学都是几乎能与常青藤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藤”之称，录取竞争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 今年有15000名申请者，最后能收到录取通知的有3000多名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同时申请许多学校，拿到录取通知后常有一半左右不会来就读）。录取委员会有7名成员，从3月开始一起最后开会审阅录取材料。这一过程被录取部主任戏称为“长征”（long march）。在会上，一个女生的申请材料摆在大家面前：成绩全A，女童子军成员，舞蹈家，同学的辅导老师……然而，如此优异的记录难以给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否决了。“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位录取委员会成员说。

另一位是意大利蓝领工人的儿子，因为其作文动人地描述了他对食物和家庭的热爱，以及他和自己智障的弟弟的关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获得一致通过。下面一位是个平均成绩为B、英语成绩为C的学生，她有听力障碍，生长在西班牙语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险的社区，每天要通勤一个多小时上学，从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录取人员对她争论不休：“这孩子在大学第一年可有些吃不消，不过最终她会赶上来。”“她已经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孩子失败。”大家讨论了20分钟仍没有结论，最后不得不推迟决定。

Amherst College 的录取委员会有6位成员，要在7700位申请者中挑选1100位学生。一位科罗拉多的学生材料被摆在他们面前。他成绩平平，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合格。但是，录取委员会发现，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多年，他的母亲失业，他生长在犯罪率极高的社区，挣扎着不掉进犯罪的陷阱。结果，他的成绩就显得不那



么重要了，委员会一致决定录取。

另一个来自纽约的牙买加移民，虽然在美国历史和统计两项高级课程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学录取的主要综合考试SAT中成绩仅为1180分（满分1600分），离Amherst College学生1360—1530分的中等水平还差得非常远。录取委员会发现，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并已经被遣返牙买加。大家一片叹息：“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不过，在纽约，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进了候补名单（因为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一半左右不来就读，当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预想时，留出的空额就由候补名单中的学生填补。即使一流大学，候补的机会也相当大）。

一个非常轻松地获得一致通过的学生，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11岁才开始讲英语，各项成绩都很出色。大家无话可说，连举手表决都没有进行就把她的材料放进了录取档案。

录取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审查申请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学的学生比例等等。这三项越低，这个学生越容易被录取。父母都没有进过大学的被归入SP30类，家庭收入非常低的被归入SP31类。这两类的学生，在录取中得到了种种的照顾。

当然，这样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论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学变成慈善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挑选人才。在这样的选才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做衡量学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中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然，艰难的生活也加强了你对他人的理解力，成为你的“领导力”的基础。可见，“品格”和“领导力”这种在美国大学录取中非客观的指标，刚开始设立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如今则基本上成为辅助弱势阶层的有力手段。



中国大学要向美国学什么？



## 美国高等教育给中国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

2005年,《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一书出版,次年即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优秀图书奖。领衔的作者William G. Bowen是美国高等教育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他本为研究劳工经济学的教授,1972年39岁时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到1988年卸任,在1988—2006年间出任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主席。另外两个作者:Martin A. Kurzweil为梅隆基金会的研究人员,Eugene M. Tobin则是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的前校长。此书是Bowen在主持梅隆基金会期间最主要的集体研究成果,所分析的资料和数据之全面、系统实属前所未有的。2009年,Bowen又和另外两位作者(其中一位也是大学的前校长)合作,出版了《跨过终点线:在美国公立大学中完成学业》(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Completing College at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实际上是同一研究的继续。只是前者重点考察精英大学,后者把重点放在公立大学中。两者相加,大概构成了迄今为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最全面的评估,意义深远。

在美国,由大学前校长们亲自出马并长年领导如此大规模的量化研究实属罕见。其中的背景是深刻的教育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大学财源茂盛,实力大增。美国的高等教育几乎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但是,在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高等教育费用不断上升,越来越难以为普通百姓所能承受。教育本是创造社会流动的最有效的手段。可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不断追求优异的同时,则有丧失这一功能的危险。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究



竟“是特权的堡垒，还是机会的引擎”？高等教育将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些时代问题，急需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来回答。

几乎在William G. Bowen主持这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全面评估的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大学开始了急剧扩张。本世纪初又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风潮，纳税人的钱滚滚流入几家名校。但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再加上大学结构的失调，导致了大量大学生的失业。另外，许多大学已经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大学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难以为普通家庭所承担，大学校园越来越被城市中高产子弟所占据。大学不但没有推动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一句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评估美国大学对中国有什么意义？首先，美国是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是说平等和优异）方面，长期以来一马当先，对其他国家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其次，在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美国范本”频频被引用作为各种改革“工程”的依据。比如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中，就有人明确提出以美国的高校为榜样。而正是在这样的“学美热”中，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制度、政策也经常被误解或曲解，导致了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失败。

Bowen主持撰写的这两本书，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美国范本”，有助于澄清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教育目标怎样服务于其社会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美国的大学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其预定的目标，又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理想？这些问题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大学究竟“是特权的堡垒，还是机会的引擎”？其实，这也是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界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两本书所给出的回答，对中国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的发展当然具有启发性。

平等与优异：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夜，作为美国前身的13个殖民地仅有750位在校大学生。这个数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涨到了1150人。那时读大学的基本都是社会中精英的精英。到1940年，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已经崛起，正处于赶超欧洲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即使如此，2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也仅有4%左右完成了大学学业。到2002年，

这个比例则超过了25%。其中在25—35岁年龄段的人口中，有39%接受了大学教育。历史的曲线非常清晰：大学正从精英走向大众。

当精英的机构大众化后，大学教育还能保证其优异的质量吗？占人口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精英，和占人口近一半的平民当然素质不同。追求平等与追求优异难免发生冲突。但是，这次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平等和优异的目标并不冲突，而且能够相辅相成。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大学要培养精英，就不能让那些有精英素质的人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进不来。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自然贵族”。所谓“自然贵族”，当然是相对于当时欧洲的“世袭贵族”而言。杰弗逊是位平民主义精神极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欧洲的等级社会不屑一顾。他曾经说，欧洲的那些国王，其素质到了美国连当个小镇长也不够格。在美国，一切靠能力而不是家门。大学选拔人才，应该纯粹根据能力，超越学生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平等教育体制，才是“自然贵族”成长的理想条件。

对此，在当今美国保守派的学者中也不乏赞同之士。我在《北大批判》中介绍了《钟曲线》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的看法：早年美国就那么几个大学，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大学不断扩招，高等教育普及，平民百姓也有机会进大学了。按照智商的理论，高智商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恒定、有限的。比如，智商达到140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大致为0.5%左右。但智商100以上的则在人口中占了一半。在一半人口都可以上大学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平均智商按说要比只有1%的人才有机会上大学的时代要低不少。但是，通过各种测试资料证明，美国大学生的智商，却随着大学的普及呈上升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在20世纪以前，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口想上大学，也有条件上大学。大学生虽然少，大学的生源相对则更少。后来，犹太人在教育上崛起，参与了高等教育竞争；高中的普及，也进一步扩大了大学的生源。二战后，《退伍军人法》则让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退伍兵进了大学。到了60年代末，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大量的女性和有色人种也参与了大学竞争。奖学金的丰厚，又使许多过去不可能上大学的穷人走进校门。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大学干脆在全球搜罗人才。如果我们把竞争上大学的生源作为分母、把大学生人数作



为分子的话，就会发现：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分母比分子增长得快得多。大学的选才因此也就更精。这种现象在常青藤更为严重。常青藤的规模长年稳定，但是常青藤的生源则不停地翻番。早年的哈佛、耶鲁，主要在新英格兰的几个贵族寄宿学校中招生，不过是地方大学而已，富家子弟想上的几乎都可以上；如今则成了世界名校，录取成了全球的竞争。现在常青藤学生的智商，是200年前或100年前那些“富裕而愚蠢”的学生所难以想象的。

第二，美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维持这么庞大的规模，就必须调动各个阶层的人力资源。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产业也不断向高端升级，近年来制造业不断外包，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蓬勃兴起。过去那种以小部分白领管理大部分蓝领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甚至制造业也有白领化之趋势。这样，少部分人上大学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应付社会的需求。大学必须使人口的大多数成为“劳心者”。但是，诚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Bob Herbert最近撰文指出的，以黑人和拉美裔为主的少数族裔在教育上远远落后于白人和亚裔。从人口趋势上看，白人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萎缩，将从今天的67%下降到2050年的51.4%。黑人和拉美裔的比重在同期将大幅度提高。如果美国各种族间的教育格差不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就将随着种族比例的变化而逐渐下降，美国的高智能经济就找不到员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25—34岁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来比较，1991年美国为30%，仅居芬兰（33%）和加拿大（32%）之后。但到了2002年，加拿大（51%）、日本（50%）、韩国（41%）、新西兰（40%）、挪威（40%）的大学生比例都超过美国（39%），芬兰、瑞典与之并列，其他欧洲国家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急剧缩小。美国在高等教育普及方面失去领先地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大学的质量和数量上跟不上需求，而是因为义务教育的相对落后，供应不了足够的生源，使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义务教育落后的一大原因，则是教育的不平等。比如，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是地方自治。富人区的学校资源充足，穷人区则办学条件甚差。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留下的经济和文化遗产，使黑人在教育上长期落后。这些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美国的高等教育就无法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三，一个优异的大学，必须在其教室内外都能保持多元性。精英大学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领袖当然要了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否则就无所谓领导

力，培养出来的人也会成为不了解社会、无法体会他人感受和诉求的宫廷式人才。因此，多种族、多文化、多阶层的融合，应该是美国大学校园的基本使命。大学作为传统的精英教育机构，就应该注意在多种非精英阶层招募人才，使大学更好地反映社会。

第四，一个参与型的民主社会，要求大多数公民具有良好的教育、把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慎的决策。如果教育资源仅仅被少数人所占据，民主制度就会发生“参与危机”，进而威胁到民主本身的生存。

#### 美国大学为什么优异？

在确立了以上四个目标后，美国高等教育的表现究竟如何呢？这是这次总体评估的核心。答案也非常明确：在优异这方面，作者给美国的大学打的分是A甚至A+。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在质量上可以和美国的大学相比。对此，书中提供了许多数据进行论证，事实非常清楚。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异？作者给出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大学资金充足。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相当于其GDP的2.7%。与此相对，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开支，平均占GDP的1.3%，英国则仅占1%。美国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花费为22234美元，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10052美元的花费要高一倍还多。

第二，美国高等教育经费充足的一个原因，是其体制的优势。美国的高等教育比起欧洲国家来要更加多元化。在欧洲，主要的大学实际上都是国立，靠纳税人的钱直接资助。美国的国立大学，只限于几所军事学院。接下来，各州有自己的州立大学，主要依靠州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全国性的精英大学，如常青藤，基本为私立。这种体制，使民间资金大量涌入高等教育。美国最富的大学，全不是依靠政府拨款，而是靠自己的捐助基金。美国的私立大学在学费标准上不受政府的限制，标价很高，使富裕的家庭多多支付，同时拿出钱来给贫困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这种开放灵活的体系，使美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充分吸收社会的资金。

第三，除了资金和制度外，美国高等教育成功最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有充足的生源。从历史上看，19世纪末美国大学的崛起和其义务教育的发展同步。到了1870年，免费的义务教育已经遍及全国。20世纪上半期是美国高等教育高超欧洲的时代。这也伴随着义务教育的急剧扩张。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10到



1940年的“高中运动”。在20世纪开始时，高中入学还要考试，使能在高中就读的学生少于人口的5%。到了1910年，有20%的15—18岁的青少年在高中就读，有10%的18岁青年高中毕业。到了1930年中期，除了南方以外，大部分州的高中毕业生占适龄人口的一半左右。到了1940年，73%的15—18岁的青少年在高中就读。到了1950年，80%的美国青年高中毕业。与此相对，在战前的欧洲，高中仍然维持着入学考试制度，高中毕业生在适龄青年中仅为10%—20%。可见，美国在二战前夜的义务教育已经大大超过欧洲。这就为美国战后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美国的K-12义务教育体系不仅包括12年的中小学，还外加1到2年的半日制幼儿园。到18岁该上大学时，许多孩子已经接受了十三四年的教育。这就保证了美国4000多所大学有充足的生源供应。

总而言之，优越的财政实力可以使美国建设一流的高等教育设施，吸引一流的教授，维持巨大的规模。但是，如果没有合格的学生，大学不过就是空空的校园和无事可做的教职员，高等教育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保证充足的生源，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平等，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过，也正是在这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来似乎有走到尽头之兆。这也是这次全面评估所锁定的核心问题。

#### **美国高等教育的弱点在哪里？**

当评价标准从优异转移到平等时，美国大学的得分就低了，仅仅得了B。要知道，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总体而言在资金和教育质量上都领先于世。但是，守着这么好的条件，美国近年来在大学毕业生在适龄人口的比例方面，正在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赶超。另外，虽然各种数据显示，上大学对个人的经济回报虽然越来越高，上大学的机会也很多，但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比例的扩张却有减速之势，形成“重赏之下乏勇夫”的状态。这次评估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上世纪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发展突然放缓，正在被其他国家赶超。这就使美国难以创造新时代所必需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失败。

为什么这一领先于世的高等教育体系会出现如此的失败？

应该说，美国的大学在追求教育平等方面还是进行了非凡的努力。可惜，努力的结果，仅仅是个B的成绩。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非常不相称。这里的种种复

杂原因，构成了这次评估所分析的中心。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查，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大学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原则，不过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情。大学在传统上就是精英教育机构，一直为精英阶层所垄断。这一现象举世皆然。美国是以草根民主的政治体制立国，自然与旧欧洲有所不同。比如，大学的目标是杰弗逊所谓的培养“自然贵族”而非世袭贵族。也就是说，大学理想的服务对象是有天生禀赋的人，而不是豪门子弟。早在美国建国前，哈佛等学府就有资助贫穷的英才之传统。不过，这种传统和现代平等精神还是非常不同的。“自然贵族”仍然要求人们按“自然法则”各安其位：那些有先天禀赋者永远应该是领袖。那些没有这些素质的，要老老实实地跟随。人类社会有固定的层级，只不过谁属于哪个层级是按才能而非家门而定。现代的平等精神，则早已突破了这种“天才论”的观念，其目标就是超越固定的社会层级，活化社会流动。为此，大学纷纷给弱势阶层一些特别的照顾，鼓励他们摆脱固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套价值目标的确立，基本上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结果：有色种族纷纷进入名校，主要的大学也开始男女合校。

可见，即使在以“人生而平等”的精神立国的美国，大学这种传统的精英教育机构消化现代的平等价值也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而把这种价值在实际的教育中落实，自然也是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复杂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满意的成果。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许多相关政策，其效果要通过几十年对毕业生事业成就的追踪统计才能把握。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以教育平等为目标的政策究竟结果如何，最初的系统数据到90年代才可能被有效地观察到。目前这一“总评估”，实际上是对美国大学在现代平等精神之下所获得的成果的初步研究。

我们不妨从努力和成就两方面检讨最近三四十年美国大学对教育平等的追求。从努力方面看，美国的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资助和支持弱势阶层。其中最为流行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家庭财政状况和录取脱钩。以往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依靠学费来维持，录取时自然要考虑学生家庭是否有能力支付其教育费用。这样，许多贫困家庭的学生自动被排除在录取过程之外。在新的政策之下，大学录取办公室完全无视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只看学生本人的素质来决定取舍。



等作出了录取的决定后，学校对于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学生想办法给予资助。这样，富家子弟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就不可能仅仅靠家里的钱而把穷学生挤掉。当然，这一政策的实施，主要还是建立在大学的财政实力上。到了二战后，特别是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雄厚的捐助基金使其不依靠学费收入就能经营。其重点从保障财源转移到不拘一格招募英才上来。所以，这些一流的私立大学领导着这一新政策的实施，一旦招募了穷学生，就能拿得出奖学金来。应该说，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培养“自然贵族”的传统精神的继续。

但是，常青藤等私立名校毕竟不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要使低收入阶层全面获益，政府必须有配套的政策。自1965年以来，联邦政府逐步推广完善学生贷款制度，对教育贷款的利息进行封顶，并使许多学生在学期间免于支付利息。1973年，联邦政府首次推出了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而颁发的奖学金 Pell Grants。这是美国总额最大的奖学金。如今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子弟读大学都依靠这一奖学金。除此之外，各种民间机构、州政府等等，也都加大了对低收入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资助。

经过这样三四十年的努力，美国高等教育的奖学金结构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流名校不仅对低收入阶层，甚至对中产阶级也开始实施免费教育。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年收入达不到六七万美元这道线（各校标准略有区别），上这些学校不仅不用缴纳学费，而且连生活费和各种杂费都由学校支付。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完成世界最精英的教育。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目前还仅有几个顶尖的学校，另外有一批一流大学接近了这种“免费”的目标（至少基本保证了贫困生的免费教育）。不过，一般的公立大学通过政府的支持也能够对低收入阶层提供相当的财政资助。比如，根据对1999年重要的州立大学系统新生的数据分析，来自年收入最低的25%家庭的学生，平均所接受的奖学金不仅足以支付学费，而且还有将近3000美元的剩余来支付生活费。即使在这一阶层以上的另25%的中低产家庭，孩子上大学所接受的平均奖学金也能够支付学费而稍有剩余。也就是说，在这些大学中，一半的学生上学不必缴纳学费。当然，一个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和各种杂费并非3000美元可以支付。不过，学生除了贷款外，还有各种打工机会。特别是校内的工作，经常有政府的补贴，小时工资的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

看一看这样的奖学金结构，我们很容易把美国的大学看成穷人的天堂：人家

毕竟是花钱请你去读书呀！但是，另一面的数据则揭示了几乎相反的现实。以截至2000年的数据统计，那些来自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5%的阶层、同时父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孩子，到26岁时拿到学士学位的比例仅为9%；而来自收入最高的25%的阶层、至少有一位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孩子，到同样年龄时则有68%拿到大学文凭。如果把统计仅限于高中毕业生，那些来自最低收入的25%家庭的学生，仅有54%会上大学；而那些来自最高收入的25%（年收入在88675美元以上）家庭的学生，则有82%会上大学。以1995年的新生数据分析，在精英大学中，来自收入最低的25%家庭的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0.8%。来自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的家庭的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6.2%。再比较种族群体，在26岁时拿到大学文凭的比例，在白人女性中为36%，在黑人女性中为22%，在拉美裔女性中仅为13%，在白人男性中为将近30%，在黑人和拉美裔男性中仅为11%—12%。根据人口统计预测，从2004—2005年到2014—2015年这十年间，美国公立高中的白人毕业生将减少将近20万，是下跌了11%，拉美裔毕业生则会增加20多万，上涨54%。如果目前的局面不扭转，随着教育良好的白人人口的缩减和教育不良的拉美裔人口的上涨，美国的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的比例就已经不是上涨缓慢的问题，而是可能下跌。

为什么在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制度下，竟出现了如此不平等的现实？如果连如此慷慨的奖学金都改变不了这种不平等，那么还应该有什么政策措施可利用？在这方面，这次总评估给出了非常复杂的结论。

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教育的病症，往往是社会病症的延伸。美国是西方世界中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在教育公平上表现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也在情理之中。美国高等教育上的不平等，主要根植于其义务教育和社会经济的现实。美国以地方自治立国，高度分权。义务教育从一开始就属于地方自治的范围，资金多来自当地学区（一般以镇为单位）的房地产税。这种分散的财政体制，在大部分时间表现得比欧洲那种由中央官僚体系操控的集权制度要有效率得多。特别是美国早期社会非常均富，地方上财政资源丰富，且居民的公共精神高扬，曾让托克维尔感叹不已。倾地方之财力建设学校、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一直是地方社会的时尚，甚至大家以此互相攀比。这也难怪美国的义务教育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迅速超过了欧洲。但是，如今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原来很有效率的



地方自治体系，则使经济的不平等直接转化为教育的不平等。比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发展，高速公路体系的建设，使原来就近混居的富人和穷人更方便分开居住。富裕社区房地产价值非常高，中等房价可达百万美元以上，税源充足，教育经费非常多。但是，贫困地区房价低，中等房价可能就几万美元，税源枯竭，学校难以为继。更何况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遗产仍然渗透在当今的社会中，使黑人和拉美裔教育程度甚低。这就把美国青少年教育的平均水平拉了下来。

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一系列为大学所鞭长莫及的政策措施。这不仅包括改革义务教育，甚至涉及种族、贫困等深刻的社会问题。否则，无论大学如何强调教育平等，许多弱势阶层的子弟也很难达到大学的门槛。不过，大学并非完全无事可做。对于到达了大学门槛的学生，应该把谁优先请进来？大学的录取是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了社会的平等？这是大学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这些评估表明，美国的大学在录取上，根据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的原则，对弱势种族特别是黑人进行了明显的照顾。但是，抛开这些种族因素，大学对穷人则并没有给予应有的照顾。不错，穷学生一旦被录取就可以得到优厚的奖学金，甚至享受免费的大学教育。但是，在申请大学时，如果一个穷学生和一个富学生的资质（特别是学习成绩）相当，那么双方的机会就基本均等，穷学生并没有得到降分的照顾，除非他属于黑人等少数民族。学校显然没有考虑到，一个穷学生在学业上达到一个富学生同样的水平，需要种种特别的奋斗才有可能。另外，穷学生入学后的辍学率明显比较高。这主要是其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的。穷学生在学期间需要打工。而打工时间越长，学习成绩越差。这些最终导致了穷学生较低的毕业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学系统，尽管来自最贫困的25%家庭的学生平均所获得的奖学金在支付学费之外还有近3000美元的生活费，但是，他们还需要3665美元生活费用去填补不足。这对于一个年收入2万美元左右的家庭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学生不得不靠打工来支持自己的学业。

基于上述结论，这次评估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提出了几项政策性的建议。第一，根据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的精神而针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优惠倾斜政策必须坚持。第二，对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在录取上也应该实行优惠的倾斜政策。第三，加大对政府奖学金的投入，对低收入阶层进行更充分的资助。

以上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评估，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贫富

过度悬殊所导致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教育上来，最终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速度，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大学虽然以矫正这种不平等为核心目标，并且倾其巨大的财力奋斗了几十年，但还是有些“胳膊拧不过大腿”。中国的贫富分化比美国还严重，这同样表现在教育不平等上。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远没有确立美国高等教育三四十年前所确立的平等的目标。在现实中，中国的大学一直在向富裕阶层倾斜。再从人口结构和生育行为上看，中国享受教育特权的城市中高产阶层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在教育上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村和民工的人口，生育率则一直比较高。在未来几十年，前者的子弟在人口中的比例会下降，后者的子弟在人口中的比例则将上升。这将可能导致总人口的教育程度的降低。同时，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降低，将要求中国经济从目前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创新产业迈进，大大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和教育水平的要求。当前教育的不平等，则妨碍了全民素质的提高。在中国，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舆论，对在一个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社会中实现教育平等的难度和重要性都远远低估了。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高等教育马上确立平等的目标，并且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几十年下来成果如何也很难有保证。所以，美国高等教育最近三四十年这本账，无疑更加凸显了中国大学的深刻危机。



## 中国的大学如何走出“弱智化”

我在近著《北大批判》中，提出了“中国大学弱智化”的问题。这其实是基于一个小学算术般的常识：如果把大学录取的人数作为分子，把生源（或考生）作为分母，那么，分子越小、分母越大，录取的比率就越低。录取的比率越低，在一般情况下说明被录取者智商越高。因为高智商者在人口中分布的比例是一定的。百里挑一就是比十里挑一要出色。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录取率。一般而言，越好的大学录取率越低。这一现实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个挑战：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到了几乎谁都可以进大学的程度。这还能维持十里挑一时代大学生的智商水平吗？

美国右翼思想家、轰动一时的《钟曲线》的作者之一 Charles Murray 对此作出了回答：美国大学的学生智商水平不仅没有因为教育普及而降低，反而提高了。其中主要原因，是一系列的社会进步扩大了选才面，使过去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的弱势阶层能够参与高等教育的竞争。换句话说，大学生人数（也就是分子）虽然增多了，但是大学的生源（也就是分母）增长得更快。结果是选才更严格了。

所谓“中国大学弱智化”，也正是在这一对照中提出来的。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招生以来，中国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但是，中国在这一期间并没有美国那种导致了生源增长的社会政策。恰恰相反，农村学生在高校的比例越来越小。这说明中国大学的选才面越来越狭窄。如果作为分子的大学生人数不断急剧上涨，作为分母的生源不能适当扩大甚至在某些层面出现萎缩，使录取的比率越

来越高，选才越来越松。当年的大学生也许是十里挑一，如今则二里挑一了。所以，中国的大学正在走向“弱智化”。

此论一出，立即遭到留美博士生（或博士）田方萌和陈心想先生的批评。田先生称我“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引用的数据源自10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陈先生虽然观点略有不同，但在数据问题上也支持田的观点，并对我“科学思维的缺乏”表示遗憾。这里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大学弱智化”的现象是否存在？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第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提高大学生的“智商”。在这方面，田先生特别反对我提出的大学按城乡比例招生的“配额制”。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之争，而涉及未来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共政策问题，值得进一步辩论。

#### 数据纠纷：“弱智化”是事实吗？

对于我的论断的质疑，首先来自沈若愚先生。他考证出，我在论证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过低时所引证的数据是2008年初的一则新闻：“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而这个比例又出于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字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于是沈先生得出结论：“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2009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沈先生的指正非常宝贵，确实更正了我在数据引用中的不精确之处。但是，这种更正是否能够挑战我的结论呢？可惜还是不能。沈先生本人把我的中心论点总结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大学目前招收的农村孩子太少，这不仅是公平问题，而且是效率问题。因为智商在人群中有着固定的分布，大学应该多招收高智商的学生，从而提高竞争力。如果从农村招的孩子太少，就会多从城市招收智商不怎么拔尖



的孩子，所以中国大学会“弱智化”。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

这样的结论错了吗？首先必须指出，在大学研究中引用10年前的数据是非常惯常的做法。举例而言，2005年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一书，曾获2006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优秀图书奖。领衔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G. Bowen。他在1988—2006年间出任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主席。此书是他在主持梅隆基金会期间最主要的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所分析的资料和数据之全面系统实属前所未有的。可是，如此权威的著作，也大量引入1995年（即10年前）的数据。道理很简单，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数据统计非常发达的国家，成熟的数据出来也要有一定的过程，中国的数据统计还非常粗糙，自然更不能对近期数据有过高期待。另外，北京乃中国高等教育之都。北京的统计数据当然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倒是沈先生引用的官方数据让人充满狐疑。在2005年农村学生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是53%，这几乎和当年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同。考虑到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考虑到高考录取中并无对农村学生倾斜的政策，这个比例几乎是个奇迹。

这里，我特别需要感谢田先生推荐了张敏杰先生的一篇文章。此文承认沈先生所引用的教育部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高校农村新生比例逐年上升的事实，但同时指出：

“2005年，教育专家杨东平负责的一项调查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又据清华大学袁本涛教授统计，从1990年至2004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录取新生的比率为44%至51%，县市以及县级以下，包括农村的学生录取率较小。以2004年为例，清华大学新生中，北京学生占13.7%，4个直辖市共录取677人，占新生总人数的20.7%，全国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生比例为46.2%，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为21%。南开大学近3年来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2007年这一数据为25%，2008年为24%，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即使是一直受农村考生青睐的中国农业

大学也是如此，1999年至2001年的3年间，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自2002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

如何解释这些数据的矛盾呢？在没有更详细充分的数据之前，我们只能进行审慎的理性推断。首先，既有的数据显示：在北大清华这种“一流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大致仅占百分之十几，只有清华大学2004年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超过20%，即使如此也远低于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即总人口的55%以上）。《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的报道说，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1/3。第二，在南开这种“非一流”的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还是在百分之二十几。即使在中国农业大学这种为城市学生所回避的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在百分之三十几。这些数据，大体符合一般中国公众的常识。

那么，又如何解释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总数53%的数据呢？我们暂且不去怀疑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先用上述已有的数据进行推断：在“一流大学”、重点大学这些办学条件比较有保障的学校，城市学生占绝对优势。农村学生只有在那些低层级的大学中占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才能把自己在全国大学生中的比例凑到53%。田方萌先生批评我时提供了《广州日报》2009年1月的数据，显示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农村学生比例占了63.3%。其中的唐山学院，是2002年才由唐山高等专科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和唐山市职工大学合并组建本科层次的普通本科学校。另两所学校资历稍老，但也都属于缺乏资源和声誉的弱势大学。在更差的大学中，农村学生也许更多。用简单的话来说，城市学生去了重点，农村学生去了非重点或一些匆忙创办的学校，甚至可能就读于“野鸡大学”。这至少可以说，重点大学的选才面依然因为过度依赖城市而变得狭窄，“分母”还是太小。

北大清华等等“一流”和重点，当然不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全貌。但是，这些学校，是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就如同美国的常青藤、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反映着一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智力。比较一下，两三百年来，常青藤从主要招收美国东北部贵族寄宿学校中的富家子弟，发展到如今海纳百川，选才面越来越广，学生所来自的社会阶层、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越来越丰富，录取率越来越低，选才越来越精，学生的智商也越来越高。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呢？在农村人口占



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情况下，越来越集中于在人口另一小半（即城市人口）中招收学生，甚至越来越被若干精英或重点高中所主宰。这如果放在美国的背景下，就等于从20世纪退回到19世纪。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弱智化”。

从另一端看，大量农村子弟进了非重点或“野鸡大学”，是否能大大缓解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总体上提高中国大学生的“智商”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拼凑几篇论文、弄个博士学位，并不等于有了良好的博士训练。同理，把农村子弟上的学校叫“大学”，未必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基本的高等教育。

农村学生占优的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我们目前并没有全面地研究。不过，我们大致可以从另外一些宏观数据中进行一些推断。比如，最近有报道说，201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630万人，比起2000年时的百万出头，翻了6倍。在此之前还有消息说，2011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758万。十年间大学毕业生增加了六七倍，这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大学扩招的速度。

再拿美国的数据对照一下。1965年，美国大学在校人数尚不足600万，到1974年突破千万大关。众所周知，这段时间美国经历的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使大量女性和黑人进入大学。特别是70年代初男女同校，女生的拥入大大扩张了学生人数。不过，即使如此，十年之间大学在校人数离翻番也还差一小点。自此以后，大学在校人数涨势放缓，到2009年涨到了1800多万，大致是1965年的3倍。也就是说，美国把大学在校人数扩张3倍，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实际上，这段时间美国大学所经历的还是急剧扩张期。不到半个世纪大学生人数涨了三倍，已经被称为历史奇观了。这种扩张最重要的一个底牌，就是美国大学经过将近100年的经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博士课程。

众所周知，博士课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大学教师。没有足够的博士，大学就失去了保质保量发展的空间。美国的博士课程难读、时间长。比如文科博士经常要熬七八年才毕业。不过，大学对博士的资助充沛，博士产量也非常大，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博士过剩的现象。我90年代刚开始在耶鲁读博士时，就看到校报上有位刚毕业的博士发牢骚：过去在耶鲁拿个博士，那叫一个神气活现，哪里用愁自己的生计？！可是，现在毕业，发了几十封求职信，许多求职的地方是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结果呢？大家一致回信来：“感谢你来申请工作，我们对你的优异成就印象非常深刻。可惜，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学术和教学需要选定

十几个面试候选人，你不在里面。”这位老兄屈指一算：几十个学校，每个学校十几个面试候选，加起来就是几百个位置，居然没有他这耶鲁博士的一份！可见大学教师的人才库已经到了“陈陈相因”的爆棚程度！几年前美国的媒体发明了“新常青藤”之说，称因为美国的博士课程规模甚大、人才甚多，一流人才几个顶尖学校根本装不下，分流到小学校去了。结果，一些并不太起眼的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过去常青藤的实力，值得评出几十个“新常青藤”来。我自己博士毕业后就到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学校任教，发现系里的同事，一半都是哈佛耶鲁等常青藤的博士。

中国在90年代末开始大学扩招时，则全无这样的博士教育基础。有哪个大学能够以全奖支持博士读六七年才毕业？读三年匆匆拿个博士学位，外加帮导师打工，如何保证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师资支持如此急剧的大学扩张？

这一背景，更突出了城乡学生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质量上的不同。众所周知，北大清华等“一流”或重点，长期享受国家的倾斜性投资，甚至有能力强把施一公这等在普林斯顿立足的名教授招募进来。事实上，许多海归博士，到中国的重点大学找工作已经越来越难。这些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流、重点大学的师资质量还是有相当的保证的。虽然这些大学近年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但规模还是有限。城里人占据的，主要也是这种学校。真正导致大学生数量10年涨6倍的，恐怕还是匆匆上马的基层大学，其中许多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把大量农村学生安置到这样的学校，使农村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大致符合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并不能说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

### **“空校危机”的前景**

展望未来，中国大学的“弱智化”在未来五六年后将面临的“空校危机”还将进一步加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正在进入急剧的老龄化过程，孩子的减少必然带来大学考生的减少。2009年大学考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首次下降。比如，山东省考生人数为70万余人，比2008年减少了约8万人，减少幅度超过10%。河南省考生总数为96万人，比2008年减少2.9万人。上海市高考报名人数约为8.3万人，比2008年减少了2万人左右。河北省高考报名人数约55.9万人，比2008年减少了1.63万人。其中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的下降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教育部学



生司副司长姜钢证实：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2008年约减少30万，减幅3.8%。而这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200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为849万，2009年则减少到834万，而到2010年则要锐减到803万，两年就减少5%以上。2010年北京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将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较2009年减少了2万多人，降幅为20%。尽管各高校减少在京招生名额，录取率还是可能上升。高考退潮之凶，可窥一斑。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大学连年不断扩招，2009年招生超过600万。考生减少和扩招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高达60%以上的录取率。如果我们以现今1000万考生为基线的话，10%的下跌就是百万之众。

同时另有报道说，2010年中国留美学生将达10万人。这10万人有多少是本科生、多少是研究生，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明细数据。不过，近年来留学年龄不断下降，本科生正在成为主流，乃不争之事实。另外，留学欧洲、日本、韩国、大洋洲乃至新加坡等国家的人数，也肯定是不小的数目。这些学生多来自发达的大中城市，所享受的教育条件要优越得多，是目前占据重点大学校园的主力。如今中国的发达地区不少已经进入国际中等发达水平。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人民币的升值，这些地区的家庭越来越有能力送孩子出国读书。在未来五六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恐怕要翻番。试想，如果老龄化和留学潮把中国的大学考生从现有基础上再降低几百万，那么，中国大学在招生时就几乎没有挑选考生的余地。到时候，高考对许多大学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更不用说，不久前又传来“我国今年将增设43所高校”的消息。这大概意味着中国大学的招生能力还在扩张中。如此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出现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的现象。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是资源相对充足、门槛颇高的重点大学，如果过度依赖发达地区的生源，在出国潮中也会剧烈地感受到脚下的“水土流失”：这些大学忙着巴结城里中高产阶层的学生，但这些学生未必看得起这些大学，乃至高中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就早早留学去了。这就可能使重点和名牌大学也生源萎缩、挑选余地狭窄，进而导致学生智商的进一步下降。

显而易见，这种“空校危机”，除了人口趋势外，和教育不公平大为相关。我们不妨具体讨论一下个案。《新闻晨报》曾报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出现“史上最牛毕业班”：“该班54个学生中，31个获清华大学保送资格，15个获北京大学保送资格，余下的8个学生也分别获得了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的保送资格。”该

校的何校长称，学校是确定了这些学生的保送资格后的重新组合，把他们都集中到一起，直接让交大、复旦的老师给他们开大学课程。因为“已经不用再承受高考的压力，如果把他们放在原班级，按高考的要求就是炒冷饭，低层次地反复重复训练，我认为对这些孩子不公平”。

确实，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跳出高考的死记硬背而直接学习大学课程，是优越得多的教育方式。但是，谁来为这样的教育埋单？重点中学不公正地享受了过多的人均教育资源，已经引起社会的公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不过是这种重点中学之一。如今，其对教育资源的侵占变本加厉，乃至要让交大、复旦等一流大学的老师给学校中的天之骄子们上课。无论是交大、复旦还是华师二附中，都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经营的。目前农村许多地区的学生年度人均教育行政经费还不足三五百元，这笔钱恐怕还不足以支付名校教授的一次讲课费。钱怎么能如此花？交大、复旦的教师如果真有余力教高中生的话，为什么不到贫困的农村找几个聪明的孩子来办个扶贫的大学预科？

如此的教育不公平，实际上是精英重点中学变相挥霍国有资产，将严重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预见，这些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将出国留学，出去的人则绝大部分一去不归。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2009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中披露：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而根据美国最近的统计，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率，中国最高，达到了92%，比排第二的印度遥遥领先了11个百分点。坦率地说，我自己30年前就是作为顶尖高中生考入北大，大学期间虽然立志于中国，甚至放弃了英语学习，但毕业10多年后竟也阴差阳错地加入留美潮，如今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而且没有回国的准备。从我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也看得很明白：中国现在把本来该用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农村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挪用到大城市的一个精英学生身上去花，把这一精英学生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人才，使之有能力竞争进入美国名校，毕业后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雇员，再到国际市场上和那些从小就被剥夺了基本的教育经费、连中学也没有毕业的中国低薪劳工竞争。中国人的血汗，就这样被用来投资、培养发达



国家企业未来的高级雇员。这样拿自己公民的教育经费去给富国请客，难道还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竞争，中国能赢吗？

回到“中国大学弱智化”这个话题。教育资源过多地被城市子弟占有，使中国的精英教育（包括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学）越办越像留学预科，用从穷人特别是农村子弟身上盘剥来的教育经费培养一个特权阶层，其中涌现的优异之士最后还是楚材晋用，导致中国大学的生源流失。同时，农村大量仅享有人均三五百元年度教育行政经费的孩子，本来可以开发成未来中国大学的生源，但由于教育经费分布不均，他们绝大部分几乎不可能走进大学的门槛，使中国大学在不断扩招的同时生源无法同步增加。

总之，美国在大学生持续增多的情况下，选才反而越来越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浪又一浪的教育普及和在社会革命中展开使生源的扩张超过学生人数扩张的手段。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则使许多农民子弟、民工子弟以及各种弱势阶层的子弟根本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义务教育，无法成为新的生源，甚至把本来该投资在这些人身上的钱拿到大学里浪费，造成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如今，大学录取率已经到达60%上下，日后还会不断提高。在享受了种种教育优惠的大中城市，北京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了80%。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几年都在80%以上，在2010年则有望达到100%。这还有什么选才可言？这难道还不是弱智化吗？

#### **美国经验：从“积极行动”到“配额制”**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并非仅仅是大学本身的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育格差，使一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潜在的大学生源之外（如大量农村学生没有条件读完高中，或者读了高中也不具备参与高考的能力等等），这恐怕才是导致大学“弱智化”的最根本原因。所以，矫正目前的教育不公平，必须是全方位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尽早做到城乡教育平等。不过，与此同时，大学的招生政策适当向农村倾斜、建立按城乡人口比例来分配招生份额的机制，也是改变教育不公和大学“弱智化”的重要步骤。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把按人口比例招生描绘为“配额制”。这从字面上并没有错，所以我也接受“配额制”之说。但是，并非所有的“配额制”都尊重人口比例。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在本质上就是“配额制”。各大院校在各省市投放的招

生指标，不就是“配额制”吗？只是这种“配额制”背后的原则不清不楚，无公正可言。按人口比例招生并非我的发明。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就提出按人口比例招生的方案。这仅仅是按地区而非城乡的人口比例。但是，曾以公开发表“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言论而暴得大名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就立即站出来指责这一举措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另外，在美国，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曾于1997年签署法令：在本州高中排名10%的学生，自动被本州的州立大学录取。这样，办学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学校前10%的学生进州立大学的机会就有了保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按“配额”招生的机制。一些考分低的农村子弟得以入得州最好的大学。他们是否也类似于孙教授所谓的（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呢？

在讨论中国的大学招生制度之前，我们不妨先审视一下美国的经验。前面提到的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G. Bowen领衔的集体研究成果《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起点。此书包含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细节，在此无法讨论，兹引用其中的几大结论。

第一，美国的大学仍然代表着世界最优异的高等教育制度。但这种优异的最根本原因，并不在大学本身，而在于义务教育的成功。因为发达的义务教育推进了教育平等，普遍提高了美国青年的文化程度，使大学的生源不断扩张，大学选才也游刃有余。这一点，和保守派思想家Charles Murray的结论几乎不谋而合。

第二，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领先于世，但目前危机重重。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教育平等正从美国教育的优势渐渐变成劣势。目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这种贫富分化，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一些弱势阶层的子弟，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无法成为大学的潜在生源。结果，适龄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虽然逐渐提高，但这种提高速度近年来急剧放缓，有“到顶了”的征兆。适龄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也随之被几个发达国家超过。鉴于目前处于教育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保持现状，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准可能不进反退，无法满足未来知识经济的人才需求，最终削弱国家的竞争力。

第三，近40年来，美国大学为推进教育平等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成绩不尽如人意。在以“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之下，



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族裔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确实受到了相当的照顾。但是，经济弱势的学生，虽然在大学录取中没有受到歧视，但也没有受到优待。结果，中高产阶级倚仗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过多地占据了高水平大学的位置。因此，对弱势种族之外的各种经济弱势阶层和群体的学生采取倾斜政策，乃是美国大学的当务之急。

第四，究竟是经济弱势还是教育弱势更影响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机会？统计表明，教育弱势的影响更大。比如，经济收入最低的25%的家庭的子弟在大学生中占10.8%。相比之下，有38%的16岁的青年人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而这些家里第一代的大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仅占6.2%。可见，父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劣势，远比收入低要大得多。教育虽然属于经济范畴，更属于文化范畴。对弱势阶层的最有效扶助，也许就是创造第一代大学生。一个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就为这个家庭创造了一个“文化楷模”。在这一“文化楷模”的带动下，这个家庭就更容易产生第二代。

美国的经验未必是成功的经验。美国模式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但是，美国的大学在追求教育平等方面毕竟奋斗了40年，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数据，为考查各种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效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很值得中国在探索教育平等时参考。

中国有悠久的科举传统。受这样的传统的影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条不可触犯的“公平”原则。在美国，“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在理论层面也很难成为一条绝对性的原则。且不说许多能力难以通过几门考试的分数来衡量，单就分数所能衡量的能力本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很难实现公正。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挑选长距离自行车运动员时，“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是最公平的。但这里必须有一个条件：大家使用的自行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试想：在四十公里公路赛中，有选手使用的是价格高达几万美元的高科技赛车，另有选手使用的是十块钱买来的轮胎都瘪了的废旧自行车。如果前者先于后者五六分钟完成比赛，是否说明他更有实力呢？即使是以赢为绝对目标的教练恐怕也会对此三思。如果把从孩子出生到上大学为止的教育竞争比为一场长距离自行车赛，双方的条件差距恐怕要比前述两辆自行车之间的差距更大。仅以分数论输赢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这也是大学应该对弱势阶层适当照顾的原因所在。

论者也许会反驳：既然是车不一样，就给两位选手提供同样的车进行比赛。也就是说，不应该让大学对弱势阶层网开一面，而应该加大对弱势阶层的基础教育投入，让他们有和中高产阶层一样的“车”来参加竞争。可惜，在现实生活中，消除教育不平等远非换辆车那么容易。即使经济劣势可以通过财政资助来弥补，文化劣势作为弱势阶层更大的教育障碍，则绝非金钱所能解决。任何社会，都必须面临在基础教育上不平等的现实，并在大学教育中对这种不平等进行补偿。

为了解释起来方便，我不妨借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Martin E. P. Selgman提出的概念：“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这一概念是在反复的动物实验中发展出来，并用于临床心理学以解释人的行为。简单地说，当一个动物或人在某种设定的条件下反复努力试图达到某种目标，但结果不仅是徒劳，而且会带来许多痛苦时，这个动物或人就开始回避这样的努力，哪怕你改变了设定的条件，使其在能够无痛的情况下比较轻松地达到原来的目标，这个动物或人也会因为过去经验所带来的徒劳和痛感已经内化于心，仍然继续采取回避努力的态度。用更直观的例子讲，当一个孩子学钢琴遇到困难时，家长和老师如果在孩子每犯一个错误时都怒斥：怎么这么笨?! 怎么不动脑子?! 你真不是这块料! 那么，这个孩子就可能发展出一种“我怎么努力都白搭”的心理状态，日后不仅是钢琴，哪怕面对其他挑战也容易退缩，最后一事无成。这就是“习得性无助”。如果还是同样一个孩子，当他犯错误时，老师和家长总鼓励说：“你比上次已经好了不少，许多天才的钢琴家当年学起来比你困难呢。这样的挑战，也只有你这么聪明好强的孩子才敢面对!” 久而久之，这孩子不仅在钢琴上，而且在其他问题上都可能发展出一种面对挑战跃跃欲试的本能，最终可能大有建树。这叫“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

我在这里把Martin E. P. Selgman的个体心理学概念扩大为一个社会构成，即某一社会群体或阶层，都可能发展出一种集体的“习得性无助”。美国黑人社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最近几十年，美国为了修正种族歧视的错误及其社会后果，大力推进以“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特别是在大学录取中，对黑人学生降低标准录取。这不仅引起了许多白人的抗议，而且保守主义的黑人也站出来说，这一政策培养了下一代黑人的劣等感，觉得自己不必努力，仅凭肤色来降低标准就可以和别人竞争。当然，还有报道说，许多黑人特别是男性，没有家庭意识，



性关系随便。有的黑人社区，居然没有一位父亲，经常是单身母亲拖着一群孩子。这些母亲打几个工才能生存，孩子扔在街上吸毒犯罪，怎么可能考大学？社会明明给他们提供了种种机会和优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了生活和事业的失败。

这些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检视一下历史就知道，黑人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运而来。奴隶主最后容许黑人成立家庭，不过是因为购买黑奴太贵，希望他们自行繁殖，同时比较好管理。这种环境当然对培养家庭价值非常不利。后来奴隶制度虽然取消，但种族隔离制度一直延续到60年代。黑人不仅被剥夺了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而且为争取和白人一样的机会所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痛苦。久而久之，就养成了集体的“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在许多方面放弃了努力。有研究也表明，所谓黑人智商低，许多都是长期失学的后果。如今，虽然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时代的“设定条件”已经被移除，但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习得性无助”已经内化。所以，美国需要一系列纠正这种“习成内化”心理的新的“设定条件”，使这个群体感到自己的努力绝非徒劳。以“种族平权”为核心的“积极行动”，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新的矫正性“设定条件”。

“积极行动”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总体而言，在几十年间让许多本来无法进大学的黑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许多成为社会精英，功不可没。从黑人大法官托马斯到现任总统奥巴马，恐怕都是受“积极行动”之惠。2008年大选时，一些保守派人士大谈奥巴马进哈佛法学院是否是靠着“积极行动”对黑人的优惠，最终未能找到确实的证据。其实，假设他确实是成绩不够、但靠自己的肤色在“积极行动”的政策下进了哈佛，这难道不说明“积极行动”的巨大成功吗？过去黑人社会很难找到这样的楷模。大家能学的就是些球星，整天泡在球场不读书。更坏的楷模，则是黑帮的头头，或者到处拈花惹草的放荡子。如今奥巴马夫妇以受着精英教育、一边选总统一边开孩子的家长会的模范父母和恩爱夫妻出现，又成为整个美国的领袖。这种“文化楷模”，对黑人社区里那种集体的“习得性无助”就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毕竟，这种“文化楷模”在过去是被邪恶的政治社会的“设定条件”所剥夺的。如果新的矫正性“设定条件”能够加速恢复这种楷模，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正义吗？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反对“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视之作为一种反向种族歧视。不过，即使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也没有放弃扶助弱势的基本原则。这里特别

值得提出的就是前述布什在得州当州长时签署的教育法案。此法案规定，在得州公立高中排名前10%的学生被本州州立大学自动录取。因为美国贫富分离居住，此举使一些办学条件甚差、学术水平无法和优异高中竞争的落后地区的学生得以挤掉发达地区的高分学生进入大学，促进了大学生社会背景的多元化。布什显然将此事当成自己的得意之作，在当了总统后，最高法院正在裁决密西根大学学生起诉学校利用“积极行动”为招收黑人学生而歧视白人的历史案件，布什就把得州的法案知会最高法院，证明不按肤色照样可以照顾弱势阶层，而且这种照顾更加合理。

虽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支持了“积极行动”，捍卫了大学考虑肤色因素的权利，但得州的法案所引起的后果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是得州州立大学的“旗舰”，质量最高、竞争力最强。1997年刚刚实行“前10%”的录取规则时，有37%的学生是靠在本高中排名前10%而进来的。到2000年，这个比例上涨到了47%；到2003年则高达70%；2004年时有所回落，但也到了66%。也就是说，大约2/3的学生是靠着配额制被录取的。在得州A&M大学，一半左右的学生也是靠这种配额制进来的。说配额制成了这个美国第二大州的大学录取主流，恐不为过。

这样的政策很快引起争议。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学生靠在比较差的高中排名前10%而进入大学。而一些来自州里最有竞争力的高中的学生，虽然在本校没有排进前10%，但实际的学术水平比那些在差高中排进前10%的要好得多。前10%的规矩，使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输给了不如自己的对手。

SAT的成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SAT是美国大学录取时普遍参考的学术能力测验，被中国人称为“美国的高考”。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在1997年采取前10%的录取制度时，那些在本中学排名前10%的学生占新生比例1/3强，他们的平均SAT成绩为1249分，明显高于其他学生（1180分）。但是，随着这部分前10%的学生在新生比例中的上升，他们的SAT成绩开始下降，2000年为1226分，2003年为1223分。与此相反，那些不按这种配额录取的学生，随着其在新生比例中的下降，其SAT成绩则不断上升，在2000年提高到1205分，到2003年则大幅度跃进，达到1257分，超过了按前10%的配额录取的学生。

一些担心学术质量的人，据此对配额制提出批评。州议会中也有许多提案试



图修正或限制配额制。比如，有人要把被自动录取的排名从前10%改为前5%。也有人试图限制通过配额制录取的学生在新生中的比例。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在2000年时，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被配额制录取。这部分学生的SAT成绩还是明显比非配额制学生要高的。到2003年配额制学生占了新生的2/3以上，SAT成绩才落在非配额制学生之后，但差距有限。另外，捍卫配额制的人士指出，SAT成绩的说服力有限。事实上，配额制学生在大学的学术表现超过了非配额制的学生。在2003年，配额制录取的学生有93.1%在大学第一年后仍然继续攻读，非配额制录取学生则仅有92.6%。可见配额制学生的辍学率要低一些。

我们还必须指出，前10%的“配额制”，并不是得州的地方政策。事实上，人口第一大州加州和第四大州佛罗里达都有自己版本的配额制，只不过没有像得州这样以法律形式保证了前10%的学生可以任选本州的大学。仅这三大州，人口就占美国总人口的25%以上。另外，绝大多数美国的大学，在录取时把学生高中的排名作为重要因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的配额制。我们还需要注意，以实现“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旨在对弱势种族特别是黑人进行照顾，属于美国左派的社会政策的核心之一。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不时有黑人富家子弟利用这样的政策被“照顾”进大学、抢走了弱势白人学生的位置。另外，这种录取优惠也确实娇惯了一些有条件的黑人学生，使他们觉得凭自己的肤色就能以低分和别人竞争，不必竭尽全力。因此，用以照顾经济弱势为目标的“积极行动”（或可称“经济平权”）代替以照顾某个种族为目标的“积极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保守派试图顺应这一潮流。以得州领导的“配额制”，实际上就是他们要建立一种“更公平”的制度机制，在大学录取中以“经济平权”代替“种族平权”。有报道说，这种“配额制”实施后，得州贫困的白人农家子弟成为最大的受益集团之一。

究竟是“种族平权”还是“经济平权”更公正？这是典型的“美国问题”，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两者在更高一级的原则上还是一致的，即大学录取都应该以某种倾斜性政策对社会现存的教育不公平进行矫正。虽然大家对什么是最有效的矫正方法各持己见，但都偏离了中国传统所推崇的统一分数标准的“公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究竟中国这种除了分数“六亲不认”的科举式统一标准更加公正，还是美国这种考虑到学生的社会背景、把分

数作为弹性标准的原则更加公正？

让我们回到前述自行车赛的比喻。如果一个选手用几万美元的高科技赛车，另一位用轮胎都瘪了的破旧二手车，两者的实力就无法简单地用最后的比赛成绩来衡量（国际自行车比赛之所以不考虑车的因素，多少也是因为各国选手所使用的车大致都是最先进的，彼此的实质性差异不大）。更科学的办法，恐怕还是以车的效率分类，让骑破旧车的和骑高科技车的选手分开比赛，从各组的胜者中挑选最有潜力的选手。在申请大学的竞争中，学生之间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条件，又岂止是高科技赛车和破旧自行车之差！有的学生就读的学校，有自己的游泳池，老师中不乏常青藤的博士。另有的学生，教室的玻璃窗破了都没钱换，许多老师连简单的乘除法都不会。怎么能不问两个人的学习条件，最后以统一的SAT成绩衡量比较他们之间的能力呢？“种族平权”也好，“经济平权”也好，要么把种族群体、要么把经济阶层当做学生使用的“车”。在衡量学生的能力时，除了最后的比赛成绩外，还要考虑本身车的效率。毕竟，能力高低的一大指标，是一个人回应外界挑战的效率。在贫困学校就读的学生和在精英学校就读的学生所遭遇的外界挑战有着质的区别。衡量他们应付挑战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恐怕还是看他们在遇到类似挑战的人群中是否作出了最优的回应。

再从矫正社会的教育不公平的角度看，“种族平权”和“经济平权”所体现的弹性标准也比科举式的统一标准要更有效。不错，扶助弱势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基础教育，使这些阶层或群体中有更多的青年在学业上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用我们中国人的常识来说，就是先打好基础，再求提高。还没有学会爬，就不要总想着跑。用“低标准”把弱势阶层的子弟“照顾”进大学，不仅会导致他们因为缺乏适当的学业准备而失败，而且也可能普遍降低大学的教育质量。前述由William G. Bowen领衔的研究也表明，对弱势最有效的扶助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早期，甚至早到学前教育。

但是，同一研究也得出结论，对弱势的扶助应该形成遍及各个年龄段的全方位政策。早期扶助的有效，并无法证明后期（即大学阶段）扶助的无用。更重要的是，仅仅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扶助，缺乏大学阶段的配合政策，那么也会削弱早期扶助的效率。

用倾斜政策让一些弱势群体或阶层的子弟进大学，一个重要的效果是在这些



阶层和群体里创造“文化楷模”。这种楷模作用，往往比学校教育的改善更重要。前面已经论及，教育上最大的弱势，并不体现在经济收入，而体现在父母的教育程度上。有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好，孩子在学前阶段使用的口语词汇就多。而这种口语词汇量，对阅读的提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教育好的父母无意中就给孩子充当了很好的家教。更重要的是，教育好的父母以自己为“文化楷模”，塑造了孩子的社会认同。记得几年前我们全家刚刚搬到波士顿近郊时，经济上还很困顿，租了个当地最便宜的房子，甚至买不起车。后来为女儿找了位钢琴老师，必须开车去上课，于是在买了钢琴后花了3000多块买了辆二手车。一次女儿在练琴时，房东的修理工来换厕所的部件。他看到女儿弹琴立即惊叹不已，一边夸奖一边用手抚摸着琴键。我问他是否也弹，他马上摇摇头说：“我们这种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位置，玩玩吉他就不错了。”这位工友是个快退休的白人，颇能体现上一代美国劳动阶层的心态。他不学钢琴，不上大学，未必是不喜欢，也未必是没有条件。事实上，他拥有着一艘游艇，这绝对是我们家承担不起的。问题在于，在他的家庭和社会圈子中，没有大学生作为他的“文化楷模”。他本能地觉得弹钢琴上大学不属于“我这种人”。

中国有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俗语反映的通常是社会的成见甚至偏见。但不管这些成见和偏见多么深，俗语被广泛接受，说明其中也渗透着生活的真实。这一俗语见证着家庭传统对孩子的事业至关重要的影响。有人从基因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人的许多素质是遗传的。另有人则从社会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认为父母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有许多资源和纽带，有助于孩子在自己的领域成功。“文化楷模”则带入了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父母传给孩子的不仅是基因，也不仅是自己的关系网络，而是一种社会认同。比如，女儿出生时，我们全家非常贫困，乃至要在她名下领取“食物券”。在6岁以前，她一直是班上唯一一个家里没有车的孩子，对自己的穷困地位有着很强的意识。但是，她一直有着小小的“精英心态”，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孩子、将来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据我对她和她的小朋友的观察，这种“社会认同”在10岁前后已经非常清晰，班里的同学甚至以此划出小圈子：有的属于领袖阶层，有的属于庸众。这种不同的认同，又塑造了孩子们对学业非常不同的态度。那些觉得自己能成大事的孩子非常用功，事事要当尖子，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那些觉得自己碌碌无

为的孩子，则很难集中精力读书。他们的“社会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还在于父母。比如，我女儿有受良好教育的父母。她能领悟到家长的“文化自信”，知道贫困仅是个暂时的现象，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她看着父亲出书、接受采访，觉得这些也是她分内的事，于是，完成学校的作文时不仅仅是交个作业，而且是意识到自己在和整个世界沟通，乃至要数易其稿、精益求精。

所以，在教育上扶助弱势阶层或群体，不仅仅是加强硬件的投入，还要迅速在这一群体中培植一些“文化楷模”。试想，如果仅仅在美国一些破落的黑人社区建立良好的学校，但孩子的父亲多还关在监狱里，那么这些孩子长大后上大学的比例可能依然很低。相反，尽管这些孩子依然很穷、学校的条件很差，但如果他们有许多奥巴马这样的“文化楷模”，看到自己的家长从贫民窟奋斗，最后成为一个哪怕是收入很低的大学教授（美国的许多大学教授收入并不比干粗活的劳工要高），那么这些孩子日后上大学的可能性则会高得多。

William G. Bowen领导的研究坦率地承认：弱势阶层子弟在大学中的表现总体上依然不如中高阶层子弟。这里有许多原因。比如这些学生因为生活所迫实际上是在半工半读，不可能像富裕的同学那样专心于学业。另外，这些学生因为父母教育程度低，在家教上有劣势，未能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对付大学中的种种压力时，也要全靠自己摸索，没有家长作为“过来人”的指导。不过，他们的成绩依然是令人满意的，毕业后也成了相当有创造力的中产阶级。把他们推进大学，是一笔非常有效益的社会投资。更不用说，他们的成功树立了宝贵的“文化楷模”，使下一代弱势阶层不必等着政府或社会的扶助而奋起效仿父母。这种对弱势阶层全方位的教育扶助，恐怕比单向的扶助要便宜得多。在William G. Bowen看来，目前美国只是在种族方面对弱势有明显的照顾，对经济弱势的学生的录取标准和富裕阶层基本一致，这是非常大的不公平。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 为什么中国需要“配额制”？

比起在美国来，“配额”机制的建立在中国又显得格外迫切。如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介绍的，一般美国的大学，都把扶助弱势、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尽管在实践上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大学，则在目标的设立上就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倾向城市的高中阶层，努力让学生的背景更加单一。对此，张敏杰先生已经有所论述：“在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



农村学生比例下降，除了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等原因外，高校招生中的‘城市视角’也挡住了农村考生的门槛。近年来，一部分大学在自主招生时，考试内容和形式多从城市学生出发，比如，看重学生的文体特长，注重学生的知识面，甚至有的只把报名资格和名额分给中学名校，这对农村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大学农村生源下降的趋势还在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的指向其实只有一个——社会公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有些大学以新生中的城市学生比例上升为夸耀的资本，甚至以城市生源达到北大、清华那样高的水平为奋斗目标。以大学毕业生为例，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就业率也较高，而学生就业率的高低将影响大学排名和专业招生规模。”没有“配额”机制，这一倾向就会愈演愈烈。

那么，“配额”机制如何建立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以中国情况之复杂，没有人知道如何建立。其次，历史上良好的制度，也往往并非经过严密的设计一蹴而就的。设计得再好的制度，拿到现实中运用后也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进而引起一系列的修正。好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设计出来的，而是演进的。这种演进，就是根据正当的原则对经验不断修正。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确立正当的原则。这才是本人的目标。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可见，农村小学、中学的人均公用经费现在还达不到300元和500元。另外有几个地方数据也可以参照。根据甘肃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标准的通知》，该省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400元，初中每生每年600元。另据兰州市教育局2008年终的教育统计资料计算，该市平均的义务教育阶段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水平，农村每生每年达到了665元，城市每生每年达到了801元，市本级则达到了1228元。可见，即使在西北的落后地区之内，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明显不公。而与东部发达地区对比，这些差距就更加惊人。根据民革上海市委公布的材料：2004年全市小学生均公用经费1973.80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2635.36元。换句话说，上海市的标准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比当今中国农村所奋斗争取的标准要高出6倍多。当然，上海的物价远高于内陆农村地区。但是，上海的数据是2004年的货币价值，实际价值比5年后同样面值的货币要

高得多。更何况，上海的生均教育公用经费近五六年来恐怕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长。总之，尽管数据仍很不充分，但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之惊人，已经是不该有疑义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义务教育中所应该确立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均分教育资源，并适当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所谓均分，就是在考虑到物价因素后，做到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发达还是落后地区，学生平均教育公用实际经费基本相等。在这个基础上，农村和落后地区应该享受适当的优惠，即其学生平均教育公用经费要高一些。毕竟，目前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许多教育的基础投资（比如校舍建设等等）已经完成，农村和落后地区则尚未起步，需要救助的家庭也多得多。即使是学生平均教育公用经费相等，也难以达到教育公平。适当的倾斜政策乃是必需。

与此同时，大学要确立按配额招生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高等教育中，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都会大大推进教育公平。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楷模”的效应。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种族问题，但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歧视，而且照样有严重的文化恶果。比如，中国用行政手段推行了几十年人为的城乡分离，使城乡居民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社会权利、文化资源上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因而，美国为矫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恶果而施行的“积极行动”政策，为减缓贫富分化所带来的教育不公而实施的“配额制”，对中国都有参照意义。在几十年的制度歧视下，农村人口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沉淀，缺乏信心参与精英教育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点大学、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大量减少，农村孩子就更丧失了通过自己努力进名校的“文化楷模”，最终觉得自己与名校无缘，甚至高中也不会去读。如果中国一半的适龄人口对自己教育的前景失去信心甚至放弃，大学潜在的生源自然会萎缩，最终导致选才面缩小，大学生“弱智化”。

根据北大张千帆教授《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中所提供的例证，“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



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人，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这种政策，自然导致了各省高考录取率之间的巨大差距。以2007年全国各省市高考录取率排名为例，前几名的分别是海南、上海、辽宁、北京、浙江，录取率都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最后几名，则为河北、河南、安徽、山西、贵州、甘肃，基本全是落后地区，录取率最高不过50%多一点，最低还不到40%。同是中国的省份，高考录取率竟可以相差一倍。长此以往，自然造就了大中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地区的考生“天之骄子”的意识，对自己的“文化期求”甚高，无论是其家庭还是个人，都更愿意在教育上付出努力、参与竞争。落后地区的考生，则逐渐丧失了这种“文化期求”。比如，河南是名校投放的招生指标最低的省份之一，而对河南人的歧视，在中国社会中也非常流行。久而久之，河南人就丧失了文化自信，其教育表现也会降低，甚至放弃针对名校的教育竞争。

按人口比例建立“配额制”，当然不是矫正教育不公的唯一办法，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环节。配合以基础教育资源的均分，“配额制”能够大大提高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对自己的“文化期求”，进而更充分地利用改善了的或尚未改善的“办学条件”，奋斗到大学的门槛。而他们的成功，又会给他们的后代创造“文化楷模”，带来长久的社会效应。这些弱势阶层的子弟越是全面地进入大学（特别是名校）的竞争，大学的选才面就越大，录取就越严格，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越有望扭转目前的“弱智化”趋势。

## 清华应该怎么学习美国的奖学金制度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最近在纽约对记者表示，清华大学有意采用美国高校奖学金制度，吸引国外优秀学生前来留学。目前正在策划阶段，尚无定案。

如今是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又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世界一流大学，纷纷把国际学生和教授的比例作为校园多元化的标准。清华立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急着跟风也情有可原。不过，学习国外的经验首先要对人家的制度有深层的了解，否则就成了东施效颦。

不错，“美国高校奖学金制度”确实在“吸引国外优秀学生”方面领先于世。但是，从袁校长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未免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一，“美国高校奖学金制度”并非旨在“吸引国外优秀学生”而设，而是要保证普遍的教育机会，特别是美国学生的教育机会。换句话说，人家是在保证了本国人才得到充分的财政资助后，才会考虑外国学生。这里又有许多具体的政策细节。比如，在大学本科，绝大部分院校集中资助本国学生，外国学生基本是自己掏腰包的。在公立大学（也就是州立大学），不要说外国学生，就是外州的学生，学费也比本州学生高两三倍。这一事实显示的，是人家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州立大学靠本州纳税人支持，当然要对纳税人有所回报。到了研究院，特别是博士课程，外国学生拿奖学金的机会确实大大增多了。但是，这也主要是因为高精尖领域人才稀缺，在本国招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且录取的大权在教授手中。教授一般不看国籍，只选最优秀的申请者录取。即使如此，在许多公立学校，比如加州大学系统，外国学生在争取资助上还是特别困难。美国学生在其他条件差不多



的情况下，拿奖学金比外国学生有着巨大的优势。

第二，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外国优秀学生，并不仅仅是被奖学金吸引。其中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世界一流大学有一半以上在美国，美国的大学在许多学科遥遥领先，甚至占有垄断地位。真正顶尖的人才，是冲这个来的。目前清华当然没有美国大学的财力。即使有，凭着现有的学术水平，也不要指望能招到几个优秀的外国学生。即使把施一公这样的明星教授从普林斯顿挖来，给他足够的经费，让他能给得起普林斯顿水平的高额奖学金，他那个领域中的外国优秀人才，怕是也都会去普林斯顿，而不会跑到清华来。袁校长豪迈地说：“世界上最富有挑战的问题都在中国，要想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就要到中国去，这也是现在我们和国际同行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假大空的话，还是少说为好。美国人平时待人接物都很客气，在教育界更是如此。比如，我28岁才开始学英语，说得一口洋泾浜，国内大学本科生听了恐怕都要笑话，但在美国到处听到的是“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呀”，如果信以为真，甚至为此飘飘然，那就会出刘姥姥的洋相了。

想想看，即使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这30年里，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新发明，哪个是中国提供的？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国际名牌，除了买下人家淘汰的技术和品牌外，只能给人家提供廉价的服务。中国的教育，也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这种情况下，说“要想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就要到中国去”岂不是自欺欺人？想想看，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除了能教教中文外，还有什么教育上的比较优势？

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领袖，还是放下假大空那一套，埋头做点实事吧。其中的实事之一，就是把外国的经验学到家。比如，袁校长看着“美国高校奖学金制度”眼热，那就应该做点家庭作业，了解这种奖学金制度背后的精神，优先考虑几十年一直支持、供养着清华的中国纳税人的利益，让他们的子弟先获得美国水平的奖学金。同时，还要埋头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对自己的大牌教授出现抄袭丑闻都不知如何是好，还谈什么给世界解决“最富挑战性的问题”？我看清华还是别把纳税人的血汗烧在不入流的外国学生身上。如果清华真在许多领域领先于世，你不给奖学金，真正优秀的外国学生也会来。

## 怎样拓展技工教育的前途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研究生就业率低于大学生，博士生沦为垃圾群体……这样的新闻，如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同时，熟练的技术工人奇缺，技工学校远远不能适应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以博士教育带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已经破产。所以我曾提出关闭大部分博士课程，把高等教育中的这部分投资用在建设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也就是我们的大专）上。

我的建议，核心精神是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更有草根性。两年制大学费用低、学制短，立竿见影，让一些弱势阶层比较容易获得基本的高等教育。同时，两年制与四年制大学要有结构性的衔接。读完两年制的学生如果有条件和兴趣，可以进入四年制大学深造，并带入一定的学分。

不过，我一直还没有谈再低一级的教育，那就是技工学校。《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报道，谈马萨诸塞州的技工教育，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美国的技工教育、等级定位不像我们这样明确。一般是在高中最后几年进行，也有在高中毕业后的。这种学校，一般称职业学校（vocational school），有公立私立两种，在私立之中，又有赢利型和非赢利型两种。

大体而言，读技工学校的人，是那种对上大学没有兴趣，或者觉得自己不是读书材料的人。他们在技工学校迅速地学一门手艺，然后就当了管道工、木匠、厨师等等。有人还提出，美国大学过热，应该发展技工教育。现在许多人上大学是看到企业外包愈演愈烈，制造业消失，蓝领找不到工作。其实，大学生的工作，



是最容易外包的。而管道工、木匠、厨师等等，则无法外包，必须本地人来完成。

此话有多少道理，且另当别论。不过，现在美国的技工学校，已经开始转型。那里的许多学生，不再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或与大学无缘。相反，他们觉得技工学校以独特的方式为他们的大学教育做好了准备。

在麻省，将近一半的技工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上了两年制或者四年制的大学，这个比例比1990年高了一倍。有的学生，甚至最后进了麻省理工。越来越多的技工学校督促鼓励学生参加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考试（SAT），甚至开大学程度的高级课程。比如，一个学管道工的，要学三角学；一个学木匠的，要读梭罗的书，并参与重建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那个著名的小木屋。结果，技工学校吸引了相当多高质量的学生。

技工学校与传统高中的根本不同是更强调动手能力。许多有天才的学生，本来是以动手见长，但在传统高中不得不整天围着书本转，丧失了学习兴趣，创造力被压制，学术表现差，最后被认定“不是读书的材料”而被排斥在大学之外。技工学校则把学生送进实验室和车间中。比如有一个女孩，在技工学校的生物实验室中磨炼了很好的动手本领，也接受了良好的古典训练，最后被哈佛和麻省理工同时录取。另一个学电工的学生，虽然才17岁，但在波士顿发电厂工作时，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机器的问题。他颇有体会地说，许多机器的问题，就在于那些设计的工程师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制造过。如今，他带着SAT的高分申请大学。他相信，他制造的一些电动机械，足以给教授们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有些人对这种倾向表示担心，怕技工学校围着大学转，“忘了本”。不过，从课程上看，技工学校主要培养的还是技术工人，仍有半数以上的人毕业后成为地道的“手艺人”。现在只不过技工教育变得更灵活，给优异的人才提供深造的机会，给一些实际能力强的学生提供了准备上大学的另一种途径。

技工上大学，在美国素有传统。比如美国的自动化之父Eli Whitney（1765—1825），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手巧，玩机械比读书聪明多了。当他干了一段技工后决定上耶鲁时，同行慨叹：“一个天才的工匠就这么浪费了。”可是，他大学毕业后，重操旧业，进行了一系列发明，获得了许多专利。他对水力时代工厂的自动化设计，对机械部件的标准化，为日后美国的工业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这一切，都和他亲自动手有密切关系。

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体制，等级过于森严僵化。孩子初中毕业后，上高中还是上技校，似乎一辈子就这么定下来了。这对人才的成长有双重伤害。首先，一些学生因为觉得技校低人一等，进去就等于堵了上大学的路，对之回避。技校本身无法获得社会的尊重，造成技校不足、技工不足的问题。另外，那些选择读高中并最终上了大学的人，进大学前就背书背傻了。在大学里，同学都是读同样的书，参加同样的考试选拔上来的，背景单一，难以彼此取长补短。像Eli Whitney这种手巧的发明大师，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中恐怕早就被埋没了。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更灵活的教育体制，鼓励技校、大专、大学之间互相有条件地承认学分，使学生在这几个体系中自由流动。学生有能力上一年学的，就要有机会上一年。不行就工作一段时间，等日后有条件再接着上。只有这样，才能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才能使我们的学生更有实际能力。



## 怎样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我曾经在《新京报》的专栏中，提出把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当做高等教育的中心：中国的大学总体上面临的发展前景不是升级而是降级；政府应该考虑在未来几年有序地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降为大专式的职业学院，使高等教育结构符合中国未来几十年产业结构的要求。

那么，怎样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呢？首要一点，就是给职业学院以充分的尊严。

为什么中国的大专中专纷纷想升级成为大学，而没有大学希望降为中专大专？这当然是计划经济中的行政级别使然。大学的级别比中专大专高。谁不愿意当个大点的官呢？当官僚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主宰了高等教育时，高等教育的结构就越来越脱离市场的需求，大学生成了校长们官运的筹码，一窝蜂去读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当然也就找不到工作了。

不过，这种官僚逻辑背后，还有一个陈腐的社会共识，觉得中专大专就是不如大学，那里的学生“不是读书的材料”，毕业后很难成为“劳心者”，将来前途也是“封顶”的。比如，我们的中专大专学生，很少有日后上大学的；即使他们偶尔有上大学的机会，也根本不可能把中专大专的学分带入大学。

美国的职业教育，以社区学院为主导，表现颇有效率，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有2/3的员工就是社区大学出身。为什么会如此？一个原因是社区学院不“封顶”。不错，社区学院的学生平均素质远低于四年制大学。但是，社区学院给学生向上发展的机会。比如，有些学生没有钱支付四

年制的大学教育，就在社区学院两年毕业，进入劳动市场，以后经济状况改善后再进四年制的大学，并把社区学院的学分带到大学中。这样，他们基本上再读两年，就可以拿到学士学位。

有研究表明，从社区大学转到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比那些一开始就上四年制大学的人更成功。我在萨福克大学教书，今年班上就有一个从社区大学转来的学生，26岁，比一般本科生大些。他是从经营食品店起家，又在社区学院毕业，慢慢对历史有兴趣，希望读博士，日后成为大学教授。他一上课就显示出优势，甚至把班上另一个曾被斯坦福录取的高才生也压了下去。我特别给了他一堂课，让他讲鸦片战争。他在此之前毫无中国历史的训练，但居然讲得头头是道！事后我请他吃饭时，他坦率地告诉我：工作一段时间，认识了社会，思想成熟，知道教育的重要，更珍惜机会。而这样的素质，一般本科生是很少具备的。

可见，美国的社区学院，不是“终端教育”，不是一毕业就到顶了；而是给起步的人提供一个向上走的阶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走走停停，一级一级向上爬。为证明这一点，我不妨提供两位从社区学院毕业而获得成功的人士的履历表。

第一位名叫Carol Swain。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农村的赤贫黑人家庭。母亲和不同的男人生了12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受虐待的家庭长大，没有一个能从高中毕业，不进监狱已经算万幸。她也从高中辍学，但日后觉醒，先上了弗吉尼亚西部社区学院，在1978年拿了个副学士；后来上了四年制的Roanoke College，1983年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则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在这期间，她曾是拖着两个孩子靠福利吃饭的单身母亲，在老人院、制衣厂干粗活，走家串户搞推销，在图书馆打工。终于，她成为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两名黑人教授之一，后来到了南方名校Vanderbilt当了终身教授。

第二位叫William Green，是个管道工之子，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干粗活，从来没有想到上大学，因为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一个叫Dean College的社区学院看朋友，突然被学校的气氛感染，就到那里读书。如今，他是美国著名大企业Accenture的总裁，并成为该校的校董。他是美国企业界为社



区学院说话的最强音之一。

其他的例子还有许多。不过这两个人的教育经历和业绩能够充分显示出：如果没有社区学院，美国的许多精英，特别是从草根一点一点爬上来的精英，就可能根本不存在。社区学院降低了大学的门槛，可以让许多弱势阶层的子弟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主张在大学的框架中建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制。职业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有能力和条件可以上大学，他们的学分也可以部分带入大学。这样才能创造更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些农民工子弟，也有望从职业学院起步，最后成为我们社会的精英。

## 比比中美的学贷

奥巴马在医改案上刚刚获得了胜利，作为医改案的附属，他又签署了学贷改革方案。此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颇有些启发意义。

奥巴马的学贷改革，大大提高了联邦主要学贷Pell Grants的贷款额（每年将近6000美元）和贷款数量（增加82万个贷款）。由于中美教育费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些数字的参照意义并不明朗。但是，还贷条件则很容易拿来和中国进行比较。

根据这个改革方案，从2014年7月开始借贷的学生，偿还学贷的金额上限从扣除其基本生活费用后的收入的15%降到了10%。另外，如果学生一直接时还贷，最长的还贷期从25年降到20年，在此之后未能偿还的学贷得以免除。

这对一个还贷的大学毕业生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一个城市找到份年薪4万美元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为2万美元。那么，你超出基本生活费用之上的收入，则不过2万美元。这一年你最高的偿还额也就为2000美元。如果你在同一城市找到份相对低薪的工作，仅有3万的年薪，那么你最高还贷额不过是1000块而已。既然是“最高偿还额”，这当然意味着你的还贷额可以远低于这个数字。20年如果还不清，则剩余债务全免。大学四年，你负债2万多。如果每年仅还1000，20年才还2万，连本金都还不清。况且，如果你从事公共服务，比如当教师、护士或参军等等，那么还了10年后就可以余债全免。这样恐怕本金也不用偿还一半。当然，如果你一下子拿了十几万的年薪，你可能两年就把学贷还清了。



学贷是一个社会对下一代的整体投资，不能在具体个案上斤斤计较、一定要收回成本。如果毕业生拿了高薪，说明教育的成功，自当归还投资。但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许恰好说明教育的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向受害者要钱？当然，还有许多毕业生放弃有油水的行当，投身于公共服务，社会应该予以鼓励。你到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就知道，给你服务的经常是一些非常典雅斯文的女士，对图书了如指掌。一查人家的年薪则吓了一跳：才两三万美元。这种人，当是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人家肯为社会干这种事情，社会难道还应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追讨学贷吗？

近年来经常听到中国一些大学毕业生因为无法偿还学贷被起诉的案子，许多学校还为此大谈所谓“诚信”问题。甚至有个案子，是2002年发放的学贷，2008年不还贷就被起诉了。如果2002年贷款的学生是新生，到2008年时才毕业两年！这是否逼得太紧？大学生毕业成了蚁族，能拿什么还贷？另外，中国大学的负债总额或达5000亿。这钱肯定是还不了的。和大学本身无法偿还的贷款相比，穷学生欠的几个钱也好意思追吗？

和美国比较，中国学贷对学生就不够厚道了。如果最能赖账的大学也觉得自己有资格教育学生讲“诚信”，用北京话来说，那才真叫一个“臭不要脸”！

## 中国大学缺乏“中产阶级”

2010年在QS (Quacquarelli Symonds) 颁布的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榜,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大陆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十名, 北大清华和1984年刚刚创建、1994年才成为正式四年制大学的香港城市大学处于同一水平 (北大第12, 香港城市大学第15, 清华第16)。不过,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则被忽视: 中国大陆的大学能进入前200或前100之列的太少, 总体实力太弱。

中国是个金牌的国度: 奥运会排名要看金牌总数而非奖牌总数, 大学盯着“世界一流”, 学术则瞄准“诺奖”。其实, 一国的竞争力, 更体现在中层大学上。“一流大学”全球化程度高, 人才的流动性大。比如, 北大、清华的学生, 出国留学很容易, 实际比例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最高, 而且大多一去不归。其为中国提供本土服务的能力, 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中国真需要高端人才, 则只要有好的环境和条件, 哈佛、耶鲁的毕业生也照样能吸引过来。中等大学则不同, 培养的是中高级人才, 毕业生多留在本国本地服务, 而且数量非常巨大, 代表着劳动力的基本素质。所以, 分析这一排名, 我们必须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应该说, 进入亚洲前100或前200的大学, 都可以列入这个“中产阶层”。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 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之落后就显得非常惊人了。香港人口大约700万, 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 也就是说每百万港人就能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的大学。再加上香港学生的留学率非常高, 2005年15岁以上的孩子准备在未来三年出国留学的就达45700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地两个主要大学的学生人数。可见, 香港学生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最高。接下来是新加坡, 人口不足



500万，2所主要大学都排在亚洲前百位，大致每250万人口就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大学的教育。同样，这里的学生出国率也非常高，大致有2万学生在海外读大学。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台湾人口2300万左右，9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7所大学进入前200位。这也就是说，平均25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13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位的大学。韩国人口5000万左右，17所大学进入前百位，42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29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11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日本排名第五，人口不足1.3亿，30所大学进入前百位，57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4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2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人口超过13亿，仅12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8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在总数量上大大低于日韩，大致和台湾地区相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1.1亿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在这一项上还不如印度，其12所前百位的大学使不足一亿的人口就可以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7400万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以接受前百位大学的高等教育的密度（也就是每个孩子接受这种大学教育的机会）来衡量，中国大陆比香港要低100多倍！我们还应该注意，新加坡、韩国、日本和港台地区，老龄化程度高，适龄青年少，出国率高。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大陆学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距。

前百位大学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大陆，排在前百位的是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北师大。这些不是什么世界一流，而是亚洲一流但质量大致尚可的大学。这种层次的大学，香港高中毕业生基本上想上就可以上。而在中国大陆，不管大学如何扩招，能挤进这些大学还是如同鲤鱼跳龙门一般。

从这个排名看，中国大陆以大量倾斜性投资保证几个重点的战略，效果并不明显，乃至北大、清华不过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水平。更糟糕的是，这种倾斜性投资，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了中国大陆的中层大学质量差的局面。比如，中国大陆进入前100名的大学仅12所，但在100到200位之间的大学更少，仅6所，连武汉大学这类“名校”也不在此列。也就是说，除了重点的重点外，中国大陆的大学质量普遍很差，缺乏雄厚的“中产阶级”。而这将注定中国在未来的高科技竞争中的下风位置。更奇怪的是，中国大陆人的“老大心态”膨胀，动不动就将香

港斥之为“文化沙漠”，乃至我几年前提出“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也成了大逆不道。殊不知，亚洲最好的三所大学不仅全在香港，而且香港大学的平均实力也是亚洲最强的。这种“老大心态”不除，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就更无法正视自己的问题，并浪费向香港学习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